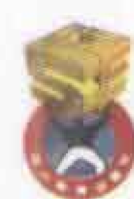
SOCIAL SEMIOTICS



〔英〕罗伯特·霍奇 Robert Hodge
冈瑟·克雷斯 Gunther Kress 著
周劲松 张碧 译

当代符号学译丛 主编：张 杰 赵毅衡

社会符号学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社会符号学

Social Semiotics

很多人认为符号学关注形式，而社会学关心的是内容，两者距离遥远。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误会了。符号学研究人的意义活动，而人的社会生活湮没在意义中：蹈矩循规，礼尚往来，潮流时髦，尊严羞愧，自讨其辱，门当户对，守成进取，继往开来……哪个不是意义活动？可以说，社会学诸问题，正是符号学的用武之地。

赵毅衡（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中心主任）

ISBN 978-7-5408-5973-2



定价：36.00元



当代符号学译丛　主编：张　杰　赵毅衡

社会符号学

〔英〕罗伯特·霍奇（Robert Hodge）　冈瑟·克雷斯（Gunther Kress）著
周劲松（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　碧（西北大学文学院）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符号学 / (英) 霍奇（Hodge，R.），(英) 克雷斯 (Kress，G.) 著；周劲松，张碧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6
（当代符号学译丛 / 张杰，赵毅衡主编）
ISBN 978-7-5408-5973-2

Ⅰ. ①社… Ⅱ. ①霍… ②克… ③周… ④张… Ⅲ. ①社会学–符号学 Ⅳ. ①C91②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1114 号

责任编辑 郑晓韵
封面设计 何一兵
版式设计 王 凌 张 涛
责任校对 吴映泉
责任印制 杨 军 陈 庆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chuanjiaoshe.com
印 刷 四川福润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制 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规格 168mm×240mm
印 张 18 插页 3
定 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调换。电话：（028）86259359
营销电话：（028）86259477 邮购电话：（028）86259694
编辑部电话：（028）86259381

当代符号学译丛

总序

赵毅衡　张　杰

符号学不是一门新学科，却是近20年来发展最迅速的人文社会学科。其原因倒是在学院之外：整个人类文化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剧烈变化，我们都能感觉到一切在变，并给了它各种好好坏坏的称呼："信息经济"、"超级现实"、"平坦地球"、"精神分裂时代"、"泛审美化"、"奇观时代"、"消费时代"、"消闲时代"、"娱乐至死时代"、"历史终结"、"流动现代"、"软件现代"，不一而足。每个称呼都很有道理，都有道理就说明没有一个能解决问题。人类思维的习惯，是从现象纷纭背后寻找一种规律。偏偏在这个紧要的转变关头，我们苦于不理解这个时代，我们焦虑无法把握现象流，更无法窥看一眼可能的未来。

这就是当前符号学繁荣的背景：符号学就是意义学，意义的发生、传送、理解，是符号学的基础问题；文化的定义有几百种，我认为我20年前在《文学符号学》一书中提出的定义依然有用：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因此，符号学既然研究意义，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文化。

当前文化的一个总特点，就是符号活动出现了剧烈变化：数量上是符号淹没人类活动，品质上是符号杂出多元，价值上符号渐渐代替物质成为目的，社会上符号越来越成为权力杠杆。因此，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的焦虑，或许只有强调符号学这个社会文化研究的"公分母"，才有可能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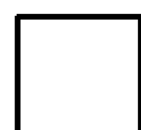
这就是我们策划这套译丛的动机：让我们看看全世界一些最杰出的头脑，是如何从符号学角度考虑当代文化诸问题的。

为什么要看译著？不是说中国人无法独立对付这个课题，中国是世界符号学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先秦名学（墨子名辩论、道家意言说、儒家正名说、名家学说）已经深入研究符号学诸课题；佛教哲学（尤其是因明论与唯识宗）对符号研究作出巨大贡献。进一步研究中国传统，将让全世界符号学界倾听。目前全世界各大学有几十个符号学研究中心，有 40 多份刊物/网刊。中国在符号学研究上，落后于传统文化大国，也落后于瑞典、芬兰、丹麦、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印度等重视学术的欧亚国家。无论是为继承传统，还是为开发学术资源，中国没有理由落后。现在中国各大学纷纷开出符号学课程，本译丛或许能给老师和同学们打开一些思路。

然而，符号学面对的课题，是世界性的。这不是说符号学有“普世性”，而是说符号学研究本身就是跨越文化边界的，是高度比较的。格雷马斯曾经不无忧虑地建议，共通的表意模式，恐怕只能在比较“同质”的文化之间考虑。如果他看到今日全球青少年在打同一种电子游戏，玩类似的恋爱游戏，他做符号模式研究时，可能会放心得多。正是因为看到这样一个趋势，本译丛的编者译者同仁，才坚信这项工程有助于中国人理解世界、理解自身。

符号学—传媒学的理论涵盖面，超出了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围。文学、艺术学、美学、哲学、音乐学、信息论、认知科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研究、商品经济研究、市场研究、城市规划、设计研究、计算机研究、游戏机设计、生态学、旅游研究、动漫研究等等门类，均有学者在应用符号学。他们的贡献，必然会丰富符号学理论。所以本译丛有意挑选多样主题、多方向内容。

身处正在巨变的文化中，往往当局者迷。符号学能帮助我们跳出细节，跳到庐山外，看到云遮雾盖后面的底蕴。莫泊桑经常到埃菲尔铁塔里喝咖啡，他与 19 世纪大多数巴黎人一样，极端讨厌这个竖在眼前的铁家伙，但是在整个巴黎，只有到埃菲尔铁塔里才看不到埃菲尔铁塔。巴尔特分析说这个塔绝对无用，是个不需要理由的空的存在，然后才变成巴黎的意义所在。我们比他们更聪明：我们愿意在远眺埃菲尔铁塔的地方，手握一本符号学坐下来，瞅着这个人类愚蠢的产物，看它在眼前变幻成文明之



美的象征。然后在咖啡热腾腾的雾气中，嫣然一笑：原来变化并不神秘，是我们的解读让世界变成意义无穷，符号化就是我们的生存秘诀，更是淹没人类未来的洪峰。

（附注：本译丛受四川大学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平台的支持。）

序言

本书是一项进行了十余年的课题的阶段性成果。1979年，我们出版了《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Language as Ideology*）一书，这是我们对我们称之为“实用的语言学”或“批评的语言学”六年探索的结晶。这种语言理论，目的是为包括历史、文学和媒体研究、教育、社会学在内属于一系列不同学科的批评理论家——在其文本和话语形式的工作中，他们想要对社会、政治力量及其操作进行探索——针对作为社会现象的口头语言，提供一种富有启发的描述。这一理论在我们的目标读者那里得到了很好的接受。然而，这一理论范畴中却存在着许多内在局限。为了达成一种实用的、批评的语言理论这一初衷，我们感到有必要对其进行修订。其中一些缺憾，我们之后会在本书中来解决。这里，我们要强调两个前提，它们构成了我们现在研究课题的基础。首先，在理解语言结构和操作时，社会维度是重中之重。在《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中，我们认识到也考虑到社会维度的重要性，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同意，语言的文本和结构是分析的正式起点。现在，我们将社会结构和操作、信息及意义作为正确出发点，以此展开对意义系统的分析。其次，就我们的核心立意来说，先前这本著作局限于口头语言，现在看来，有着极大的不便。意义强烈而普遍地存在于其他意义系统中，种种视觉、听觉、行为及其他符码中，仅仅关注语词是不够的。这，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有了第二个前提，即在孤立情况下，任何单一符码都是不可能得到成功研究和充分理解的。所以，口头语言理

论必须放在由所有符号体系组成的理论这一语境中，这些符号体系都是社会构成的，并且都须当做社会实践来处理。于是，我们对先前的课题进行拓展，并将现在这部著作命名为《社会符号学》。

实际上，《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正出自我们对符号学总体思考的语焉不详，因为当时那个阶段，我们还不能对这些问题充分地理论化。那时，我们以为，集中关注符号过程的某个部分——口头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同时将更为广博的框架视为当然，似乎是行得通的。在许多探索领域中，这种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摇摆不定，都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现在的这本书，就是针对《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的一种互补性举措，二者共同组成了我们课题的基本面貌。没有与口头语言以及与各种语言学理论传统的深度关涉，我们的符号学探索势必陷入纠缠不清的一片茫然。没有与一般符号学问题的参照，我们的分析模式，哪怕是口头语言分析模式，对那些研习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学生而言，会大大降低实用价值。在跳出语言理论那些束手束脚的规定这一条件下，我们会继续强调语言理论的潜在价值，强调须把语言学和口头语言研究完全放置到关于社会操作的总理论中去，因为意义正是通过社会操作才得以构建，才具有效力。

我们希望，本书对研究不同领域问题的人都具有实用价值，他们可能学科背景不同，但他们都需要精确追踪各种文本中的意义交流，而无论这些文本是口头的还是视觉的，或是嵌刻在特定对象、举措、实践或行为之中的。但是，尽管我们看到它的价值体现在对一系列学科的各种分析实践活动都有所贡献上，却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只装满特技的宝箱，不论意图和目的如何，任何人都可以能够用得上。我们的工作，是基于交流与社会理论中众多假设之上的。本质上，我们把交流视为一种操作，而不是将其看做由意义或文本所组成的系列被拆解之物。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通过特定的物质形式和施为者方能达成的。它关系到具体的主体和客体，而且除非是从这套关系入手，它根本就不可得到阐释。典型地，社会是由权力结构和关系组成的，为其驱使或受其抵制；其性质正是冲突和协同所赋予的，所以，各个层面上的意义结构，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形式到局部的意义行为，都会以不同比例，以种种方式，显现出矛盾、含混、多义的迹象。所以，对我们而言，文本和语境，施为者和对象，社会结构和诸种力量，包括其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共同组成了符号学分析最为基本和不可化约的对象。无疑，这种分析对象是复杂而苛刻的。

然而，孤立地考虑符码、文本和意义，这种想法看上去是简单多了，实际上，却具有其自身的复杂性，不仅难度没有降低，而且最终远远无法完成任务。

本书思考酝酿颇费时日，在此之中的各个阶段，许多人为之奉献了自己的观点、评论及资料。诸多对我们有过影响的人，都在参考文献部分提及。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韩礼德，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理论著作，如《作为社会符号学的语言》（*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s*）等，还因为他是语言社会功能方面的研究者、教师、探索者，是激励我们的榜样。还有许多学者曾就我们之前那本书发表过评论，即使我们无法全然认同，这些意见还是让我们深受启发并有所裨益。这里，我们尤其要提到皮埃尔·阿沙尔、约翰·弗洛、理查德·赫尔格森和约翰·汤普森。而且，汤普森阅读了本书较早的一稿，对其进行了敏锐而不失宽容的评论，使我们获益匪浅。一些同事提供了很有用的意见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悉尼技术大学的史蒂芬·米克、柯尔丁技术大学的诺埃尔·金以及莫道克大学的艾伦·曼斯菲尔德、霍斯特·鲁斯洛夫和米歇尔·奥图尔。阿尼·戈德曼、史蒂夫·辛克莱、安妮·克兰妮一佛朗西斯、雷切尔·克雷斯、乔纳森·克雷斯以及卡西·米特森等为本书提供了材料、评价和讨论。我们对上述以及允许我们引用其著作和论述的诸位表示感谢。

帕姆·霍奇和吉尔·布鲁斯特对本书的贡献卓著，却只能在此聊表谢意。本书大部分章节都请他们进行了试读，与他们之间的讨论，使得他们对本书的许多观点，贡献几与我们同等。

最后，感谢辛西娅·贝克，她那双充满魔力的手让失去的东西完好如初，混乱而难以辨认的纸片被她整理为一份漂亮的打印稿。

目 录

第三章　作为意义的语境：符号活动维度

第四章　作为意识形态的风格

第五章　真实的社会定义

第六章　转换与时间

第七章　爱与权力的转换：叙事的社会意义

第八章　进入符号活动：为文化而培训主体

第一章　社会符号学

对许多人而言，符号学（semiotics）这个术语是比较新鲜的，在使用方面也有许多概念上的困难。符号学被定义为“关于社会中符号生活的科学”（索绪尔 1974）。如此定义之下，使得其范畴既惊人的简单又惊人的丰富。从符号学角度讲，文化中的一切都可被看做一种交际形式，它们以类似口头语言的方式进行组织，并按照通常的一套基本规则或原则得到理解。在今天的学术机构中，对该现象的研究往往是在诸多学科中进行，不成体系而且零散，略举最为突出的，就有心理学（其中派系林立）、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及电影研究等等。符号学承诺把交际现象作为一个整体，以有体系的、全面和条理清晰的方式对其进行研究，而不是仅仅研究其中的某些现象。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就符号学试图将自己建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言——不知是好是坏，它实际并没做到这一点——符号学伊始之际，便充满不安和矛盾。符号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足以令人对它的宣示郑重对待。然而，符号学也承受着一系列批评，这已经汇聚成一种力量，对其构想和实践的合法性形成了严峻挑战。批评的核心前提是主张符号体系的社会维度是其性质和功能所固有的，所以不能将体系割裂开来加以研究。“主流符号学”强调结构和符码，但牺牲了符号体系的功能和社会应用，以及社会实践中各种符号体系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而这些因素，正是符号学的动力所在，正是其出发点和目标、形式和实质。主流符号学重视的

是体系和生产，而不是具体社会语境中以不同方式彼此关联互动的符号活动中的说话人、作家或其他参与者。它赋予权力以意义，而不是赋予意义以权力。它抹去了符号学领域的界限，却默认了将符号过程与社会、将符号学与社会和政治思想隔离开来的那堵厚墙。

由于上述反对意见，许多提出了值得我们尊重观点的同事，对符号学本身是拒绝的。他们认为这些缺点是根本性的，是与该研究领域密不可分的，因此，他们认为符号学不可救药，纯属陷阱和虚妄。对此，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立场。我们认为，重建符号学的尝试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种尝试承认对之所做的批评是有力的，但又超越了它们。它吸纳符号学现有形式所具有的力量，并且甘愿冒我们将无法全然避免某些局限的危险。重建工作必须进行，因为，不论这些批评在其自身方面如何适宜，它们都缺乏让人信服的分析实践。符号学，或者说某种符号学，必须为分析实践提供可能性，因为不同专业学科的许多人，都在对付关于社会意义的不同问题，都需要多种途径来描述和阐释意义的构成过程和结构。大部分符号学都没有抱着这种运用视角，而这正是本书要承担的任务。

意识形态综合体与思想控制体系

社会符号学必须依赖一些有关社会与意义的一般性假设。我们本身的出发点来源于马克思的著名论断：

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das Bewuss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ss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

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1970：42）[①]

这一论断强调了具体的个体，他们相互作用，并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他们是意识的基础和源泉，*Bewusstsein* 这个德语单词在此被翻译为“意识”，其所指涉的却是符号操作的一整套东西，包括施为者、对象以及源于物质和社会世界、且只能在此基础上才能得到理解的种种力量。各种交际形式（德文中之 *verkehr*，意即交流，交换体系），都与社会组织的特定形式相呼应，这是其存在所不可或缺的。

与大部分其他社会形态一样，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权力和其他产品分配不均的状况。因此，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存在着社会结构上的裂隙：这样的社会显示出特色的统治结构。为了维系这种统治结构，统治集团试图用反映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力利益这样的形式来表现这个世界。但同时，他们也需要维系作为其统治条件的稳固联系。被统治阶级并非总是处处无法看到对这些统治结构的运作。于是，渐次地，他们会竭力抗拒统治，常常也能够在社会结构中不可胜数的社会交锋中获取成功。

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中进行反抗或采取对立的那部分人之间，必然存在双重性和矛盾性，从此之中，暧昧的意识形态问题应运而生。意识形态被视作虚假意识，是以“上下颠倒”、本末倒置的方式表现世界。但意识形态也如其所应该的那样展示了世界的形象，或者如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视角所见，或者如同有利于被统治阶级的视角所见。为了把握意识形态这一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我们要谈到意识形态综合体（ideological complexes），这是功能上相互关联的、由对世界种种矛盾看法所组成的集合，它由某个社会集团出于自己特别的利益而针对另一集团强行施加，或者由另一集团为了自己利益试图进行抵制而针锋相对地提出。意识形态综合体之所以存在，是为了维系权力与稳定的关系，它以同时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服务来表现社会关系。利益的实际对立，催生了综合体中必然存在矛盾。综合体的构成要素，包括以下两种模式：关系模式（对各社会施为者、行动、对象等等的归类）和行动模式（对社会施为者而言，什么行为、动作是需要的、允许的或禁止的等方面的规定）。这表明了这样一

① 此处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译者注。

种意思：我们要使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内容）”这两个术语，来表示对于一个社会阶级或社会集团有着特别功能、定位和内容的社会意义层面。我们注意到，其他人同我们使用这些术语的意思不同，他们的理由也同样充足。用法多样可能造成混淆不便，但却无法轻松得到解决，而且，这个术语过于重要，社会符号学的确无法抛弃不用。

构建意识形态综合体，目的是为了采取特定的方式，通过建构作为社会行为基础的各种现实样式，对行动做出限制。由于意识形态综合体把矛盾性的符号形式作为解决态度和行为矛盾的工具，因而它们是不可能独立起效的。矛盾中对立的双方都想把对方消灭掉。因此，我们要调用信息的次一级层面，该层面不仅对意识形态综合体的运作进行调节，而且还与意义的生产和接受直接相关。

对信息的每个生产者而言，要想信息按照其所预计的那样起效，就得依靠它的接受者。这就要求信息接受者在另一层面上了解信息，了解那些为如何阅读该信息提供了特别知识的信息。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笑话”，笑话是一种陈述，本身可能被证实为对接受者有所冒犯。笑话信息的制造者却要依赖这一事实，即听笑话的人知道，这样的陈述，也许附带有其他“笑话”标记，是“不会被当真的”。听笑话的人也许不知道那层信息——就像在跨文化交际中很常见的那样，或者选择拒绝那层信息——譬如一个少数民族成员就会不把冒犯性陈述当做“笑话”。运用反语，是另一种使用次级信息调节信息功能的浅显易懂的情况。我们将这种更高级的控制机制称为“思想控制体系（logonomic system）”，该术语源于希腊文逻各斯（logos），意为思想或思想体系，也指用以表达思想的语言或话语，nomos即控制或指挥机制。思想控制体系是一系列规则，规定着意义生产和接受的条件；它规定了在什么条件下、带着什么情感态度（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以什么理由），针对什么主题，谁能宣布启动（生产、交流）或知道（接受、理解）意义。思想控制体系在生产和接受关键点上对社会符号行为做出了规定，因为如此，我们得以区分生产体制（production regimes，即对生产加以制约的那些规则）和接受体制（reception regimes，即对接受加以制约的那些规则）。

思想控制体系本身就是一系列的信息，是意识形态综合体的组成部分，它的目的是为了在实践中使之意义明确。在统治结构未受到挑战之时，思想控制体系通过保证符号行为的活动来最终确保统治结构的统治地

位。一旦统治结构面临危机，思想控制体系极可能成为竞技场。思想控制体系会得到具体社会行动者（父母、教师、雇主）的专门传授和保护，并通过原则上可以进行研究和分析的操作，对特定状况下的具体个体进行压制。思想控制体系受到诸如儿童、学生、雇员等社会行动者的挑战。思想控制体系必须清晰明确，否则就无法运作。在礼仪习俗、礼节、产业关系、立法过程等等领域中，思想控制体系尤为昭彰。

思想控制规则表现在关于人、话题、生活环境等一系列划分上，这些是长期博弈之后形成的结果，但追根溯源，还是源于统治群体的统治观念。思想控制体系必然对来自交流过程的系列信息进行编码，因而标识出统治群体和被统治群体之间的关系状态。譬如当某种思想控制体系允许把对妇女有所冒犯的一段话解读为“笑话”，这就意味着一种特定的性别关系结构，其中相对女性而言，男性不但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群体，而且需要掩饰他们对女性的敌意与侵犯。

因此，思想控制体系暗示了一种社会理论、一种认识论以及一种社会情感态度理论。和意识形态综合体一样，思想控制体系反映了社会组成中的矛盾和冲突。典型地，它们具有一个总体结构，这个总体结构是（表达统治者的统治权的）一般性规则与（有条件地承认被统治者反对的）其他或例外相加所构成的。这样，在功能和内容方面，意识形态综合体和思想控制体系就被彼此联系起来，思想控制体系通过控制一个个的行为（符号活动）来表达意识形态的内容，而意识形态综合体则作为一个整体，投射出系列矛盾，使得统治前提不仅取得了合法性，而且为其强化赢得了诉求空间。

信息、文本与话语

对符号的结构和操作进行分析时，社会符号学大量援引了来自主流符号学中的术语和概念。但符号学尚不具备共同认可的术语和概念。即使有，社会符号学也得对其中一些进行重新定义，方能表现自身对社会行动、语境和运用的强调。下面，我们将对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所用的关键术语进行描述。

拥有具体存在的最小符号形式是“信息（message）”。信息具有直接性——有其渊源和对象，有其社会语境和目的。信息指向符号活动操作，

意义正是通过这一社会性操作得以构建和交流，它所发生之处，我们称之为“符号活动层面（semiosic plane）”。信息是关于被认为存在于自身之外的某事物的。信息与信息通过某种方式指涉的世界彼此关联，信息的意义就来自信息所实施的这种再现或模仿功能。我们把再现所发生的层面称为“模仿层面（mimetic plane）”。

但符号活动领域并不简单地是由信息累积构成的。在符号行为中，连串的信息在符号活动参与者间穿梭往返。在言语交际研究中，针对这一更大符号单位，常常使用“文本（text）”和“话语（discourse）”这两个词。我们在扩大了的符号意义上使用“文本”一词，用以表示信息结构或信息轨迹，它们都具有社会赋予的统一性。文本一词来自拉丁文 *textus*，意为“编织在一起的东西”。话语一词常常用于与文本同类之物，但我们对两者有所区分，坚持用话语来表示文本嵌刻于其间的社会操作，而用文本来表示产生于话语之中的具体物质性客体。文本与话语的指向不同。文本的主要指向是模仿层面，在这里，它因为投射出某种样式的现实而具有意义。话语则更直接地指向符号活动层面。

文本还同另一个重要概念——体系（system）——彼此相对。主流符号学发展出符号体系的概念，将其作为在文本中得以实现和具体化的抽象结构。对于如此体系，主流符号学倾向于将其处理成一种静止之物，以为它是一种社会事实，与社会发展、变化过程无关。相对而言，我们强调，每一符号体系都是符号活动操作的产物，都记录着该符号体系自身的建构史。体系中的术语根据其在该体系中所处位置而具有自己的价值。同时，体系在文本中不断得到再生产和重构。若非如此，体系将不复存在。所以，文本既是符号体系的物质现实，也是不断有着变化发生的场所。

文本与体系间的辩证关系总是发生在特定符号行为之中，亦即话语之中。在这一意义上，话语是这样一个场所，在这里，社会组织形式与符号体系在文本的生产过程中彼此关涉，从而对构成了文化的系列意义和价值进行再生产和改变。所以，譬如医学机构制定出一套专门的意义，它总是要涉及该机构相适的社会操作，关系到病人、医生、研究人员等重要参与人群。在他们所生产的这些相互行为和文本中，这套意义不断得到应用，并在应用中面临断裂的危险。对社会符号学而言，文本和话语这两个术语代表了同一现象层面之上的互补性观点。但是，尽管我们强调话语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却并不表示，文本和信息就是非社会性的用语。在其生产

与再生产之际，文本和信息二者都代表着特定的社会关系。

体裁、顺从和反抗

为了探析微观、宏观结构间的关系，我们需要一些居间的范畴。种种思想控制体系拥有约束文本和话语一般形式的规则。这些体系常常通过对文本的体裁（genre，联系生产者、消费者、主题、媒介、方式和地点的文本典型形式）做出规定来进行操作。这些东西不仅控制着文本生产者的行为，也控制着潜在消费者的期望。体裁规则是思想控制体系的范例，也是思想控制体系得以运作和传达的主要途径。和文本范畴一样，体裁是对符号形式具有的社会属性的界分。

只有在一个社会群体宣示并实施那些使之合法化的规则时，体裁才会存在。譬如有明确规定来调控参与者之间的相互行为，即所谓委员会会议。也就是说，由一个社会群体来建立、承认和命名特定一类场合，并且，对针对以什么做法来约束这些场合中参与者的行为，也有清晰规定。委员会会议操作中形成的文本，因此而拥有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对参与者的实践和相互关系、参与者的期望和目的进行编码。这样的文本形式——无论是作为“完全记录”还是“会议摘要”——本身都被认为是体裁，是具有效力的符号范畴。其他例子也很容易想到：譬如访谈、讲座、专题报道、聊天、小说之类。每一种这样的体裁，都对社会参与者之中存在的“特定”关系进行了编码。这里所讨论的规则体系，在某些事例中（譬如采访）要比其他事例中（譬如小说）更显而易见，但可见程度不高并不就等于运用得不充分。所谓“小说的兴起”乃是一部历史，追溯了一系列历史特定关系，涉及阶级地位、性别定义（和话语）、技术状况、休闲与教育、基于阶级的家庭的概念，诸如此类。从其“兴起”开始的小说这一体裁的历史，也包括了这些关系的嬗变，以及其作为新话语的重要因素、作为现存话语中那些嬗变的表现。体裁由此代表了一个符号学范畴，这个范畴对社会变化以及社会斗争所产生的作用进行编码。

过分把注意力集中在规定性体系（思想控制体系、体裁、意识形态等），会产生一种内置性歪曲，并会强化观念的主导作用。就其得到有效施行而尚未遭到有效抵制而言，这些体系仅仅是限制了非统治群体的行为

和信仰。留心符号操作细节，便会发现不计其数的对抗事例的实质，在这些事例中，权力中发生的那些次级嬗变都产生了重大效果，促使统治结构发生改变，有时是被统治集团取得成功，有时是统治集团取得成功。这种操作在葛兰西关于霸权结构及其建构的著作中得到了详尽的描述。斗争与反抗的操作，本身就是社会组成的决定性方面，影响了符号体系的各个层面。在微观层面，权力被放到每一次交际中去检验，而思想控制体系，典型地，通过把大块符号活动领域划为“私有”而成为检验的记录，且此“私有”须被当做超出“公共”/社会范围之外的东西来处理。与之相仿，通过将矛盾形象纳入其强制性结构，意识形态综合体试图在对抗中先发制人；即便如此，矛盾还是在那里存在着，无声地宣示出统治阶级的权力局限。所以，统治者和非统治者之间的意义和利益是按照非预先决定的比例共同作用的，这构成了每个层面上意义的诸多形式和诸种可能。我们并不认为抵抗总是成功而有效，但是，我们也不会像许多研究社会意义的理论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想当然地以为抵抗总是被毫不费力地收编，被弄得毫不重要。

社会符号学和文本分析

通过对一幅万宝路香烟的展板广告进行分析，我们将阐明对社会符号学的基本描述，在那上面，名为“使用展板涂鸦反对不良促销”的群体（简称 BUGAUP）添加了一些修改（见图 1.1）。



图 1.1　已被修改的万宝路广告。

我们的阐述从对思想控制体系的描述开始，这里的思想控制体系，即控制这个文本的正常生产和接受的一套社会信息。从符号层面和从围绕文本生产的那些条件开始，我们想说明的是，社会符号学描述不能从幼稚的文本——语境入手，恰恰相反，它必须将语境理论化，并将其理解为其他的一系列文本。

原初的广告是一个大规模文本，被显示在一张展板上，展板本身挂在一个公共空间的砖墙上。这直接标识着一套思想控制规则：树立如此尺寸展板的权利，明显掌握在当地政府法律以及控制着譬如这幅广告之类信息在“公共”空间里出现的代理商手里。该广告在此出现，就已经表明，这个文本得到了极为不同的各种制度的合法授予。这里，我们取得了这个体裁的一个社会决定要素：当地议会依照法律或按照自由裁量权，既能够决定文本是否可以出现在这里，又能够决定哪种文本可以出现。进一步控制广告在此出现的，是向广告人出租空间的代理商。从观看/观察广告的人的观点来看，这对接受是有重要影响的，哪怕这些东西没有被经过此处的读者注意到。该文本具有制度化了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只要想象一下如果在那里出现其他文本，我们就会很容易体会到这种影响：譬如一则鼓励吸食海洛因或者鼓吹释放一个被警方判处监禁的囚徒的信息。这样一种文本在此处出现将会是“让人震惊的”。

文本本身是有大小和类别的，这暗示了对重要物质资源的使用。这种资源的可取得性，被读者理解为生产这一文本的前提条件，它赋予文本以特定地位，并将读者置于特定位置。在本例中，该文本是作为“对抗”的一个部分而出现的系列文本之一，所以读者/观众可能会在电影、电视、杂志中，看到类别与之极为相似的其他文本。

这些东西表明了思想控制体系的某些方面，它们已进入该文本生产、外观和接受之中。它们为该文本投射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特定关系。读者/观众被以特定方式安置其中：他们虽然是参与者，却无法参与任何意义制造的公共活动。这种参与的可能性被明确地排除：法律保障展板不受“侵扰”。他们只能“私人性地”观看、阅读、回应。由于该文本所具有的普泛性结构，他们被当做（潜在的）消费者而成为言说对象。如果读者允许自己被建构成消费者，那么，这就赋予了他们一种权力。所以，作为读者，他们毫无权力；而作为消费者，他们却拥有权利，尽管这种权利是以该文本制造者赐予的礼物这种样式体现出来的。对读者/消费者进行

安置/建构这个问题，让我们对模仿内容的意识形态结构有所思考。原初的广告图片上，是一个牛仔的剪影和一大盒香烟。上面的文字是“新颖。醇和。万宝路。”（New. Mild. And Marlboro.）。这句话中的句号是很重要的。这些文字不仅仅是单词或者省略句：它们是“陈述句”。作为读者，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的是每一个陈述都包含着大量的意义域。所以，就算我们希望开展大量的符号工作，但我们已被当做读者，已然完全成为身在这些陈述意义内部那个群体的成员。此种条件下，在积极阅读/投身其间过程中观众/读者的位置，与其意义已经完全熟悉的文本之间，会产生出某种张力，该文本是通过这种张力才得以运作。这是意识形态综合体中固有位置的一个方面，或者说，一种效果。如果我们从事这种阅读，我们将被迫尝试着重新追寻已经在前面那个广告文本中建构出来的路径，其中“新颖”是现代人类的基本品质，不仅要求他们自己须做到，也要求其他人以及所有对象都须做到。但是，“新颖”同时也处于透过牛仔这一浪漫化形象所流露的怀旧和敏感这种张力之中——尽管牛仔是非常“老旧”的，但他却既是“新颖”的都市人，又能够在都市人的户外活动中如鱼得水。“醇和”与图上那刚毅的男子气概的形象及其生活方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个词在这里出现，还指向对其他话语的压制/否定：那些与健康相关的话语（反吸烟运动），以及那些与性别相关的话语，这个词可能被建构成针对女性主义者对男子汉气概这种传统观念所做批评的一种回应，因此醇和/温柔可能用来表示那种“新颖”的男性的阳刚。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阅读立场和阅读本身都是性别化了的。该文本的制作者可能有刻意的意图，要在这里吸引“女性”观众，这样的观众，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和“醇和”而不是“硬朗”所标识的价值观念接近的。在该语境中，我们也可联想到为什么在澳大利亚女性消费者会构成了香烟消费市场中上升最快的部分的原因。

对这一意识形态综合体的有些反对，是通过缺场而存在的：女性是缺场的，但她们不仅被“包括”在“醇和”的效果之中，而且还被“包括”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中：至少某些女性读者/观众会“认同”这个新颖、老派、醇和、硬朗的男性假想伙伴。这个牛仔是一个工人，在这里，他没有老板，他自己就是老板；不受束缚的个体，只身“抗争”或率性而为，这些观念，与该文本大部分观众/读者的生活结构，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对立和矛盾。

于是这些便成为构成该文本的意识形态综合体的一些特征。直接相关和具有偶然性的社会结构和实践的方方面面——许多都表现为（系列性）文本形式——如何在该文本的形成中产生自己的影响便很清楚了：对反吸烟运动文本所做的半遮半掩的回应，女性主义对传统男人气概样式的解构；以“新颖。”和“万宝路。”样子表现出来的、由其他同一产品促销者所带来的其他的相似文本所具有的那种压力。当然，尤其重要的是该商品制造者的需求，他们要维护或者——如果可能的话——提升他们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在所有方面，文本的结构都总是一种表征，表明了由社会要素构成的综合体正处于运行之中。

不过，如图所示，一种特殊的阅读方式入侵了这个文本，这种方式小心地利用了该文本中意识形态综合体的某些矛盾，这就是由 BUGAUP 所进行的阅读/重写。这种阅读/重写既反抗意识形态综合体的意义，也反抗思想控制体系的意义。后者把读者定位为交际活动中的被动角色，懦弱且易于妥协，而 BUGAUP 的阅读则以激进的方式对该体系进行了抨击。个体可以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对一本杂志中的广告进行丑化；作为一种私人行为，这绝不会掀起什么轩然大波。通过对展板的“丑化”，BUGAUP 的读者/作者把自己植入到了一个被禁止的符号角色之中，成了在公共地方以公开方式呈现颠覆性意义的交际者。他们不仅公然挑战公司的权力，而且暗地里挑战以地方权威、以掌控“公共”文本著作权和内容等作为代表的政府权力。在这么做的过程中，他们却又不得不面临另一种矛盾，即虽然政府坚持在每一个香烟盒上发布健康警示，控制或禁止在某些媒体发布烟草广告，但同时，政府又依赖着来自烟草税的国库收入。

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BUGAUP 的作者利用了我们已经提到的某些矛盾。“醇和。”所蕴含那些围绕阳刚/女人味以及健康的复杂意义，被改成“邪恶”而一笔勾销了。骑手和马所暗含的统一性（完整人性的一个方面）被削弱了：让马说出的那些话，暗示了女性主义者对这种男性建构的批判，同时，使得女性同这类男人产生认同的可能性灰飞烟灭了。这就是说，这种改写使用了被压制的话语的诸多方面，至少是将由女性声音发出的回声写了进去。

正如原初广告的效果之依赖于意识形态和思想控制信息的联合效果，这种挑战也是从这两个层面汲取力量的。通过同时揭露和颠覆思想控制规则的方式，它说服了那些通常消极地受到这些规则约束的人们，而这种压

力的释放，又促使他们对这样的广告进行反对。相反地，那些赞成政府有权控制意义的人，则可能拒绝这些信息，认为它们“幼稚”、“品位太差”，即使他们并不赞成吸烟。

最后，我们需要考虑被理解成不断流动的符号活动的话语层面。作为文本，原初广告从与其他文本间的互文性关系中获取意义，这些与之具有互文性的文本包括那些具有更完备叙述的电视广告，以及由万宝路（或其广告代理商）和其他公司所创作的大量其他文本。BUGAUP 所做的评论，也许在无数读者的私人话语流中已经发生过。在这些读者那里，展板的意义有可能在连续不断的话语行动链之中得到了讨论、认同或反驳。这种情况下，文本的意义在话语操作中可能受到极大的改变，对文本的分析，针对文本的总的有效性而言，也有可能会被误导。BUGAUP 加上的那些东西，组成了一个具有对话特色的文本，在这个文本中，对原初文本的一种读法被发掘出来，并被纳入该文本自身之中。然而，即使有了这种互动之后，话语流仍将继续下去，在与其他话语施为者及其利益的关系中，对新文本进行定位。文本这个概念必须得到保留，并同作为操作的话语概念彼此对照，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文本是一个过于有限、片面的分析对象。文本只是话语的迹象，僵硬而封闭，有时可靠，有时给人误导，没有定准。围绕文本流的话语却又消失得过于迅速。所以，分析工作应当兼顾文本与话语两个方面。

就使反对性阅读清晰可辨而言，上述这个特定文本并不具有典型意义。文本将针对它的这些反对性阅读呈现出来，并不是为了回避对立，压制从反面进行阅读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是无法忽视其存在的。在阐明任一阅读的各种操作过程中，该文本表明了什么是完全典型的却又是典型不可见的。社会符号学不能把自己的分析限制在包括 BUGAUP 或类似团体所做评论在内的文本上。它所确实需要的，是承认在围绕文本建构意义时话语流所具有的重要性，并且找到把这种操作本身转变成各种文本的方法。意义总是在符号操作中得到沟通的，绝对不是无所不能的作者通过绝对的符码从上而下无情地强加的。传统符号学喜欢认为，相关意义在文本自身之中都是僵化而固定的，通过客观、中立、为符码使用者所通用的编码体系，分析者就能将其提取出来并进行解码。社会符号学认为，文本实际上无法生产出它们作者所期望的意义和影响：斗争及其不确定的结果（这些必须在社会行动层面上进行研究），以及它们在意义生产中的影响。

第二章 回顾奠基之父

在本书中，我们会提供一种专门认识，论述符号学能够是什么及应该是什么。然而，我们对符号学的看法，不可避免地要在其他类型的符号学中得到定位，并且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还广泛地借鉴了他人著作。我们所主张的社会符号学并非一种自成体系的事业。它是从以特定立场对先前著作进行精细的批评性阅读发展起来的，它对这些先前著作的某些部分进行了扬弃，对其余部分进行了吸纳、重组和改造，使其成为一种理论，而这种理论所想要做到的，就其本身而言它须是符合逻辑而且有力的，就其做出判断的，不论新奇与否或者源出何方，须取决于它对那些从事着类似我们所做探索的那些人是否有效、实用。所以，在本章中，我们会大致勾勒出我们的立场，并且针对现代符号学奠基人的某些著作和现代符号学中某些奠基性概念，从这种视角切入，展开批评式阅读。

如同所有社会活动一样，符号学也拥有影响着自己现状和未来的过去，这一过去，也同样是在历史中建构出的，它使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交叠显得既不可避免又难以挑战。符号学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应该做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某种特定历史样式已经给出了专门而且有限的认识基础，而我们，则想要与此展开竞争，提出我们的看法。我们称这种认识基础为主导性传统，但并不认为这就意味着它是铁板一块，或者在它为了证明自己拥有过去而回顾从前时，它就如此连绵无尽、没有断裂。我们想做的，既不是要与过去决裂（即使是假设这是可能的条件下），

也不是要对它进行重新组合，挪用它所拥有的权力。相反，我们会竭力恢复它此前被封闭的某些可能，并对过去处理得不成熟、不理性的某些分歧和矛盾做出强调。至此，我们一直在谈“传统符号学”，仿佛“社会符号学”与之是势不两立的，其实，这是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事实上，传统符号学的所谓“传统”，不仅并非独石一块，甚至连作为一种理论与概念组成的、得到一致认可的东西它都算不上，它也根本不可能决绝地把社会一维抛在一边。对于这样一个如此难以定型且不断变化的东西，我们并不打算对其做出清晰的综述，因为做到最好，这种东西都会显得太肤浅、太冗长乏味。所以我们反其道而行，我们会批评性地检视某些关键人物的著作，这些人物在符号学这一事业形成的关键阶段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思想理念。

在进行如此的检视中，我们首先不能忽视的，就是索绪尔，在符号学的所有方面，他都被称为这个学科的奠基之父。人们有时把他和皮尔斯相提并论，但他的思想无疑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作为日内瓦大学普通语言学教授，其门生后来也都在欧洲的著名学府里占有一席之地，索绪尔的地位对于其影响的广为传播非常有利，即使在他逝世后也同样如此。他的思想遗产形成了现代结构语言学以及结构主义符号学。另一方面，皮尔斯，他的思想是从美国19世纪末学术思想体系的边缘发展起来的，并且他的一些弟子本身就非常杰出，以至于他们有资格认为自己不必效忠于他的观念。符号学界的某些描述暗示，从两位奠基之父繁衍出了两种传统：源于索绪尔的、重视理性和结构的大陆符号学；源于皮尔斯的、更具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色彩的美国符号学。虽然美国符号学派确实拥有自己的特色形式，但对皮尔斯表面尊重与否却并不是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皮尔斯的符号学观点散见于他的文集，相比某些自称他的追随者所提出的那些机械性理论，他的符号学观点实际上要更为微妙和流畅。并不存在着什么皮尔斯式的反传统，美国土壤上也没有结出什么累累硕果，使之能够与索绪尔的欧洲符号学相抗衡。但是，皮尔斯的确做出了自己的工作，虽然不成体系，但他对符号活动和思想的观察，却处处充满犀利而闪亮的观点，这些观点至今有待人们付出努力，将其恰当地整合到普通符号学理论中去。

就其根本上是一个学院派人士而言，皮尔斯是一名哲学家。在知识被建制化的阶段，哲学有着广阔的视野，致力于关于语言和思维一般性问题的研究。皮尔斯实际上已经用到了符号学这一术语；其他哲学家对于语言

和意义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反思，却没有用过这个术语。某些思想家，譬如现象学传统中的胡塞尔，以及维特根斯坦，发展出了众多符号学性质的观点，但它们今天大部分都还止步于符号学传统之外。这些观点当然不乏影响力和支持者，但这种影响却被贴上了“哲学”的标签。于是乎，语言学就在既没有符号学，又没有语言哲学的情形下踽踽独行，而语言哲学则与更广阔的符号现象彼此隔绝，降格为对哲学语言的无休止分析，以之作为自己名正言顺的对象。

“奠基之父”这个条目空间如此有限，但另外两位思想家却必须包容在内。一个是弗洛伊德。尽管像皮尔斯一样，他的思想也产生于边缘地带，但时至今日，他的影响之巨大已经无可置疑。由于拉康的拥戴，弗洛伊德作为始创符号学家（a proto-semiotician）的身份已得到认可。当然，拉康本人对弗洛伊德和符号学的看法并非确定无疑和无所不包，弗洛伊德思想在普通符号学中的地位也并没有盖棺论定。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设想的符号学重建，是沃洛辛诺夫的著作和巴赫金学派。沃洛辛诺夫的代表作（1973）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他对同时代的索绪尔进行了批评，但在西方，这部著作仅仅最近才开始产生影响，才开始被认为是一部具有潜在决定性意义的、能动摇索绪尔学说的理论性著作。沃洛辛诺夫极大程度地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滋养，而在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西欧和美国理论界是受排斥的。不过，沃洛辛诺夫及其学术团体的其他成员，也同样被斯大林主义打入冷宫数十年。对沃洛辛诺夫的重新发现，还起到了塑造当代索绪尔的作用，它赋予了那些由索绪尔发起的话题以新的生命，为一种新的符号学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和方向。

索绪尔的垃圾箱

一眼看去，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是一个令人奇怪的文本，它过于仓促地催生了符号学。在书中，索绪尔明确提到“符号学”的篇幅只有三页。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只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利用了符号学现象。其所举的例子主要来自他的特殊语言能力研究领域，即印欧语系中的语音流变史。这种矛盾在索绪尔留给我们的问题式遗产当中处于核心位置。一方面，他所倡导的学科具有最为宽广的范畴，可是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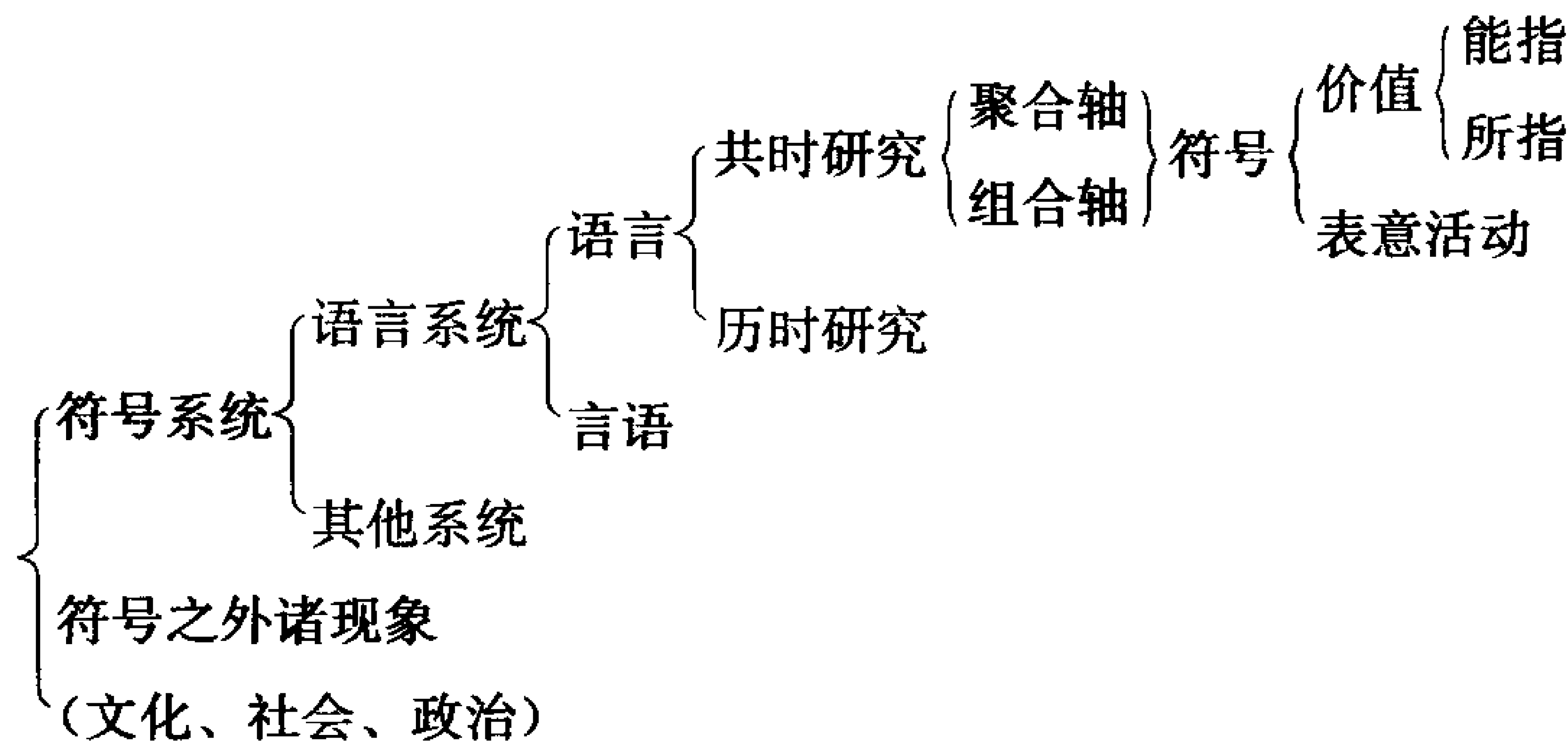
方面，他又制定出一系列限制，把他的理论遗产一分为二，这不仅使语言学发生扭曲，而且阻碍了符号学的到来，长达数十年。

我们可以从索绪尔著作的多个方面来看待这个矛盾。他在讲求精确和学术性的比较语文学传统中接受训练，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的主要目的，是对印欧语系进行历史重构，但这一传统实际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巴利和泽歇哈耶，索绪尔《教程》的编纂者，对索绪尔的动机做了这样的描述："我们常常听到索绪尔发出哀叹，遗憾自己学术发展期中用来对语言学进行标志的原则和方法过于匮乏。终其一生，他始终在固执地寻找能够在混沌中为他的思想指示方向的那些法则。"（1974：xxix）在《教程》中，索绪尔投身于构建一个崭新的、更为广泛的研究领域的任务，所以，他构思了一幅简单、明晰而全面的图示，按照这种图示，这种封闭且狭窄的工作——他认为这种工作很符合自己的气质——就能在他所如此渴望的确定性伴随下，再度继续下去。他的基本策略是规划出一个庞大且没有差别的场域，然后，通过一连串显明的二分法对该场域进行划分；接着除去每组二分法中的另外一半；结果，索绪尔得到了一系列的分界线，每条分界线都被视为对语言学和符号学绝对的、不断的窄化。这里需要质疑的是这些分界线所做的排除工作。符号学甚至今天依然需要索绪尔所用到的术语，而与这些术语打交道，就必须对这些分界线所标识的初始场域进行重新审视。索绪尔的分界划得十分彻底，而且，他本人对界线的需要，在许多学者那里也得到了共鸣，这些学者在语言学界和许多其他文化研究领域中都已经建构出了许多难以撼动的界限。

索绪尔那些著名的成对范畴常常被孤立讨论，但是，它们应该被理解成一个严格方案的组成部分和该方案进程中的诸个连续性阶段。在我们对索绪尔思想的总结中，我们将对这个方案的进程加以概括。在寻求纯粹的研究对象过程中，索绪尔首先做出区分，哪些是属于语言内在的东西，哪些是属于语言外在的东西，不过后者对语言现象这一研究趣味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现象包括了文化人类学、政治社会史、制度史、地理学等等。在对第一重区分进行厘定之后，索绪尔提出将外部语言学（external linguistics）剔除出去——即使他在别的场合还是坚持认为，语言是不可化约的"社会事实"。他把经过剔除之后剩下的部分归到一起，提出要将其作为更大的对象加以研究。这里所谓更大的对象，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符号体系。索绪尔把这种研究命名为"符号学"，并提前预言了它的存在，尽

管他本人实际上没有对之进行研究。

如此的口头语言，被索绪尔表述为一个如此的符号体系。然后，他把这个对象分成两个类别："语言"（langue，由潜藏于话语之下的原则所构成的抽象体系）和"言语"（parole，人类话语：字面意义上的"语词"）。他认为，从本质上看，言语是一片毫无秩序可言的沼泽，是个体言说者对"语言"诸要素所进行的具有无限性和任意性的组合。他把言语作为不能被体系化研究的对象加以抛弃。然后把语言划分为两个部分：共时的（synchronic），即对语言——某特定语言群在任一特定时期所存在的体系——各个阶段所进行的研究；历时的（diachronic），即对跨时间的体系中那些变化所进行的研究。索绪尔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历时研究上，但他却把这些划为不可体系化的东西。对他来说，历时性变化基本上是零散的、非理性的。然后，索绪尔在两个轴上对共时性语言现象进行了描述：组合轴和选择轴，后者他称之为联想轴（后来，耶尔姆斯列夫在1953年将其分别重新命名为横组合轴和纵聚合轴）。共时语言学处理符号，符号在横组合或纵聚合的体系或结构中具有其价值和位置，也就是说，具有表意活动；共时语言学同时也处理存在于语言之外的指涉对象关系。基于与框架中其他部分也相互一致的那些理由，索绪尔选择了对价值（位于体系中的那些关系）和表意活动展开思考，而不是对指涉对象展开思考。符号本身具有双重形式，这是由能指（意义载体）和所指（概念或意义）共同组成的。索绪尔并没有完全忽视对所指的思考，但他的主要兴趣放在了能指上。能指也具有双重形式，它的双重形式是由物质实体（譬如钢笔画出的一笔、一个物理性的声音）和作为精神事件的实体形象。出于个性化的考虑，索绪尔把对物质符号的研究降格为语言学之外的一种学科。于是，整个框架看上去是这样的：



这个方案中居于下方的，代表了索绪尔垃圾箱中的内容，对这些，他要么排斥要么简化。不过，被他排斥在外的部分是如此重要，以致人们不得不把这个人总是在犯错当做是一个很有用的现象。按照这种推理，那么，只要是索绪尔拒绝的，就一定是重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当然是太简单了。因为他所做的排斥行为和压制行为，总会使被压制东西的回归。那种被压制的东西乃是他体系里活力洋溢的原则。这种被压制之物，始终是能量、运动、操作，而无论什么发生了变化，或者什么引起了这些变化，或者怎么来描述这些变化。所以，索绪尔关于社会性高于个体性这一断言所表示的，只是抽象而僵化的那种社会秩序受到了不可胜数的个体活动的潜在威胁罢了。然而，在语言层面上，他主要研究词汇或短语，而不是更大的话语结构。也许，这可以被看做索绪尔更关心的是单个的语词，而不是语词存在于其中的那些结构。但是，在一个更为深刻的层面上，他的这种关心却泄露出，他一心停留在那些能够被确定因而也能够被了解的东西上，即使他所付出的代价是只见到一片混乱喧嚣，旋动于语言学和符号学疆域之外的生活与话语中：在言语中、在社会中、在历史中以及在由物体与事件构成的难以驾驭的物质世界中。索绪尔竭力尝试逃避这个由种种操作所构成的世界，他为之所付出的努力，正表明他是充满爱怜地承认这些力量的，即便在他的理论之中，它们仅仅是作为被否定之物而出现。

以索绪尔为反向导（antiguide），我们可以将他所禁止的东西颠倒过来，将其改写成一种替代性符号学的基本前提（这样一种替代，在他的著作中是确已有之却未予明示）。这种替代性符号学至少包含了对以下诸个部分的研究：

1. 符号学内部固有的文化、社会和政治；
2. 伴随口头语言的其他符号体系；
3. 言语、言说行为、以其他符码形式进行的具体表意实践；
4. 历时性、时间、历史、过程和变化；
5. 表意操作，表意体系与指涉结构之间的相互交流；
6. 所指结构；
7. 符号的物质性。

社会与符号

在沃洛辛诺夫 1929 年的著作中，他把索绪尔那些理论从头颠了过来，正如我们上面所做的那样。他的批评具有典范的流畅度，至今仍值得密切关注。他把索绪尔式传统贴上“抽象客观主义（abstract objectivism）”的标签，并剖析了其核心错误，即“伪核心”（proton pseudos）：“抽象客观主义，通过以语言体系作为对象并将其当做语言现象的整个要核，把话语行为——言谈——作为个体性的某物加以摒弃……［但是］言谈乃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一论断指出，把将语言和言语分隔开来的做法，以及关于言语太个体化而无法成为理论对象，所以必须摒弃的观点，都是索绪尔思想中的致命错误。针对索绪尔致命的二分法，沃洛辛诺夫还对符号学现象的统一性进行了重新构建，他提出了三项主张，坚持物质性和社会性维度对于符号学分析是具有根本性的：

1. 意识形态与符号的物质现实不可分；
2. 符号与社会交际的具体形式不可分（必须看到，符号是有组织的社会交际的组成部分，因为如此而无法在其之外存在）；
3. 交际行为和交际形式与物质基础不可分。（1973：21）

沃洛辛诺夫本人关于符号社会决定论的观点，在关于个体和集体结构关系方面，并非没有问题：“符号形式首先要受到相关参与者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制约，同时，还要受到参与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直接条件制约。”（1973：2）在这里，“同时”一语的使用将一般性社会组织与相互作用的直接条件联系在了一起，尽管这样一来，在解释符号行为中作用于参与者那些限制条件和决定因素中，社会符号学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就被轻描淡写了。沃洛辛诺夫所做的，是把话语行为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将其当做个体之间的交流，而这些个体的意识则是已经在社会中得到建构的。这里所强调的是生产这一层面对符号学分析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对于种种话语作用与阶级社会中种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彼此相关关系，以及不同层面上的思想控制体系的复杂结构，他却没有在阐述中进行展开探索。此外，

普通符号理论必须尽力对整个系列的符号行为进行理论化，包括写作、艺术、电影和大众媒体等，参与者在这些符号行为中的关系，要比在面对面的谈话交流中复杂和抽象得多。但这仅仅是说，沃洛辛诺夫把重要的任务留给了社会符号学来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我们觉得，他关于“参与者构成的社会组织”与“相互作用的直接条件”这两个阐述，可以称得上是再管用不过了。

沃洛辛诺夫建立了符号学和意识形态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没有符号，就没有意识形态……一切意识形态性的东西都具有符号价值。”(1973：9）这里，他是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对此，我们稍后会做分析。此处值得强调的是，对他而言，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语言，都不是将其不可抗拒的统一性强加于一个无助社会这种一成不变的现象。相反，在他看来，社会的特点是斗争、冲突以及不断进行着重新协调的关系所赋予的，而且，符号活动以其典型的形式反映出这个过程。这里，他所提出的“腔调（accent)”这一概念非常有用。腔调是一种特殊的语音变化，为一系列明显共通的符号赋予不同的社会意义。譬如不同话语腔调会标识出阶级和地域身份的差异。除此之外，对沃洛辛诺夫来说，通过与不同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相互关联，腔调还影响到符号的力量和意义。他把语言体系看做是典型地“复调性质的（multiaccentual)”，表面上看来共通的符码，由于不同阶级或团体所处的位置而发生折射、偏离。从这个角度上说，不可能把意识形态看做独一无二的一套意义或文本，以一种绝对的要就要、不要就拉倒的方式自上而下强加而来。对索绪尔而言，语言必须是一种总体上说来具有集合性质的现象，否则，它就会是非社会性的、不可理解的。对沃洛辛诺夫而言，种种差异之间斗争、谈判、创造和解决的过程，既是社会性的，又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正处于符号学探索的核心地位。

我们相信，作为一种概览，沃洛辛诺夫的基础描述对于社会符号学而言是基本恰当的。剩下的任务是以此为基础进行建设，并且面对实施这一计划过程中的种种困难。但是，指出有可能在这个方向起到引领作用的西欧传统中的几个方面，仍然是值得的。譬如皮尔斯对语言和符号曾有一种对话式的认识。“每一种思维都是一个符号，”他宣称（5.470)，“所有的思维在形式上都是对话性质的。某一时刻的你会诉诸你的深层自我，以获取其允许。”(6.338）与沃洛辛诺夫不同，他把构成思维的交流内在化了，将其作为个人

心理事实表现出来，没有明显地扎根社会操作之中，因此，这是皮尔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缺陷。但是，反过来说，这与俄国心理学家维戈斯基后来（1962）发展起来的关于思维操作的描述，基本上是相同的，而维戈斯基本人所受到的影响，正是来自于沃洛辛诺夫和巴赫金学派。

皮尔斯也很重视对符号研究中的操作。对他来说，符号学乃是“关于符号活动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变异的学说”（5.488）。符号活动在这里就是一种操作，符号的行动，并非一个语言的结构或一个代码。“我用符号活动来指一个行动、一种影响，是说涉及诸如符号、该符号的对象和该符号的阐释符号这样的三个主体之间的彼此协作。这种三元关系的影响，无法以任何方式化解为发生在两两成双之物彼此间的行动。”（5.484）准确地说，皮尔斯到底用“阐释符号（interpretant）”表示什么，是并不清楚的，他的理论也多有争议。但是，符号过程涉及交换这种关联着对象、符号和阐释符号的操作，则是十分清楚的。阐释符号是和符号相互关联的一个更进一步的观念。“一个陈述的阐释符号是其表述。”（5.473）阐释符号的生成，表面看上去，其操作是无限的，是一种无止境的符号活动，非常像自由联想这种操作方式。但皮尔斯坚持认为，这种自由和无限是有两个限制的。符号与阐释符号之间的关系，仍然受与对象、与物质性存在之间关系的控制。阐释符号无止境的流动，还受到他所谓“习惯”的控制（4.536），即关于思考和推理文化方面的专门规则，这些规则与我们前面称之为思想控制体系那些东西是相互呼应的。所以，与索绪尔不同，皮尔斯把意义看做一种内在性的操作，而非符号或文本的某种质素，而且他看准了一个地方，既能适合意义的物质决定因素，又能适合个体思考的总的社会文化限制。

即使是索绪尔，也不应被视为义无反顾地反对符号学的社会基础。实际上，正是在这一论题上，他的作品显示了一种深刻的分歧，这种矛盾贯穿了他的著作。譬如，他列出了决定语言学范畴的三个目标：

1. 描绘并追溯所有可观察语言的历史……

2. 决定所有语言中普遍性地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推导所有专门历史现象可以归结其上的一般规律；

3. 解脱自身束缚，为自身做出定义。（1974：11）

目标 1 和目标 2 突出了对影响语言的历史和社会力量进行研究的重要性；而目标 3 试图把语言学从符号学那里割裂开来，从社会和历史阐释中割裂开来。这一系列目标并非要对该学科这种更为宽阔的范畴表示敌意，而是对该项事业感到深刻的两难。索绪尔其实并没有将他所谓的外部语言学抛弃一旁，他指出："我相信，对外部语言现象的研究的成果是极其丰富的；但如果说我们不研究外部现象的研究就无法理解语言学的内部机制，则是错误的。"（p. 22）这个表述明确承认了外部语言学的价值和重要性，同时，也为内部语言学做出了吁请。后来的符号学家们以抽象、自主的内部语言学的名义，纯粹抛弃外部语言学，援引索绪尔来证明他们的做法是合理的。这对索绪尔并不全然公平，因为他在这个论题上也是摇摆不定的。

符号如何工作

索绪尔弄混了符号活动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使他的某些最具影响力的论断受到了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波及这个问题中看上去并不居于讨论核心的那些方面。例子之一是他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arbitrary）这一学说：他用任意性表示（至少在口头语言中），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和"自然的"关系（譬如："马"这个词，拉丁文 *equus* 也好，希腊文 *hippos* 也好，指的都是同一种动物）。所以，在"马的属性"这个概念同拉丁文、希腊文单词（以及其他语言中的许多其他单词）之间，并不存在什么自然联系。显然，就其所说的而言，这种观察是非常有意义的。然而，索绪尔对这一论题的处理，附着了令人惊讶的重要性。他宣称，这就是"语言符号的首要原则"，其他无有过之。

事实证明，这是颇具影响而且有害的言过其实的陈述。实际上，正如某些有影响的符号学家所说，即使是对语词的声音，这也不可能绝对而且始终都正确。对口头语言中所有符号而言肯定也不都正确：索绪尔本人就承认，譬如句法模式，常常是他所谓"有理据的（motivated）"，即以某种理性的、"自然的"方式同其意义彼此关联。譬如英语中句子的主语首先出现，正是关于其重要性的有理据的能指标志。在口头语言之外，非常多的重要符号类型非常明显地具有特定的合理性（正如索绪尔本人所承认

的)，因而要把任意性这一学说认定为符号学中一种普适性学说，实在是太困难了。皮尔斯有一种更有帮助作用的符号分类。他把符号分为三大类："象似符"(icon，建立在相似性或相像的基础上，譬如路标)、"指示符"(index，建立在相近或因果的基础上，譬如作为火的符号的烟)，以及"规约符"(symbol，仅仅是约定俗成的联系，类似于索绪尔所谓任意性符号中存在的那些联系)。用索绪尔的术语来表述，那么，三大类中的头两大类是有理据的。综观整个符号类型，似乎不可否认地，符号中存在着一个从更富有任意性到更缺乏任意性或更多地有理据到更少地有理据这样一个连续性。坚持认为符号统统地或同等地是任意性的，不过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对普通符号学而言是没有道理也没有任何裨益的。甚至索绪尔的术语"任意性"和"理据"也不乏误导性意味。有鉴于此，我们换用"透明(transparent)"这个术语来表示能指，表示它与所指之间的联系可以被使用者轻而易举地看到，而无论这个使用者是符号发出者还是接受者。同时，指向问题始终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同样一个符号，可能对其发出者而言是透明的，对其接受者却不是透明的，反之亦然。我们将与此相反的品质称为"不透明(opaque)"，这也是同特定行动者相互关联的。

但是，这种替代性提法并未阐明，为什么索绪尔会觉得坚持把任意性放在首位是必要的。与之形成悖论的是，索绪尔如此认定的动机，正在于他觉得，社会在决定口头符号体系中具有压倒性的权力。这一立场的逻辑可以分析如下：当索绪尔将其习惯的二分法思维方式运用于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时，他看到了两种可能。一是基于其物理属性，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关联关系，或二者之间不具有这种关联关系。索绪尔的兴趣，如前所述，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对语音和词汇的研究上。审视过去和现在的语言，他发现，语词的变化多样，是与作为同一个概念的语言本身彼此呼应的，而这些跨越时间的变化又如此地具有延续性，因此，他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存在抗拒这些社会和历史力量的什么自然纽带。所以，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学说，是用一种戴上面具和借助否定的方式，表达了符号的社会决定论原则，这同沃洛辛诺夫所采用的形式，有同样的力度。

但是，索绪尔对该原则所采取的形式却没有沃洛辛诺夫的那么有帮助，而且，在实践中，它毫不惊讶地阻碍了社会符号学的发展。这是因

为，对于社会对语言的决定，索绪尔不仅将其看做是无限的，而且认为从其内部而言是不可理解的。这就是他使用“任意性”这一术语的原因，仿佛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纽带关系必须臣服于社会这个威力难测的集体存在的那些心血来潮。将这些符号称为“约定俗成”，正如包括索绪尔在内的许多人所做的那样，并不会更好一些，因为这仍然是把决定的源头归结为社会，对研究这种决定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并没有鼓励的作用。沃洛辛诺夫的工作为探索表意活动操作的性质提供了清晰的框架，他的方法是把这种操作放在一个更宽广的背景之中。在这一背景中，各种社会力量的活动的确十分有力，但却并非不可理解。

我们将再次使用 BUGAUP 的万宝路广告来对符号任意性实际分析所具有的关联性进行阐述。一方面，从“醇和”到“邪恶”的改变，看似很小，却产生出一个鲜明的对比性意义，这暗示出这两个词的语音所具有的任意性，想必索绪尔就会这么认为。“咳嗽”一词是任意性更弱、透明性更高的符号——它部分地是对咳嗽这个行为的重复——尽管两者不完全相同，而且得到了习俗的支持（“hack”，“cuck”，“cack”以及其他带/k/的发音，都同样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但是，这种文字书写风格自身也是一种符号，它能清晰地表现它与其意义之间的关系。挑战者那种粗陋的涂写，同原初广告那种匀称的、机器制作的文字书写，两者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用皮尔斯的术语来说，原作的样子乃是一个指示符，乃是关于香烟工业控制大量技术资源的一个能指，而涂写，则表示对霸权结构的弃绝。这一意义编码在书写风格之中，正是总体效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符号是高度理据化了的，或者说是极其透明的。然而，它也是特定社会形式所特有的，因为确切地说，它正是从关于发达技术社会的结构和物质实践的某些假说中获得了自己的意义。这个符号既透明又为社会所特有这一事实，有助于它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与其他更为不透明的符号体系一道，创造出相关文本的总体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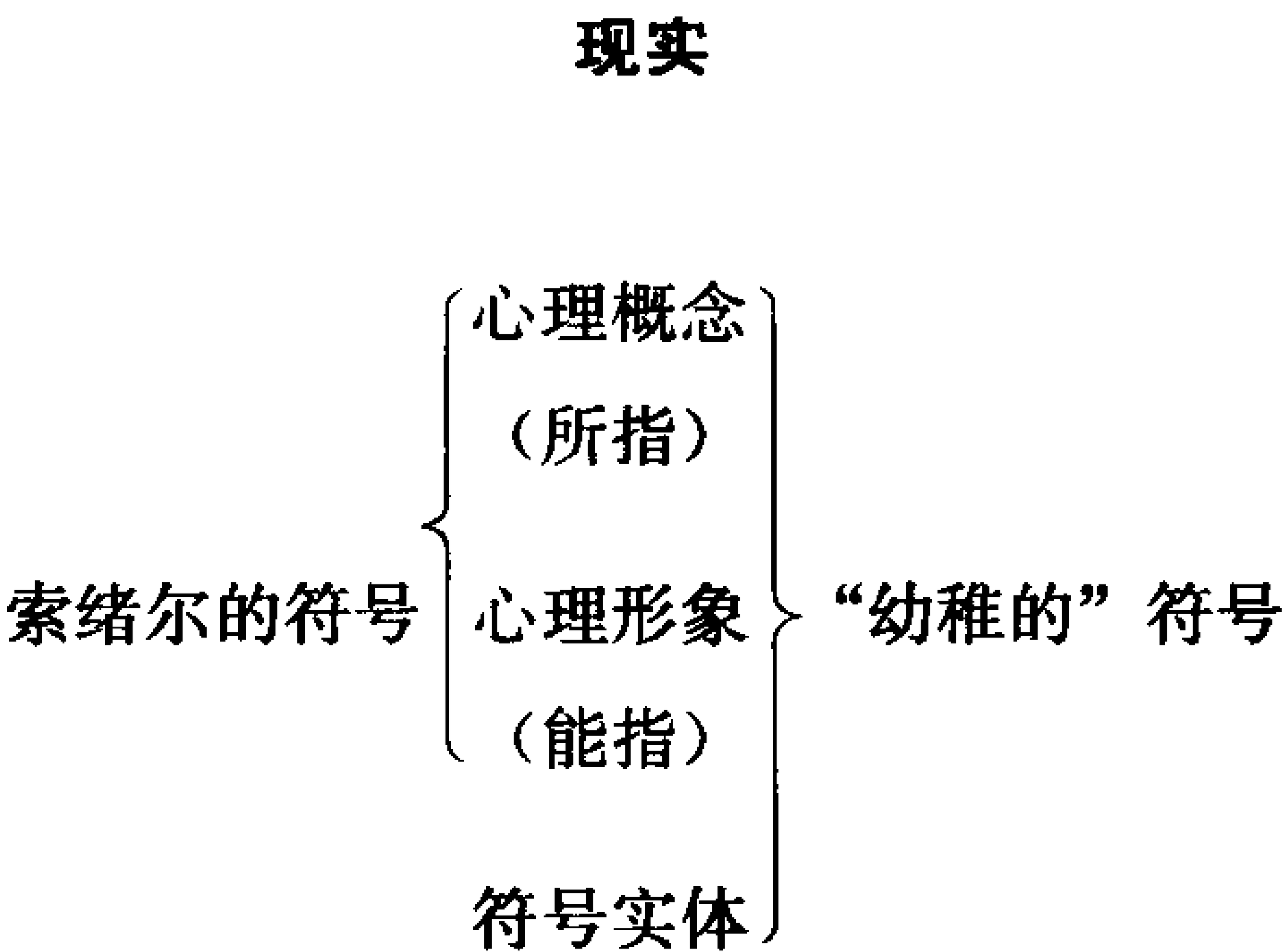
符号学和现实

同样重要的是，实用性的符号学应对符号活动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有所阐释，“现实”即提供符号活动对象和符号活动的物质世界。如果符

号活动不去面对这种关系，它就无法同实际事物产生关联，无法对“现实”做出自信的假设，也就无法解释符号体系在那个世界中所起到的作用。符号活动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在一些困扰西方思想界数千年的问题上得到了体现，包括语言和思维之间关系的问题，思维和现实之间关系的问题，以及如何界定“真理”和“现实”的问题。当然，在实践活动中，当人们称对方为骗子时，所依据的只是粗糙的、现成的标准。这些标准即使在现实的层面，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和困难。但是，在期待关于真理和现实的绝对性定义的同时，摆出试图不要任何标准的姿态，也会带来实际的后果；情形很难会是这样的，因为这样一来，关于真理最为粗糙也最为现成的定义就会占据辩论场，彼此迎面相撞。

索绪尔对此做出的贡献，如同在许多其他方式中那样，是有欠明晰的。一方面，他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这种关系有问题的性质，但他另一方面又设计了一种策略，使得忽视这种性质的做法看上去似乎是合理的。他对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或没有关系）这个问题的看法说服力不足，因为他对此谈得太少了。在《教程》开头，他采取的是将语言视为“一个命名过程而已”这种颇为流行的观念（p. 65）。他将这种观念标记为“一种相当天真的方法”，而且按照他所总结的样子，情形的确如此。但是他所做的，不是提供一种不那么天真的描述，而是走上了他分离并断开这条惯常的老路。首先他看到的是一如既往的分离，在符号自身内部，在物质实体和该实体的心理形象之间，接下去是进一步的分离，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在概念和现实之间。结果的样子是四个层次，而不是天真的两个层次：

现实



索绪尔没有看出这些层面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所以每个层面都是可以完全独立进行研究的。但是，他还宣称，在实践中，心理概念与心理形

象之间的联合如此地结成整体，以致无法区分。它们就像一张纸的两面："思维是正面，声音就是背面；要切开正面，就不得不同时切开背面。"（p. 113）但是他没有看到，在符号（按照他对它们所进行的描述）与现实之间，有着与之相似的一条紧密联系的纽带。相反，他觉得自己能够宣布，这种关系与语言学无关，这样语言学就能把注意力通通放在符号上，所以他作了如下定义："语言学因而是在声音要素与思想两相结合的边缘地带展开工作的；二者的结合所产生的是形式，而不是物质。"（p. 113）因此，他所做的，是要在两种物质层面上确立符号，并由此而确立符号学，其一是符号所指称的世界，其二是构成符号本身的物质（这实际上是来自同一物质世界）。"天真的"符号更为高级，因为它避开了这种强加于物质现实之上的双重分离。

回溯至柏拉图乃至更早，西方哲学一直关注着这组问题带来的困扰。在 20 世纪，早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提供了一种走出指称问题困境的方法，这为关于指称的符号学提供了一个基础。在写于 1921 年的《逻辑哲学论》（出版时间仅比索绪尔的《教程》晚四年）中，他提出了以下前提：

> 4.01. 命题是现实的图示。
>
> 命题是像我们所设想的现实的模样。
>
> 4.011. 初看上去，命题——譬如像印在纸上的那样开始——似乎不是它所关注的现实的图示。但是，书面的乐谱初看上去似乎也不是一首歌曲的图示，我们的发音符号（字母）似乎也不是我们话语的图示。
>
> 可是这些符码语言还是被证明是图示，即便是通常意义上，是它们所代表之物的图示……
>
> 4.021. 命题是现实的图示：因为只要我理解这个命题，我就能够知道它所代表的情形。并且无须把它的意思向我解释清楚，我就能够理解命题。[1]

换言之，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所做的，是把表意活动的最小单位从一个单一元素变成了多个元素的组合（在符号学中，这常常被称为"横组合"）。皮

---

① 此处译文参考了〔奥〕维特根斯坦著，郭英译：《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39 页、第 40 页，略有改动。——译者注。

尔斯也将符号看做一个命题，将命题看做一个符号。索绪尔曾一度对符号学的单位是什么有过讨论。他专门进行思考的，不是命题而是“句子”，但他又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句子的数量是无限的，这使它们出离了语言和语言学的范畴。他也不大重视单词，一部分原因是某些词汇分解成了更小的有意义单位，语言学称之为词素（morphemes，譬如 cats 由词素 cat 和词素 s 构成，后者表示复数）。然而，由于某些限制条件，实际上，索绪尔把单词——被认为能够作为独立实体进入与其他这类实体之间的关系——当成了符号最为透明的范例。

然而，如果将单词和词素当做语词符号的首选范例，就会产生著名的指称性问题。譬如对“cat”这样的单词，我们能够指向那种浑身长毛、有四条腿、跑来跑去的动物，但“the”这样的单词该怎么办呢？“the”有几条腿？但是，如果命题是语言和现实之间关系的主要所在，那么，把“猫坐在垫子上”（the cat sat on the mat）这个命题里的“the”换成“a”会产生什么效果，这样的问题就是很有见地的。被暗示出的“世界的图示”是极其不同的。这种不同涉及的并不是什么猫或垫子，而是对关于特定的猫和垫子的知识有所宣示。这里所影响到的，与其说是模仿层面，还不如说是符号活动层面。说话人用“the”来宣示，自己知道所提到的那猫和那垫子，而且专门地暗示出听话人对此也是知道的。而说话人用“a”，宣示则弱了很多：任何垫子上的任何一只猫都是可能的。对譬如万宝路广告上的骑手这样一种物理性图示而言，模式是颠倒的：图示很容易被看到，命题则不然。但我们重申，意义是存在于投射出来的世界之中的——在万宝路广告这个例子中，这个世界里的工作是浪漫的，贴近大自然的，同时由于闲暇和作为闲暇之自然能指的一支万宝路香烟，这个世界由此变得完美无缺。

维特根斯坦提出，须在命题与现实的“图示”或“模样”的彼此关系中看待意义，这一提法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对意义的分析，哪怕是在口头符码中，也会不可避免地超出语言符码的范畴和使用到普通符号学。这当然使自足的语言分析不再可能，但是它对实际的阐释操作却有了深刻洞悉，人们今天对它们的理解亦如是。譬如索绪尔所知的著名符号破解行动，如商博良之解析埃及象形文字，罗林森之解析亚述楔形文字，都依赖于以确切了解特定文本所谈论的内容为基础。现代阅读（和误读）理论显示，“倒置”这一策略，从感官的先行期待到特定文本的意义，效力

实在强大无比。信息理论用不确定性来衡量文本中的“信息”，在解码器中解决它。不确定性是知识存在状态所具有的功能，它也被用于衡量与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跨文化交际方向的学生都知道，由于不同的文化团体中的不同看法，误读的发生有多么频繁。无疑，这使得我们无比需要在这个方向拓展符号学研究，把对既定社会文化知识储备的描述和分析包括其中。然而，如果社会成员们在成年之前已经获得完成这一伟业的能力，那么，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策略便成为是符号学的分内之事。

只要符号活动与现实之间的总体联系由于问题太多而被规避，针对特定符号活动与现实之间联系策略所进行的研究也就会被耽搁或被忽视。但是，为了实践的目的，重要的是寻求辨析各种错漏和各种谎言的方法——或者，反过来讲，是为了发展出更为狡猾的欺骗或掩盖真相的方法。索绪尔没有对这类问题进行思考。皮尔斯对此却有过一些考虑。皮尔斯从逻辑中提取出“模态（modality）”这一范畴，即一个命题所具有的那种真值。在他看来，模态类型有三种：实存性、必要性和可能性（即事实上真实、逻辑上必要和假设）。他把强度当做模态的一部分，这是语言学在 50 多年里所未曾认识到的。他关于符号分为像似符、指示符和规约符的这种分类，把模态值内置其中了。象似符是图画一般的符号，它们要么就是它们所表示之物，要么很像它们所表示之物，具有可以直接体察的模态，因此是符号中最富说服力的（正如现代广告商和新闻编辑所了解的那样）。指示符是在因果链中（譬如，烟—火）或者毗邻关系中（譬如，胳膊—人）形成的。它们具有高度的模态性（即符号与意义之间密切契合），但由于它们仍然是基于一种判断或推导行为的，所以它们的模态性比像似符要低。规约符通过约定俗成的纽带（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类似）把符号和客体联系起来，具有最低的模态性，尽管皮尔斯在其革命性的方案中也把使用规约符的符号活动看做思维的最高形式。

皮尔斯对模态的处理相当粗陋。三种模态，三种符号，并不足以解释运用于该领域的整个系列策略，而且由于缺乏更好的表达方式，符号学家们又常常滥用皮尔斯的术语。但是，至少皮尔斯把这个论题提上了符号学理论的研究日程。埃科正确地将符号学称为“关于撒谎的理论”（1976：7），就此而言，对根据对现实的规范性描述而采取不同的方式对读者和信息进行定位，以求让谎言更为有效的这样一整套撒谎策略来说，符号学是断然不能忽视的。与此同时，符号学需要思考控制谎言及其效果的方法。

结构主义和符号的物质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关于索绪尔对符号学影响的论述似乎大部分都是否定的。现在是该对这种某种意义上的偏颇进行纠正的时候了。索绪尔对符号学有重要贡献，而且我们相信，后索绪尔时代的符号学仍然有须向索绪尔借鉴的地方。毫不奇怪，对于符号学的两个领域，索绪尔为之付出了毕生大部分心血，为之贡献最多，但现代的符号学家认为，对于索绪尔所做的，他们已经消化了并且超越了，或者说，他们可以稳妥地对之加以忽略。在本节中，我们将对索绪尔的价值概念展开思考，尤其是针对这一概念被运用于能指结构时的情形。之后我们会谈到历时性、历史和变化所起到的作用。

索绪尔的价值概念是结构主义的基础。对索绪尔来说，价值指的是一个元素在一个体系或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价值是由相同和对立组成的综合体构成的。索绪尔阐述了价值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与指称物彼此对立的，他的方法是将法文单词 mouton 和两个英文单词“mutton”和“sheep”进行比较。这个法文单词所指称的，与这两个英文单词所指称的，是相同的那个现实域，但是它却有一个不同的价值，因为这两个英文单词是彼此对立的，而 mouton 这个法文单词则是不可分拆的。

索绪尔用对语义对立的指称来阐述“价值”的方式很有启发性，但是，当把这种方法应用到自然语言中的词汇体系，却是有问题的，事实上，还没有哪个自然口头语言中的所指体系可以用索绪尔这些术语进行充分解释。结构主义之所以获得支持，在于它在分析音系符码这种人类语言的声音符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结构主义所取得的成功是与特鲁别茨柯伊和雅各布森等人的著述密切相关的，这种成功使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写于1948年的著作中，把语言学转化成了一种适用于所有社会科学的科学和模式。这类成果，即使是像此处一样属于非常狭窄的前沿，而且仅仅关注一种符码的表意体系，却被证明，对于理论发展而言，它是比任何其他概念更为实质性的基础，尽管其他概念也不乏启发性。索绪尔不仅为符号学事业提供了价值这一概念，而且其著作中清楚地对这种分析做出了前瞻，并在后来由特鲁别茨柯伊和雅各布森使之得到完善。

如我们在前边章节中看到的那样，索绪尔将物质性考虑排斥在外，在关系到符号分析方面更是如此，这被许多评论者认为是他的基本原则之一，而索绪尔所取得的成就，则要求他悖逆这种东西，注意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索绪尔把自己对声音符码的探索命名为“音系学（Phonology)”。卡勒这位颇具影响力的现代阐释者，对这个命名进行了研究。在卡勒看来，索绪尔混淆了音系学和语音学（phonetics）这两个现代语言学范畴，前者研究的是作为能指体系声音，后者研究的是音系体系的物质媒介，所以，卡勒声称，大部分被索绪尔称为音系学的东西都应被称为语音学。他还附加了评论：“在对声音的研究中，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他把物理声音排斥出语言学体系之外的全部蕴义。”（1976：xxii）卡勒说得完全正确，索绪尔在这里的确同他惯常的反物质主义立场不一致。但是，这恰恰是因为索绪尔明确承认，声音体系的物质基础对于研究其结构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他才能取得自己的理论突破。

索绪尔对语音的分析以发音机制——发音器官的各个部分负责发出不同的声音——作为基础。既然“发音机制从不变化”（p. 33），那么，产生声音的物质基础便为描述所有语言中的声音提供了一种普适性基础，即使实际的声音体系多种多样而且不稳定。在传统音系学中，声音按照特征加以标识，而特征则来源于发音机制中最有特点地涉及产生了这些声音的那个部分。譬如唇齿音 d 或 t 是舌头触碰牙齿发出的，边音 b 和 p 则是用嘴唇发出的。这里要注意的是发音空间进行了细分，并被赋予了意义，而这些便成为对音流进行细分的基础。索绪尔把这种分析推到了更为抽象的层面。他提出了多种备选方案。在其中一个方案中，索绪尔规划了四种基本语音类型，它们产生于四个基本的发声行为：呼气、口头发声、用嗓和鼻腔共鸣。接着他再向前一步，提出要从一个单一原则中得出所有语音，即±闭口（或±开口）。发音机制的各个部分使开口或闭口的程度不同。不同的语言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达成这一点，产生出其自身音系体系中独具特色的声音来，但语音的多样乃是这单一原则的实现，要受到为之提供无数实现样式的物质的现实制约。索绪尔的分析最后结束于从开口到闭口这个连续体中的七种语音类型。处于一极的是元音特征最明显的那些元音（最大开口度），处于另一极的是辅音特征最明显的那些辅音（最大闭口度）。他把语音分为七种这一创造，模糊了他的提议所具有的极度简化特征，而极度简化正是结构主义对音系体系的普遍形式所进行的分析所具有

的本质特征，他所采用的方式同雅各布森广为人知的方式具有相似性，但是后者做出描述的时间要比他晚了一些。

索绪尔还分析了口语链中的音素，即音系层面的横组合结构。再一次地，他采用了以一条单一原则的方式来提供一种极其简约的分析。他观察到，语音在话语中结合的时候，涉及的要么是内爆破（闭口进行），要么是外爆破（开口进行）。音节组合的横组合规则于是可以用内爆破或外爆破动作来进行具体表述，正是二者建构出了音节的性状和分界。所以，这条抽象规则既负责音系符码中的纵聚合结构，又负责其中的横组合结构。索绪尔的提法给人印象深刻，因为它具有综合性，干净利落。他允许自己为这项成就感到一定的骄傲："第一次，我们摆脱了抽象化。第一次，我们发现了具体而不可或缺的单位，它们在口语链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合乎节律。"（p.53）有趣的是，对于自己突然下滑到实际口语链"具体而不可或缺的单位"，索绪尔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正如卡勒的批评所暗示的那样，索绪尔把他的成功看做是与物质主义策略不可分割的。

令人惊奇的是，索绪尔的分析成果被后来的结构主义者们大大地忽略了。他对横组合链的分析很少被提及。即使是对音系纵聚合所进行的结构主义分析，如雅各布森和特鲁别茨柯伊所发展起来的那种，虽然受到欣赏，却并没有被众多符号学家用作普通符号学方法的基础。两大例外是雅各布森自己，以及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但是，雅各布森的拓展超出了狭隘范畴，列维-斯特劳斯则倾向于在音系学模式的使用中进行思辨和反对体系化。这就为符号学中的结构主义传统留下了一个悖论：那些成果让它声名鹊起，但它却难以从中汲取经验。

这个发展姗姗来迟，作为起点，我们要以普通符号学形式来着手处理某些结构主义原则。在破解音系符码的过程中，索绪尔对其根本特点连贯性和简约性进行了阐述，他所采用的方式是借助抽象的基本双分原则，把这个原则所产生的无数特定形式反复应用于符码的物质基础。对此的辩证运用，可以产生出无数的仍然具有意义的不同形式。不过，它们的意义是双分原则和物质基础二者共同造成的，因为二者彼此作用。形式的多样性不能化约为潜在的双分原则，双分原则自身也不可能始终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同一条双分原则，又会以抽象的或类似的形式，把符码的横组合结构和纵聚合结构都组织起来，所以在横组合及纵聚合之间会产生一种同系关系。音系符码的纵聚合结构不仅仅建立在从共通原则到横组合层面的原则

之上，它们还发源于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人类活动。构成符码的那些特征是从单一的横组合中得来的：气体自肺部到体外，经过无数阻碍，利用沿途的各种机遇，才完成了言说之旅。在结构分析中，纵聚合与横组合、结构与操作、意义与事件、统一与多样，彼此之间都是不可分割的，并且必须成为单一描述的互补方面。我们可以对这些源自索绪尔的物质主义结构主义原则做出总结：

1. 双分原则与编码媒介的物质性质之间相互作用，而符码的结构，正是通过少量双分原则之间的相互作用得以建立的。符码的统一性来自总体性原则以及这些原则之间的关联关系，符码的多样性来自物质基础，这些原则作用于该物质基础之上。
2. 纵聚合结构特征的来源，看似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其实是由时间和空间中的人类活动和目的所构成的物质世界。
3. 符码之中的横组合与纵聚合结构是由同样的一套原则构建起来的，两种结构通过同型关系被联系在一起。

历史、变化、转换

索绪尔通常被看做反对语言中历史性阐释的代表，实际上，他的重要性常常被认为存在于他所制造的断裂之中——索绪尔背靠比较语文学传统，但他却反对这个传统的历史指向。卡勒基本上就是这种看法：“简而言之，索绪尔、弗洛伊德和涂尔干为了对规律的人际体系进行研究而抛弃历史和因果性的阐释，使得社会科学发生了变革”（1976：xiii）。这一论断代表了结构主义的现代正统观点，但是，如果说这代表了关于索绪尔的全部事实，那么就太让人难以置信了。索绪尔是比较语文学这一学科的杰出倡导者，而该学科的策略和任务根本上是历史性的。的确，索绪尔坚持认为共时性和历时性是研究语言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的方法，而且为共时性语言学研究开创了比他所继承的传统更为广阔的空间，但同时，他却把历史、过程、流变看成了语言的常规条件。在《教程》中关于共时语言学的章节里，索绪尔确立了“语言状态”这个观念，但仅仅把它当做一个近似的概念。实际上，他在注释中说，“绝对不变这类东西的确是没有的。”

(III, i, p. 140) 他抛弃了语言学规律必须既有普遍性又有强制性这种观念。"共时性虽然法则," 他说,"具有其规约性,却不具有命令性,而历时性法则具有命令性,却不具有规约性。"(I, iii, p. 6)。也就是说,共时性虽然是理性的,却不具有强制力。因此,索绪尔把历时性看做因果阐释的场域。这很难说是像卡勒声称的那样,抛弃了历史阐释。

话语是在时间之中展开的,索绪尔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实际上,他坚持口头符号具有这种特征,并将其提高到他关于符号的第二原则这一位置。(实际上,他可能夸大了历时性在口头语言中的作用。语词发出的时候同时伴随着音高和音调,而且许多符码中都存在着共时性的横组合,对此我们后面会加以关注。)但是,针对幅度更大的文本,情况常常是,如果把跨时间的诸多要素考虑到一种重要关系之中,文本中就只有意义存在。我们可以对这个总结进行推广,把那些产生于不同时间的文本或者文本要素之间的关系包括进来。如果我们在这里使用历时性这个总体术语,把无论或长或短的时间维度都包括进来的话(索绪尔并没有走到这一步),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悖论性的结论,即哪怕是在共时性"语言状态"中,历时性对意义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很明显,绝对不能认为索绪尔抛弃了时间或历史,尽管同样也很明显的是,索绪尔觉得它很成问题。

把上面这些观点归诸于索绪尔并非我们的目的,因为这只是后见之明。我们想说明的是,索绪尔与历时性语言学打了终生交道,这不可能不给他留下处理这些问题的策略。具有深刻反讽意味的是,索绪尔为共时语言学所做的辩护,却被想当然地用于合法取消历时性的维度,这意味着索绪尔作为一名实践型符号学家所提供的大部分东西都被轻易地忽略了。有理由假设,这位日内瓦大学普通语言学教授会认为,他的听众认识到了历时性语言学的重要性,所以他才能如此无拘束地对之展开探索。现代符号学家认为,历时性是如此明显地无趣,以至于他们不想费神去严肃对待索绪尔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不打算就此问题从他那里学到什么。

如果我们转回头去看看《教程》,会发现里面有大量关于历时性现象的敏锐观察,这并不出乎我们所料,因为它们所欠缺的,仅仅是一个把它们讲明白的总体性框架。索绪尔进行了如此广泛的历时性现象的研究,全部讲的都是关于语言变化的例子,其中大部分与词语的语音相关。用更为现代的说法,我们可以将他所发展的理论称作转换理论 (a theory of transformation)。譬如他关于音系结构的理论,研究范围狭窄,需要进行拓展,

以便将其他符号体系囊括其中。由于索绪尔以忽视语言社会语境为一大特色，而语言社会语境正是历时性法则的“强制性”的源头，因此，他不能对自己描述得如此精细的转换操作做出阐释。但是，既然这项工作尚未完成，那么索绪尔的转换理论就仍然对研究有益，因为现代符号学缺乏的就是一种让人满意的转换理论。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中，随着乔姆斯基方案走向衰落，人们对转换的严肃兴趣也开始减弱。我们在《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中所提出的理论，算是这种趋势中一个形单影只的例外。在结构主义符号学中，对于转换，描述数量有限，而且不乏偏颇的论说。弗洛伊德的确提出了关于转换的一个有力而全面的理论，但它不够体系化，而且未能被应用到符号学主流中去。

尽管索绪尔对共时性和历时性做了清晰的区分，但他依然坚持认为，所有与转换有关的系列操作，都必须首先作为共时状态中的替代之物而存在。“在说话（言语）层面，总是先有事实，或者更应该说，先有大量相似的事实，之后才有事实衍变。”（p. 98）索绪尔拒绝对言语进行理论化，或者说，他不认为言语是理论的对象，这种姿态模糊了他在这里所说内容的重要性。实际上，他要说的是，转换产生于共时状态，产生于语言使用的社会条件。在这个共时状态中，他说，作为变化的起点，至少有两种形式是必须共同存在的，哪怕二者差别细微。索绪尔没有对这种分别提供阐释，尽管从沃洛辛诺夫的理论中是肯定找得到一个阐释的。因为后者认为，作用于符号的分裂力量来自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索绪尔特地排除了两种共存形式之间的转换关系，这个决定使得他要成功对变化做出阐释变得难上加难。但是，他的确做出了一种有用的清晰化操作。他坚持认为，所有的变化必须按照极为严格的顺序进行罗列，一次只列出一个变化。譬如现代法文单词 chaud，意思是“温暖”，来自拉丁词语 calidum。虽然表面上我们看不出两个词之间有什么关系，但二者却是遵循这样一个序列发展的：calidum—calidu—caldu—cald—calt—tsalt—saut—sot—so。他注意到，如果我们只看到开头和结尾，那么，在这种形式中，理性和可理解性是两两相对的：“单独地看，每个步骤都绝对确定、符合规则、效果有限，然而，整体地看，这个单词给人的印象则是细微变化无限多。”（p. 152）

在这类序列中，索绪尔注意到两类变化。他无助地称其中一类为“自发式”，称另一类为“组合式”。自发式变化，指纵聚合体系中声音价值的变化（譬如从 c 到 ts），所以我们称其为纵聚合转换（paradigmatic trans-

formation)。组合式变化涉及对存在着的组成部分的横组合排序(譬如 calidu—caldu),我们称其为横组合转换(syntagmatic transformation)。索绪尔还有一个进一步细分的范畴,他称之为"有条件限制的自发性"变化,指依赖于其语境中特定横组合条件的纵聚合转换(如某元素在单词中所处的位置)。所以,要理解一种形式,关键在于理解它的精确转换历程,而这一历程是由横组合与纵聚合转换二者所构成的,它们分别起作用,但配合默契。

对索绪尔的转换理论和乔姆斯基后来做出的更为有名的阐述(1957,1965,1976)进行比较是很有好处的。乔姆斯基把自己的理论实用范围严格限定在共时状态的横组合转换上,他认为这是可逆的,是语言与典型说话人意识的一部分。索绪尔理论把纵聚合转换和横组合转换都包括在内,而且他对变化进行了不懈地追溯,直到抵达变化不再可逆的那个点。所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理论可谓索绪尔转换理论的特定子集。如果理性取决于共时性语言状态的正式成员的思想状态,那么,索绪尔把历时性看做延伸进了非理性领域这种看法就是正确的,历史便是特定社会中决定性的非理性之物。弗洛伊德也对难以逆转的转换进行了研究,在他那里,是将其作为无意识操作的特别产物。索绪尔的研究倾向使自己没有朝着这样的方向努力,但他比乔姆斯基走得更远,乔姆斯基明确地把一切类型的非理性通通地赶出了语言学领域。

然而,充满悖论的是,乔姆斯基的工作,在"深层结构"观念方面,在把这些操作定位于不可知的人类意识深处方面,暗示的是一种相反倾向,而所有被索绪尔按照顺序做出排列的形式,在之前则都有着先在的社会和物质。如果索绪尔被迫去重构一个假设的形式,那仅仅是因为那种形式在此之前被遗失了,只是被它所留下的空间或罅隙打上了印记而已。《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对转换理论中"深层结构"的作用和地位的描述是误导性的,过多地受到了乔姆斯基所做阐述的影响。现在,我们把成序列的物质性文本或文本形式确定为转换这个概念的阐释核心,而之前的文本或结构,并非"更加深刻",只不过是"时间更早"罢了。但在许多符号活动事例中,这一序列经常是不在场的,必须靠符号制造者暗示,靠符号接受者重构。一定程度上,这些暗示出的或重构出的序列是文本属性所产生的效果,同时,它们也受到符号学参与者的目的和了解的强烈影响。这些就是我们以前——在《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中——称之为"深层"

结构的那种东西所包括的内容。这样的分析实践，我们认为似乎仍然站得住脚，但三维稳定性这种幻象——“深层”这种暗喻对文本或意义有所暗示，而文本或意义的最明显特征就是它们的非实体性——则让现在的我们颇为不安。术语“符号活动所产生的投射”（semiosic projection）算不上十分误导。尽管和这个术语名称相比，符号分析中意义这个层面所具有的重要性和说服力更值得关心。

索绪尔着重处理历时性变化，因而带出了其他问题，对之他也有过研究。完整的历时变化链总是超出属于特定社群的成员的知识范围。如果作为整体的历时链的中介必须存在于特定时空之外，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使它们在人类的社会操作之中扎下根来呢？它们只有在元语言层面才能看到，只有学究才能触及。另一类索绪尔没有打算进行调查的历时性现象，即开端和结尾都模糊不清或暧昧难明的历时性横组合结构，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似乎都不得不启用跨历史的主体，或者一个位置上多个主体所组成的集合，然而这些不过是寻求着作者的无数意义结构所做出的投射。在这个问题上，索绪尔的观察仍然行得通：“所有这些都存在于语言之中，却是作为抽象实体而存在的。对它们的研究很困难，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确切地知道，说话人的意识是否与语法学家的分析走得一样远。但重要的是，分析到最后，抽象实体总是建立在具体实体基础之上的。”这里，我们再一次领略到索绪尔的风采，他能够对历时现象做出微妙而让人叹服的判断，因为他敏感地发现物质性的、具体的事实是阐释的基础，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理想主义者的索绪尔把历时性当做不可理解的流变抛在一边。

我们自身在《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中所做的工作，是发展出一个有力的转换概念，它的力量来自于充分理由，而且适用于具体文本，但是它没有把这一点明显地同历史分析理论或策略结合起来。现在，我们把发展关于历时性的综合理论看成我们投身其中的这种符号学事业最迫切的需要，只要其能够对诸如大大小小的变化、操作、危机、革命等等关键现象做出阐释。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相比其他结构主义形式，决定性的优点在于它一直都承认历史，对历史做出了理论性阐述。我们相信，任何忽略历时性维度的社会符号学，都不可能胜任其职。

根据索绪尔关于历时性和转换的工作以及我们对这个论域的反思，我们可以归结出以下几项原则：

1. 所有符号学活动都发生在时间之中：所有符号现象都是历时性的，无论时间范围是多么小（产生或阐释某单一横组合段的时间，话语中横组合段语流的时间）或多么大，（大到）人类符号活动史也包含其间。
2. 每个横组合段都是转换操作的一个时间片段，在时间中朝后（朝向同一次交流中的前一个横组合段，朝向前一个话语或符号活动）或朝前（通过解码者和编码者，朝向后一个横组合段）运动。这种操作，有着其严格的时间秩序，是阐释该横组合段的关键。
3. 符号学领域中的每个结构和关系都受制于转换活动：因此有了横组合和纵聚合转换以及其他转换操作，它们的共同作用构成了每个符号学对象。
4. 每个转换都是具体性的事件和中介、缘由等，都源于物质与社会生活：任何历时链的阐释基线，都是它与物质世界之间的交叠。
5. 转换能够具有力度和效度，即便其整个幅度是意识所无法触及的。因此，对转换的分析能够揭示意义的结构，意义结构的活动是无意识的，但在特定阐释语境中又是决定性的。

我们可以运用这些原则来描述本章中的符号学传统。我们把符号学传统阐释为动态的、非封闭的，而不是一套有待（全然或者逐步）接受或拒绝的一成不变学说。我们不是从索绪尔出发，也不会去决断索绪尔的思考在何处结束。我们从索绪尔的思考中看到了种种可能性，它们同其他思想家提出的其他可能发展脉络彼此关联，但是，我们不会把对这些可能性的充分认识归功于索绪尔，也不会宣称对这些可能性的发现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功劳。所以，我们没有转过头去追溯索绪尔（或皮尔斯、沃洛辛诺夫）“真正地”思考了什么，仿佛这成了某种已有定论之物，对之其他评论者已经看到了或者无缘无故地忽略了。我们对索绪尔的专门阅读是一种批评性阅读，对他在多方面的工作都进行了转换，所以我们不会认为假设索绪尔仍然在世的话，他会对我们所说的每件事情都表示赞同。但我们并不能以此作为借口，漫不经心地去读索绪尔以及其他奠基之父的著作。与此相反，精确地认识存在于索绪尔之中、存在于在任何历时链的必要起点的那些结构和裂隙之中，对于这种批评——转换工作的展开，是不可或缺的。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已经粗略地描述了我们自己这种社会符号学理论所使用的主要术语和前提。我们本来可以把这些做成一套公理的样式，再用说明和支撑性论述来使之完备。但是，这种表现方式总会起到负面效果，使之思想僵化，把它变成无根之木，阻碍它的进一步发展，让它在某种程度上变得不可理喻。对传统的历时性的描述，使读者摆脱了传统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缺乏一致性的这种压迫感。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这种理论之所以被提出来，是因为人们相当清楚地知道，它是必要的，它是不断争议中的里程碑，它是为了明晰而不懈的奋斗。

第三章　作为意义的语境：符号活动维度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沃洛辛诺夫将其针对索绪尔式结构主义的批评聚焦在一个单一错误上，他称之为“伪核心”——把话语当做某种个体性的东西加以否定。针对这一错误，沃洛辛诺夫坚持采用与之针锋相对的提法：言说是一种社会现象。接着，他把言说——即单一性的符号行为——置于社会符号学的核心地位。之后，他做出了下面的阐述，这个阐述我们已经引用过，但还是值得在这里重复：“符号形式首先要受到相关参与者所构成的社会组织的制约，同时，还要受到参与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直接条件的制约。”

这种关注焦点的变化标志着与结构主义符号的根本决裂。在过去约二十年里，大量理论家开始向这个方向推进，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到符号行为语境的方方面面，但他们都注意到了符号语境的重要性。

我们将以交通灯为例来阐明这种新方向所包含的某些蕴义。结构主义者很喜欢这个例子，因为交通灯似乎是经典的简易性的符码。按照惯例性符码，有三个能指（红、绿、褐黄/黄）与三个所指（停、行、慎停/慎行）彼此相关联。由于按照惯例红灯在顶部，绿灯在底端，黄褐色灯在中间，所以实际上存在着双重符码，但这似乎无关大碍，因为它只是重复其他符码而已。那么，对于如此基本的体系，我们有什么更多的可说呢？

答案是：如果我们坚持忽略语境的话，的确没什么可说。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体系如何在自身语境中运作，那么，我们马上就会明白，

语境是其意义的核心部分。我们还能明白的是，由文本（成序列的交通信号）与其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意义，是复杂的、影响深远的，在终极意义上是属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交通信号，当然（这似乎明显到不值一提），被安置在路边和交叉路口。这不仅仅是它们的使用语境，还包括了对于其意义至关重要的信息。它们主要向驾驶员宣示信息，而且驾驶员与其所驾驶的机动车也包括在其意义之中。譬如红色并不仅仅代表“停”。它的意思是“驾驶员，停”。在语境中，它携带着其他意义，这些其他意义正是其模仿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承诺，位于交叉路口其他位置的驾驶员的行为是可以预计的。其他驾驶者本身，也会停或行，如他所碰到的情形一样。于是，它具有一种模仿内容，暗示着物理世界中的事态。不过这只是一种说法，因为它可能被“某个闯红灯的疯子”破坏，让“它具有力量”这种说法成为谎言。

的确，为了能在特定地点安全驾驶，我们须理解，这类文本是由不同阶层、性别或其他文化方言所建构的。在悉尼，对于特定驾驶员群体而言，黄灯的意义是“如果接近交通灯了就提速”。在这个群体的方言中，红色自身至少有两个能指：“刚刚变红”和“变红了几秒钟”。在上述方言中，“刚刚变红”意味着“继续向前开，通过交叉路口”。所以，“绿灯”在该方言中也就有了不同的解读。但是，同样变得显而易见的是，驾驶者必须是“会多门语言的”，必须注意到不同方言的存在，并理解它们所表示的意义。因此，对于所有使用这一符码的人来说，“绿灯”变成了“在认准是否有使用这种其他方言的人在场之后再继续向前开”这一意义的能指。社会因素的复杂性促生了次级方言的出现，要理解这种复杂性其实不难，这些因素包括：交通状况、上下班时间、对权威的态度、性别态度、种族差异，诸如此类。

于是，作为文本，交通信号建构出一种特定的语境，它既是物理语境，又是一种参与者组织。这一点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的信息必须被理解，必须在一般存在内置性冗余这一基础上来理解——几盏交通灯所言说的是同样的内容，却增加了许多其他的附着性符号。即使是顶端加上红灯、底端加上绿灯，这种复制信息从功能上说仍然是冗余的，因此，即使这个序列中某个颜色不亮，譬如在功能失控情况下，文本仍然是能够得到解读的。但这并非它所传递意义的界限。这些符号的社会意义，部分是因为在它们的操作中人类这个中介者的缺场。在两个意义上，发布这些指令

的“中介”都是非人的：从电动装置方面说，它串联全套信号灯以使其信息同步；从运行状况看，它和电动装置一样，都是以不可见的、有效的方式起作用。这是具有绝对权威的能指，它所发出的指令公平、理性、怀着善意。但是，在其命令之后，还有警察威慑和一套规则存在，这些东西对不服从交通灯信息指引的人就罚金等处罚做出了明确规定。正如符号具有多义性一样，对于不服从规则的也可能有双重的惩罚：车祸中受伤，受到法律制裁。

所以，如果没有潜在的思想控制体系——它对人群和行为进行分类，且它的行为只能通过观察行为以及信号才能加以猜测——这种基础性符码可能无法运作。思想控制体系与政府的法制体系直接关联，由政府官员实施。这样，它的意义就具有相同的范围。交通信号既传递意识形态信息，又传递特定的指令。它们呈现出一种社会样式，一种非人的理性形象，以所有人的名义无私运作。这一意识形态意义不是一种仁慈宽宏的添加之物，而是其有效性的组成部分，因为它表示的是对这种善意的无私的信心，它携带巨量冗余，靠无数交通灯日复一日地传输，它约束着驾驶员，让他们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遵行交通灯所发出的信息。

该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像每一其他的这类社会信息体系一样，涉及两个方面：权力和稳定性。在交通灯这一情形中，权力是最明显的方面，权力在此可以被理解为由其他人行为所构成的社会中介人所施行的控制。但是，稳定性是权力产生的效果，正如权力是稳定性所产生的效果。交通灯把车流分成两组，每一组都作为单一实体采取行动——所有车要么一个挨着一个但彼此不相碰地行驶，要么静止不动。如果没有这种稳定关系，不能形成“交通流”这一单一实体，那么，权力就不可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得到认定。

我们在这个专门化的例子中所观察到的，也适用于许多其他交流情形。在话语情形中，对任何模仿内容的交流，一般都伴随着关于符号活动的信息串，它们在传输过程中携带了一系列符号体系中的巨量冗余（声调、表达、行为，等等）。在口头文本自身内部，存在着许多表示关系的能指。信息制造者为自己及其听话人建构出社会身份。他们还留意来自接受者的接受信息，接受信息作为一种反馈起作用，渐次地，又被建构到他们自己的信息中去。正如驾驶员之所以做出通过绿灯的行为，是基于他们相信其他驾驶员不会闯红灯，所以，口头文本中的每个变化，在某种意义

上，都是由主要参与者共同创造出来的。语境——既是物理性的指涉之物，又是符号活动的社会条件——对于交流的发生起着决定性。只有被赋予意义，使之有意义，语境才能够进入交流之中，尽管这些意义有可能不同寻常。应该剥离传统的交通灯阐释中关于交流操作的暧昧意识形态。即使是电动操作，符号活动也绝对不是简单、清晰和理性的。我们认为，哪怕是在关于交通灯这样看似简单的例子里，符号活动也总是涉及冲突、异议，缺乏清晰性和一致性。

我们可以对这些关于语境功能的观察做出如下一些总结：

1. 符号活动的语境本身被组织为一系列文本，参与者和关系等范畴都被赋予了意义。
2. 参与者的行为受到思想控制体系制约，思想控制体系通过有关参与者身份和关系的信息运作，这些信息表示出了地位、权力和稳定性。
3. 符号活动的参与者，典型地以大量符码传输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涉及交换地位、参与者本人和其他人所起作用等等。
4. 在符号交换不涉及由所有参与者做出的直接接触情况中，信息制造者有可能把关于制造者、接受者和语境的明确规定纳入他们的文本形式。
5. 组织特定符号交换的这套信息，会对社会关系的总体面貌做出暗示，即每个符号行为都具有意识形态内容。

关于权力与稳定性的信息

在考察组织权利和稳定性关系的思想控制体系时，我们首先看看布朗和吉尔曼的经典语言学研究——《具有权力与稳定性的代词》（*Pronouns of Power and Solidarity*），这篇文章初次发表于 1960 年。初看之下，这篇文章的论域似乎极其狭窄。它观察的只是约四百年期间用于许多不同欧洲语言中的指称代词（you 及其诸种形式）。但是，尽管——或者说正是因为——它论域狭窄，它却被证明是一种典范性分析，对于其他符码的分析有着丰富的启发。当然，其他语言学家对代词体系也有过研究，但他们把

代词的使用条件当做次要因素，并且没有确立起这些处于自己研究核心地位的此类的社会意义。布朗和吉尔曼的成果颠覆了这些语言学家们所看重的东西。他们以这一系列代词的社会意义作为出发点，按照他们的分析，这一系列代词分成两个方面：权力和稳定性。在他们自己的专门分析背后，是涂尔干的社会理论，涂尔干把关于社会组织、稳定性（连贯与不连贯、联合与对抗、关联与阻碍）以及权力（秩序、控制、等级）的所有形式都用两种基本维度来定位。这些抽象范畴既有广泛性又有灵活性。它们可以运用于社会的宏观和微观层面，运用于阶级社会中各个社会阶级之间和之内的种种关系，或者运用于更小的组群的构成，譬如家庭、家族等等。

布朗和吉尔曼的研究是从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开始的——对于第二人称单数，许多欧洲语言都有两种形式，而且有着复杂的用法规则。他们把这两种形式标记为 T 形式（法语和意大利语为“*tu*”，德语为“*du*”，英语为“*thou*”）和 V 形式（法语为“*vous*”，意大利语为“*lei*”或“*voi*”，德语为“*Sie*”）。它们的用法有两个问题。其一和它们的意义有关。每个代词都携带有关权力和稳定性二者的那些意义，所以每个代词从潜在可能来说都是暧昧不明的。譬如，T 形式如果用于平辈，就表示亲密，如果用于非平辈，就表示优越或鄙视。V 形式用于地位可能高于自己的人表示尊重，用于朋友则表示冷漠。第二个问题在于每个代词的意义都有赖于所期待的回应。因此，它们的意义直接取决于参与者所构成社会组织的共有知识以及对这些词类的接受。正确的用法要求一个人对直接性（谁对谁言说）和体系（此人或此群体在社会上被“定位”于何处，可以期望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回应）二者都有所了解。这就使得这类形式使粗心的语言学习者困惑，因为它们要求学习者具备确切的社会知识。当社会关系不够清晰时，这也会让它们面临危险，要么是因为缺乏清晰的、起支撑作用的能指，要么是身陷由于商谈或争执而使之不稳定的这种状况。

在其最基本词类中，构成符码的不只是一对要素（T 形式或 V 形式），而是两对要素：对等性（reciprocity），记作+R（T 和 V 彼此平等）或非对等性（non-reciprocity），记作−R（T−V 或 V−T）。下面，我们列出各种基本可能及其意义，括号中的形式是所期待的回应：

	能指	所指
T	+R（即 T）	— 亲昵
	−R（即 V）	— 权力/敌意
V	+R（即 V）	— 正式，尊重
	−R（即 T）	— 恭顺

这个体系让人惊讶的地方之一，似乎在于它结合权力与稳定性的意义的那种方式。抽象地说，这个符码由两个透明对立构成，一个是T与V之间的对立，另一个是对等性和非对等性之间的对立，它是一个表示不平等的透明能指，因而也是一个表示权力或权力缺场的透明能指。该体系的逻辑表示出某些点上权力与稳定性之间的对称性关系。譬如，弱稳定性或礼貌，强稳定性与亲昵，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由平等的T和平等的V之间的差异来表示的，仿佛平等的V所表示的更远距离意味着更大的权力，或者说，两者的更大权力要求保持更远的距离。但是，由有权力者针对无权力者所使用的T形式，则把亲昵而不是其反当做权力符号来运用。当这种用法受到挑战时，对亲昵的宣示失败就被当做其反，成了强烈敌意的宣示，仿佛权力意义起到的是逆转稳定性意义的作用。

该体系的复杂性与不稳定性导致它在16～18世纪的英语中被废弃不用，所以它不再是现代英语中的通行形式。然而幸运的是，莎士比亚大致正处于见证该体系面临危机的时代，所以在他一些非常伟大的剧本中，对这种操作及其社会蕴义进行了戏剧化处理。本着这一目的，我们可以来看看《李尔王》这部写于17世纪初叶的悲剧。

在该剧第一幕中，李尔王"考验"三个女儿对自己的爱，要求她们告诉他，她们有多爱他，作为回报，他赐予女儿们权力和三分之一的国土。面对老大和老二两个女儿，他使用复数"我们"（we）称呼自己，用"你们"（you）来称呼她们，直至她们靠假惺惺的夸张示爱通过考验。当李尔王确信她们爱自己，把她们提升到他认为平等的权力地位之后，李尔王用"thou"来称呼她们。考狄利娅是李尔王最宠爱的女儿，她不想让这种方式来使自己真挚的感情打折扣，所以李尔王对她的爱变成了同样强烈的愤怒。但这也是通过他使用"thou"表达出来的，这里的"thou"表示的是不对等关系，所以传递出蔑视和趾高气扬。但是，他的三个女儿中没有一位以T形式来称呼他，所以，他对老大和老二两个女儿的亲昵只是个幻

想，他与考狄利娅之间密切但充满权力意味的关系，只是一个男人、一位父亲和一名国王与一个挚爱他、孝顺他的女儿之间的关系。在李尔王的社会中，权力与爱是不可兼容的，但二者是通过一个共同的符号体系表达出来的，所以，可能李尔王没能理解他自己这个符号所具有的意义。同样，当他的行为受到忠臣肯特伯爵反对时，李尔王没能理解爱能作为权力或权威的对立面来表达自我。肯特用T形式向他的国王发起挑战："你想干什么，老头子?"这里的T形式又是颇为暧昧的。它强烈地表示了真实的亲昵情感，但其性质却挑战了李尔王的权力。尽管李尔王宣布关注的是爱而不是权力，他却没能把两者分清，在李尔王因为相信爱而牺牲了权力之后，他对肯特做出的一番行动却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为了爱（李尔王放逐了肯特）。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所相信的是爱的符号，这在他那个社会中，是无法与表达权力的体系分开的。

对thou/you体系的这种分析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于它容易显得过于特殊，因为这个体系已经从英语中消失了。当然，我们所探讨的这套意义是很难消失的。相反的，这些意义对社会生活如此具有根本性，以至于它们注定要通过数不清的、以与thou/you相似方式运作的其他系列符号加以传递。布朗和福特对其中之一即指称词类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这些在20世纪美式英语中，与16世纪的thou/you具有相似的功能。16世纪也有一个指称词类体系，用来补充thou/you。但是，为了更有力地从thou/you体系出发，使之能统括表示权力和稳定性的整个系列的能指，我们需要理解，这些能指本身是如何构成的，它们又是如何在一个更大的符号体系中运作以表达符号活动的意义的。

要说明的重点是，如果这就是操作体系，那么它是建立在表示权力和稳定性的透明能指基础之上的，而正是这些基本的能指，为我们的统括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一个充当构件的能指是对等性/非对等性，或者对称性/非对称性。这是一个关于权力的透明能指，的确涉及面颇广。"thou"和"you"之间的区别也建立在透明能指的基础之上。"thou"是单数形式，"you"是复数形式。所以，当两者都用于形容单独的一个人时，"thou"用到的是它最直接的意思，而"you"则是一种转换、一种移位。所以，区别是由两个能指构成的：复数，移位/转换。复数，如同大小，是关于权力的普通能指（复数=重要=权力）。转换要求付出努力，并且引入区别。于是，转换活动的在场，成为一个表示距离或

不稳定性的透明能指，成为对权力和制约的承认。

如果我们在这些词类中来看它，16世纪的指称词类体系并不是和thou/you并行无关的单独体系，而是（许多体系中的）一个共同表意体系的另外一种实现。为了表明它是如何带着这类体系特有的巨量冗余作为一个体系开展工作，我们从托马斯·米德尔顿的《齐普赛街少女》这部17世纪早期剧作中选取两行对话：

瓦尔特·霍宏德爵士：怎么样，杰克？
阿尔维特先生：为您的健康而骄傲，先生。

以上两人之间的权力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对话发生在阿尔维特家门外，这使阿尔维特先生具有某种地位，但瓦尔特爵士是一个富有的贵族，阿尔维特先生则是一个为生活奔波的手艺人，经济上受瓦尔特爵士资助，所以这位贵族能维持与阿尔维特妻子之间的私通关系。因此，这种稳定性关系与权力维度是不可分割的，而且瓦尔特爵士最大程度地利用了这种暧昧性。

对语境做了简短的描述后，我们来关注那些既反映语境又维系语境的体系。用马林诺夫斯基的术语来说，两人之间在进行着表情性交流。瓦尔特爵士对阿尔维特夫人耿耿于怀，至于阿尔维特怎么做、做什么，他并不真正感兴趣。阿尔维特也不以瓦尔特爵士过剩的精力为荣。这场对话的用处在于迅速唤起并强化他们之间的关系本身，伴随的是整个权力上的不平等和对稳定性的神秘化。在两个方面，瓦尔特爵士为对话做出的贡献都是不对称的。他发起对话，用的是以缩合形式出现的非对等形式的“dost (thou)”，部分地把这个词掩盖起来了。而且，他并不是简单地使用姓来称呼，而是用了姓的昵称“杰克”来称呼，而阿尔维特用“先生”来做回应。所以，瓦尔特爵士轻松地摆出一副亲昵面孔，有意让阿尔维特先生自己来制造出对他有所依附的标记。整个对话诗歌的简约例子，表明了有多少信息可以迅速得到传递，而处于核心的东西，则不过是对一套意识形态规矩的反映罢了。

然而，从阿尔维特的视角看，情况没有那么简单。面对瓦尔特爵士的问题，他的回答意义并不明了。但是，如果我们重新构建一个转换顺序，就的确能够起到作用了（括号中是被删除的成分）：

↑为您的健康而骄傲，先生

↑（我）为您的健康而骄傲，先生

↑（我）骄傲，（我）佩服（您）/（您是）健康的，先生

↑（我）骄傲，（我）佩服（您）/（我是）健康的，先生

↑（我）骄傲，（我）佩服（您）[1] /（我是）健康的，先生

尽管实际排序可能引起某些争论，但很可能阿尔维特面对瓦尔特爵士的表情性问候，最早形成的是“我很健康”这个简单而安全的回答。可是，就在“我很健康”这个老套的回答话一到嘴边，它便发生了转换，几乎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变成了关于瓦尔特爵士健康与否的不相干评论。这里的转折是一个具有一致性模式的组成部分，通过它，身份较低者删除了自我指涉和自我意义（他本人要表示的意义）。与此相应的是他对瓦尔特爵士的放大。他不仅把直接性的单数“thee”扩展为尊称性的复数，还加上了“先生”这个标记符。瓦尔特爵士的确提到了阿尔维特的名字，但是删除了代词（thou）。由此，我们看到一条由“you”的形式阐释出的更为通行的规则——身份低微通过对自我意义进行压制、对对方意义进行放大得到表征，身份高贵则通过与此相反的方式得到表征。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虽然阿尔维特的话很长却仍然无法表示拥有权力的原因。对瓦尔特爵士所说的三个字，他回复了六个字。相对于瓦尔特爵士的一句话，这六个字背后隐藏着三句被缩短的话。但这仅仅表示，他要制造出自己的意义是多么困难。他那精致的语词形式，很容易被看做“礼貌话语”，明显起着与“you”形式相等的作用。和称呼形式一样，这种非权力的实现在20世纪仍然鲜活而有用。英语，和大多数其他当代语言一样，具有被看做地位标记的尊贵形式。这些形式的特点是广泛转换，这些转换使得话语难以产生，也难于理解。但是，“礼貌的”话语，和“礼貌的”代词形式一样，都是自我否定和自我压制创造出来的。平等的礼貌话语，16世纪和20世纪一样，表示的是源于相互间的自制而建构起来的平等。它表示的是弱稳定性和对对方权力的承认。但是被认为与这种符码相关的身份地位，却并非来自对符码的使用，而是来自对方把它提供给你，作为

① 与上边诸句中使用的you来表示“您”不同，此处所用为thee（thou的受格）来表示“您”。——译者注。

交换，你又把它提供给对方。真正的权力，现在与当时并无不同，都是由表达自我意义的、非对等使用的直接话语表示出来的。

过量话语总是弱势的标识，这当然不是问题的关键。显然，沉默是表示被排斥在关系之外以及缺乏权力的透明能指。在阿尔维特的这个对话中，仆人们始终沉默而恭敬地站在周围，从社会来看，这表示了它似乎要表示的意思。阿尔维特实际上身陷矛盾之中，他想表达自己既拥有权力又缺乏权力（他经过转换的话语之一是"我骄傲"——在某些方面他的确是这样，尽管他是一个奴颜婢膝的戴绿帽者）。仆人们，如果他们遵循17世纪中关于仆人的那些思想控制规则的话，不仅是在语言模式中还是在非语言体系中，都会自我删除，置身交流之外。作为优秀仆人，他们的脸上应该不动声色（哪怕他们有所感觉而急于关照和帮助瓦尔特爵士，也是不合适的）。他们应该恭立一旁等待吩咐，而不是进行什么交流，不过绝对不交流也许不可能做到，因此他们只能尽可能少地交流，并且他们所交流的只能是他们作为仆人要求他们产生的、预先就建构好的那些意义：那些表示他们不具备任何作为参与者的可能地位的符号。

在诸如此类的相互作用中，许多其他符码也起到了作用，包括服饰符码、姿势等等，还有一些，譬如建筑符码，它们不仅确立了语境地位，而且确立了什么样的关系模式能在其中占据优势。特定标识随着社会和时间的不同而产生变化，所以，像 thou/you 这样的体系在20世纪英语中是不可理解的。大多数17世纪戏剧的现代读者甚至可能没有注意到有这里这种体系存在，更不用说理解这个体系如何起作用了。但是，这些体系对社会功能至关重要。思想控制体系通过一种双重策略将这个问题遮蔽起来：巨量冗余（如果一个符号体系不起作用，那么其他符号体系就会为其进行翻译）以及通过使用置于基础地位的透明能指。

关于这类符号体系的诸多要点，我们可以进行如下总结：

1. 表示权力和稳定性的符号所构成的彼此相关体系，在所有符号行为中都被用于组织和阐明参与者的关系。
2. 表示权力和稳定性的能指所构成的体系，是建立在关于这些维度之间对立和相似这种假设基础之上的，这导致了系统性的涵义暧昧和各种各样的冗余。
3. 表示稳定性的透明能指，是建立在大量原则基础之上的，这些原

则包括平等性、对等性、自指性以及简易性，或者缺乏转换修饰。这些还可以表示权力的缺场；反过来说，表示权力的能指缺场可以表示稳定性。

4. 表示权力的透明能指，是建立在大量原则基础之上的，这些原则包括不对称性、自我压制、放大和美化。这些还可以表示稳定性的缺场；表示权力缺场的能指可以表示稳定性。
5. 思想控制体系明确规定和假设了有关各类参与者之间权力和稳定性的特定关系，投射出关于现实的意识形态景象。

权力和稳定性的媒体建构

在当代西方社会，权力和稳定性是无法仅仅通过无数单个交换行为发挥作用的。大众媒体如同以前的写作、艺术、建筑等交流技巧行动相仿，必须建立起各种交流交换行为，把距离遥远的参与者带到有效社群之中来，才能让他们服从权力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需要由表示权力和稳定性的能指所构成的现有体系。相反，他们对能指体系的需求同样强烈，尽管他们必须发展替代性的体系和策略，来加强或替换那些促成面对面交流的东西。为了考察这些专门化了的体系，我们将使用下面的文本：麦克·威尔西与约翰·布耶克－彼德森爵士之间的一场电视访谈，前者是澳大利亚时事新闻节目“威尔西”的主持人，后者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右翼的人民党前任总理。（我们的记录稿，是为了再现相对即兴的话语中的语法组织——而不是用文稿方式进行介绍——对于文稿而言，以句子为基础的标点方式是不正确的。文中的点表示停顿和犹豫。）

威尔西：大家好。感谢参与我们的节目。昨晚，昆士兰州总理约翰·布耶克－彼德森先生遭受了他最严重的政治失败。国会否决了他备受争议的堕胎法案。11位自由党党员，其中4位是部长，打破联合阵线，把票投给了反对派，而在总理所在的、一向团结的国家党内部，也有4位党员反对，3位党员弃权，呃，做出这种行为的人中还有一位是部长。周二晚，在清点自由党和国家党的票数之后，这个失败似乎开始明朗起来，但是，在昨晚失败之前的十分钟，布耶克－彼德森先生同意削减损失，决定不以

政府的名义，而是以个人的党员身份来支持这项议案。但是，这并没有为政府因这次失败遭受的影响起到多少缓和作用。政治评论家们现在开始推测，随着今年年底将举行的选举，布耶克—彼德森先生的政治前景将会发生如何变化。布耶克—彼德森先生现在就在我们布里斯班演播室。总理先生，感谢您来这里与我们进行交流。

布耶克—彼德森：呃……谢谢……很荣幸……非常……非常荣幸……嗯……嗯……

威尔西：您过了几天难熬的日子。

布耶克—彼德森：唉……这就是政治……没什么特别的……有人来，有人走……那种日子……这些年……有许多这种日子……嗯……我投身政坛…特别是我当总理的这 12 年……这没什么特别的。

威尔西：有很多日子像现在一样难熬?

布耶克—彼德森：哦，没错……我想，这些日子……它们……呃……有很多……对……当然……有的……总是来来去去……各种各样的事情。

威尔西：这件事对您的影响，并不比其他更严重。

布耶克—彼德森：是的……没有……我们……我们……昨天……这个，呃……唉……我说过，只要你投身政坛……如果你像我一样身在其中 33 年……麦克……你知道的……我……我不得不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类人……像你这样的人……其他的人……所以……是的……这……这没什么特别。

威尔西：所以这不会影响你……你遇到这类事不会失眠。

布耶克—彼德森：是的……是的……我不会……我……我……说实话我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这里有两种交际活动，都涉及威尔西这位采访人：第一种是他和观众之间的交际活动，第二种是他与这位政治家之间的交际活动。我们先探讨这场访谈本身。两位参与者都有自己的权力资源：威尔西是采访者，布耶克—彼德森是政治领袖。两人生活在不同城市，访谈是通过两个电视演播室之间的连线进行的。他们的政治倾向刚好相反：威尔西的政治背景是中偏左，布耶克—彼德森属于右翼。同时，两人年龄相差 30 岁。真正的稳定性和亲密感是不可指望的。

分析的便利起点是指称词类，因为它们表征并建构了访谈本身中的关

系。威尔西称布耶克－彼德森为“总理先生”，这比称“布耶克－彼德森先生”更为正式，他被称为“麦克”，这比称“威尔西”更亲切。也就是说，两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极端的非对等性。在两种分类体系中甚至还存在着断裂，因为“总理”暗示着公共领域的取向，“麦克”则取向私人领域，即个人私下的存在。威尔西的用词表明，他认为这个情形是充满权力意味的，而布耶克－彼德森则表示他不这么认为。这种不对称性形成了一种权力的横组合段——布耶克－彼德森的权力和威尔西的弱势。作为采访者，威尔西首先发话，这种发话权一般意味着权力，但有趣的是提问这种形式——这是通常表征该权利的表层——却很难为他所用，或者说，绝对没有得到转换。他的第一次“提问”像是在陈述：它具有“宣示”这种句法形式。对他的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之增补上了一个问号，因为这在句法上像是一个问句，尽管他删除了开头的问句句法标志（即“您是否……?”）。语调上看，这是一个问题。他的其他两次插话都是陈述：句法上说，它们都是宣示，只有略微上升的语调来表示它属于提问。威尔西与这位身居高位的政治家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实际上取消了威尔西作为采访人所拥有的运用提问形式这种权力。

这场交际活动存在着大量的不对称，它们都携带着相同的信息。威尔西的话远远少于布耶克－彼德森——这与威尔西开篇时的滔滔不绝形成了极大反差——这是由于他本来可能说的话被大刀阔斧地删除了。这种被极度删除的话中仍然包含了不利于布耶克－彼德森的内容，而且他一再重复自己的观点“这件事并不……”、“所以这不会影响你”，正是在坚持自己拥有权力，尽管这种坚持被转换成表面上赞同对方的意思。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他的针对性在语词这一表面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看不出任何带有感情色彩的内容，也许只在语调中有所体现，而即使这一点，也是非常轻微的。

布耶克－彼德森的语言很像演讲，也就是说，语法结构很有相当即兴的特点：分句结构松散地“链接”在一起（“唉……这就是政治……没什么特别的……有人来，有人走……”），而不是像书面形式那样强烈融合，更有句子的结构特点。譬如，像采访者的引入部分中那样。以这句话为例：“周二晚，在清点自由党和国家党的票数之后，这个失败似乎开始明朗起来，但是，在昨晚失败之前的十分钟，布耶克－彼德森先生同意削减损失，决定不以政府的名义，而是以个人的党员身份来支持这项议案。”

这个句子至少包括八个分句，但是，如果我们把“清点”、“失败”和“损失”当做从分句中派生出的词，那这个句子可能包括了十二个分句。布耶克－彼德森的话语还被犹豫所标识，这是相当即兴和非正式的场合中口头语言的特点。这种犹豫发出了一种对等信号：一方面通过譬如称呼对方的方式表示权力，另一方面通过使用更为亲密的随口发言的方式表示出稳定性。由于看上去采访者不能使用相似形式做出回应，我们不得不假定总理是在向采访者发出权力信号。不过，他是通过使用表示稳定性的形式来做到这一点的。

这种涵义暧昧性不仅仅是假设。实际上，布耶克－彼德森像威尔西一样，同时在两个符号活动语境中同时发挥功能，其一是访谈，其二是包括节目观众在内的交流。对于政治家和采访者来讲，第二种符号活动语境对节目的效果至关重要。就像代词体系一样，这种关系必须是开放性的，这样接受者才能够尽职地建构适当的模式，愿意在其中起作用。观众实际上完全被排斥在交流过程之外，他们的权力甚至比威尔西还要少，但是，对他们来说，还是有这样一种可能，即想象自己以熟人的口吻做出回应，就像这位大人物那般亲切。所以，话语形式的亲近是指向他们的。作为矛盾携带者，布耶克－彼德森的双重形象，经由同一话语和风格同时投射出的权力和稳定性，是非常有效的，因为矛盾正是这位人民党党魁的根本。对于“民众”，他使用了他们的说话方式——或者说，使用了构成他们说话方式的那些东西。对于他的受话人威尔西，他坚持了自己的权力。威尔西带有符号性质的节目，在这种情况下，却不允许自己投射出任何形象，即便他说的话相比之下要长出许多。

这份记录稿的第一部分中，观众的选择是不同的。在访谈本身里，观众是旁听他们的对话，因而有更多的自由决定将自己站在哪一方。第一部分中，威尔西直接探出屏幕，问候“大家好”。这种语言具有书面符码的特定形式，表示出权力和正式。在另一端凝视的唯一一个人是看电视的人，他不是在读而是在看，成千上万户家庭都是这个模式。赋予符码意义的主要符号活动结构，在这里，是电视中的说话人和看电视的人所构成的二元组合。对于分析者而言，存在着一种诱人的幻觉：对话的意义，在电视屏幕上和我们的记录稿上，都是确定的。可是，对话的意义还取决于这个二元组合的另一元，而这并不是确定的。观众也许会关掉电视，把威尔西的声音调至静默，甚至让电视屏幕上只剩光斑，将其完全删除。如果他

们听，他们或许很放松地坐在沙发上，边看边聊，直接谈起自己对威尔西和布耶克－彼德森的看法。或者，他们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静静地看和听，全然忘我（把他们本人的所有的信息都化作零）。后一种关系被当做电视关系的标准样式：被动的、被麻痹的观众。但是，表面的样子是具有欺骗性的。两个同样是被动的看电视的人（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读书的人、观赏绘画的人者，以及戏院、布道、论辩这些场合中的受众），可能与同一文本之间有着极其不同的关系。一大重要不同是转换能力的不同。任何一个人，如果从经过转换的文本出发，能够规划出一套更完备的先在结构，那么，他就是在从事一种反映原生产行为的操作。这个人或许一言不发，但这仅仅是暂时的和表面上的自我抑制。在他内心，信息像一个平等者所做的那样，被复制，被重新创造，所以，这个人能够和说话人一道感受到稳定性。但是，对于这样的接受者——从不生产那些转换并且充其量能够部分地逆转转换操作——而言，关系是被排斥的那种，他们感受到的只是无力和被异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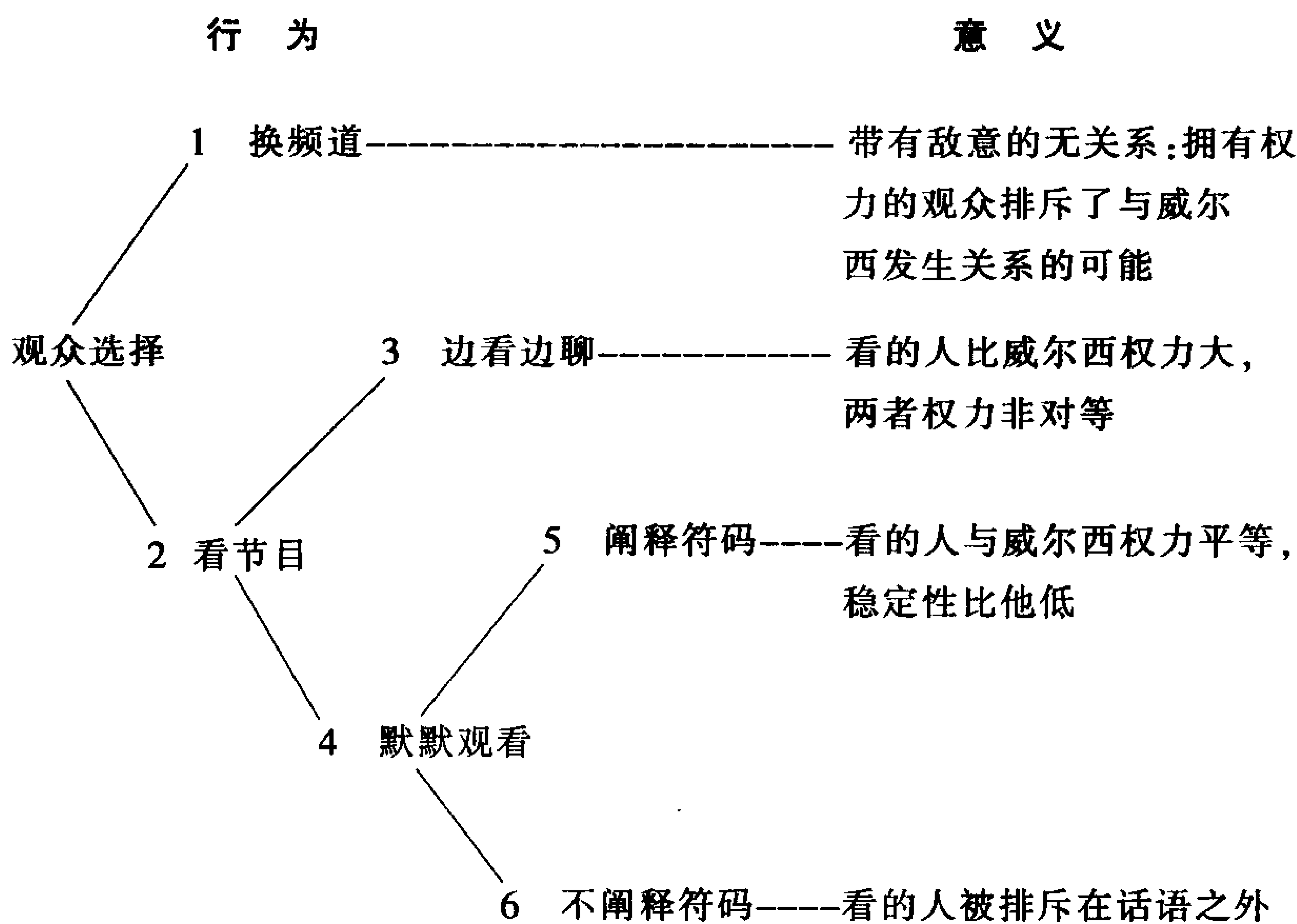


表 3.1 节目“威尔西”的观众选择

在表 3.1 中，我们把各种可能的反应制作成一个选择网，每种选择都分别表示与威尔西之间的关系。随着每个循序渐进的选择，观众同威尔西相比，变得愈加弱势，尽管这种主体方面的变化是同时存在的客观方面关系的相互依存，与威尔西这位地位尊贵的交流者相互依存，与包容在一个

私人化场域中的观众相互依存。选择 1 至选择 3 都赋予了观众某些权力，但这是与其反面相互依存的，威尔西有在大众传媒上交流的权力，任何观众都没有直接做出答复的权力。只有选择 4 不包括任何矛盾，除非是那些人——他们虽然身体上没有做出关电视的动作，但思想上已经做出了关电视的动作，因为一个不能做出阐释的阐释本身就是一个矛盾。

我们能够认识到，在某种意义上，某些反应是“优先”的。威尔西和第 9 频道或许不播出这档节目，我们推测，那么很简单，观众换频道就是了。我们还能够认识到，在威尔西和布耶克－彼德森之间的对话中，有着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再次做出了某些表面上看去像是常识的假设。威尔西是一名专业采访者，他的语言形式与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的大多数其他采访者的相似，布耶克－彼德森是一名经验十足的受访者，正如他本人所指出的那样。好比久经沙场的战士，谁也不能唬住谁。我们可以通过体裁概念来把握这层双方所共有的假设包含的意味，把电视访谈这种体裁视为暗示着一套接受和生产体制，携带着一套关于角色、意义和风格等等已经先期存在的理解，这些东西是包括观众在内的所有参与者所共有之物。

然而，尽管关于这一体裁的知识确实存在，而且具有阐释力，但是，指出它的局限性也是很重要的。威尔西和布耶克－彼德森用到了一套表示权力和稳定性的能指，这套东西制约着 20 世纪澳大利亚人的日常交际行为，与运用于英国和美国的那些体系也相似。体裁并非所有其他体系不再实用的神灵庇佑之地。它是这些体系运作的具体事例，是那些规定具体情境中各种行为的选择所组成的横组合段。通过这些规定，体裁对社会形态、意识形态形式进行编码并予以实施，由于社会形态或意识形态形式在环环相扣的生产和接受体制中被奉为神明，所以似乎成了意义产生的先决条件。但是，在实践中，体裁所投射出来的这套意义和关系绝对不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思想控制体系轻松地就把意义赋予我们所表示的“叛逆”行为。换频道，或者边看这种节目边聊天，二者都是再寻常不过的反应，即使威尔西所希望的并非如此，而且，不论从哪个方面说，二者都不是无意义的。同时，如果这种反应变得“不同寻常”，并且把参与者之各种可能的关系进行编码，那么，这个程度上，它们就表示这里所探讨的体裁发生了改变或有所拓展。每种情况下，最终所探讨的都是权力与稳定性之间的一套复杂关系，其中，权力和稳定性被涵义暧昧地联系在一起，两者透过自身就涵义暧昧的那些表示权力和稳定性的能指而彼此对立、相互混杂。

空间中的意识形态和身体

对符号情况的所有维度而言，最根本的维度是空间中参与者（的身体）之间的物理关系。在英语中，就像在其他语言中一样，存在着多种话语形式，它们用空间词汇表达出社会意义："保持距离"、"置身事外"、"高高在上"、"奴颜婢膝"、"认清你的位置"、"管理高层"，等等。这些话语的转义有时被称为隐喻，但是，它们表达的是位于物理空间中身体排序之间的基本平等，以及社会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构成了透明符号体系的基础，这个基础对于人类和其他无数物种的社会生活组织而言，都是具有根本性的。狗群中的领地行为，譬如，就一套复杂信号组织起来的，这套信号宣布了，对于特定个体之间的系列特别关系而言，什么距离属于过分亲近了。而从鸡的等级森严的秩序机制中，则生成了"啄食秩序"（pecking order）这个术语。

无疑，在"低等"物种的这些符码中存在一种生物学基础。这种基础在人类身上可能也有所残留。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强调，尽管这一基础形式可能有着生物学上的癖性，但是，它在不同社会群体中所经历的驯化十分多样，以致不能被简单地归结到某种先天性的癖性。同时，符码所携带的意义毫无疑问是来自社会生活，而不是来自生物性。这些意义与社会关系的主要范畴有关：构成每种社会结构的权力与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曾杜撰出"空间关系学"（proxemic）这个术语，用此词来表示空间中的物理关系所携带的那一系列意义，尤其是近（即"邻近性"，proximity，他为这些符码的命名即由此词而来）和远。这无疑是关于多种社会意义的一个重要的透明能指，尤其是针对与稳定性关系相关的那些而言。然而，尽管从表面上看去，它的形式基本而且它"自然而然"，但实际上，它却惊讶的复杂、涵义暧昧，并且会受到其他种种决定要素的影响。非邻近通常表示关系中的弱势、漠然或异类，无论这种表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但是，邻近性表示一种强势的关系，它既可以是积极的（爱、亲密），也可以是消极的（侵犯、敌意）。邻近性，就其自身而言，携带着一种矛盾。它是一个涵义极其暧昧的符号，只有存在着其他控制阐释的理由或符号，才能让其涵义不再暧昧。偏远性（remoteness）

同样地涵义暧昧，尽管不如邻近性那么明显。任何一种特定文化都为这一符码提供了基本的阐释隔栅。所以，举例来说，在一种文化中（譬如英语）表示稳定性的远，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譬如意大利语）表示非稳定性/权力。当然，每种文化之中都存在着“方言”。涵义暧昧的进一步可能，来自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术语不是绝对的，而是对一个连续体中的若干个点作出标识。所以，2 米比 4 米（=亲密/侵犯性）更近，却比 1 米（=非亲密）更远。空间关系符码，携带着关于稳定性在场或缺场的意义，是不能被孤立地理解的，因为在任何社会结构中，稳定关系与权力关系都是彼此混杂的，后者（各种权力关系）一般是通过上——下（或高——低）这种维度得到表征。空间的两根轴共同作用而产生出意识形态意义。所以，表意体系和它们的社会意义这两个维度是如此杂糅，以至于我们更乐于谈论空间符码，而不是空间关系符码。



图 3.1 《天使报喜》：对关系的研究

为了阐释这套符码的某些形式和功能，我们来看一幅黑白两色的复制品《天使报喜》。这幅祭坛画由锡耶纳画家西蒙尼·马尔蒂尼作于 1333 年，原本陈列在锡耶纳大教堂，现在被安置于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首先，我们就要认识到，我们所研究的，是源于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这种独特的文化之中的这些符码所构成的一种形式，具有该文化所特有的美学的、社会的、经济的组织。这种文化生产和接受模式——思想控制规则——与“我们的”文化，即20世纪“西方通行的”文化，有着体系性的不同。所以，我们的阅读所致力的，是重构符号活动层面的相关因素，重构西蒙尼·马尔蒂尼这位画出了这幅画的人在社会定位中所处的地位，我们所回应的，不仅是作者生活时代中符号活动的广泛要素，而且无疑还有极具地方色彩的那些要素，譬如当地的教会政治。尽管只是集中关注于这一幅画，但是，我们自信地认为，我们对画的解读是可信的，它是以许多解读者关于无数相似文本的分析作为依托的。也就是说，马尔蒂尼的画作并不是孤立的文本，而是众多文本中的一个，具有相似的信号，长期以来都得到了解读。绘画表现了跪在左侧的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宣布，她将产下圣子。金色的背景上印着的语词，像一只箭一般从天使射向玛利亚。尽管这是一幅描述现实的写实画作，我们仍将从分析它的主题入手，然后将对它作为艺术作品所具有的地位展开思考。

如果对画认真观看，会发现天使加百列与玛利亚相距约2米，也就是一个身长，玛利亚坐着，他跪着，这使得玛利亚比他高出大约10厘米。对于这个事实，需要认清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就这个事实自身而言，它的意义具有相对大的不确定性。大厅显示了距离意义中的文化差异，特别是被看做距离太近的那些东西，可以对关于人物和关系的既定范畴做出阐释。所以，我们会问：以14世纪锡耶纳的标准衡量，加百列是否距离太近？同时，玛利亚是否足够高——对她本人来说，对加百列来说？空间符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来自于这样的事实：距离组合联结起了至少两个人，因此所携带的信息是关于两个人双方的，但是，要么两个人中的一个，要么两个人，可能无法掌控这种空间关系，因而无法表达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意义。挤在电梯里的人们的行为，正是属于此种情形。如此邻近距离本身有可能表示一种极端的亲密，但是，电梯乘客可能彼此之间全然陌生。这里有一种接受体制被触发，它为该文化中的所有成员所依赖，它取消了亲密信息。否则，某个人向另一个人靠近，后者并不接受这种意义，却由于某种原因无法摆脱，那么，前者就可能掌控这个组合。

因为这个缘故，距离一般会由一整套其他能指进行补充，这些能指可以被理解为物理距离的转换，它们作为评论而对物理空间的隐含意义施加影响，表达出一种具体的接受体制。玛利亚扭转身子，把脸侧向一旁，用

长袍遮住喉咙，表示加百列离得太近，借此抵消该距离的显在意义。然而，她仍在看着她，从眼角瞥视，表面上漫不经心的样子，把耳朵伸向加百列的那串话语。加百列跪着，这既降低了他的高度，又让自己无法动弹，保证了自己不会跳起来欺负这位少女。他身体笔直，微微前倾到玛利亚的空间之中。他的头部直冲前方，大臂大致呈垂直下垂，小臂朝向玛利亚，双手则一只朝上，一只朝下。他的左手握着一根树枝，树枝与地面几乎是严格垂直。

从两位参与者表现出的矛盾之中，我们获得一种矛盾心理的总体印象，在玛利亚身上体现尤其明显。对此我们能够表述得更精确些，诸如意义如何得到编码和传递，我们如何对其进行解码。我们从基本的空间组合入手，它不仅仅由距离组成，还包括各种类型的人。两个人中，其中一位明显是位女性。另一位是天使，从性别标志上看要暧昧得多。而且，他的背上有一对翅膀。对这样一位受到良好抚育的姑娘而言，面对一个从天而降的陌生天使，两人之间能有多熟悉呢？玛利亚坐在椅子上。很明显，决定两者之间精确距离的是天使。他的意思是第一个的。两米是相当近的，但也是涵义暧昧的。同时，在亲密中也含有潜在的侵略性。玛利亚的反应，于是，可以被解读为对加百列对空间关系的陈述所做出的评价，正如加百列的姿势可被理解成对玛利亚担忧的提前回答，标志着他本人那种接受体制。

在我们的分析中，玛利亚所使用的信号包括肢体动作（将身体转向一边）、头部动作（低头向下、向侧面）、对服饰符码进行调整（用长袍捂住胸部）、面部表情（紧闭嘴唇，面无笑容）以及凝视（看着加百列）。此外，在这场对话前，她将自己整个身体都裹得严严实实，坐在那里看书。她用来回应加百列闯入的所有信号体系，都明显起到了表示空间意义的作用。这些信号体系是对空间符码的转换，清楚地对关于社会距离的陈述进行了编码，伴随着明显冗余，携带着关于被察觉到的距离的许多陈述。玛利亚将身体转向与加百列相反的方向，这表示的了非邻近。撅着嘴，头转向一旁，头向下，这些动作强化了这一非邻近意义。但是，她的凝视与所有这些意义发生矛盾，建立起一种眼神交流，因而也就接受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意义不仅仅是这些符号的总和（表示趋近的有 5 个，表示疏远的有 2 个）。意义存在于操作中，包括对符号的排序。对符号操作顺序常常都是

可以猜测的，并且可以在假设中复原，就像这里一样，该顺序实际上记录下了一个辩证的过程，这个过程仿佛描述出了关系表达式。玛利亚的态度表达式是（+——————+）趋近。把这个表达式翻译成语言，就是说："你离得很近。太近。过分近。过分近。过分近。过分近。行了。"眼神运动，凝视，是尤其有意义的符号体系，因为它最灵活、最容易受到控制，这么说吧，它是最后一个词，是最表面化的信号。典型的解码活动是从符号链的两端开始的，即开端陈述（物理距离）和终端陈述（认知距离，通过凝视而得以交流）。有时，阐释者会按照不同的顺序进行猜测，或者遗漏许多步骤，给出不同的意义，但他所利用的总体操作程序则是相同的，在这里，意义并非指一个不同的思想观念方面的内容，而是指一个不同的人际关系方面的内容。

通过同样的方式，我们能够对加百列的复杂态度进行解码，以便复原出他所采取的进退模式，这套模式的总意义在于表明，他有克制地让自己侵入了玛利亚的私密空间。但是，距离不是在这里具有意指作用的唯一空间维度。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加百列是跪着的。跪姿降低了一个人的高度，所以它是表示权力减弱的透明能指。它还与表示稳定性的能指相互作用。如果加百列是站着的，那么他的距离会被认为更具有侵犯性和威胁性。这反映出权力和稳定性呈反向关联这一总趋势，所以，权力减弱意味着稳定性增强，反之亦然。

然而，玛利亚是坐着的。如果"高高在上"自动地表示权力增强，那么坐下便应当表示权力减弱（尽管意味没有躺下所表示的那么强）。然而，对此有着太多的反例，以致这种解读可信度受到影响。在很多文化中的许多个时代里，从旧式的国王宝座到现代主席、教授的坐席，各种各样的椅子都表示着权力。似乎争论的焦点不是高或低的问题，而是静与动的问题，因为地位高是通过不必动身来表示的。本例中，权力能指具有某种动机，某种理性，但也为涵义暧昧留有余地。解决这种涵义暧昧问题的一种明显方式，是把其他权力能指附加在拥有权力的那个坐着的人身上，譬如通过升高椅子，要求所有其他人下跪、爬行或匍匐，或者将华盖、或者升高位于坐着的人头顶的华盖或其他构造。加百列正是通过下跪的方式表现出玛利亚的权力，所以他比玛利亚矮，但是，她拥有权力这个信号却不受她的控制。因此她没有权力，除非是加百列赋予她权力。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所以在根本上说是涵义暧昧的，这种暧昧与二者之间亲密/正式这种

复杂关系具有内在关联。

空间符码及其各种转换形式携带着复杂的社会意义，对文本的解码则以空间符码的方式揭示出总体的社会类型，以及各种协商操作。但是，为了确切地理解这一交际行为（以及这幅画），我们需要了解这一交际行为指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它与所指对象所构成的世界之间那种模仿关系。天使的话语为从这种维度切入这一交际行为提供了路径。《圣经》对这一事迹的叙述在中世纪的锡耶纳要比在现在更为著名，《圣经》讲到："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路加福音》第1章：28—29节）接着天使向玛利亚宣布，她即将产下耶稣，父亲是上帝，而受孕方式则不清楚。我们没有任何关于涉足这一事件的想法，关于《圣经》中这个片段已经有浩如烟海的说法和经解。但是，我们可以说的是，《天使报喜》的描述十分接近《圣经》对这一受孕圣迹的描述，所以，作为中世纪绘画的常见主题，关于"天使报喜"的绘画，所表现的是经过几次变化之后而被移位的性行为。这种转换，部分地，是交流与性之间的系统性类比所达成的。在《约翰福音》中，提到耶稣用的是"道"，提到受孕行为用到的是这句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如同这幅一样，这个主题的画作通常会表现玛利亚忙于阅读的形象，旁边还放着一本书（《圣经》），用来获得更为丰富的语言信息。这幅画中，玛利亚所传递出的焦虑或不安，是对语言施暴的回应。加百列的话语好比阴茎，越过空旷的空间，穿透她的耳朵和她的思想。阴茎形象数量众多：加百列右手竖起的手指、树枝、传统的百合花、他身后莫名其妙扬起的斗篷。同时，在这幅画中央的上方，一只鸟被代表着圣灵的一群婴儿的脸簇拥着，（鸟，代表着圣父），它投射出一缕光线，与加百列传递到玛利亚耳朵的那句话相互交织。这是这类画作的另一种惯用手法，把上帝或圣灵表现为，从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位置，向下投射出表示受孕的神圣光芒，因而加百列的话语行为与表示性行为的习惯能指被划成了一类。

体会到了这个交际行为指什么以及它与作为阐释语境的事件世界之间的指涉关系，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空间符码所携带的那些复杂切换和矛盾。对于交际行为中的参与者，仅仅了解他们的性别和社会地位是不够的，尽管这些属性固定而持久，并且能够决定社会行为的所有可能性。活

动类型同样至为关键，因为特定任务需要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样才能有效地得到施行。这幅画以一种几近戏仿的形式展现了父权式家庭框架中的关于爱情和性的问题。玛利亚与两位男性相关：跪在她面前的加百列和天父上帝，后者的权力是如此巨大，以致他不能与贞女玛利亚出现于同一画框，却必须通过中介者与之相关。从符号角度看，如此的权力是以高度和距离之极表达出来的，因此使得对性而言具有根本性的亲密变得不可能。权力与稳定性无法调和，因此权力本身，由于缺乏了稳定性，便成了性无能。所以，缺场的上帝成为父权制的能指，对在场的加百列而言，如果他要完成自己的婚介功能，而且让相关的所有人都觉得满意，就成为父亲实践中必须要做之事的能指。这样，通过下跪这一自我贬抑的动作，以及他年轻的女性化的外表，加百列构成了相对平等关系的基础，没有他，便不可能有稳定性。上帝表示的是作为父权化身的男性，加百列的意义则是含混的（因此有了那些彼此矛盾的信号），但在他身上，包括了男性作为爱人的这一表意活动，觊觎在圣父权力的阴影下达成与玛利亚之间的亲密关系。

所以这幅画代表两种彼此叠加的符号行为，每种都表示一种男女社会关系。这种叠加表示出一种矛盾，它将这个男性形象一分为二，一个是远古的男性，另一个年轻的女性化的现场形象。这幅画还阐明了女性的矛盾作用和行为，她是顺从的、被动的从属者，又是具有潜在权力的、积极的平等者。这些性别关系的其中之一，可以看出是父权制意识形态。另一种关系似乎与它正相反，但是，画家将其表现为一个必要的伴随者，父权制“附体的幽灵”（*doppelgänger*）。马尔蒂尼让我们看到两种意识形态构架在功能上的关联性。这种“马尔蒂尼效应”实际上是一个广泛现象，意识形态常常就是以这种方式具有双面性，其理由已经由上边的例子做出了清晰说明。在更大的结构中，统治群体关注的是如何维系自己统治的权力和权利，而且会生成一种意识形态，用强化了的形式来表达这些权力关系。然而，一心关注权力表达，会导致在这个更大群体中出现瘫痪和缺乏效力，最终侵蚀掉这个统治群体的真正权力基础。统治群体是唯一效率所在这种假象，一旦意味着统治群体需要包办一切，那么这个假象便会陷入尴尬境地。稳定性的纽带必须存在，必须允许从属者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主动性，甚至控制权。所以，在教育领域，教师权威得到意识形态的支撑，赋予他们对知识的垄断权，但是，如果他们在学生的校园生涯行将结束时

还保持着这种垄断，那么，他们就没能完成作为教师的任务。老板和管理层合理占有利润，是因为他们拥有专业知识、权威，充当了工作制度制定者的角色，但是，没有工人的反馈和协作，这些东西中没有一种能够生产出产品来，而工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被信任，必须与管理层融为一体。在家庭中，如果一家之长只是让家人畏惧和服从，他是得不到爱的；如果缺乏稳定性纽带，家庭像社会群体一样，就会分崩离析。这两种表面对立的意识形态形式，在上述范例及更多的情形中，对于统治者维系其统治，都同样地至关重要。潜在的统治者必须中和二者，必须具有控制矛盾的能力，才能让作为整体的体系得以延续。

画作放置背景的意义

必须承认，这是一幅画，一个出自画家之手的文本，而不是便于保存的现实片段。既然如此，这幅画必须以符号活动层来定位，把西蒙尼·马尔蒂尼考虑到信息生产中来。文本可能由远离马尔蒂尼时代和文化的人——譬如，我们——进行解读，但是，我们会用将其置于它最初生产时刻这种做法来开始，对此我们将尽力而为。这并非在暗示这就是文本“真实的”或唯一合法的意义，而其他所有解读都是歪曲之辞。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尊重特定时间点上由参与者的社会组织和文本形式所构成的统一性，为了承认它们在运作于当时的思想控制体制经济中所具有的重要性。

这幅画原本是作为锡耶纳大教堂的祭坛画来设计的，尽管现在它不在那里了。西蒙尼·马尔蒂尼为画署了名，标了日期——这并非当时的通行做法。若非如此，他就像上帝一样在画中缺场，只有从画的效果才能够得到觉察。在中世纪绘画中，作者的缺场极为常见，以致通常无人对此有所提及，但是，缺场仍然是一种关系，是文本动力的一部分。从符号角度而言，没有受众，文本就不会存在，而受众必须把文本置于某种社会关系之中，并把文本的关系归结为世界。社会关系对画作的效果至关重要。没有社会关系，画作的意识形态内容将会是呆滞的。我们可以用更强烈的方式来表述这个论点：文本的意识形态效果，是两个层面的结构相互作用构成的，其一是透过文本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形式，其二是符号活动本身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形式。这里的意识形态概念，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阿尔都塞对

意识形态所下定义——“与真实存在状况的想象性关系”——的影响，他的定义从彼此相宜的角度勾画了意识形态。通过“询唤”（interpellation）这个概念，阿尔都塞还强调了意识形态和单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询唤是一个暗喻，表示拟人化了的意识形态所发出的事实上的召唤，召唤旁观者们与之建立起一种符号关系。经过实事求是的艰辛探索，我们坚持认为，意识形态是不发声的。只有人这一施为者才可能取得社会效果。但是，像询唤作用之类的事情确实会发生，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按照实在的社会事实对之做出解释。

我们从身体在空间中的物理定位开始。这幅画本来放在一个固定位置，祭台后面，放在高出一截的平台上，四周都有屏障，除在特定场合外，只容一名祭司通过。将其环绕的教堂是一座哥特式的宏伟建筑，遍体绿、白两色大理石装饰，地板是精致的马赛克。所有这些事实，对于潜在的观看者具有一种强制效果，“召唤”他们静默地穿过这座大理石、石头和黄金构造起来的建筑。他们知道哪里是自己可以站的，哪里自己是被排斥在外的。因为施为者缺场或不可得见，所以更容易被受到如此召唤的人称为“上帝”或“教会”，意识形态效果也因此更为强烈。

背景结构所包含的信号提供了两个观察视角：其一是祭司的视角，它是封闭的，其二是善男信女的视角，距离安排相当精心。我们先来考察善男信女。他们被安排在画的下方，与之相距至少10米。从这个位置看，这幅画有了某种意义。物理上说，观众也许没有被置于中心位置，但画作的对称性足够清楚地表明，这正是合适的观察位置。从这里观看，黄金让人印象尤其深刻。画的一半以上都为黄金所覆盖，使之成为不折不扣的名贵之作。画风本身并非高度写实，因而凸显了距离、正式和权力。从这个距离和角度观看，观众在留下印象的同时，不会被强烈卷入场景本身。在这里，凝视方向是一个决定性能指。加百列和玛利亚形成了一个二元组合，二者通过目光交流彼此关联。这使得旁观者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距离。两人永远不可能注意到观众这一事实，让观众得以有所选择——要么他们近身走入画作场景，成为画中的中枢，要么他们驻足远观，置身其外。但是，前一种选择，由于周围语境及其制而不可行。所以，旁观者只能被放在恭顺而距之遥远的权力信息接收者这一位置上，而发出信息者是如此恢弘的一个实体，因此为它命名的必定是教堂，而不是西蒙尼·马尔蒂尼。虽然看不真切，但在这一更大信息中是包含了其他更为亲密的颠覆性信

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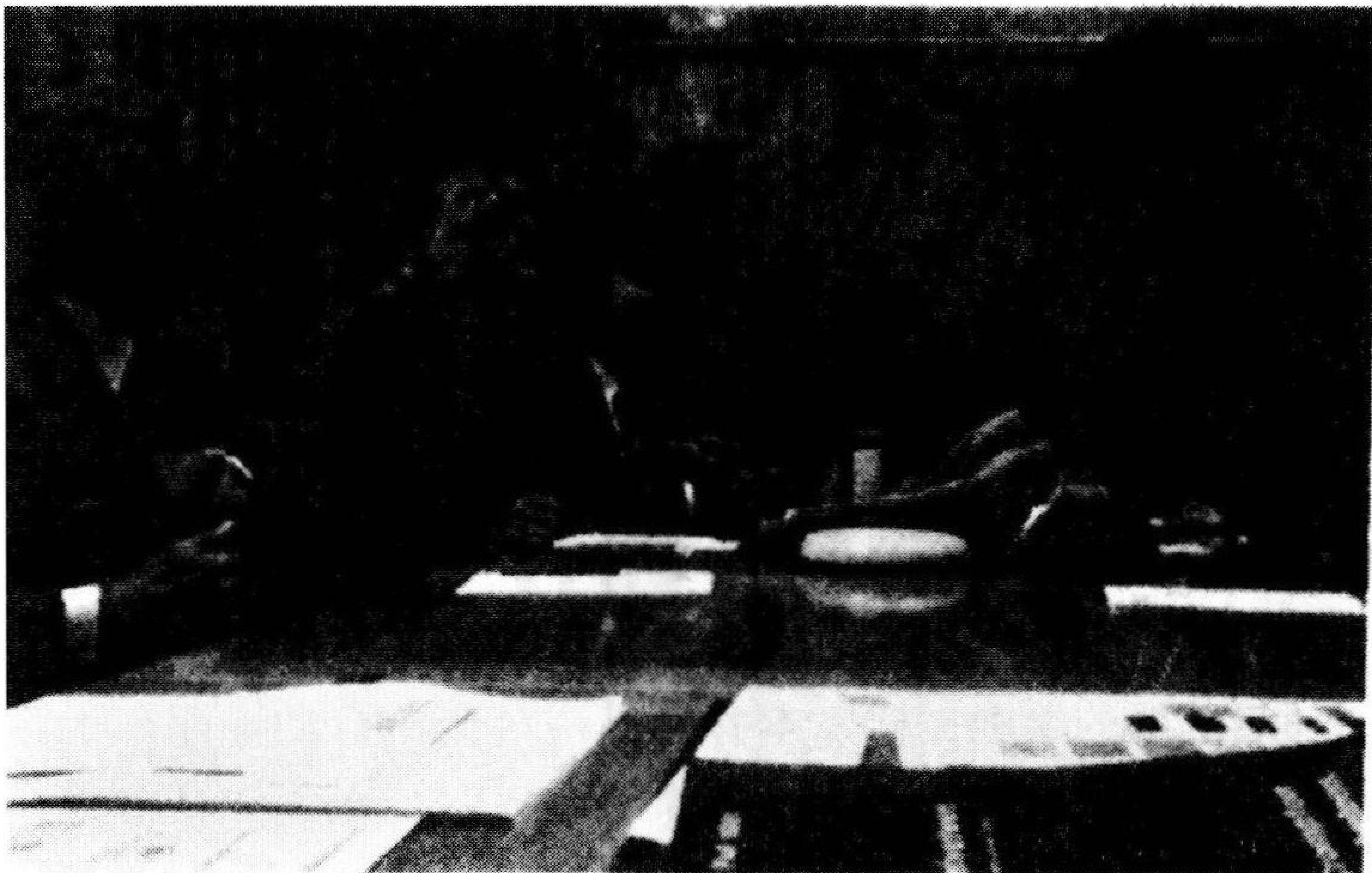
令人惊奇的是，祭司，作为独身的教堂职能人员，被放在邻近这幅画的位置，由于与画作之间的亲密接触而更有可能发现这幅画的亲密意味。聘任西蒙尼·马尔蒂尼并付给他钱的教会高层人员与这幅画亲密接触的可能性更大。他们所接触的，是对性别关系如何必须在父权制下得到掌控进行去神秘化的描述，而不是关于男性权力的官方意识形态。当然，这两种观察位置之间的差异并不是绝对的：这是一个通过信号进行强调和突出的问题，这些信号鼓励观众去解读这一套意义，而不是另一套意义。从这两个位置，对于那些能够也愿意这么做的人，暧昧和矛盾是都能得到解码的。物理信号的压制性，典型地受到接受体制强化。譬如，如果不是还有充分教诲并得到警察保障的种种规则，强化栏杆之为“屏障”这种意义，那么，祭台周围低矮的栏杆会被人们轻松跳过。同样，在善男信女那里，把性的父权制形式解读为本质上是对生命的扼杀，会受到特别的禁止、严惩和阻止，而在为情所苦的男男女女的精神导师那里，在非拘囿的父权的倡导者那里，这种解读却是必然会得到认可的。

坐姿的意识形态

空间符码常常是表达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介，它们通过其他符码，在一系列广泛的情境中起着调和作用。这里以图 3.2 为例，这是玛丽·奎恩特这位著名纺织品设计师主持的一次董事会，它是发表于《星期日电讯》这份杂志上一篇文章的配图，文章对作为著名商界女杰的玛丽·奎恩特做了介绍（1981 年 3 月 29 日）。

桌子的刻板形状以及椅子把一种空间结构强加于每个在座的人，携带着关于公司中权力与稳定性的清晰意识形态信息。桌子两头的人相距大约 2 米——与加百列同玛利亚之间的距离相似。沿桌而坐的人们彼此相距约 20 厘米，从物理角度讲，这是个很短的距离，但在心理距离上却是彼此同等的，因为他们是平视的，并不拥有构成空间横组合段的眼神交流。男人们穿西装打领带，女人们的高领遮住了喉咙。在衣服包裹方面，他们可以媲美加百列和玛利亚，尽管玛丽·奎恩特是以服装设计大胆而闻名。所有这些信号都严格受到思想控制规则的严格规矩，使得关于群体之内普遍关

系的认识得到强化。有了这一基础，这种认识不必用语言来表述，却在每次董事会上反复得到表述：每个个体权力是平等的，其他所有人的权力都得到平等的尊重，每个个体都封闭在隔栅式的结构中，能够对关系进行调整（譬如转向一边，或斜倚桌上），但这种调节仅限于规定的范围之内。这种安排生动地表达了典型地制约着这类情况中话语的思想控制规则。评论必须导向主持人，或者在她的许可下，"经由主持人"而导向其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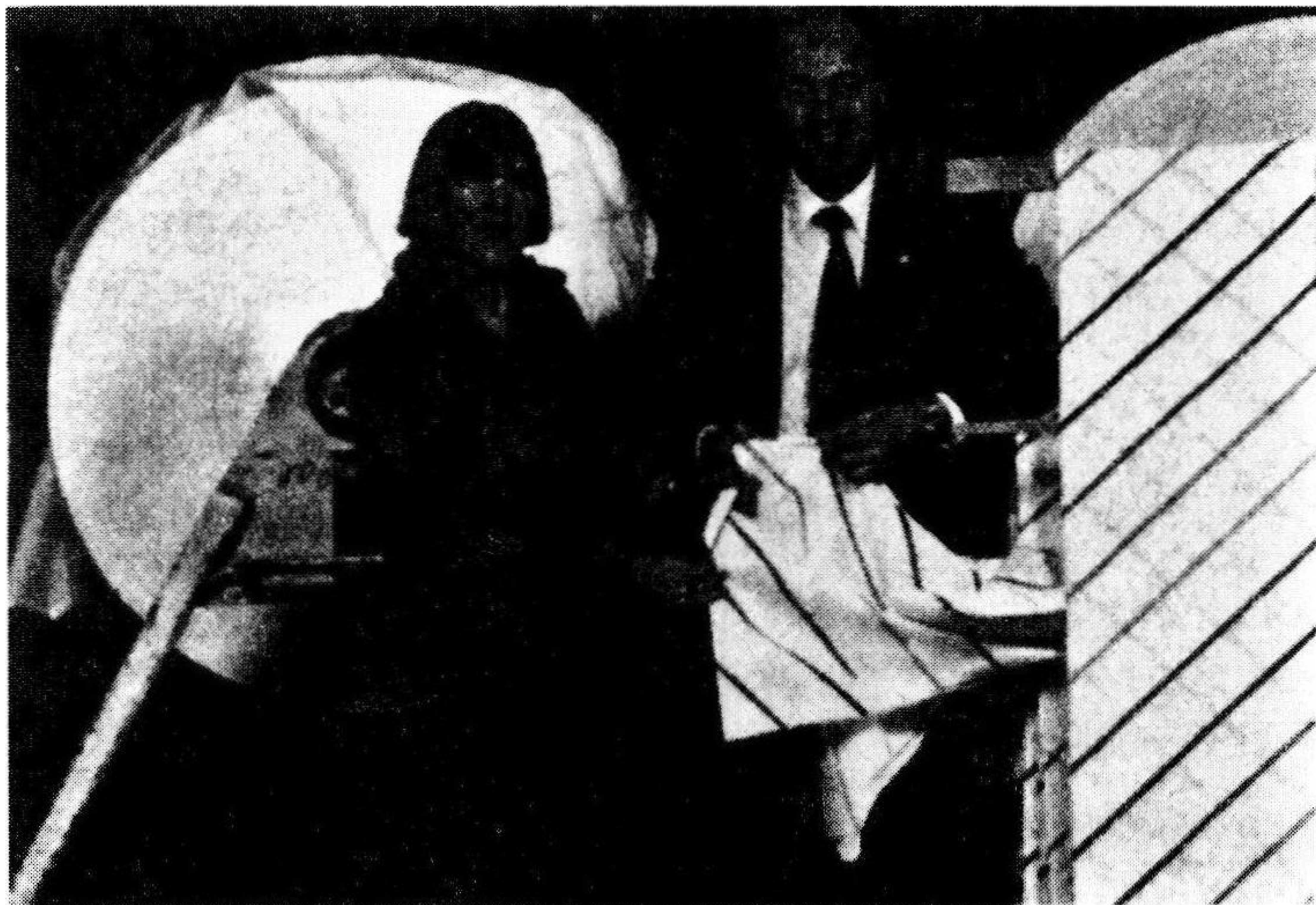


图 3.2 作为权力能指的玛丽·奎恩特

当然，玛丽·奎恩特是主要的例外，她坐在桌首这个象征权力的位置上主持会议。其他空间位置也具有关于身份高低的同样意义，或者也可以

被看做身份高低的转换。桌“首”被视为更高一些，尽管实际上它与其他位置处于同一水平面。另一个透明的权力能指是中心与边缘的对峙。玛丽·奎恩特位置如此安排，使得她能够俯瞰中轴线两边的众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处于中心，众人可以平等地向她咨询。这张图片简单地通过复制董事会中经由空间关系和空间符码所传递的信息，传递出关于玛丽·奎恩特组织的信息，这些符码本身复制了关于组织中统治关系的那套信息（它们可能是反事实的）：一个由独立的平等者们围绕轻松并面带微笑的老板所组成的和谐结构。

但是，这位老板是女性。这是这篇文章的关键，也是我们复制图片的原因。如果众人之一被划入不同范畴，那么同一空间关系将携带不同的意识形态内容。确切的原因在于它复制了它所挑战的统治形式，它对自己非常规的地位表现得越少，它对于它的挑战就越强。这是不考虑社会的、纯粹的文本分析最容易犯错误的地方。横组合关系在文本中是看得到的：完成它们所具有意义的纵聚合以及接受体制却是看不到的。这张图片，如同西蒙尼·马尔蒂尼的绘画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交流行动，存在于符号活动层面上。这张图片将看图片的人定位在一个特定位置，这是摄影和电影的典型做法，因此建立起一种意义重大的空间——社会组合。在这个例子中，观看者从一定距离观察到的，是一位成功的女老板这种周延现象。她处于图片中央，处于自己王国的中央，却遥远而无法接近，远离观看者，因而观看者就被置于一种权力弱势的地位。这种情况下，她难以与基本属于保守派的《电讯》那些男女读者形成联系或得到其认同。就她这个榜样所具有的威胁性可以被调和而言，摄影师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意识形态与性别建构

由于只有在调节实际行为时意识形态才会生效，所以意识形态最有力的表达是当其表现为空间符码及其转换并通过空间符码及其转换得以组织的时候。性别信息可以通过礼仪规则得到灌输——譬如“绅士”必须在“淑女”进入房间之时起立。这里，口头语言起到了重要的、补充身体空间符码的作用。服饰样式、外表和行为都是公开的，足以受到严格约束，所以其携带的意识形态意义可能是强制性的、普泛性的。口头语言于是起

着次要作用，像评价语一样，其真正意义是由其所启用的潜在行为文本所赋予的。为了阐明这个过程，我们从1984年6月发表于澳大利亚女性杂志《克莉奥》上的一篇文章中选录了下面文段。这篇文章题为《身体在说话》，描述了办公室中不同类型的女性，并针对每一种类型的女性，指导她们如何修正自己的行为，以便改善她们工作中的状况。所针对的类型有“老鼠小姐”、“魅惑小姐”、“成功女士”、“冷面小姐”和“犯上女士”。下面是对“魅惑小姐”和“成功女士”的描述。

魅惑小姐

每次聚会都有这种类型的人出现：派对上，她充满诱惑地放声大笑，与每个人（甚至你的男人）都打得火热。一见到男人，她就撅着嘴唇，睫毛闪动，让身体来说话。即使在超市里，她们也会款款摆动翘臀，身着紧身安哥拉羊毛衫而行。没错，她就是那种人：她总是坚信，只要自己玲珑浮凸，一切都会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吸引男人，让他们犹如蜜蜂叮着蜜罐，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她，而她总是抛出一抹灿烂的微笑。她有整齐的牙齿、丰润的嘴唇、丝滑的头发、彩绘的指甲以及动人的身体曲线。男人对她莫不倾心，即使女人不然，这正是她喜欢的那个样子。之前（一直是男性老板）她轻松就能得到好差使，而且从不需要为约会晚餐实行“AA制”。魅惑小姐的麻烦在于，世界的一半是女人构成的，而喜欢她这种类型的男人都长不了，因为他们太花心。这让她在大多数时候都形单影只。

你，魅惑小姐，需要大量帮助。抛弃你的妖娆，从头开始吧——你不会在男人那里错失机会。你也许会错过那些浪荡子，但是，你能结识到那个好小伙——第一次之后他依然会陪伴在你的左右。营造办公室的和谐氛围并非你的强项，因为你让女性同事们疏远。工作中取得升迁需要的是热情和能力，而不是低胸装和风情万种的外表。节制，在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是必须谨记的关键词。

成功女士

成功女士并不总是很容易一下子就能归出类来，因为她的自信如此低调。她属于无须以能力打动别人的那种类型——她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无论如何都能展露出来的。她的自信来自每一举手投足，服饰的任一细节、轻松的姿态、自信的言谈。她的着装具有天然韵味，知道如何将保守衣装

同新潮的饰物做出搭配，穿出尽显个人特色的协调风范。从根本上讲，成功女士神气十足。无论是工作交流，还是晚餐聚会，她总是不分场合地精心着装。她的发式剪裁时兴，却不至于过于张扬，化妆则微妙有韵致。但是，成功女士最大的优势在于她方方面面都得体的谈吐，总是生动而机智。她有许多男女朋友，他们在她那里都不会觉得受到威胁。她不会背后议论人，也不溜须拍马。她有主见，却不会将见解强加于人。成功女士，你正走在正确道路上，所以什么都不要改变。

两段描述的总体意识形态观点是很清楚的。如“魅惑小姐”那一段所总结的，“节制是关键词”。在两个例子中，女人成功的秘诀都是自我克制。关于成功女士的那段描写说得很明白了：她并不想赢得太多——譬如，不会像玛丽·奎恩特那么多。对魅惑小姐性格的毁谤，首先是通过使用一套符号交际的陈词滥调，用社会意识形态术语对她进行界定。焦点在于她那一系列符码中的信号，但是这些信号，作为确定了她的意义那种社会关系的形象，暗示着交流模式的其余部分。关于极端亲密的行为的基本空间关系信号罗列其中，从（与每个人）“打得火热”到“直勾勾的眼神”（我们猜，这距离是非常贴近的）。她的面部表情（“撅着嘴唇，睫毛闪动，……抛出一抹灿烂的微笑”）和着装（“款款摆动的翘臀”，“紧身的安哥拉羊毛衫”、“低胸装”）都同样地送出不加掩饰的亲密信息，与贞女玛利亚（以及玛丽·奎恩特）成为正好相对的一极。

但这种罗列无法解释这里描述的意识形态效果。诚然，所有信号都是关于“办公室里的妖艳女子”那种经过夸张了的刻板定式，但是，这类信号体系又总是惯性化的、可预见的。穿西服、打领带同样是刻板定式，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文中有一些关于消极态度的偶然流露（譬如，“款款而行”、“浪荡子”、“好小伙”），但这些被有可能在其他语境中属于积极的东西所中和（“风情万种”、“玲珑浮凸”、“丰润”）。文章所采取的策略，关键并不在此，而在于符号活动本身的社会关系，在于符号活动层面，在于为关注魅惑小姐的读者和社会组织而构建的立场。

《克莉奥》是一份女性杂志，主要面向“得到了解放的”女性，即参加工作并有一份可自我支配收入的中产阶级女性。它的读者群有既定的性别，尽管很多男人也在阅读这份杂志，但是，与写玛丽·奎恩特那篇配图文章相比，后者兼有男女两性的读者，同时具有双重的意识形态效应，所

以，我们强调《克莉奥》的女性读者立场和作用是合理的。这里，读者的性别起决定作用，因为它对于符号交际行为的意义至关重要。在第一个文段中，读者是明确点出的（通过“你的男人”这种字样——足以暗示其性别）。魅惑小姐是以“她”的名义以“第三人称”提到的，所以是在构成文本的交际行为之外，与作者和读者距离同样地远。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她所从事的交际行为是由强烈的亲密信号组成，具有清晰的性别标记。“风情万种”这样的词是上佳的例子，它们表示一系列专指女性向男性发出的性别信号（男人不会“风情万种”地笑）。所以魅惑小姐所提供的亲密和稳定性，专门针对女性读者而言，是无法体会到的。她与“每个人”（也被认定为男性）打得火热这件事也一样是为女性读者所无法体会到的。由于“每个人”包括“你的”男人，所以魅惑小姐的亲密信号只能被理解为对读者和这位男人的冒犯。把她描写成“牙齿齐整、嘴唇丰润、头发丝滑”实际上又让无助的读者加上了三分无助，把这位读者的性别做了重新分类，如果关系属于稳定性关系，那么男人将被巨齿吞噬，为红唇迷醉。但是，读者已经明确地被建构为女性。结果是让亲密所包含的强大敌意得到释放。不加分别使得对魅惑小姐所具有的潜在危险感受更加深刻，单身男子或单身女子莫不如此。这里的暗示在于，日常生活的复杂社会组织已经碎裂为无数无法控制的露水姻缘。

由于女性读者在文本中被定义为不快的牺牲者，被魅惑小姐不加节制的攻击性亲密感玩弄于股掌，所以作者无须真正地对此做出谴责。作者实际所做的，是提供了两个可供选择的符号模式和接受立场。第一段中，作者对读者的说话很少有直接接触，尽管她拥有控制话语叙事的人那种权力。这暗示出一种疏远的、正式的关系，是权力受阻时那种不平衡。这与魅惑小姐那种带有攻击性的接触形成对比。这与第二个文段中的接受者立场也形成对比。这里与魅惑小姐有着直接接触，但这种接触是具有明显攻击性的那种密切接触。她身在具有极度侮辱性的要求、建议和观察的接收端。但是这洋洋洒洒的一段文字的意识形态效果并非是为了提升魅惑小姐，在这个阶段她是不太可能来读这种东西的（退一步说，她会读吗?）。这个文段所提供的，是一种站不住脚的读者立场，身为魅惑小姐这种经历导致了她受到惩罚。因而在作者这种性格诋毁中做个置身事外的读者或许更妙。

第二类刻板模式是成功女士，她不仅被描写得不同，而且被置入不同

的符号交际行为之中。成功女士的信号由多种矛盾——就像加百列的和玛利亚的矛盾——所赋予的，因而很难得到归类。作者列举了一些符码——举止、服饰、姿态、谈吐——却并未花心思来阐明，这一系列矛盾的信息是如何得到整合的，或是如何得到解决的。对于不同受众对于她的信号所产生的问题，作者是以压制信号接受者的方式得到解决的，甚至连她在制造信号这个事实作者也实施了压制（“她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无论如何都能展露出来的”）。通过这些方式，文中对她所从事的那些交际行为表现得让人印象模糊，觉得宜人而遥远。没有人觉得在她那里“受到威胁”，觉得权力和稳定性信号过强，同时，因为关系不紧密，读者很容易让自己介入这两种主要符号立场中的其中一种，要么像她，要么像她的女性“朋友”。作者用以结束文段的那句说给成功女士的话，与说给魅惑小姐的话有绝大的不同。它不仅是正面的，而且简捷而浮泛，与其说是要求，不如说是恭维。连作者的赞许也是一种不快的经历，因为有着权力差别，但至少这种经历持续时间不长，而且用语简捷本身就是作者对权力的一种自我克制，对成功女士近乎平等地位的一种肯定。

正如西蒙尼·马尔蒂尼的绘画一样，文本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潜能是由符号活动层面上的符号交际行为与所再现世界的符号活动关系互相作用所确立的。在两种情形中，都存在着一个双重的接受立场，为作者/权威提供稳定性、权力或屈从的不同可能。在两种情形中，所再现的世界都包含表现社会关系不同面貌的规约性信号，都包含性别关系构成的两种矛盾的意识形态，其一以权力为特色，其二以亲密性为特色。尽管两个文本都具有虚构性（很难说成功女士比马尔蒂尼的贞女玛利亚更具有现实性），但是，由作为其框架的符号交际行为和再现于文本内部的交际行为所激活的社会关系，得到了相当透明的解码，并直接得益于主要空间符码及其转换。某些理论家曾强调，不同性别或来自不同文化或时期的文本，对于读者/接受者有着特定的要求。的确，我们不应该认为 14 世纪的锡耶纳同 20 世纪的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有着同样的性别关系，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当今西方世界的每个人都会以同样的方式理解性别关系。某些思想控制体系所依赖的那些让我们能够达成这种认识的知识是具有文化方面的专门性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总是存在着不能克服的困难，让人们无法进入特定的接受者立场。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汇入意识形态形式就成了留待少数精英的特权，而问题显然不在于此。有时是存在着排斥，正如以不同

方式存在于马尔蒂尼的绘画和《克莉奥》中的那样，这有可能是受到社会力量和利益的推动和保障，并通过特定社会中介者得到达成的。若非如此，理论家们将更容易得到理解，当他们以平常男人（或女人）作为目标时，他们的技巧和能指体系可能也会变得平常不已。这种平常性或平常特征，正在于这类文本中所运用到的能指相对而言更为透明。

场域与反世界

文本发生的场所包涵着关于诸如文本应当如何得到解读、文本中能够发现什么意义等等指令。同一文本——譬如西蒙尼·马尔蒂尼的《天使报喜》——如果被置于博物馆内，或者一本关于社会符号著作的书页中，与之作为锡耶纳大教堂的祭坛画，由锡耶纳祭司或其教堂会众所进行的解读相比，解读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背景对于在其中产生和接受的意义具有强制力。在实践中所发生的是，背景的特定范畴被从社会角度划分为场域，即特定团体的特定意义有望获得凸显的场所。

争论的焦点不仅仅是差异。竞争团体之间的冲突和敌意典型地通过对事实的颠覆得以表达。马克思将意识形态描述为“被颠覆的世界”（the world turned upside-down）：不折不扣的头在下的现实样式。在语言学中，韩礼德发展起一门他称之为反语言的理论。这些语言的制造者不是政府的代理人，而是罪犯、囚徒、被政府边缘化的团体，他们通过创造一种排斥圈外人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根据韩礼德的看法，反语言的首要功能是创造出一个反世界，一套与统治社会的意义和价值观相颠倒的意义和价值观。这些反语言的特点在于，它们是由一系列旨在否定、对立、颠覆的转换建立起来的。反社会的成员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使用他们那种语言。相反，他们保护自己的语言，只在自己感到安全的时间和场合使用它们。这种语言被限定在他们自己的场域，这是统治公共生活的权力所无法抵达的社会空间，即使这种反语言的规则是从统治语言的规则中形成的，是从对后者的抵抗中创生的。

在西方社会，建筑的主要作用是标出单个的场域。譬如一座房屋标出一片特定区域，各种不同的权力规则便凸显其间（譬如没有许可证书，警察不能进入；其他地方受到禁止的行为，在这里却能获得许可）。这些差

异看上去不过是统治规则的松弛形态。但是，“松弛”严格说来，正是一种否定的形式。在对柏柏尔[①]社会中房屋排列所进行的经典研究中，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表示，该文化中的房屋呈现出他所谓“一个被颠覆的世界”这种样子。他的分析值得密切关注，因为这提供了一则范例，展示出场域作为颠覆形式创造者所具有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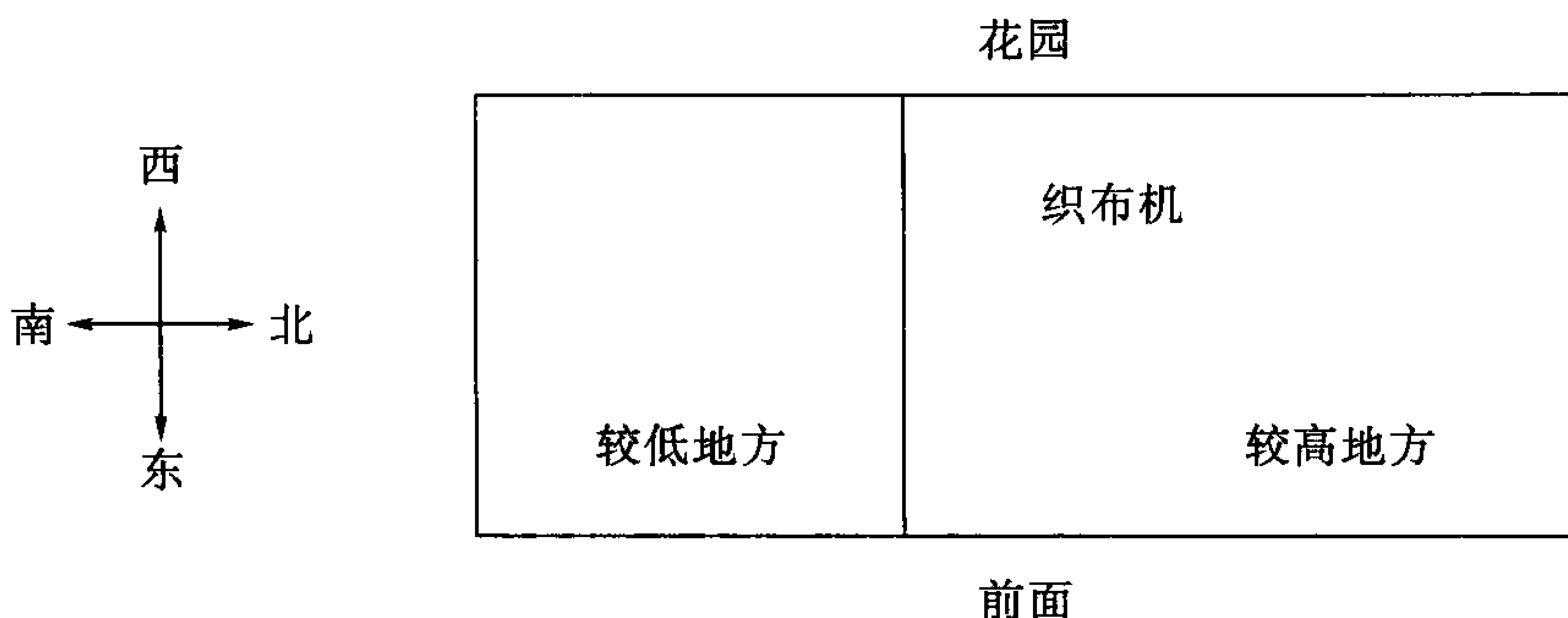


表 3.2：布尔迪厄对典型的柏柏尔房屋的分析

按照布尔迪厄的描述，典型的柏柏尔房屋分为两部分，如表 3.2 所示。他单列出来的第一个社会分类是男女之分。空间组织的意义是这种社会分类的转换。较低部分朝向南方，是繁殖功能区，是具有黑暗、潮湿、生产、动物性特点的地方。较高部分是款待客人的地方，社会活动进行于此，尽管在白天里男人们外出的时候，女人们也可以在这里做家务、编织和烹饪。朝向东边的前门是属于男人们的，每天早晨，他们经过这道门外出工作。通向花园的后门朝向西边，是属于女人的。从布尔迪厄的分析中，显露出了两件事情。其一，北与南、东与西，两者都表示着男性和女性这一主要社会对立，北与南是东与西这一主要对立的转换。其二，房屋里的世界，以门槛为界，是一个颠覆的世界，外面世界（公共场域）的所有空间价值都（在私有场域中）被改造为其反面。男人向东而作，女人则向西而作（织布机靠在西墙）。不仅是空间方位被颠覆，对男人和女人的评价也被颠覆。布尔迪厄注意到，说女人终日被关在室内，就像说男人终日被关在室外一样，都是不对的。白天，房屋是女性权力的场所，而男性是无权力的，即使男性白天的工作被视为更值得尊重、更重要。他还记载了房屋主梁和搭在上面的横梁所具有的意义。主梁被看做女人，横梁被看

① 柏柏尔：是西北非洲的一个说闪—含语系柏柏尔语族的民族。实际上柏柏尔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它是众多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方面相似的部落族人的统称。——译者注。

做她的丈夫。这意味着女人支撑着丈夫，这是意识形态对柏柏尔社会中女人对丈夫具有经济依赖做出的颠覆。

布尔迪厄的分析是框架性的，去除了记录中的社会阶级差异。本质上，这是一个父权制性别关系的极端范例，但是它简单明了，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一操作的主要轮廓。他进行了主要的社会分类（男人——女人），并对赋予该分类以内容的劳动也进行了分类。这就是最小横组合段形式，人群分类就存在其中：一类行动者配合一类动词（作用）。接着，他看到了地点分类（主要分为内与外、私人与公共；它们以转换的方式复制出了整个环境结构）和时间分类（白天与夜晚，加上光亮与黑暗这种对立的其他转换）。对各尽其用的物体分类并没有被我们包括在内，对物体的这种分类也许这能够提供关于物体的语法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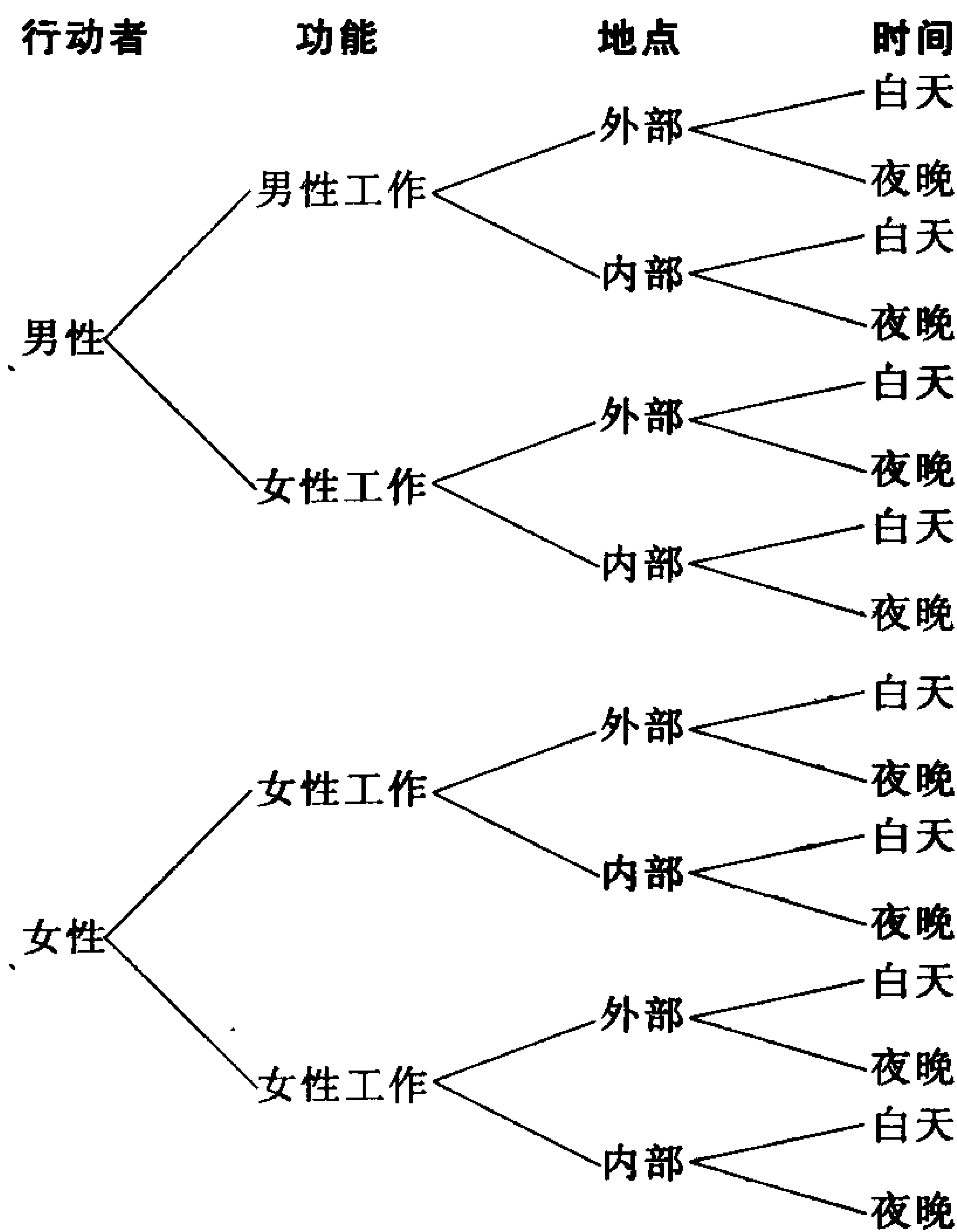


表 3.3 布尔迪厄分析中的横组合段可能

有了这种最为简单的分类，即如表 3.3 所示的横组合段可能。当我们沿着这种格局，运用布尔迪厄关于柏柏尔人的发现，我们会看到，让男性处于女性的位置来做女性的工作，会使得他们的男性地位受到挑战。这会涉及一种双重矛盾。如果处在女性位置来做男性的工作，或者处在男性位置做女性的工作，矛盾性似乎会小些。性别规则在不同的社会中会采取不

同的形式，共通的是起中介作用的转换都存在，而且充满困难。譬如，在现代西方社会，女性进入某些劳动力层面，使得工作类型和工作场所的体系/符号必须重新分类，这对于传统性别体系既有所保留又有所改变。然而，时间范畴在横组合链上起到了不同作用。时间与空间不同，因为某些地方是可以避让的，但时间是无法避让的。男性并不是在任何划为女性时间里就不再存在。在柏柏尔人的横组合段中，尽管夜晚和黑暗（以及冬天）是同女人相互关联的，时间却明显只是起到颠覆横组合段其他部分的价值这种作用。“白天”是一个正价标志，表示所有价值观都有效：在男性位置从事男性活动的男性就是男性。“夜晚”则全部或部分地取消了这些。到了夜晚，男人回到家中，睡觉或从事繁殖活动，他的活动之地在房屋较低的、属于女性的区域，这些都证明了他身为男性的地位。事情反过来就不对了。到了夜晚，女性并未离开房屋，为生计奔波。对她而言，白天起到的是否定作用。到了白天，她进行生产性工作（织布，或参与其他经济活动），并且她也的确以一种受到限制的方式走出户外，来到花园。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把横组合段分为两个部分：核心（行动者及其功能）与条件（地点和时间）。在柏柏尔的模式中，两个阶级（与生产与再生产彼此呼应的男性与女性）之间极端的对立所造成的问题，通过运用于诸种条件的同样对立得到了解决，所以在某些时间以及/或者地点条件下，男性可能置身再生产活动，女性可能置身生产活动。由于矛盾的解决是通过运用构成性范畴而达成的，所以它不会对那些范畴的重要性形成挑战，即使它的效果是产生出对抗作为原则基础的核心横组合段的反横组合段。但是，作为总体性规则，我们可以说，这种反横组合段的存在，乃是对与核心横组合段相抗那种力量的承认，或者是对它们实际上的不便的承认。同时，这些条件都是规则制约下的、旨在包容这种矛盾或转移这种不便所做出的尝试。布尔迪厄对柏柏尔房屋所做分析的一大特点是简明，这很出乎意料。通常，条件常常和作用于潜在规则体系那些非常复杂的纵聚合转换彼此相关。

社会形式引为特色的这套规则（核心与条件），对特定的社会团体而言，有着特定的细节，就像口头语言由共同操作形成，却产生出不可胜数的方言和语言。布尔迪厄分析所关注的区别，即便不是对所有社会而言，至少在绝大部分社会中，都是主要的一个。为了把他的格局加工成最为抽象和泛化的形式，我们要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待横组合段。这种权力源于社

会，由不同社会的不同纵聚合策略赋予，但遵循所有社会中的共通形式，始于所有社会中通行的分类原则。基本的权力横组合段，可以转换为形容词，英语中即“powerful”（有权力的），实际上是“X 控制 Y”这种形式的句子，表示一种社会关系，从中可以产生出进一步的横组合段“X 做/有 A：Y 不能/没有”。但是，社会生活通过无数途径和无数例证表明，弗洛伊德的“被压抑物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在社会中，如同在精神体系中一样，都是一条基本性规则。“被压抑物的回归”有可能通过规律性的转换系统地达成，它的作用是容纳破坏性能量。它可能作为“漏洞”出现，效果也与之相似。或者，它有可能汹涌澎湃地回归，形成对社会秩序的激烈挑战，回归场所有可能与发生颠覆的场域相重合，它的出现表示统治结构中出现了断裂和罅隙。

这一趋势是这类体系性质中所固有的。权力横组合段要求与之相关的世界按照权力进行分类：人、地方、事物、时间，无一例外。潜在的行动者按照特定标准享有权力：年龄、性别以及社会地位正是划分社会行动者的三条无所不在的标准。但是，在一个具有某种程度凝聚力的社会中，就像在所有社会中一样，这些分类使得现象的持续性、依赖与相互依赖这些关系，都变得模糊起来。男性和女性，在多数情况下，似乎都是清晰的分类，尽管也存在着双性、变性、性倒错及同性恋等问题。但是，男女相互依存这种关系一直挑战着为维系权力所需要的男女分隔。年龄是个更明显的持续体，它碰到的问题也更进了一步，因为每个老年人都曾年轻，而且随着年纪增长，便越发衰老，回复到类似小时候那种依赖。然而，年龄的自然分类，就像性别的生物分类，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意义：入学年龄、参军年龄、选举年龄、结婚年龄、人到中年、退休年龄，全部属于强加于年龄这个连续体上的文化分类。阶级或地位之间的差异，必须对权力程度这个连续体进行描述，并从中分隔出一个个群体来。还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社会流动性，对源于该原则的清晰分类格局发出挑战。每种分类格局都比它所划分的现实更为条理分明。社会冲突对纵聚合体系施加压力，后者运用自己的缺陷去整合这种压力。所以冲突作为矛盾而出现，由于它是体系性的，因而能够通过体系方式得以容纳，成为特定场域，或者时空条件，统治性横组合段不能充分地对其实用。

仪式的空间和时间

在布尔迪厄所分析的例子中，使得颠覆条件成为可能是历时性层面的那些分类。夜晚是一种特殊的时间段，在夜晚，白天的规则被颠覆了。在许多文化中时间都是这样使用的。在假日、开斋期、茶歇等对一年时间的分割或对一天时间的分割中，当通常规则无法使用时，时段就派上了用场。这种原则是普适性的，尽管纵聚合结构和转换可能是特定的。譬如，法里斯曾研究过位于纽芬兰近海岸一个名叫猫港的小渔村居民中间的“偶然”结构。他发现了如表 3.4 所示的纵聚合结构。图中，“大快朵颐”(Scoffs) 是猫港特有的一种传统聚会，一小群人聚在一起大快朵颐，而吃的东西是从一个未被邀请参会的人那里偷来的，这里的人平常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此时却纵情狂饮，满口淫词浪语。法里斯将这些事例解释为受到允许的反常。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时间，社会横组合段失去自己的控制力，实际上是被颠覆了。巴赫金用术语“狂欢节”(carnival) 来表示类似现象。桑森曾对居住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市边缘地区的土著宴饮进行过分析，他发现，宴饮规则要求每个饮酒的人都必须喝得酩酊大醉，都必须抛开日常理性的种种规范。但是，在法里斯的分析中，所有被猫港人贴上“偶然”标签的时间，都包含着一种受到允许的反常因素。在所有这些时间，平时被规定为禁止的行为都能得到允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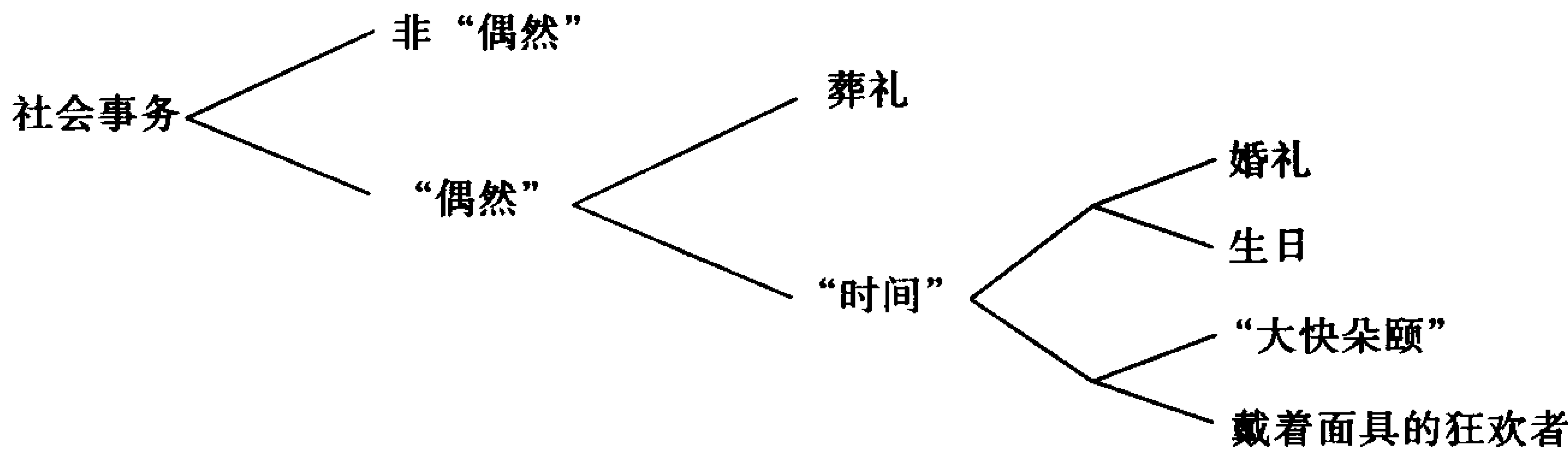


表 3.4 “偶然”：猫港的结构

在许多文化中，特殊行为最为常见的场合是婚礼和葬礼。范·根内普为这些和其他仪式杜撰出了一个术语：“过渡仪式”(*rites de passage*)。生日是不那么典型的过渡仪式。过渡仪式同传递个体或团体从一种身份发展到另一种身份这种信息有关，这种发展由于时间的流动性而不可避免（人

们出生、成长、性成熟、独立、最终死亡或者看到别人死亡）。由社会划定的各个阶段之间彼此有所交叠，这正是该框架中非整一性的那些方面。仪式为此做出了解释，或者说，找到了对付这些非整一性方面的方法。它们也是表达其他非整一性方面的方便处所。正如在猫港一样，过渡仪式常常都是些“偶然”，在这些“偶然”之中，某些社会规则受到了挑战或被颠覆，或以某种方式被转换。

婚礼是这类场合中的一种。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婚礼形式多种多样，但在这两个国家，所谓“传统婚礼”都很受重视，被写进了圣公会的《公祷书》。我们来看看最关键的、戴戒指的那一刻。按照要求，新郎为新娘左手食指戴上一枚金戒指。新娘也许会为新郎戴上戒指，但这并不都如此，而是根据自愿而定，因为英国式婚礼中只有男人必须为女性戴戒指这种要求，尽管德语世界中的规范是双方必须互换戒指。接着，男人要说这么一番话：“凭此戒指，愿与汝婚；凭吾身躯，与汝互敬；凭吾尘世之财，愿与汝赠。”这个环节中，有两个细节很有趣：手指戴上戒指很明显是对性行为的展示，象征阴道的戒指套在象征阳具的手指上。但是，把戒指戴在女人的手指上却是男人。在仪式空间中，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男与女这种分类被颠覆了，即使婚礼表面上是对两性的精心组织。同样的颠覆发生在话语中。说话的是男人，但他所谓“凭吾尘世之财，愿与汝赠”表示的关系，至少在过去，当这一婚誓规则被设计出来之时，意味着这种婚礼形式使女人在经济上完全依靠丈夫。将自己全部世间财产赠予丈夫其实是女人，男人仍然对自己的财产保有控制权。他的诺言“凭吾身躯，与汝互敬”对男女任何一方都同等实用，尽管要丈夫“崇敬”妻子会让传统婚姻关系显得过分了些。在教堂之中，尊敬这个说法也许是合适的，但“崇敬”听上去则显得太过，有些亵渎神明。但是，这个说法由于戒指而光彩熠熠，它就是那个要尊崇“汝”的那个“身躯”：会尊崇男性阳体的那个女性阴体。这里的内容是一种极权关系，男性在这种关系中是经济控制者，但话是由代表女性的男性说出口的，也就是说，出自被转换为女性的男性之口，听这话的，则是被转换为男性或短时间里被重新划分为男性的女性。

这个仪式起到的作用是坚持控制两性关系的正确形式，在许多方面，表面内容都是女性享有优越性，男性都相对不重要。此即所谓“新娘日”。人们的注意力放在新娘身上，符号上说，她处于中心，周遭尽是表示其重

要性的信号。她迈入教堂而仪式才得以启动。对幸福伴侣的视觉表现，千篇一律地是要表示她的重要性。譬如，《婚礼》声称自己是“英国自己的新娘杂志”（并没有相应的“英国自己的新郎杂志”），以准新娘作为服务对象。各种广告的主体所凸显的只是新娘——新郎如此无足轻重，以致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之所以把两人放在一起表现，也是为了表示新娘的重要性。在婚柬上，按照传统的做法，新娘名字写得要比新郎名字高出一些（下方做了模糊化处理，所以高出多少并不清楚），并且/或者写在新郎前面，并且/或者写在更靠近卡片中央的位置。英国皇室婚礼也有这样的习俗。以戴安娜·斯宾塞女士同查尔斯王子的婚礼为例，新娘个子比王子高些，但社会地位则远低于王子。然而，官方的订婚照显示：戴安娜夫人站在中央，虽然未来的婆婆是当朝女王，虽然未来的新郎是王位继承者，却都站在两旁。作为纪念品，这张伴侣照畅销英伦，处处可见，它凸出了戴安娜女士，仿佛她才是两人中更重要的那个。这张图片的表面意义表示女人比男人重要，哪怕这个女人是平民，哪怕这个男人贵为皇室成员。然而，从来没有人怀疑这张图片是具有颠覆性的，因为情况充分表明：女人很短暂的，在特定的时刻，方能被允许，甚至被要求，显得更为醒目。

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某些地方，有一种与戒指相关的“反仪式”，具有某些“偶然”的特质。新娘身带花环，仪式之后，出了教堂，一位被抽签选中的男性，通常是未婚的，被赋予特权，在一片带有色情意味的鼓噪中取走花环。这种反仪式颠覆了仪式本身的许多细节：与戒指不同，花环不是被戴上而是被拿走，制作花环用的是便宜而易坏的材料，而不是像制作戒指一样，使用的是昂贵而耐用的金属。这个反仪式的表面意义是新娘的阴道被某个陌生男子占有，在此行为中他感受到了她肉感的大腿。这是对滥交的仪式化行为，明显与刚才举行的仪式主体彼此矛盾，因为刚才的仪式所包含的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性质的结合：

仪　式：新娘获得男人的阴道

↓　　↑

反仪式：男人获得新娘的阴道

由反仪式所施行的性转换，直接颠覆了仪式的价值观，但是，仪式本身也对所关涉的性的真正性质施行了同样的转换。原来的转换，作用在于否认新郎的性（除非他为妻子的阴道提供阳具）。反仪式恢复了男性的性，却把性赋予了另一位男性，因为新郎放弃了它。然而，反仪式必须被看做

对转换的转换（正因如此，它不被认为具有颠覆性），而不是被看做对相关现实的直接呈现。被压抑之物回归了，但却是在给定条件之下、受到控制下得以回归的。

除了对时间进行分类，社会还对空间或处所这类社会横组合段语境进行分类。某些语境容许或者施行某些转换，正如布尔迪厄对柏柏尔社会的研究一般，白天，房物内部颠覆了男性优势。反常情形常常对地点和时间有着明确规定：婚礼当天这一时段，加上教堂内或外这一地点，共同规定了各种不同的转换。但是，反常场域只是场域的一种，只能按照它们所转换的场域的一般结构来理解。英国场域结构的一般形式，以及西方社会的其他形式，都是按照权力而进行的初步划分所赋予的，其先决条件是：在这个社会中，行动者、作用和条件都具有同一性，权力实施行为一直有力，非权力者被排斥在权力之外（参看表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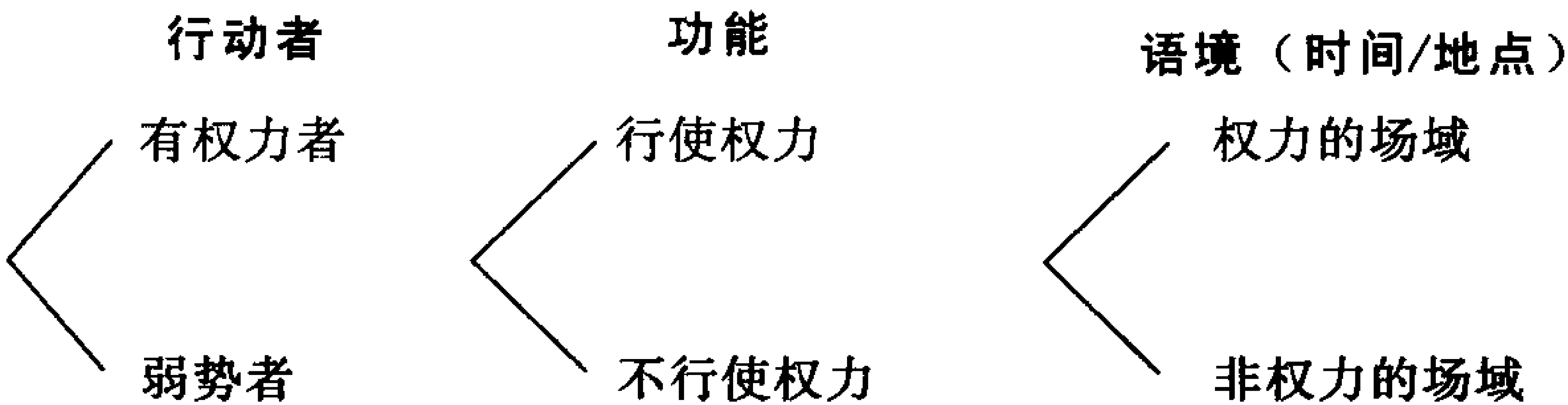


表 3.5 场域：西方社会的一般结构

但是，要让有权力者实现其他功能，并让非权力者实现各种生存功能，就要求对这种格局进行细微的修改。所以，我们将场域分为公共和私人两个部分（参见表 3.6）。整套能指一般存在于极具有符号特性的体系中，表示公与私的对立。有时，所使用的口头语言实际上不同于其他行动者为了其他作用而使用的那种语言（譬如在阿拉伯语、希腊语和汉语中，姑且举此三种）。语言学家们称这种情形为“双语制”（diglossia），或者双重语言情境（double-language situation）。服饰符码一般都具有可辨的不同形式，譬如“正式”和“非正式”，诸如此类的其他符码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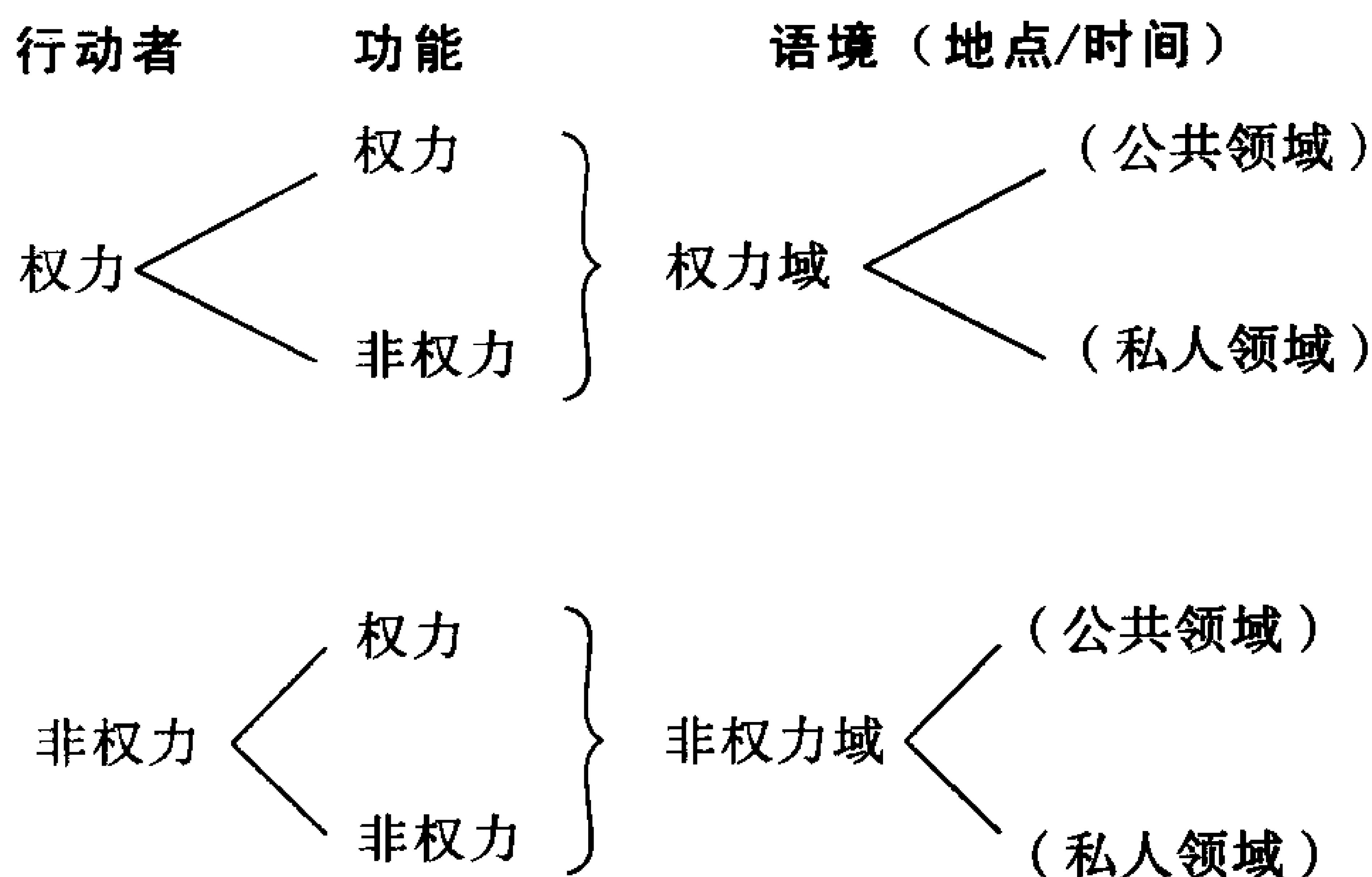


表 3.6　西方社会中的场域：公共与私人

但是，当代西方社会中的整个场域结构，比公共和私人这种划分所能预测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即使在公私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连续。譬如，上千年来，宗教已经构成一个独立的场域。马克思对它的定义非常有名："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①] 基督教使弱势者的庆祝合法化。其中心的象征，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表现的是一位饱受挫败、颓唐无助、濒临死亡、孤零零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这种对权力的否定，正是权力本身的象征，却在其语境中被再次否定了。美学领域也被认为是一种场域，它具有独特的规则，横组合段形式可能在其中受到颠覆。许多人不大能看出，科学领域是一个具有特权的场域，在其限制之内（限制总是存在的），统治性的横组合段，具有统治权的横组合段，允许被相关科学所规定的事物序列替代。体制化知识领域之外的教育机构中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譬如体育，通过确立冲突的条件和结果，把冲突的横组合段转换为和谐的横组合段。各种"笑话"——从口头的幽默到野蛮的动作笑话——同样是对常规横组合段的合法颠覆。对于笑话所允许的地点、时间和对象都是有着种种规则的——即使这些规则有时会被违反。法里斯描述的"大快朵颐"也许能够作为这种颠覆的例子：它具有特定性，强烈颠覆性，得到社会容忍，要求总体性的控制体系而不是中规中矩的系统中的某一元素。

---

① 此处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82 页。——译者注。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以及更多例子中，我们发现了同样的现象：构建出各种各样颠覆类型的对立性话语，以及这些对立性实践得以可能的操作，都能在社会的时间和空间上得到标识，都被组织到了由诸多场域构成的一个体系之中。如果我们在广义上运用韩礼德的术语“反语言”来涵盖所有符号符码，包括行动与行为符码，以及言说与写作的表达符码，那么，我们可以对场域和反语言的典型作用得出以下小结：

1. 反群体与统治群体之间的冲突和敌意，通过表示颠覆和置换的透明能指而得以表达，从而产生出反语言，即相反的或被置换的意义、价值和意识形态。
2. 颠覆场域是社会空间或时间中的特定场所，在此场域中，反群体在相对受控条件下生产出了反语言形式。
3. 颠覆场域的社会意义是不稳定的、暧昧的，因为它是由两个群体之间不断进行的斗争建立起来的。从统治者的观点看，场域对在其中表达的颠覆性意义起到了颠倒或中和的作用，把这些意义标志为受到允许的越轨行为，并将其纳入总体秩序。从反群体的观点看，这样的标签总是值得质疑的。

第四章　作为意识形态的风格

作为元符号的风格、腔调和语法

正如符号活动的单个行为都是表示权力和稳定性的能指体系组织起来的一样，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构成中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这些更为广阔的表意体系，对于制约特定符号行为的体系顺利运作至关重要。它们把符号参与者的社会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在更大规模上联系在一起。任何大小群体都需要群体成员标记以赋予其身份和凝聚力，并使之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理论上说，这些标记可能不具备任何意义，只有单一的群体标志功能。实践中，这些符号系统却通常携带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群体并不是由单一标签标识的，总是要用到一连串的标签。在这些标志中，一些具有共通的意义，重复所起到的作用是作为冗余而对该信息做出强调。另外一些则具有不同的意义，对该综合体的其他系列符号起着修订或对抗的作用。总而言之，这些符号系列不仅仅起到标记作用，对此，它们如此众多，完全能够做得足够让人满意，它们还对构成群体成员资格的那些东西做出界定。也就是说，它们宣示出特定样式的社会关系。它们所传达的意义，是相关群体所具意识形态的重要例证。我们将把这种类型的系列标记称为元符号。我们的用法受到了贝特森的术语“元交流”的影响，所谓

元交流即“关于交流的交流”。元符号具有许多形式，但它们都渗透在信息之中，而且它们不断地对符号活动参与者的社会关系进行指涉和调节。

传统上被用于描述这种现象的一个富有影响力的词汇是“风格”。风格源于拉丁词汇 *stilus*，指罗马学童用来在蜡版上刻字的尖头铁棍。在这一语境中，“好的风格”意味着值得称道地用 *stilus* 刻出了符合正字规范的正确字母和正确内容。后来，在褒扬优异表现和不同见解的教育体系中，*stilus*，如同英文单词“style”一样，表达了重视独创性的概念，表示和特定个人相关的、以个性独具的方式使用 *stilus*。在人们心目中，这集中体现在布封的这个代表着普遍共识的表述中：“风格即人。”

今天，这个词汇的核心意义被定义为“一种写作、言谈或行动方式，尤其是相对有待表达的事物或有待完成的事情而言”（《简明牛津辞典》）。风格通常被视为表示着“绘画、建筑、家具、服饰等等”之中特定的“个人、流派、时期或主题”。这样，这个词成为一个流行词汇，使符号学产生了飞跃，将一系列媒介现象——尤其是那些得到不同学科研究的那些媒介现象——纳入其中。不过，作为专业学术术语，对它进行界定是困难的。文学批评和艺术史已将它视为其各自学科研究的首要对象。它们都典型地将其当做一种反社会的范畴。作为一门杂合性学科，文体学（stylistics）从文学批评和语言学的混合中发展起来，但是，尽管有少量杰出的倡导者（如施皮泽、奥尔巴赫、韩礼德等），文体学却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活力四射或成果丰富的学科。但是，按照一种不同的、更当下的传统，美国人威廉·拉波夫的社会语言学却具有更为强烈的社会倾向。在拉波夫看来，风格意味着一种变异，这种变异在某些方面是自由的，但是要服务于标记更广阔语言社群中特定社会行动者和场合。拉波夫本人所关注的内容相当狭窄，着眼于口头符码及其社会意义，但是，这项工作和通行用法中风格所具有的更为广泛、更具符号学内涵这一彼此相通。他的工作，通过解析其基本社会意义和功能，强调其在维系差异和身份以及承载意识形态意义方面的作用，使风格能够用于社会符号学研究。

但是，风格并不是指涉符号学之外这种一般现象的唯一术语。从口头语言的研究中，产生了另外两个术语，可供我们在这一领域中运用。其一是“腔调”。在言谈中，腔调指的是一种同语词或音节相关的深度标记，用于创造差异，与风格甚为相似。苏格兰人腔调就是苏格兰人特征的元符号。它把苏格兰人同其他说英语的人区分开来，向苏格兰人和非苏格兰人

表现出苏格兰人特征到底是什么样子。腔调是对发音器官的特殊运用，正如 *stilus* 是对金属器具的特殊运用。

另外一个我们使用到的术语是“语法”。它在今天的基本意义似乎与风格彼此矛盾。语法指普遍规则，风格指个体变异。然而，这个词源出希腊词汇 gramme，意为书写中的笔画，与风格一词的起源相似。语法和风格曾在同一间教室中讲授。它渐渐成为一套将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些异族符码同熟悉的本族通用语彼此区分开来的规则。语法的核心观念是正确及规则（如此观念当初也见于风格这个概念中）。这些观念既属于社会范畴，又属于比较范畴，它们对一个群体（精英、阶级或民族）的话语与其他群体的话语做出区分。所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语法都像风格那样，指涉一种相似的现象，只是指涉层面有所不同。语法也纳入了一种元符号。

后来的作家们通过大量途径对语法观念进行了理论化，使之与社会符号学关联起来。按照本世纪早期由博阿斯、萨丕尔和沃夫开创的传统，语言学家们针对大量不同语言展开工作，逐渐开始主张语言和世界观、宇宙观或形而上学之间具有关联性。他们把一门语言的独特语法视为储存这些不同渊源的主要处所。我们的著作《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就建立在这种传统的基础之上，断定在语言和意识形态之间，在被编码到语法和使用规则中的特定语言体系和统治与被统治群体的社会意义与功能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关联。各种语言因构成它们的词汇、语义体系、语用结构而彼此不同。在各自的语法方面，它们也彼此区别。语法的一个重要部分涉及词汇体系这个子集合，这使拉丁语、希腊语教学的主要重点放在了语法教学上。在每种语言中，都有一小部分能指，似乎主要用于语法性功能，而不是内容功能。这些词一般很常见，很短小，有时是单音节（如 the），或者是不能独立构成词汇的词素（如表示复数的－s）。这些能指的特定意义通常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有时似乎根本不存在什么意义。然而，它们的用法却总是受到严格规则的控制。在语言中流畅而准确地运用这些词汇，外国人掌握起来一般都很困难，所以，它们是群体成员资格的便利标记。正像关于群体成员资格的其他标记一样，譬如腔调、风格，它们是带着巨量冗余发挥作用的。如果不能表现出至少是对它们中的一些有所了解，对它们的使用规则有所了解，那么，哪怕只说一句都是很困难的。不同于口头语言，符号符码都具有一种相似的符号：譬如，绘画周边那被人们视为当然的画作的画框，报纸的专栏和标题。这种类型的符号，常常被看做太不

起眼、太普遍而不值得注意。但是，既然如此普遍，它们是不会没有其作用的。

与风格和腔调相反，语法概念的一个有用特征是它凸显规则观念的方式。的确，许多语言学家试图降低语法一词的力量，采取的方式是将其分成规定性语法（prescriptive grammars，其规则是规则制定者强行实施的）和描述性语法（descriptive grammars，其规则纯粹是特定语言的规律性方面，由讲求科学的、态度中立的语言学家进行观察和归类）。在这种区分的背后，是对两种规则之间重要差异合乎道理的承认：构成性规则（譬如这样的表述：－s 用法之一是表示一般现在时态和单数、附加在动词词根之后的能指）和规定性规则（譬如这样的表述：单数主语必须与其动词保持一致，众多能指中，加在动词词根之后的－s，被用来标示这种一致，譬如"The boy runs"）。第一种类型的规则是使意义在符码中成为可能的系列惯例的一部分。第二种类型的规则使特定意义大体上不受影响（"The boy run"是很容易理解的）。即使在英文句子中得到遵循，少有例外，它仍然是一个规定性规则。其意义的一部分，就是说话者遵守了规定，并且将自己标示为这个语言群体内一个正式而守规矩的成员。不遵守这条规则的儿童或操方言者被归为统治群体中不够完善的一员，或者被归为另一个群体，而界定这个群体的特征就是他们的不够完善。至于其他标志，通过必要的横组合段得到表达的规则，本身是有意义的，并且具有作为该群体身份一个部分的那些意义。在这个例子中，单复数一致表示着思想的精确性（参见《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第四章）。这些规则从起源和本质上说是社会性的，而不是准科学性的。尽管规则的制定者在任何给定条件下都不会是单一的、可辨认的个体，这些规则构建和取得认可的操作是跨时代的具体的社会行动人所承担的，而且它可以作为一个社会事实来研究和理解。

我们可以把关于风格、腔调及语法的这些观察归结如下：

1. 风格、腔调和语法都指同一广阔的符号活动现象，即元符号，其功能在于维系一个群体的差异和连贯，并宣示该群体的意识形态。
2. 元符号是关于社会忠诚的系列标志（稳定性、群体身份和意识形态），它渗透在大部分文本之中。
3. 这些标志主要指符号活动（意义生产）层面而不是模仿层面（被

指涉的东西）之中的种种关系。所以它们可以看上去是任意的或无意义的，但是却携带着一致的意识形态意义，通过指涉符号活动层面而变得十分明显。

腔调、差异、社群

为了分析元符号体系如何运作，最方便的起点是从口头语言的语音体系入手，包括最为狭义意义上的腔调。这么做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它的社会功能非常容易辨认，而且众所周知。shibboleth 这个词开始表示政党标签或口号，是因为《圣经》中记载的一件发生在三千多年前的一件事。基列人和以法莲人这两个犹太群体之间发生流血事件，胜利者基列人对其对手进行了一次强制性语言测试。把 shibboleth（意为“河流”）中的“sh”音发成以法莲人的“s”音那些人会被杀掉。四万二千名以法莲人因此丧生（《士师记》12：6）。这个例子对发音类型这个看上去非常琐碎的现象所产生的效果进行了极其戏剧化的阐释。在具有一种可以相互理解的共同语言的社群中，腔调起到了相似的作用。在阶级社会中，腔调起着与犹太人的 shibboleth 一词一样的作用，常常影响到千百万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而不是导致几千人的死亡。为了这些目的，言谈腔调一般都不独立运作——有许多其他元符号体系对它进行补充。腔调的威力也不在自身。如果两个部族之间不存在敌意和利益冲突，以法莲人的“s”就不会如此致命。腔调所具有的能量是社会性的，并非语音本身所固有的，但正是这种错觉使那些围绕腔调或语言所产生的冲突在外人眼中显得如此地微不足道。

对于社会符号学而言，沃洛辛诺夫关于符号的复调性（multi-accentuality of the sign）这个概念堪称最有用的起点。与结构主义者不同，沃洛辛诺夫将这种现象定为自己符号学理论的核心。沃洛辛诺夫不认为社会具有连贯性，而是把冲突和矛盾当做常规。他把语言视为通常都是对话性的，是冲突的声音和冲突的利益构成的场所。当它是独白性的，它所表示的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对差异，甚至是对差异的可能性施加的积极压抑。于是，独白性文本是基于受到严格控制的思想控制规则的，不允许非权力者有对立，甚至不能有参与。它们所编码的意义是绝对权力的意识形态。对话性的和多元主义者的符码，表示群体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反

对、抵制和协商。在单个符号层面，这种对立是通过复调现象得以表达的。如果我们把单个的语词当做语言符号，那么这一原则是通过针对同一语词存在不同腔调而得以实现的。shibboleth 的例子可证明这一点。无论在以法莲人那里还是在基列人那里，这个词的意思是相同的，表示的都是同一种河流。只是音系材质稍有不同。“s”和“sh”之间的差异并不是要以不同方式标记现实。社会差异能够在口头语言体系的许多其他层面得到表示。我们可以用符号层级来系统地表现某些可能性，如表 4.1 所示。任一层级的条目都能用来标记差异，而且，一个群体语言符码中的各个层级之间还存在“渗漏”。我们不知道，包含“s”的所有语词中，为什么基列人偏偏选择 shibboleth（河流）进行测试，尽管河流是两个区域的分界线，而以法莲人生活的山地地带并没有河流。shibboleth 利用了若干层级的腔调，作为群体标签简约地起效，尽管这对发挥其作用并无必要。表格中越靠下，差异就越不重要，和模仿（指涉）意义关联越弱，但这让它们更为专一地关注符号活动/意识形态指涉。这一品质确切地说明，为什么具有低模仿值的标志被如此广泛地运用于这一社会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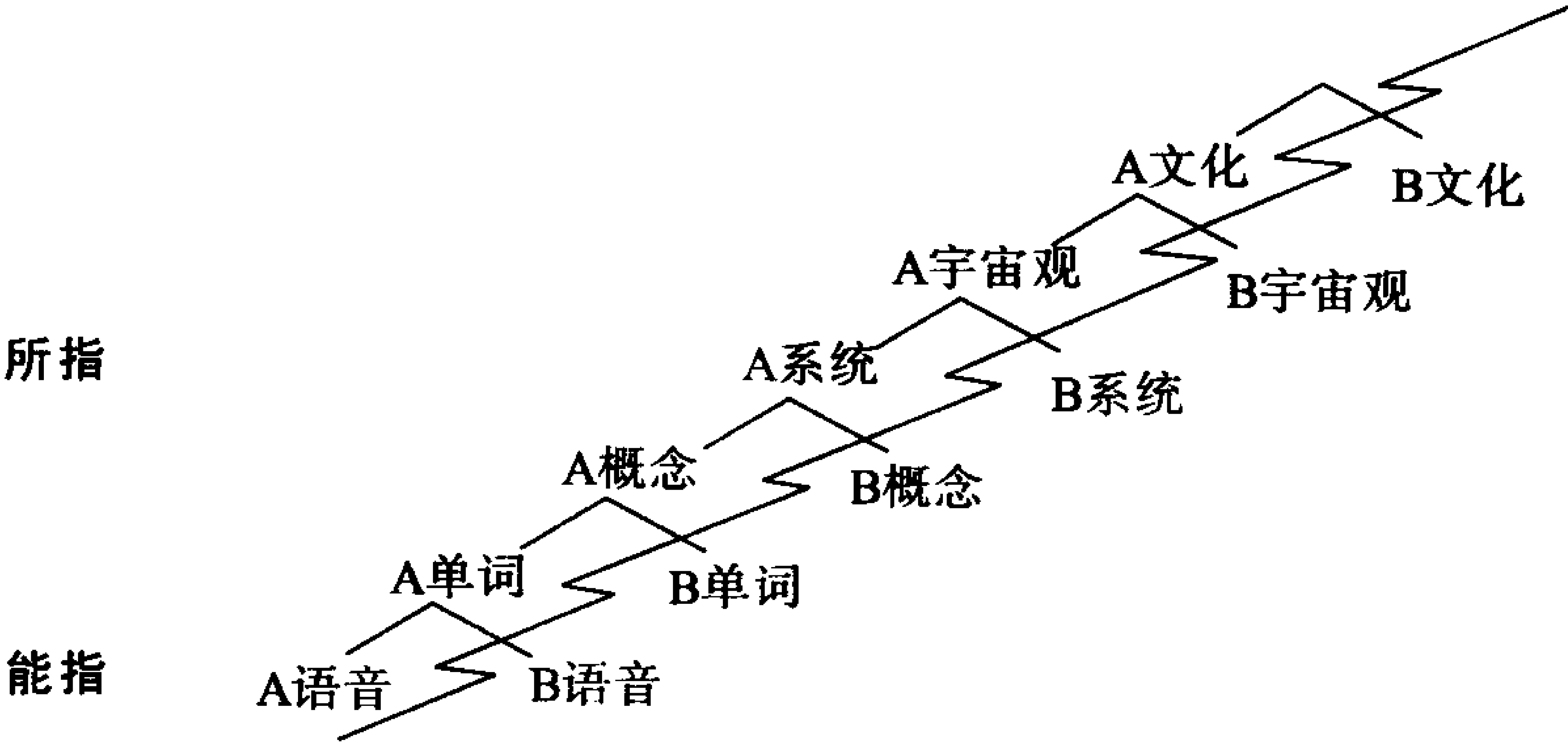


表 4.1　符号活动层级

索绪尔为结构主义留下了一个精确的体系，用以描述语音中的腔调现象，同时，也留下了有关解释和说明这些现象的棘手问题。对于索绪尔而言，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问题集中在语音变化方面。语音体系中的变化显然是极为普遍的，但在索绪尔看来，它也是令人费解的。可能索绪尔发现了促使语言产生变化的动力来自语言之外，来自社会本身，但他把这些维度排斥在符号学和语言学研究之外，而且，由于他把语言符号看做绝对非理性的，所以他不得不将语言变化看做无理据的、无意义的。解决了许

多索绪尔遗留问题的是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作为社会学家，拉波夫没有忽略语言的社会维度。相反，社会和语言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他研究的主要对象。他把历史和社会语言探究融为一体，他提出了这样一条有力的假设来把二者融合在一起：同样是那些力量和操作，它们短时期内在单一语言社群内创造出细微差异，这在更长时期里就会产生出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最终会建构出独立的语言。语言变化的动力，在现在，所以也可以推知过去，都是想要对社会差异及其另一面（即稳定性）做出表达的愿望。

拉波夫的基本方法是单独选出一个从属于语言社群内重大变化的要素来展开研究，即按照沃洛辛诺夫的术语来说，就是挑出一个从属于社会腔调的要素。他所研究的要素之一，就是纽约话中位于元音之后的 r（譬如 port 或 party 中的 r）。为了单独突出它的效果，他对只在这个可变项上有所区别的众多文本进行了操作。接着，他把它的功能确定为社会经济地位的标记或标签，其作用即为此服务。他发现，这一可变项作为威望标记而起作用，与关于说话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判断有着重要关联。他还发现，它表示着从正式到随便的各个场合所具有的地位。因此，同样是这个标记，它既可以表示有威望的说话人，也可以表示正式的场合。也就是说，虽然它表示出了符号活动层面的权力，但却同时又涵义暧昧，或许指涉的是说话人的权力，又或许指涉的是和说话场景本身相关那种权力。

拉波夫引申出他所谓的“主体性”意义，这种被赋予这些标记的意义，是纯粹以选定标记作为基础而对说话人做出的判断。他所发现的是所有阶级都在某些意义上有一致，在另一些意义上则有分歧。就权力这一维度而言，所有阶级都把威望形式使用者评价为拥有高收入的权力，但是就身体权力而言（“擅长打斗”），那些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对低威望形式使用者所做出的评价，对比这些形式的使用者对之所做出的评价，会更高一些。可以预见的是，就稳定性这一维度而言，地位高的说话人对威望形式使用者的反应更为积极，地位低的说话人做出的反应则正相反。差异和一致形成一种模式，能够很好地契合不同群体给予同一套元符号以不同赋值这种操作。

在宽泛的框架中，这里没有任何让人惊讶的东西。但是，除了从数量上证明以前做了印象式理解的东西是语言学方面的偏见之外，拉波夫还有能力表明，同样的这些意义在语言学偏见的原子般微小结构中也是存在的

（正如基列人所怀疑的那样）。他还开发了一种精密的新仪器来研究群体构成的机制和操作，以及维系它们那些复杂的意识形态意义。由于语言的声音具有一种物质性存在，它们就能够被精密的仪器分析。拉波夫既能揭示被当做“同一个声音”、无重大变化来处理的大量物质性差异，又能阐明标示一个新诞生的变化正在进行中的那些系统性的、在意识层面之下存在的差异。他还能够展现被发送信号与被认为已发送信号之间的细微差异，或者可能成为相关社会群体规范的那些东西——关于意识形态转变和群体忠诚之中存在的矛盾那些证据。所以，譬如妇女总是“太正确”（她们对元音的使用比来自更高社会群体的说话人更为“讲究”，并且/或者自己听来，也认为自己所发的元音比之更为讲究）。拉波夫进一步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为什么“说得正确”似乎有所回报，那些非威望形式的使用者还是要继续使用这种形式。拉波夫指出了他所谓“隐蔽的威望形式”在低地位群体中所起到的作用。按照他的观点，这些形式强化了稳定性纽带，作为反意识形态意义的潜在载体而起作用。所有群体都有自己的元符号体系，这些体系对于群体身份和群体生存如此至关重要，以致他们不会轻易抛弃它们。

拉波夫对许多种类的差异进行了辨析，每种都具有不同社会功能和意义。某些差异具有表现的价值，所以它们对说话人意味深长，但并不对话语社群进行标识。其他差异具有对话语社群进行标识的功能，拉波夫称其为“标记”（markers）。它们共同构成了腔调。最后，还有一种标志子集，在社群内外，它们的可见性都特别突出。这些是与腔调元符号本身具有特殊关系的符号。拉波夫把它们称为“定式”（stereotypes）。定式具有的一个重要差异是这些关于腔调的腔调。它们是一个敌对社群对整个腔调体系所进行的选择、变更和解读，它们将其化约为某种简单、易于操作、受该腔调所属社群之外的人们掌控的东西，从而使腔调变异得以重新呈现。所以，英国人会以其爱尔兰腔调为傲，美国人开口便是黑人腔调，澳大利亚人会钟情于模仿土著的腔调。在这里的每个例子中，真正的腔调表达出社群的身份，并把所有其他说话人排斥在外。针对取得该语言社群的成员资格是容易的、毫无价值的这种宣告，定式构成了一种反动。

拉波夫的研究可以使用韩礼德关于反语言的概念来补足，对此我们已经提到。拉波夫主要（并非全部）关注语音能指，而韩礼德看到了意义显然更为重要的其他层面——词汇和句法。对于反语言之于反群体的社会功

能，以及这些功能如何影响到语言本身的典型形式，韩礼德有更为清楚的认识。在反语言中，语言存在的主要目的是创造社群身份和坚持该社群与统治社群之间的差异。按照韩礼德的说法，即人际功能先于意念功能。按照我们的说法，即语言朝向符号活动层面，而不是模仿层面。其产生的结果之一，就是常常让人费解地刻意制造困难。反语言一边排斥圈外人，一边表达该反群体的意识形态。然而，反语言是从统治语言中发源而来，且寄生其上的，它通过一系列简单却特别的转化来达成它那无法理解的形式。譬如“look”通过押韵的俚语，成了“屠夫的铁钩” （butcher's hook)。另一种转化则去掉“hook”，于是“take a butchers'”（意为“看一眼”，take a look）这个短语便让圈外人无法理解了。在创造反语言形式的过程中，差异首先被常规转化操作创造出来。属于该差异的那些术语会被贴上社会标签。最后，转化操作受到压制，因而语言变得对其使用者有了排斥性。反语言与腔调之间的不同，仅仅在于它所主张的差异更强、对抗更猛；或者，反过来说，腔调乃是部分意义上的反语言。居于反语言元符号核心的意义，是对统治秩序的敌意和拒斥。只要可能，反群体常常会利用其他符号体系——譬如众多非法群体所使用的黑色服饰——来表达那套同样的基本意义。

根据韩礼德的研究，反语言似乎与属性的反对群体有关——囚徒、盗贼等等。但在分层的社会中，一个与之相关的现象在语言中则非常常见。许多语言社群有两种不同的语言，一种被标记为“高等”，被认为是属于较高社会地位的说话人在公共场合使用的语言；另一种被标记为“低等”，与前者用法相反。与高等语言相互呼应，在这些社群中，一般存在着高等文化，它具有与高等语言相同的社会意义和功能，并且通常通过相关联的高等语言传递出来。高等文化的性质、存在和作用，以及与之相对立的范畴，即低等或大众文化，已经广泛地得到理论化。从普通符号学的观点看，有必要确立这套现象的统一性，所以高等语言可以被处理成高等文化的一个构成成分，最终作为构成了包括彼此交叠的多套元符号的单一符号体系展开运作。我们还观察到，在韩礼德的阐释中，反语言标识对立的、边缘化的群体，高等文化和语言则通常代表统治群体的价值观。然而，高等语言具有反语言的典型品质。它们的定位指向符号活动层面，而不是模仿层面，在表示各种权力和稳定性时，它们充满复杂的转换，让指涉意义暧昧不明。同时，它们起到了将那些高等语言社群之外的人排除在外的作

用。与此相似，高等艺术、高等音乐、高等文化本身，都有让人困惑的特点，它们的模仿意义通常都难以让人明了。它们充满被赋值的复杂转换，以确保高等文化形式，由于这或那的原因，无法被普通人所理解。控制着高等文化的精英们的元符号包涵了对大众的敌意，同朋克族、飞车党和黑手党之敌视大众没什么两样。

从社会符号学的观点来看，仅仅注意到文化中竞争性腔调的存在和作用是不够的。标记的大量存在具有第二个主要作用，就是宣示意识形态意义，社会符号学必须能够对之进行解读。拉波夫对这些符号所具有的主体性意义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但是，由于接受了索绪尔关于语言学符号具有内在的任意性这一教条，拉波夫的研究受到了阻碍。但在表明一个单一符号，对于不同群体，可能具有多重意义这个方面，他所采取的方式却是值得称道的。然而，为了发掘这些符号的意识形态意义，我们需要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这些符号本身组织得有如文本那样。为此，我们使用了透明能指这个概念。

令人惊奇的是，结构主义传统本身为这个概念提供了最有用的出发点。这里最重要的贡献，是雅各布森 1968 年关于语音象征主义（phonetic symbolism）的论辩。雅各布森对音系学符码的研究极富影响。雅各布森以索绪尔和特鲁别茨柯依的理论作为基础，该理论认为，世界各种语言中实际语音的多样性之下存在着普遍的结构原则。他还在构成这些符码的诸范畴中看到了一种内在的、暧昧的意义。对于索绪尔所谓“开口—闭口”这种对立，雅各布森将其界定为“力量—限制”的对立，他认为元音一般表示力量（或缺乏限制），辅音表示限制（或缺乏力量）。这样，相对受限的元音有可能表示限制（正如其与开元音相反）或者力量（正如其与辅音相反）。它们在语音连续体中还携带有另一透明所指：调和或者矛盾。构成音系符码的所有语音都会携带这套意义，但是带有大量冗余（所以一个意义可以由许多不同音素携带，即使是在一种特定语言中），同时还有可变性（所以根据其所对立的是什么，一个特定的语音因素有可能表示不同意义）。音位变体（构成话语中腔调的音素变异形式）会按照相同的原则建构相同类型的意义。个人产生相同音素或语音那种表现方式也是如此。

这两种特质，冗余和可变性，使语音象征主义这个概念在理论中似乎难以讲通，在实践中毫无用处。实际上，符号体系要正常发挥作用，这两种特质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这两种特质，所以重要的是坚持这一观点：诸

如此类透明符号并没有脱离语境的、内在的单一一套意义。相反，它们构成了一套潜在意义，受特定的阐释符码和阐释框架以及不同思想控制体系约束，与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社群的努力彼此呼应。雅各布森对自然象征主义原则进行了扩展，把色彩体系也包括在内，在色彩体系中，主要的颜色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对象征价值进行了编码。这个原则与表面的矛盾是互相兼容的。譬如，按照习俗，红色在欧洲文化中象征力量（红色代表血液，如红十字组织；红色作为革命的符号，如红旗），也象征力量中断（譬如交通灯中的红灯）。但是，可以看到，根据其符号活动指向，力量这一潜在意义是这套意义中所共有的。红灯这一交通符号表示危险，但只是从一种观点看是如此，危险来自其他物体的力量。与之相似的，红旗，就像人们常说的斗牛红布，对共产党和公牛都表示着积极的力量，但是对资产阶级或斗牛士，所表示的却是威胁。符号价值中的矛盾出自符号活动层面中的不同立场和利益。这远远构不成一个问题，反而恰是社会符号学所期望的。列维-斯特劳斯把雅各布森的原则扩展到了其他符码上。譬如，他关于食品和烹饪符码的分析就显示出，根据出自规模不大的一套透明能指的同样那些原则，它们是如何得到建构的。

萨丕尔是一位影响甚广的德裔美籍语言学家，对语音象征主义理论有过贡献。乍一看去，他的贡献似乎意义不大，并且与雅各布森的理论无关。萨丕尔表明，某些类型的元音和辅音似乎表示开口度。开口度宽的元音 a，或者发音时口腔较大的元音如 or 中包括的元音，会表示宏大。相反，开口度窄和口腔较小的元音，如 ee 或 i 则会表示细微。同样，浊辅音（如 b、g、d）会表示宏大，清辅音（p、k、t）则相反。这种现象被证明是惊人地普遍，在许多语言中都存在。然而，作为理论，它有两个问题。首先，它似乎是无理据的。表示物理性大小的方式为什么有那么多？其次，细节上的不一致似乎数量庞大。这里只举一个例子，small（意为小）这个词中的元音应该表示大，big（意为大）中的元音应该表示小（尽管它们的辅音会颠覆这些意义）。

按照我们正在发展的这种理论，第一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大小是权力这个尤其重要的社会范畴的透明能指。符号活动层面充满了关于权力、稳定性的能指，而且这类意义中的巨量冗余正是社会符号学的常规。同时，因为这一层面的能指能够指涉符号活动层面的任一要素，而非仅仅指涉模仿层面，所以，如果意义纯粹是由指涉对象来判断，我们就有望见

到大量的不一致。譬如，拉丁语单词 *pater*（父亲）中的元音同宏大和权力就是一致的。但在 *parvus*（小）、*paucus*（少）和 *paulus*（小气、吝啬）这些单词中的元音也应当表示宏大，可是这些词的意思却相反，而且它们负载的是负面的社会价值观。然而，就符号活动层面中的关系而言，这些词项被以这种方式被贴上无足轻重这个标签，却证明了那些说话人所具有的权力：他们并非"小"/"少"/"卑微"，可以无拘束地使用这些另类的词汇。在这里，界定说话人的是权力，而不是对象。对 *pater* 而言，权力既界定主体，又界定情境（*pater* 是正式的称呼用语，相当于英语中的 father)。同腔调一样，重要音素能够以单独或协同的方式，对符号活动层面的许多方面进行标识，并且带有本身自有作用的暧昧性。

针对元符号在创造和维系差异和身份中所起的作用，在此刻总结出我们的观察是很有用处的。

1. 符号学变化的动力在于表达差异这种愿望。这种愿望源自特定群体创造出内部稳定性和排除异己这种需要，譬如反群体之建构反语言、反意义、反文化和反世界。
2. 差异可以通过被标出的选择和重要的转换得以表达，从微观层面（腔调、风格或语法）到中间层面（词项、短语、句群），再到宏观层面（话题、主题、宇宙观、形而上学），符号层级的任何一级都存在着这些选择和转换。
3. 这些差异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表达群体的意识形态和群体的身份。它们通常形成功能性的元符号集合（群体忠诚度的通行标记），这些集合的意义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指涉性的，它们指向的是符号活动，而不是模仿层面。
4. 表示群体身份的元符号常常是从透明能指中建构而来的。但是，既然反语言和反文化以排斥和迷惑异己为目标，既然元符号一般常见于文本生产之中，表示群体身份的透明元符号不断累积，一般就会导致其模仿意义在圈外人看来是无法穿透、无法理解、不透明的语言和文本形式。也就是说，不可理解性绝非偶然。
5. 一个群体的文化，作为单个符码中的元符号，为群体实施着同样的功能。因而文化是一个包括来自一系列符码（话语、服饰、食品，等等）的元符号的综合体，具有社会意义的共同内核。

阶级、文化和定式

这些原则潜在于特定文本、散乱的操作之下，为阐释它们的某些复杂性，我们来看一幅发表于 1985 年 8 月 17 日和 18 日的《澳大利亚人》的漫画（图 4.1）。作为讽刺，这幅漫画无须借助社会符号学的帮助就使人一目了然。商业联盟运动（澳大利亚商业联合会，简称 ACTU）被描绘成一种痴迷权力，却又懦弱无能、破坏力十足的形象。工党首相鲍勃·霍克被画成一个自我中心、好说大话而甚少行动的人。米歇尔的漫画是《澳大利亚人》的一个固定专栏，《澳大利亚人》是澳大利亚唯一的全国性报纸，是鲁珀特·默多克在澳大利亚的系列媒体中的"高品质"报纸，可谓澳（大利亚）新（西兰）地区的《泰晤士报》，而且同《泰晤士报》一样持保守的政治立场。解读漫画中的风格和腔调，并不让人惊讶，但却的确能对达成效果所需要的操作做出揭示。



图 4.1　定式化了的澳大利亚人特点

文本本身利用并呈现了许多符码，这些符码一起构成澳大利亚人特有的腔调和风格。ACTU 这只怪物被画成鳄鱼这种体型巨大、充满危险的原始爬行动物（恐龙时代极少数幸存者之一）。这里的鳄鱼与现实中的鳄鱼有很多不同之处，譬如中分的发型，看上去像"莲蓬头"。在 1985 年的澳大利亚，这种发型是既表示了一个阶级又表示了一代人的符号，它代表的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男性工人阶级，或者从那时起就没有改变过他们发型的中年人。我们可以将其作为透明能指的横组合段来解读它的意义。作为表示性格、力量、无所拘束的能指，长发通常与短发相对，就像开口元音一样。短发似乎代表相反的一端，表示力量的削弱，但是，既然修剪是改变发型的最直接方法，那么短发便是负面力量或力量否定性的透明能指。16 世纪英格兰清教徒与 20 世纪的朋克族都用到了这一能指，它有这样的意义：僧侣、佛教徒和基督徒有这样的发型，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澳大利亚男性也有这样的发型。中分的发型所具有的意义是相同的。笔直的中分线表示性格中的文化，如果这种中分明显而且居中，那么它所对抗的就是头部的天然轮廓和技巧的复杂可能。它表示的是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因为其本身并非全然属于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这种对立是如此根本而极端。

澳大利亚人的腔调对发型的意义进行了补充。所有角色的话语都使用了正规拼写。"不正确"的拼写于是用以彰显少数几项词汇和发音，我们将其表现为定式，表示整个腔调、话语风格、意识形态意义及赋值。有两个主要语音能指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省略辅音这种趋势（譬如，用 gunna 代替 going to，you're 代替 you are，give'em 代替 give them）。这种现象不是澳大利亚所特有的。在很多语言和文化中，这是表示非正式、限制水平低、地位低下的能指。作为澳大利亚腔调的特质，它的作用是将其标识为低等语言。元音是腔调的另一载体。这里仅有几个例子：oo→a（gunna 里的 to→a，you 变为 ya），e→air（yes→yair），oh＋i→a（going→gun）。还有一种辅音切换，t→d（beauty→bewdy）。这似乎是个小小的选择，尽管它比 shibboleth 宽宏好多倍。每一项都代表着构成全部腔调的一整套转换，所以我们将逐个展开考察。

三个元音切换显示出一个共通的品质；即从闭口元音（＝限制、控制、文化）变为开口元音（＝力量、缺乏限制）。在这一操作中，澳大利亚腔调（如英语的其他非正式形式一样）创造出称呼代词中新的 T 形式，在此以

前语法学家们尚未对之有所关注。澳大利亚人的正式或V形式是you；非正式或T形式是ya。其中，开口元音a充当表示非限制的透明能指。在这一操作中，澳大利亚方言颠覆了统治语言中的这种变化，将其编入自己的语法，使得18世纪政府在某个时候禁止做这种区别。在这个以及许多与之类似的变化中，语音、语法体系的切换都是互相联系的，都是由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意义考虑造成的。

在这个文本中，所有由于澳大利亚腔调标记而变形的单词，也是词汇诸项的标记。选取用来表示齿音送气（t→d）的例子，是澳大利亚人对beauty的特殊用法，这个词表示某种意欲的东西，但不指性方面的或审美方面的东西。（所以，譬如bewdy表示的是泛泛的赞成，可以用来描述一匹奔驰的骏马、一次出色的交易、板球中一次漂亮的击球，或像这里一样，表示轻松的启程）。所以，正是因为这个词将属于性别（男/女）和美学（艺术/非艺术）的范畴混杂在一起，它表示出一种语言和文化，这种语言和文化的纵聚合结构连那些基本区别都不具备——在精英们眼中，这种“文化”似乎很难称得上是文化，因为它没有用以辨识文化是什么的那些范畴。这个单词如此拼写，是为了强调它与英语单词beauty的差异，尽管说“正确”英语的人不会按它的书写形式（e-a-u）来发这个元音。要像发元音那样不送气地发这个齿爆破音，需要口型精确，服从要求。如d一般的送气音，于是，表示力量，或者缺乏限制。这一意义与开口度或强调的观念是彼此一致的，在萨丕尔的理论中就是如此。bewdy是一个方便的定式，因为它在音系特征中暧昧的意义，与它在该语言的纵聚合结构中的地位，是彼此交叠的。这样，它就成为表示澳大利亚人特征的有效符号，它通过对腔调元符号所具意义的利用和扭曲，表示出对普通澳大利亚人一种集中而有说服力的判断。

yair是另一个恰当例子。这个元音是复合元音，与标准（主流）形式yes彼此对照，语流朝向开口元音运动，并且去掉了末尾的辅音。所以，对于这两个表示肯定的单词——yes和yair——而言，后者所表示的，要么是肯定语气更重，要么是与听话人有更为紧密的稳定性关系。但是，在澳大利亚还有极为常见的第三种形式——yup，它的开口元音被不送气辅音p截短了。它同样属于口语，但表示的是强烈限制。鲍勃·霍克首相经常使用这种形式，尤其是在回答棘手的问题时，这被人们广泛戏仿。yair表示增强了的稳定性，yup则打破这种稳定性，表示不许论争这种带有敌意的

关系，因而取得的一致非常勉强。于是，作为整体，澳大利亚腔调投射出了矛盾的意识形态形式：有表示稳定性的标记，也有表示冒犯和敌意的标记。但是，在意识形态综合体中，矛盾是常规而不是例外，澳大利亚腔调的矛盾性是非常典型的。

除了表示澳大利亚特征的那些标记外，这幅连环画中还使用到了两种不同的语言，说英语的人（不仅是澳大利亚人）都能轻松地将其分成口头语言和正式语言。ACTU 这只鳄鱼的第一句话显然是口头语言。他的最后三句话（在他消逝在远方之前说出的），可以看出，是正式符码的例子。一些表示正式符码的标记，除去了专门化了的词汇，这可以从句法中找到。它受到转换的程度很重，充满颠覆和删减。诸如此类的转换是表示非稳定性（因此也表示权力）的最常见透明能指之一。这个例子幅度很大（一个单句已经长达 41 个单词，并且仍没说完），而且具有刻板的风格架构（每个新的从句中都要重复“有权……”这几个词）。这种组织原则涉及某些附属性要素，但主要是通过排比的方式。我们把这类结构命名为并列式（paratactic）。它们是表示社会结构的能指，与那些属于主从式（hypotactic）组织有着系统性差异。

在文本本身之中，这两种话语形式是与符号活动层面的其他符号信号一道表现出来的。当使用口头语言时，ACTU 的表达表示与听话人之间具有直接接触（尽管在第一个图框中，在南非这件事上，这是虚构的）。只要他一开始自己的长篇大论，他的眼神首先就会不专注，他的目光从那只红鹦鹉（galah，一种澳大利亚鹦鹉，在口语中意为笨蛋）身上移开，然后他闭上双眼，转过身子，似乎没有注意到在他继续滔滔不绝的时候，红鹦鹉已经渐渐走远。表示非稳定性的能指很强，同时还附着在他正在使用的符码之上。他用具有力量和稳定性的语言开始，用具有权力和非稳定性的语言结束，但是，这种非稳定性如此极端，以致权力（ACTU 关于自己无所不能的幻觉，以及由于他对正式符码的驾驭而产生的威望）变成了它的反面，成了被排除在话语之外的某个人无能的表示。所以，ACTU 使用两种语言形式这种能力，并不被表现为它的骄傲资本，反倒是其反面。无论是当他使用口头的、属于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形式，还是当他打破这些形式，他都被表现得荒谬而无能，尽管当他使用权力语言时看上去更加无能，因为这种语言形式将他排斥在他自己的潜在同盟者之外。

在鲍勃·霍克这个例子中，我们很容易分辨出语言的两种形式来，但

它们并不是那么地极端化。“就是文明世界中最有历史意义的那项改革……”属于正式语，尽管其主张显得太过分，超出了全然“正确”的程度。这句话之前则是口头语“天啊，老兄”。按照米歇尔的看法，鲍勃·霍克可能与ACTU同样喜好夸夸其谈，同样无能，并且被卷入了同样的矛盾，但他依然与自己的听众代表保持着交流和稳定性关系，正如他的语言和身体姿态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在完成该文本意识形态工作的符号活动层面，同样的对立也可以实用。漫画周围是印刷文本，其惯例同澳大利亚、欧洲和美国那些“高质量”报纸一致。版面不大，用直线线条来分割文章或文章类型。句法和词汇是典型的高级符码类型，适合报纸所定位的少数“上层”精英群体。对于社论来说，就更是如此——它直接被放在这幅漫画的左边。于是，漫画风格和报纸风格截然对立，其关于权力与稳定性的暗示更是特别地明显。漫画周围是锯齿状的手绘线条。制图人同样地随意，删除了关于所绘角色的大部分可视信息，展示而不是遮蔽了米歇尔笔法中的个性化力量。图画中的文字也是手写的，没有使用任何印刷字体，只有图框之间的线条经过了规整，不过图框本身却未经精简，没做到整齐划一。

所有这些能指主要在符号活动层面运作，目的是在画家和读者之间创造出高度的稳定性。高级风格常常涉及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紧张感。这幅漫画创造出了一个使非正式、幽默和轻松变得可能的空间，若非如此，记者和读者就会觉得十分重要、十分严肃。漫画风格所采用的方式，如潜在于语言风格之下的一样，利用的是同样的符号体系。

还有其他符码，米歇尔用之来定位读者，它们都是众所周知的符码发展而来。他使用了四种规格的字体，用下划线或双线，形成了七种纵聚合。该原则可以用来产生更多的符码类型，但它们所表达的，与元音和辅音体系所表达的，是同样一种维度，即大小（开口度）作为表示强调或重要性的能指。同样的原则潜在于报纸关于标题的传统之下。特大字体，譬如叫嚷（或者没有辅音），表示没有拘束的力量，这与高级符码之下的意识形态是不相容的。所以，像《澳大利亚人》这样的“高品质”报纸，标题字体通常比诸如英国《太阳报》或澳大利亚的《真相》之类大众化的报纸要小。图像的大小，通过指涉空间关系符码来表示空间关系，也对观看者起到了定位作用。这两种符码在第一个图框中形成交叠，字母大小和图像大小创造出了最大的空间关系。作为口语形式，语言符码应该对此进行

强化。然而实际上，在澳大利亚人的话语中，这些形式都被标记上阶级性。那些有威望的《澳大利亚人》读者不会使用这些形式，甚至在放松情形时也不会。这使得它们不可互换，因而不具有稳定性。这些来自绘画风格、表示紧邻的标记所产生的效果，与用暗含腔调表示排斥的那些标记相互结合，颠覆了高度的、积极的稳定性，使之变成高度同等的、消极的稳定性。在这里，这具有特别的效果，它将此类读者与 ACTU 表达的情绪分离开来（敌视南非并非《澳大利亚人》强烈主张的方针，尽管它那天的社论，直接出现在漫画左侧，温和地对南非总统博塔改革步伐迟缓进行了批评）。除此以外，它还具有一种更为普遍的效果，这种效果在每幅使用相同符码的漫画中都得到了强化，明确了报纸读者和诸如 ACTU 这种发言人之间的对抗，相比日常澳大利亚人话语中的情形，按照阶级阵线而来的区分变得更直截了当，也更为公开。但是，即使这种效果，也绝非不可避免。对反对群体的牵挂可以颠覆这种偏见，譬如这一期中登载有一封写给编辑的信，信中说："近来，许多报纸社论似乎都在为 ACTU 建议，告诉它什么政策对澳大利亚有益。ACTU 为此表示感谢。它现在知道该反对什么了。"写这封信的是西澳大利亚州海水湾市的罗宾逊。

重要的是须强调，我们这里分析的是定式，不是腔调。从符号活动层面的关系着眼，两者之间的差异清晰可见。如我们所说，定式是关于腔调的腔调，是表达反对群体利益的一种形态。定式通常的制造者是被那种腔调特别地排斥在外的一类人，而腔调形式复杂，目的是使其难以穿透，或者使圈外人难以理解。这套定式起到的作用是宣布这种困难其实无关紧要。它们能让任何人进入反语言和反文化的封闭世界。有时，它们能用几个姿态就煽动或解散整个群体及其意识形态立场。它们也能够显得温情脉脉，宣称本质上的同一性让该腔调的使用者融入更高层次的一致，对差异所具有的力量和意识形态形式所具有的能力进行褫夺。这幅漫画实际上对这两种策略都进行了实施。它出现在一份叫《澳大利亚人》的报纸。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澳大利亚人腔调强烈表示出对立的工人阶级的归属感和价值观，因此在这里受到了戏仿和拒斥。但是，中产阶级，《澳大利亚人》那些事业有成的读者，与英美等国与之类似的读者，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是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人腔调的形式，也是他们自己的差异标志，是他们所拥有的身份的唯一表述。所以，实际上，他们的言说形式，是经过修饰和简化的澳大利亚人腔调，它具有双重指涉：拒斥标准英语（按照澳大利

亚人方向前进)，拒斥“广义的”澳大利亚人（按照中产阶级规范和意识形态方向前进)。对于其他符号媒介中的元符号而言，也同样如此。对所有澳大利亚人而言，之所以低级风格或腔调表示稳定性和身份的主要能指，正是因为它让人联想到低级，尽管讨论到权力的时候，这些东西让人觉得尴尬。所以，这幅漫画的风格，伴随其表示身为低级、大众、澳大利亚人这种稳定性的能指，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反澳大利亚人的或反大众的。如果《澳大利亚人》心系反澳大利亚人和反大众，它会走向何方？它还会卖给谁？

符号是符号学中的意义单位，解读符号是符号学家的首要技能，但是符号以多种形式存在于多个层面。它们往往是另一结构的一部分，而这个结构本身又具有复杂的意义，且作为一个复杂的符号起作用。符号的这些意义从来就不是中立和客观的。它们常常是决定它们社会意义和效果的符号策略的一部分。所以，解读符号时，常常看到相对简单而自足的符号是很方便的，譬如表示 ACTU 的鳄鱼，或者其作为界定特征的发型。然而，注意到更为散漫的符号、元符号和表示元符号的能指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已经边缘化，更可能被遗漏，或被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在关于文本效果的分析中被忽略，因而它们在无意识层面的活动也更为自由。

性别的元符号

性别是所有人类社会的重要范畴。每个社会都认可生物学事实，并对男女加以区分。根据此生物学基础建构出无数文化规则，它们根据性别分界对行为进行规定和控制。这些性别体系依赖符号体系和操作并成为其组成部分，没有符号体系和操作，性别体系是不可知的、难以维系的。这里，至关重要的是思想控制体系的性别构件，它们根据性别分界对符号意义作出了规定：女人和男人可以制造出怎样的意义，针对自己还是他人，关于自己还是他人，用什么符码，在什么语境下。这些思想控制体系又依赖于性别元符号体系，性别元符号体系建构出性别身份，传递出关于性别一系列连续而无处不在的信息。这些元符号的意义，无疑反映出关于性别关系的统治性观念。尽管，同社会使用中每种其他符号一样，它们也包含有反对意义，和男女两性实施（针对统治性意识形态）抵抗的方方面面相

呼应。对性别体系的研究通常认为，性别体系是为统治者利益服务的一套连贯意义。这常常导致采取两种策略之一：其一，精简体系，直至其符合连贯模式；其二，承认多样性，认为发现体系是根本无望的。我们的策略是一种与此相反的期望：我们认为性别体系是为矛盾和不稳定性所标记的，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它们都是充满斗争的场所。

性别（gender）这个单词源自拉丁语和希腊语，描述的是两种语言中一个普遍特征，所以回溯源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词的涵义。拉丁语和希腊语把所有名词分为三类：阳性、阴性和中性。许多例子表明，这种分类是建立在生物性别基础上的，这使它看上去没有问题、“自然而然”。但是，在许多例子中，两种语言的性别体系都超出了生物性别范畴。许多被体系赋予性别身份的名词，其指涉对象根本没有性别特征。以（确实存在性活动的）动物为例，无论其实际的性活动如何，它们总被赋予其中一种性别，而只有在有理由对之进行强调才会例外（就像在英语中，所有的狗都被认为是阳性，除非是要突出它们的身份，如 bitch［母狗］）。

生物学上的性别和社会建构的性别，两者之间的差距使得有必要把后者作为一个单独范畴来讨论。性别体系的一个方面是对现实的分类，这为非人类的世界投射出关于男女的社会意义，将关于性别作用和性别身份的意识形态嵌入了语言本身。另一个方面是构成元符号体系的那套标记。为了解语言，你必须从微小细节入手了解性别构架。所以，性别构架汲取自过去，在每一次话语行为中都毫不费力地得到复现；通过这种方式，它起到了进入“正确”语言的条件这种作用。显然，这是对个体实行社会化，使其融入特定社会的性别意识形态的一种强有力的方式。

然而，这种解释在面对实际性别体系的复杂情况时，是过于简单了——我们曾表示过，这些复杂情况，并非偶然或多余，而是与其功能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将以拉丁语为例，研究这类体系在口头语言中的一个例子。首先，我们要承认，选择拉丁语为例有某些不利之处。拉丁语现在已经是一门“死了的”语言，所以我们对其性别体系的重构必然是假设性的，不能受到该语言的使用者的检验，因为他们可能会意识到许多复杂和反常，而这些只有在属于不同性别、阶层和地域的使用者对其加以运用这种条件下才会出现。但是拉丁语的例子被普遍运用来支撑这种观点：在过去的两千年里的晚期欧洲语言中，性别体系毫无意义。把性别能指作为透明能指来展开研究，只是解释拉丁性别的开始，然而的确是个极佳的

起点。

拉丁语的语法学家们将拉丁语名词分为三种性别，阳性、阴性和中性。阳性和阴性范畴包括了许多没有生物性别的实体。这样，对于用作普泛化意识形态体系的性别，拉丁语体系堪称典型例子。但是，拉丁语不只是有三套性别标记，它还有五种词尾变化。这些词尾变化包括不同的位格标记，尽管为了这里的讨论，我们将只限于考察标识行动主体的主格之中的阳性和阴性。对阴性名词而言，最常见的主格形式以 *a* 结尾，即所谓“首要词尾”，阳性名词的词尾 *us* 则属于第二类结尾。但还有三类词尾。第三类词尾的结尾有多种形式，以 *is* 最为常见，尽管 *es* 和 *as* 以及辅音加 *s* 形式也不少，还有辅音加 *io* 形式和其他形式。这些名词绝大部分是阴性，尽管有许多例外。第四类词尾以 *us* 结尾，元音比第二类词尾的 *us* 更长也更靠前。同样，这些名词也大都是阳性，尽管例外也有很多。第五类词尾，主要是阴性，以 *es* 结尾。但是，让这里的勾勒更混乱的，是还存在更专门化的性别标记；诸如第二类词尾中的 *er*（如 *magister*，即英文之 master［先生］），第四类词尾中的 *or*（如 *creator*，即英文之 creator［创造者］；又如 *imperator*，即英文之 ruler［统治者］或 emperor［国王］）。与 *or* 相应的是阴性标记 rix（如 *creatrix*，即英文之 female creator［女性创造者］，又如 *imperatrix*，即英文之 empress［女王］或 female ruler［女性统治者］）。

必须快捷而频繁运用的体系，似乎须建立在透明能指的基础上。但是，如果我们尝试使用这些术语来阐释拉丁语的性别标记，把元音和辅音用作表示权力和稳定性的透明能指，得出的结论初看起来似乎同我们可以预料到的相反。强势的男性标记 *or* 或 *er* 符合这一基本模式，其元音开口度大（意味着权力），但是，这种形式是少数情况。第二类词尾 *us* 是主要阳性标记，既包括 *s* 又包括 *u*，前者表示微小，因而意味着非权力，后者是开口度相对较小的元音（意味着较小的权力）。相对而言，阴性的主要标记，首要词尾 *a*，是表示力量和不受限制（意味着权力）的透明能指。无论罗马女性还是现代妇女，明显都没有得到解放，都不是拥有权力、没有限制。实际上，这两种标记颠覆了关于罗马社会中性别作用众所周知的那种估价。可是，第三类和第五类词尾大部分为阴性，主要使用短促和小开口度的元音或直接在辅音后面加 *s*（意味着较小权力）。所以，即使在其本身之中，拉丁语体系看上去也不一致，更不用说那套透明能指了。

然而，如果我们把体系分为两部分，一个性别体系加上一套具有透明意义的标记，那么体系确实就有了某种一致性：

性别	标记	意义
阳性	*us*（第二类词尾）	—权力（+稳定性）
阳性	*e/or*（第二类/第三类词尾）	+权力（—稳定性）
阴性	*a*（第一类词尾） *io*（第三类词尾）	+权力（+稳定性）
阴性	*s(is, es, as, ns, x, us)*	—力（—稳定性）

如果我们假设系统的标记体系不直接表示性别，而是按照权力和稳定性这种基本模式对性别进行分类，那么表格中的体系便有道理了。于是，无论就与符号活动层面的关系还是就与模仿层面的关系，这种矛盾式的分类都能讲得通，而且可以解释许多明显的性别例外。常见的阳性形式采取 *us* 形式，而不是更明显的充满权力意味的 *or* 或 *er* 形式，是与高级语言（具有权力的语言）的典型特征相互一致的。许多其他明显的性别例外以这种方式也讲得通。譬如 *mater*（母亲），它是阴性，但拥有权力，在使用到它的常规语境中更是如此。反之，从符号活动层面的男性角度看，*a* 标记的是欲望对象、不受限制的力量，可以用来标记女性。第三类和第五类词尾中的 *s* 结尾形式，表示限制和无权，与其他两类相比，其性格化同特定性别之间的联系并不强，尽管更多的时候它都是与女性而不是男性具有关联。

因而拉丁语中的性别标记是依据权力和稳定性的关系来灵活地定义性别，对于符号活动层面的关系和模仿层面的特征都有所指涉。总体效果不是简单地建构出同一性的性别身份，而是按照权力和稳定性对性别进行全体建构。体系本身有一种男性君临一切的取向，因为它通常暗示的都是从男性意义制造者这种视角中的社会世界和符号活动层面，这成了体系之所以行得通的基点。“男人制造了语言”，尽管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是男人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拉丁语的语法形式。留传给我们的拉丁语言是一种男性建构，由男性语法学家进行描述，而描述的又是绝大部分是男性作家所使用的语言。里德尔和怀特的权威辞典以 207 位作家的语言为基础，其中只有两位是女性。然而，尽管是这种男性视角，性别体系所负载的女性特征建构却并未暗示一种纯粹贬损和轻视的女性观。拉丁语法学家们自

身都称 *a* 为首要词尾，因而赋予了它优先性（正如动词四个词尾变化中第一个就是 *a* 类，纵聚合的例子有 *amare*，即英文 love [爱]）。在其他男性符码中，在其他文化中，也能找到这种对女性的尊重，譬如表示礼节那些符码。尤其是在专属娱乐而非权力的领域中，更能找到它们。女性主义者认为 *a* 是表示欲望——女人作为男人力量和欲望的对象——的能指，不属于她们自己。尽管如此，欲望对象仍具有赋予它的力量，甚至具有某种有效性。在这里，正如在社会符号学的其他地方一样，涵义暧昧是体系性的、功能性的。

围绕拉丁语性别问题著述的语言学家们，通常是将其处理成几乎与意义和功能无关的一种早期遗留之物。实际上，该体系历经两千多年而依然留存，堪称生命力顽强，在现代法语和意大利语中也仍然活跃。人们常说，当代英语丧失了自己的性别体系（不考虑社会的非性别歧视的因素）。但是，正如沃夫首先指出的那样，英语发展出了自己隐蔽的性别体系，它几乎与拉丁语一样范围广阔和充满矛盾，而且还有继续发展的能力。一般而言，它所使用的标记数量更少，所以更容易回避。但是，某些英语形式发展起同拉丁语的那些极为相似的一套标记。在澳大利亚英语中，就像在英语其他口头变体中一样，后缀 ie 和 o 常被加在某人的名后面，生成绰号（即具有高度稳定性的名字）。这两个后缀两者都表示稳定性，但是，o 形式暗示着尊敬，对身体有力者尤其如此，而 ie 表示带有感情色彩的小。它们还具有性别暗示，像拉丁语一样，这些暗示并不是简单对应的。所以，Jacko 一定是男性，Jacky 或 Jackie 的性别则很难判断。我们可以用正字法来区分这两个名字，正字法中的一般规则是，表达特定语音的字母越多（因此受到的限制也就越多），名字就越具有女性特点。所以，Jackie 比 Jacky 更可能是阴性，但是，并不能决然就是如此。但是 Jacqui 绝对是阴性的，表示较小权力和更多限制。

这个体系，在澳大利亚英语中，产生出一种萌芽状态的性别体系。人们带有感情地称一听啤酒为 tinnie，称盛装它的冰镇容器为 esky。对 wino（好酒之徒）的态度则不同。他（这个词是有性别暗示的）似乎总是 blotto（酩酊大醉），甚至可能是个 metho（酒精依赖者），因为他明显是个 derro（浪荡子）。如最后这个例子所示，o 所表示的开口度或权力可能不适用于模仿层面的实体，而只能用在符号活动层面的实体，在这里，它发出的信号是强烈敌意。阳性和阴性不仅用表示权力和稳定性的标记来表现，它们

也表现各种权力和稳定性本身，甚至在这个相对简单的体系中，也会导致某种复杂性。所以对听装啤酒而言，尽管它们有阳具形状并与男性畅饮和男性稳定性有关联，但是却被划分为有女性稳定性这种暗示的 ie 一类，成为男性欲望的安全对象。加有这个后缀的单词构成了一种澳大利亚式语言，并把一种性别化腔调建构到其中。它们暗示对饮料进行性别化分类，按照这种分类，啤酒是男人专属的饮料。它们还创造出得到了思想控制体系支持的一种符号活动取向，按照这一取向，澳大利亚妇女是不应该使用 tinnie 的，除非她们是暗中引用男性语言，因为标记体系本身暗示着一种男性的符号活动立场。同样是这种形式，还表示着社会阶级（工人阶级）和情境（非正式）。元符号这种多义性并不少见。实际上，这正是从一套普通能指中建构而出的元符号所具有的典型后果。

性别意义还通过话语、服饰、行为等等的特定风格得到建构。建构性别的重要符码之一是服饰符码。服饰对男女做出分辨，并协助表明，该群体眼中的男人和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为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利用了其基本意义涉及权力与稳定性关系的透明能指。在这些原材料中，特定风格建构出复杂意义，这些意义不仅包括性别，而且将关于地位、阶级和其他一般社会范畴的意义也囊括在内。

为了考察服饰风格的意义如何被融入性别和其他意识形态综合体的建构之中，我们将戴安娜王妃的服饰作为文本，使用的这些图片发表于《澳大利亚妇女周刊》，该杂志对戴妃 1985 年的澳大利亚之旅进行了报道。这期杂志有四幅图片和折叠式插页，插页部分有更多图片以及一份“最美”服饰的剪裁。图片总数共计 27 幅，展示了 17 件有不同颜色、样式、质地和形状的服饰。这么大量的不同表明，不同本身就是一个自成一派的能指，承载着时装界里重要的意义。在腔调标识一致身份和一致差异的地方，时装这个方面所表示的，却是自我差异这一与之相反的东西。像戴妃这样的时装界领袖，在 4 页杂志中展示出 17 种不同面貌的自己。这种多元性是表示权力的透明能指，类似于皇室的“我们”。本着同一原则，头面人物的时装更换频繁，所以他们能够展示出，自己有能力紧跟他们的多重地位。

然而还是存在着规律性和持续性，这赋予了戴妃一种一致性的性别身份。我们先对戴妃和她的丈夫进行比较。她自始至终基本保持着同样的发型和化妆，两者都是为表示她的性别服务的。戴妃的发型已成为人人皆知

的标记。她的头发比查尔斯王子长，却比一般女人短。也就是说，头发具有双重指涉，既是根据男性标准（查尔斯王子），又是根据女性标准（譬如安妮公主）来界定的。头发的造型也是如此：比男人的更精心，却不像女王的束得那么紧。同样，按照这种文化中一般女人的标准，她化的是淡妆（素淡的口红、胭脂和眼影），尽管相比不化妆的查尔斯王子，她的性别标记还是很明显的。另一个差异体现在帽子上。在一多半图片里她都戴着帽子。查尔斯王子戴帽子的图片只有一张——他在参观一家铝冶炼厂的时候戴着安全帽，她当时也戴着这样的一顶。

除开这个例子，我们很可能想要把帽子视为性别标记，即使戴妃并不是一直都戴着帽子。当然，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中，情况并不总是这么回事：即使在这些图片里，除查尔斯王子外，其他男性也都戴帽子——他们之中五分之三是军方人员。因而帽子的意义未必代表性别，而是代表着限制（无论是服从纪律，譬如在军队中，还是安全起见，譬如戴上安全帽，或者两个原因都有，譬如戴妃一般置身公共场合的妇女）。在某些时期的某些文化中，思想控制体系对妇女的头饰有着严格规定，尤其在公开场合中（帽子、披巾和面纱），明显包含着女人作为危险的欲望对象这种观念。长长的头发是表示力量和缺乏限制的常见能指，所以戴帽子又留长发便形成一个自我矛盾的横组合段（尽管戴妃的头发不算太长）。似乎更简单的做法是让思想控制体系要求妇女剃成光头，但是，简单和一致并不是驱动思想控制体系的唯一标准。

尽管每个差异都很重要，但是，在这里，我们将只集中关注两个差异维度。其一是服饰作为身体的转换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在每幅图片中，戴妃都穿着裙子。查尔斯王子穿着裤子。当代西方文化里，这些是表示女性相对男性的习惯性能指，尽管也有例外。（譬如：从背后看到的僧侣、教士和君王；现代妇女的时装则包括裙裤和牛仔裤。理查德·布莱克威尔把摩纳哥斯蒂芬妮公主命名为1986年全球着装最差的女人，理由正是："她那不男不女的王室衣橱让她能够男女浴室通用。"）裤子和裙子之间的决定性差异，在于裙子更能掩盖人体特征，尤其是隐私部位，从而更强烈地表示出限制——尽管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无数与此相反的信息协同这一基本意义，传递出了复杂的整体信息。

戴妃的这一系列着装都相对地受到了限制，正如裙子那样。除了一件，所有的服装都盖到了膝盖以下。只有一件露出了她上臂和肩膀的肌

肤。有一件服装领口向下开出15厘米，其他的都抵至咽喉处。这些风格都表示出限制。然而，查尔斯王子的服饰限制意味更强。除了打水球外，任何场合他都是扣紧领口，打领带，身着外套或夹克，下穿长裤和皮鞋。除去手腕以下和喉结以上，浑身肌肤一点不露。尽管裤子有限制的意义，但是，这种限制不只是针对男性的。但是，正如王子这个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这些限制部分地表示出这些人的权力和场合的正式性。

另一个差异标记是颜色。雅各布森认为，主要颜色通常都与元音意义类似的那些意义，诸如红色对应于像a一样的大力量元音，蓝色对应于像oo或i一样的小力量元音。伴随这些普遍性主张，重要的是须承认，讨论的焦点是透明符号体系，该体系要服从特定文化和社会群体的调整。然而，在当代时装界，作为表示力量的能指，颜色的透明意义为从它们中建构出的复杂颜色意义提供了基础。玛丽·奎恩特对颜色与性别的关系做出了权威的清晰阐释："男装质料应该用男性的颜色——灰色、白色和黑色以及人字呢等等，再配以淡褐色或玫瑰红色的浪漫流苏。这种反常搭配让我觉得充满趣味，却让营销专家感到抓狂，他们说这样是卖不掉的。但是，夸张女性特征是极妙的。"这里，她借助其他符号（褐绿或玫瑰粉的颜色以及其他表示女性特征的能指），通过创造一种新的跨性别意义，精确地利用颜色和质料中内嵌的性别意义，颠覆了初始颜色符号的价值，从而让意义变得"反常"（对男性特征做大胆的女性挪用），而且不再是一个反女性的能指（正如她的营销专家所担心的那样）。正是这种对颜色意义的综合运用，能够让颜色似乎有了任意性，而任意性实际上就是对基本意义的刻意否定或置换。在这一层面上，奎恩特把红色看成表达了原始力量：——"坚硬、酷热、鲜活、信心，冲劲和粗鄙，血性和勇气，残忍、性、番茄、西班牙、张狂，它总让人想起这些"，而藏青色则是"艰苦、冷酷、官气，但如果与白色相间，便成就出吉吉和多维尔这两个令人愉悦的品牌"。另一方面，彩色"很难用于男性服饰。它们一眼望去，就让人觉得廉价和乏味。尤其印在白色薄型合成材料上更是如此。而印在天然材质上——譬如皮革、丝绸、亚麻和羊毛——它们看上去华贵而奢靡，因为它们本就是这样"。

于是，我们有可能通过以关于强/弱的颜色/亮度=大/小的力量这种透明能指体系作为出发点这种方式，开始解读当代英国时尚界中颜色的社会意义。根据这种体系，查尔斯王子的衣服显得种类较少，都属于奎恩特描

述的阳性范围：一件黑色晚礼服，其他剩余种类都是蓝灰色。戴妃的服装中，13 件属于素淡的浅色，其中一半是淡蓝色。5 件是浓烈的主色：两件鲜红，一件鲜绿，一件蓝色，一件黑色。这些颜色被组织成透明能指。素雅的淡色表示较小的力量，即小和缺乏重要性。戴妃的裙装和查尔斯王子的套装中，大多数都携带着这种信息，为了符合与臣民之间可能的稳定性而抹杀他们的皇室身份。在主色裙装中，有两件是鲜红色，从视觉维度讲，红色是与音系学中的 a 彼此对应的。

红色的性别联想很有趣，在很多方面，它与 a 在语言性别体系中的作用都可相提并论。传统上，粉色适合女婴，蓝色适合男婴。粉色是一种修饰过的、受到限制的红，适合小孩子，但它仍然是一种红，是力量的标记，把女性标识为欲望对象，而蓝色（淡蓝色）纯粹标识男孩具有权力，而不是将之标识为具有力量和欲望，且该颜色与拉丁语中的 us 词尾形式彼此对应。成年妇女尤其喜欢用红色表达其性别特征：口红、胭脂和指甲油。戴妃的浅色口红和胭脂表示出这种特质，尽管是用了一种受到限制的方式。按照这里的解读，她似乎主要想表达受到压抑的欲望。

然而，这些描述中的某些地方是具有误导性的。戴妃服饰这一文本是通过《妇女周刊》传递的，这是一份主要由妇女主办，面向妇女的刊物。在杂志页面中，戴妃形象受到了女性腔调的影响，由符号活动层面中的女性办刊者和读者对其进行定位。影响之一我们可以从对服饰颜色的选择中看到。尽管只显示了五件主色服饰，但是，有两件红色服饰出现在五幅图片中，一件绿色服饰出现在三幅图片中，其中一张被放大了许多，这样就给读者们提供了最后这件衣服各个环节的制作图样，从而她们可能自己仿制并穿上这种服饰。这些妇女读者在符号活动层面中有着不同定位，更强烈地倾向于表示力量的能指而不是表示限制的能指。领口向下开出 15 厘米的那件红色服饰，前摆还有直到膝盖以上的开口。绿色服饰那张，我们可以看到戴妃的一侧肩膀上扎有高高的蝴蝶结，另一侧肩膀则裸露在外，比杂志中所刊载的其他照片露出了更多肌肤。

在对起初的符号活动层面所做的阐释中，该杂志宣称："这是一次皇家亲民出行，威尔士王子和王妃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让民众欢欣愉悦，孩子们更是如此。"这段陈述把主要符号活动事件——这些服饰是事件的一部分——表现为一种皇室夫妇（查尔斯王子居于领袖地位）和人民/民众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皇室人物使人愉悦，尤其是对孩子

们而言。的确也有许多孩子在图片上，但是，他们不出现在戴妃穿红色或绿色服饰的场合。该杂志将皇室出行作为主要与儿童有关的关系来进行意识形态建构，这与女性作为母亲这种特定角色相互关联，但是戴妃仅仅是“取悦”孩子们之后就离开了，为他们提供衣食，给他们洗澡的却是另外的人。该杂志的符号活动层面用一套寻常的指涉要点建构的稳定性纽带，将女人们彼此联系起来。该杂志的女性制作人，通过统治符码中的审慎切换，表示出女性力量和欲望的存在。戴妃这一人物既表示女性限制，又表示潜在的女性权力。透过被该杂志放大了的她那些信号，她还暗地里表示女性无责任心和容易满足。戴妃本人在语言交流渠道中是无声的——没有关于她所说的话的引用，只能见到她如何张望——但是，查尔斯王子同样如此。安·皮尔玛和帕特·冯·沃尔夫创作了这里的语言文本，所以，她的沉默得到了其他女性话语的弥补。

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像《妇女周刊》这样的妇女杂志是妇女文化的一部分。这份特殊的杂志投射出一种保守的意识形态，它为妇女带来小小的满足，同时又伴随着相当大的限制。如所有意识形态形式一样，性别构建是意义斗争和反复谈判的场所。它们有其自身的不一致，受到来自对立团体出于自身原因的攻击或支持，而无论其是否属于同一性别。对皇室出行的特定建构，处理的是戴妃服饰所提供的充满矛盾的性别意义，因而能够呈现一种诱惑形象，在这个形象中，女性的欲望能够与限制共存，不会给权力操作带来危险。正因如此，它使特定的性别意识形态和特定阶级信息合法化：当传统规则发挥效用时，女人只能是女人。

我们把关于性别及其能指的观点总结如下：

1. 社会性别体系的维系和传递，靠的是思想控制体系的性别构成要素和系列性别元符号。
2. 性别元符号源自特定社群的基本符号资源，它们使用表示权力和稳定性的透明能指来建构性别身份、性别规定和性别意识形态。由于这些能指涉及权力和稳定性的总体关系，所以对于其他统治性社会结构而言，如社会阶级，所做出的决定，性别体系不可能免受影响。
3. 在特定社会中，对性别的单一规范（单一的女性或男性形象、语言或风格）是不存在的。性别元符号的意义可以指涉符号活动层

面，也可以指涉模仿层面。它们既表达统治者的利益又表达其符号活动观点，既表达权力又表达稳定性。为了生产出不同群体的别样意义和利益，它们可能会产生变化。

作为症候的风格

符号学一词最早用于医学。医生通过解读身体和症候中体现的疾病符号，来做出相应的预防和治疗。对社会符号学而言，与医学模式类似的情形常常可能被误用。疾病的隐喻过于频繁地被用来对人及其行为做出标识，使那些可疑和痛苦的“治疗”显得合理。在医学行业之外，古代世界有自己的社会符号学家，他们把鸟的内脏和其他征兆解读为社会状况的符号和症候，并对社会的命运做出预测。整个这套模式，现在看来全然不可信，并被揭示为欺骗和误解，但是，它的目的绝对没有过时。古代占卜师的继承者，如今被称为社会学家，仍然对社会形式是可行还是崩塌做出报告，尽管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和假设已经极为不同了，所分析的“内脏”也更为高级。

我们将把涂尔干对自杀的研究作为例子。这本书 1897 年首次（在法国）出版，它不仅是社会学经典文本，而且它还揭示出了社会学身为社会符号学未予承认的分支这一特征。涂尔干的社会理论显示出他对各种力量的敏锐洞察，在他看来，这些力量使 19 世纪社会那种单一架构分崩离析。自杀是崩溃和毁灭特别生动的象征，所以是一种方便表征，因此成为涂尔干的关注焦点。于是他积累数据，使自己能够把自杀的比例类型与各种社会群体联系起来。涂尔干主要关注的维度是权力（秩序）和稳定性。以他所建立的联立关系作为基础，涂尔干认为，自杀的比例和类型，与社会管理形式和/或凝聚力的崩溃之间，存在着联系。他称其中一种自杀类型为“失范型”（anomic），产生于管理机制的崩溃。第二种是“自我型”（egoistic），产生于稳定性和社会凝聚力纽带的削弱。第三种是似乎较为反常的“利他型”（altruistic），它所表达的是对秩序或凝聚力的过度执著。

在关于各种社会稳定性的阐释中，涂尔干对两种稳定性的区分对后世很有影响。其一是机械的稳定性，其中的社会纽带很强，但并不复杂，或者说组织程度不高；其二是有机的稳定性，其中存在着高度区分和从属。

涂尔干视有机的稳定性为更高级也更发达的形式，其所运用的是进化论模式这种 19 世纪思想中很强劲的范式。由于担心现有社会发生紊乱和坍塌，涂尔干开始重视秩序和凝聚力，以及它们的能指和支持，这种牵挂流露出他理论的意识形态基础。然而，这些牵挂就像腔调一样，是对本身并非特别保守的兴趣所进行的一种置换。从历史上来看，当社会特别容易在内部或者外部力量作用下坍塌和毁灭时，它们的确就容易陷入危机状况。无论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对危机以及危机的标记极其感兴趣，而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保护还是推翻政权。涂尔干的成功给社会符号学留下了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任务：为表示危机及其诊断性运用的能指理论建立一种系统性的基础。

涂尔干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比他关于表意体系的理论更为成熟，为补充他的社会理论，我们有必要再次向语言理论家求助。这里，巴兹尔·伯恩斯坦所做的工作是个很有用的出发点。伯恩斯坦从英语中存在的两种话语类型着眼，即我们所谓高级语言和低级语言，但是，伯恩斯坦分别称之为高雅化的符码（elaborated code）和受限制的符码（restricted code）。伯恩斯坦认为，在这两种语言和各种社会组织之间具有一种功能关联，无论在社会阶层还是家庭组织的层面上都是如此。他认为，高雅化的符码与正式场合的高等地位说话人有关，也与他标记为个人型的（personal）家庭组织类型有关，在这种类型中，有着对角色关系进行重新定义的巨大空间。表示高雅化的符码那些标记中，包括复杂句法、分句从属关系、（充满修饰和模态的）精巧的名词短语和动词短语、差异微妙的词汇、各类转换和（最重要的）明晰意义。受限制的符码具有相对的品质：句法较为简单、语言形式类型有限，而且意义不明。伯恩斯坦将此与地位型的（positional）家庭结构联系在一起，在这种结构中，符码关系是确定且不容商榷的。

为了完善自己各种语言的研究，伯恩斯坦还提出一对类似的范畴，用来描述不同教育体系是怎样组织和传授知识的。在集成型体系中，范畴之间界限不太分明，单个的各项一直受到同化，进而形成新的整体；在集体型体系中，各项作为离散的诸要素，以有序的方式被累积起来。伯恩斯坦对这些体系的研究既涉及“隔栅”（即分类体系的性质、分界和维系分界的力量强弱，对之我们认为和模仿层面有关），又关系到“群体”（即符号活动层面的各种结构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接

过伯恩斯坦的诸范畴并对其进行拓展，使之能普遍地用于研究宇宙观和承载这些范畴的符码。

伯恩斯坦的研究工作一直受到误解，因而被证明充满争议，但是，我们打算从中给予强调和采用的那些却并未受到质疑。在英语中，就像在其他语言里一样，人们的确倾向于以复杂句法来标识高级语言，尤其是用到所谓的从属结构，即分句从属于更大整体这种结构。从属现象还能在纵聚合层面见到，（按等级形式得到组织的）差异微妙的词汇对从属性的纵聚合结构做出标识。涂尔干所描述的有机型稳定性同样具有从属特征，所以，我们可以把语言符码中的从属现象视为表示有机型稳定性的透明能指。也就是说，视为表示一个按照等级排序的社会结构的透明能指。简单的句子结构通常在形式上是纵聚合的：分句间联系松散，无论是平行出现还是成系列出现，都不存在句法上的从属关系。单个分句之中的纽带比从属结构更紧密，而单个分句之间的纽带不仅更为松散而且多少不那么精确，从社会来看，这种结构与涂尔干所谓机械型稳定性彼此对应，因此成为表示社会组织模式的透明能指。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转换的多样性，无论在横组合层面还是在纵聚合层面，对于其控制者而言，都是表示自由和权力的透明能指。考察这两类符码的另一维度，与其说同权力有关，不如说同稳定性有关。高雅化的符码对参与者的定位，是认为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世界之间都有距离，因此必须十分清晰。受限制的符码可以涵义暧昧，是因为它们是语境相关的，语境以一条共同纽带把说话者和听话者联结在一起。所以，受限制的符码表示高度的稳定性，高雅化的符码所表示的则截然相反。

伯恩斯坦对教育体系的研究工作主要涉及纵聚合结构这种文化中组织和传输知识的统治性模式。就他的两类符码来说，集成型符码以分界不太明显和维系分界的力量较弱为特征，所以这种符码形式是以整体的凝聚为作为特征的，尽管以这种方式进行凝聚的整体会惊人地复杂，只有精英才有可能把握到。所以，这类符码的意义——作为表示稳定性和凝聚力的透明能指，同它的功能——区分精英和一般人，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相似的，具有明显分界的集体型符码，表示知识和社会的个体化。但是，集体型符码对学习者缺乏权力进行了宣示和强化，因为存在着知识等级，在这个等级中，初学者受到严格限制，而顶端的专业人士又不能全盘把握整体。

在这些事例中，很明显，在脱离其符号活动语境情况下，我们无法解

读嵌刻在符码中的符号。符码是由社会意义建构的，而社会意义并非总是反映相关群体的境遇和结构。这个事实蕴含着对任何符号诊断工作的重要警示：意义指涉并暗示现实。但是，它们本身绝不为现实的性质和存在做担保。最为细致的符号解读，也总是必须有基于使用中的意义具有内在不确定性这一认识的怀疑论来作为补充。

伯恩斯坦的工作更多地涉及表示权力而不是表示凝聚力的能指。关于口头语言中凝聚力的最重要工作，是韩礼德和哈桑对英语中凝聚力的研究。他们所建立的模式，已经被罗切斯特和马丁用于符号诊断。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语言的研究中，他们揭示出在横组合层面（没有意义的关联结构）、模仿层面（没有意义的指涉对象）和符号活动层面（不协调的话语关系），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话语都明显地缺乏凝聚力。同自杀一样，精神分裂症是表示社会秩序坍塌普遍而透明的能指。同自杀一样，它涉及权力与稳定性两个维度中的坍塌。同自杀一样，作为社会危机的表征，它为许多困难所苦。首先，关于这个标签有很大的争论空间，在其发展过程中生理因素所起到的作用也不乏争议。然而，从社会符号学角度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话语汇集了典型的一套表示缺乏凝聚力和失范的透明能指，可以诊断性地用于那些条件，而无论精神分裂症在医学范畴中占据什么地位。

我们可以整理出许多假设来指导诊断性的社会符号学，将其罗列如下：

1. 一个符码本身的语汇能够携带表示权力（秩序/混乱）和稳定性（凝聚/分散）的能指。在该符号的特权场所中，这些意义的在场揭示出它们的重要性，尽管该符码无法为它们的真实性做担保。
2. 在横组合层面或纵聚合层面中，清晰或强势的分界线是表示（群体之内）稳定性和凝聚力和（群体之外）非稳定性和分散力的透明能指，不太明显或力量较弱的分界线所表示的则相反。
3. 凝聚力手段的缺场或断裂是表示抛弃社会关系的透明能指，即涂尔干所谓的自利。
4. 从属结构，在横组合层面或纵聚合层面，是表示复杂的、按等级排序的社会结构的透明能指，即涂尔干所谓有机型稳定性。
5. 并列结构，在横组合层面或纵聚合层面，是表示不太复杂的、具有更多稳定性限制和更强稳定性纽带的社会组织，即涂尔干所谓

机械型稳定性。

6. 从属结构和并列结构的缺场或断裂是表示抛弃各种社会秩序和归属感的透明能指，即涂尔干所谓失范。
7. 转换容易是表示自由和权力的透明能指；思想控制体系中的转换受限，所表示的则相反。

这都是些宽泛的原则，意在引领探索。在来自不同社会和不同时期的不同符码和语言中，体现这些原则的特定形式难以计数。为了阐明这种多样性，我们将考察大量文本。首先，我们来看一幅绘画，图 4.2 是其黑白复制品，这是佛罗伦萨画家契马布埃大约绘于 1280 年的《玛利亚与儿童》。

这是意大利中世纪晚期的一幅典型画作。我们对画的解读针对的是它独特的风格，而不仅仅针对这个单一的文本，而且我们也不打算把解读做到无所不包。我们所关注的，纯粹是那些权力和稳定性的标记，它们是表示诞生了这种风格的社会构成的能指。文本本身被横组合层面的强有力分界线标出。这幅画的外框引人注目，它呈尖角形，上面覆盖着昂贵的金叶。我们继续关注框内的分界。围绕圣徒和天使的光环，不仅将他们一个个封闭在自己的神圣空间，而且将他们的头部和身体也分开了。玛利亚所坐的椅子是一个巨大屏障，她下端的圣徒被封闭在壁龛里。绘画风格是线条式的，运用线条而非阴影来表现形状和人群的层次。所表现的社会关系都相似地呈现为碎片。天使们组成的社会没有内在结构：每一位与玛利亚的关系都不紧密，或者转向一边。下端的圣徒与任何人都没有明显的关系。玛利亚似乎觉察到坐在自己膝盖上的圣婴是在场的，但是，圣婴却没有觉察到她。

纵聚合层面表现出相同倾向。契马布埃原画所使用的颜色种类很少，主要是金色，加上红色和蓝色。这些基本上都属于平淡而性质同一的颜色，以主要颜色为焦点接近。只是在天使的两翼之间有微妙的层次，呈现出粉色和蓝色系列。社会范畴之下，也存在着类似的纵聚合结构。社会世界分为神圣世界（圣徒和天使）和世俗世界；世俗形象被排除在所表现的世界之外，界限无比鲜明。其他范畴是男性—女性（画中只有一位女性），人类—天使。每种类型都与其他类型有着鲜明的差异，但是，如果某个类型中有不只一个个体（譬如天使和男性圣徒），则基本没有差异，正如颜色范畴中基本没有差异一样。



图 4.2 契马布埃，《玛利亚与儿童》，约 1280 年创作：
表示失范、自利和碎片化了的社会形式的能指

无论是在纵聚合层面还是在横组合层面，秩序原则都强势而简单。这幅画左右对称，以上下作为主要部分。两种组织形式都是并列式的而非从属式的。每一种形式都与另一种形式彼此共存，所以这也是一个并列式的特征。相似的，天使们如线上的珠子一般垂直地串成一列，正如圣徒则沿水平方向组成一行，同时，似乎由他们所占据的三个空间，不仅彼此没有关联，同其他画中所表现的空间也没有关联。强势的分界线所产生的效果，加上并列式组织，在作为整体的画中是缺乏连贯性的。用涂尔干的话说，它所表示的是一种严重失范的、自利的、碎片化了的社会形式。

重要的是注意到，如果这些泛泛之谈要具有力量，它们就需要超越这一文本。我们所关注的这些特征，典型地具有一种风格，而这种风格并不是这幅画或契马布埃所独有的。这种典型性表征着强力思想控制规则的在场，这些规则限制了契马布埃的自由，成为他的风格所包含的重要意义。作为比契马布埃晚一代的佛罗伦萨画家，乔托对所有这些思想控制规则做出了改变，并因为他做出的这些改变而被认为是重要画家，所以契马布埃受到的限制并非不可避免（尽管思想控制体系的代际变迁在这里是很重要的），因此也是意义重大的。契马布埃仰仗教会资助，乔托得到了世俗资助人的支持，成了决定风格特质的特定社会因素的组成部分，这正是社会艺术史竭力要阐明的。从诊断的视角看，这些考虑可以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譬如在 20 世纪下半叶，艺术家纷纷为自身强加特定限制，这些限制与作用于契马布埃和他的同时代人之上的限制同样地彻底，但是，它们的“极简主义”——如这项计划所被称呼的——有着截然不同的根源。诊断式解读不能忽视符号活动层面与建构了它的那些力量，因为弄清楚是谁的意义在探讨、谁又在控制它们，始终都是最本质的。

对于契马布埃的画，日期和出处是人们所知道的，这就使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意义和这幅画为之而作的社会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一些作家赞赏中世纪和谐的世界观，但是，13 世纪末的佛罗伦萨却是不和谐的、分裂的。它是一个陷入动荡的城邦。但丁是后世眼中它最为著名的市民，但丁属于盖尔非党的白派，与之相对是盖尔非党黑派，在两派的兄弟的争斗中，他于 1301 年被流放。1266 年黑白两派盖尔非党曾在历经 50 年的夙怨之后联手击败吉柏林党。佛罗伦萨的党派之争猛烈而且公开，政体分裂无法缝合，总的控制结构缺乏力量。直至百年之后美第齐家族建立统治前，佛罗伦萨一直是派系和家族之间的角斗场。然而，在这些夙怨之下，是蓬勃发

展的银行业和商业活动，使得佛罗伦萨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得以维系其作为元资本主义中心的威信和影响。无论可否被算作资本主义形式，佛罗伦萨都具有涂尔干视为通往失范和自利的大部分特质。这个时期的自杀率我们不得而知，可是，但丁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者，却把自杀看做佛罗伦萨的特色产品，并把它同商业主义影响联系起来。契马布埃是如何死的，历史没有记载，我们也无从假设他是自杀身亡。即使在极其失范和丧失凝聚力的社会里，大多数人都不会自杀。自杀率只被涂尔干用作关于社会秩序一套更普遍特质的表征。风格，在艺术、建筑、文学和许多其他符号符码中，都能够提供进一步的指示。某些风格可能被证明比其他的更可靠，但是，即便如此，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证据都可能比单个的指示标志更适合诊断目的。

对于每个文本和每套符号而言，被细读的是谁的意义，被诊断的是谁、是什么，这些问题必须弄清楚。譬如：我们接下来举出的一个文本例子就没有对整个社会进行界定。这个文本是小册子中的一份广告，制药公司制作这个小册子，是为了促销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一系列产品。在符号活动层面，至关重要的关系就是制药公司和精神病医生之间的这种关系，这是两类专业之间的一种商业关系，二者借由病人得以联系，而病人被划为疯子，没有医疗界的帮助和医疗界的认可便不能发挥其作为社会一员的功能。

整个文本有两页，左面配有一幅画（所配说明文字是“氟非那嗪。高危实用”），右面是印刷文本。画中显示的是一位裸体女性的背部，她将胳膊抱在胸前。人像右侧是构图的垂直轴线。画面右上角，一只白鸽飞出画框，右下方是两只药瓶，一支注射器针头斜穿过右下角。一个水平的“Z”形字，三笔将画面分为两个部分。

文本是一大块，正好被置于左边空白处，形成恰到好处的边界，右边空白则比例不当。文本的语言依赖的是医学术语，运用了诸如“高危实用”、“精神分裂症控制”、“肌肉注射”、“临床迅速起效”等等措辞。

整本小册子都采用了配图在左、印刷文本在右这种模式。所有配图都使用了素淡的颜色，而且具有线性风格，我们没有在这里复制它们。从分界线的力度和维系看，文本表现出许多矛盾。配图大部分周围都有明显的边框，但是，鸽子的翅膀以及右下方的线条，却把这一点破坏了。女子的身体被突出地固定在左侧，但是，她的身体轮廓线则被“Z”形注射器从

右边穿透，而鸽子的尾巴重重地落在她的肩上。针头在女孩臀部下面曲折经过，所以看不清楚，让她也变得形象显得模糊，但是，针头跨过氟非那嗪瓶子，所以是半透明的。在文本的这些特征中，我们既发现了严格界限，又发现了越界行为。

我们还可以重构组织该符码的纵聚合结构所具有的一般形式，在这里，我们同样能看到界限和越界。配图所具有的元素既是自然主义的（譬如女孩、针头和瓶子），也是几何性状的（譬如“Z”形和其他线条），既来自情色话语域，也来自医学话语域。表面上，女子和医学物品具有物理方面的真实性，但是，鸽子是个象征，象征的不是精神分裂患者的“精神错乱的—诗歌的”思维模式，就是氟非那嗪赋予患者那种自由。也就是说，鸽子是“主观的—诗歌的”意象，但是，它要么指患者的主体性，要么指医生的主体性。然而针头，形似阳具，相应女子的身形被放大了许多倍，暗示性地曲折经过她那赤裸的臀部，从而也负载了性的意味，这一点，使其作为医学科学话语中医学物品这种划类模糊起来。在纵聚合和横组合层面，我们都能发现界分和越界。这影响到读者如何在符号活动层面得到介入和重构，因为配图在其暧昧的建构中运用到了权力和性别这两种标记。患者被表现为女性，身体赤裸，楚楚可怜，正是男性窥阴癖的欲望所系。并非所有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是年轻女性，也并非所有精神病医生都是男性，但是，被建构的是一种特定的性别关系，在这种医患关系中，权力和稳定性完全纠结在一起了。

但是这张配图被放在左边，由光洁的白纸把它和提供技术信息的文字部分分开，形成艺术与科学之间、情感与理性之间、越界和控制之间的一道障碍。印刷文本充满表示权力与控制的能指。就印刷形式本身而言，每个字母都与众不同、棱角分明，每个单词和每根线条之间的白色空白区域，与话语符码（在语流中声音是彼此相融的）和字迹（它采用了特别的草体）相比，表示出缺乏凝聚力。印刷习惯常常表现为纵聚合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字一个接一个，行一行接一行，整齐地接踵而至。但是，该文本却远没有印刷习惯中可能达到的有序。右边不像是边，所以空白成了那个漏掉的边，似乎充当起图画右边界。词、行、段之间的空间很小，所以会被认为是汇成了一个整块。文本列出三个专门的要点，每个都用格子进行了标记，但是，三个点彼此之间、与文本其他部分之间并没有明显分隔。界限的标记很弱，等级标记也同样如此。

文本语言明显是专业性的，单词很长，多用缩略词，让非专业读者无法看懂。然而，令人奇怪的特征仍然有许多。根据标准英语语法，前三句话的句子不完整。它们没有充当组织原则的主要动词，从而只能被当做并列形式。第一句话的重点是一个破折号，第二句话的重点是一个省略号。排比标记不够一致。三个要点中，第一个是由三个词构成的一个短语，一个并列结构的分句，而第二个是两个从属结构的复句，第三个则是从属结构的句子。不同的分句类型打破了列表形式和文本本身所具有的连贯性。总而言之，无论配图还是文本，尤其是它们二者的结合，携带着许多表示缺乏连贯、失范以及矛盾的能指，它们仿佛成了模仿层面（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与符号活动层面（专家与专家的关系）之中矛盾关系的症候。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专家尚且如此，那么患者又当如何？这个文本提供了自己悖论式的回答：制药公司将自己建构为标准患者，以此说服医生购买其产品。

对社会符号学而言，像这样对一个单一文本进行分析，只会引发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只有在思想控制层面我们才能研究制约行为的那些社会事实和力量。然而，单个意义生产与维护社会统治的意义宏阔体系之间的互相作用，并不能完全预测，也不是不值得研究。图 4.3 所复制的文本，是西尔维娅·普拉斯的手迹，写于她自杀前十天。后来它作为一首诗，发表在作者死后编辑出版的一本书中。

在这个手迹版本中，我们可以从词源学角度，根据标记在纸页上的笔迹对西尔维娅·普拉斯的“风格”进行判断。标题和前三行的字迹相对清晰——字母与字母之间是分开的，单词与诗行之间也留有空间。这种写法是“正确”的，它符合在课堂上受到称道的那种书写标准。然而，随着文本的展开，这些关于清晰的标准开始受到挑战，删除比比皆是，单词和字母挤作一团，诗行歪歪扭扭，节与节之间密密麻麻。几个候选词语同时出现，争夺着结构中同一位置——它有两个标题，居中的是“孩子”，左边的是“瘫痪的陷阱”，最后一节重新起头，尚未抹去的痕迹还在。

图 4.3 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孩子》（手迹）：失范的横组合关联

这首诗所体现的绝望十分真实，这从西尔维娅·普拉斯将要采取的行动（自杀）中就可见到。该文本以这种形式呈现出来的混乱，在课堂上是不可接受的，即使创造性写作跟它一样，常常是凌乱不堪的。不过，这首诗是按照下面的格式发表的：

孩子

你清澈的眼睛是那种绝美的事物。
我想让它满是色彩和群鸭，
新奇动物园

谁的名字让你冥想——
四月的雪花莲，水晶兰，
纤弱的

没有皱褶的花茎，
池塘，里边的映像
想必高贵而典雅

不是这不安
搓动的双手，这没有
星星的天花板。

这种形式中的该文本，产生出截然不同的印象。它以印刷文本，字母是字母，单词是单词，彼此绝无混同，每行之间彼此距离精确，三句成组的每组之间留有间隔。所有这些使得语言具有一种总体的从属秩序，比氟非那嗪那个例子还要明显。该文本维系着原稿中标出的界线，但是感觉却轻易地跨过界线，产生出表示分界线和越界的能指，正如那副氟非那嗪的配图所做的那样。能指通过将该文本归于诗歌这个公认的体裁，使符号行为得以平抑。同时，能指还决定性地让文本摆脱了创造它的那个个人。手迹宣示的是个性性的东西和不受控制的状态，揭示出这一点或许会让人觉得尴尬。以印刷形式出现的这首诗，则通过移除作为有血有肉的社会存在的西尔维娅·普拉斯，对其进行了净化处理。

文本仍保留了她的某些句法标记。两种文本形式的前两行有着连贯的语法秩序和从属秩序，但是，后面却变成越来越不受控制的排比。印刷形式的最后八行是一串难以彼此联系的词组，手写形式的大部分则都是如此。这正是失范的横组合关联，在原稿中更突出，但是在印刷形式中也仍

然可以分辨得出。原稿是以删除为标志的，这一操作，在发表出来的形式中，通过去除表明删除发生的标记，显得更为干净。然而，两种文本形式仍然有一些删除标记。最重要的删除，是西尔维娅·普拉斯之自我删除。在第二行中鲜活的自我（手稿版中明确标出的“我”）之后，她从文本表层之中去除了自己。她的手搓动着，不安、瘫痪，追根溯源，就是她的抹布，她的死亡。这种对自我的去除是表示自杀本身的透明能指。所以，很有趣的是我们观察到，为文学出版而做的常规编辑和准备工作这些操作，只是强化了这些能指，同时让它们显得符合正常而已。那个关于氟非那嗪文本同样删除了施为者，包括精神病医生执行其专业任务的施为活动，以及治疗前后的患者的活动。（譬如“管理”和“控制”拥有“医生”这个施为者，他对“危机”进行管理和控制，而“危机”是患者所具有的，不是他们所施为的。）两个文本中的这些特质并非个性化的，也一般不被认为是自杀或疯狂的症候。相反，这些特质是思想控制规则所规定的，这些规则支撑着许多当代话语类型中的权力语言。

将风格作为症候来研究，如果不论及接受机制的作用，是不完整的。所有上述三个文本都包含表示缺乏凝聚力和失范的能指，作为社会精神的标记，它们可以从症候角度加以观照。不过，一个是备受称道的中世纪宗教艺术作品，一个是一首诗，一个是一则广告。每一个都属于排斥了某类阐释的一个体裁，所排斥的也包括我们在这里给出的绝大部分阐释。艺术作品，尤其是宗教性的艺术作品，被人们说成是属于审美领域，在其领域之内，它们是强烈拒斥对文本的症候式阅读的。关于文学文本不能做症候式阅读这种禁忌，由于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努力，尽管未被打破，还是有了松动。总体而言，文学机构仍然足够高效地监督着各种体裁。而且，心理分析机构也并不鼓励心理分析学家及其成功的商业供应商自己可以充当症候分析对象这种观念，尽管，在该行业意见纷纭的诸群体之中，在各种各样的流行文化之中，这个想法算不上匪夷所思。思想控制体系绝不是不可抗拒的；反之，它们在特定社会中起作用和崩溃的程度，本身就是那个社会所处状态的有趣症候。

第五章　真实的社会定义

探索一种关于模态的总体理论

在日常交际中，我们赋予言谈以何等的重要性显然是关系重大的。一个陈述可以用强调的语气说出，无须附加资格限定，我们就会知道，这是要我们相信其所言为真。或者，这个陈述会带有“我认为”、“可能是”这种保护措施。也许把它说出来的时候是像一个问题一样带着升调，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说话者提出陈述的方式是更具试探性的。也许它说出来的时候是带着大笑，或是用了讽刺的腔调，我们就会知道，说话者根本不信这个陈述。语言学家把诸如“可能”（may）或“或许”（might）这样的词称为情态动词（modal auxiliaries），它们是语言情态体系的组成部分，我们将对这个术语进行改造，使其能够应用于整个符号现象。在非文字媒介中，和文字语言中一样，这都同样会发生。谁都知道照相机不会撒谎，但不幸的是，摄影师和图片使用者是能够撒谎的，而且他们的确这么做了。相比之下，某些体裁被认为在引领人们面向真实的时候更加可靠、更加值得信赖。譬如新闻胶片，就被认为比源自戏剧和小说文本的形象更加真实，某些小说被认为比其他小说更具有虚构性。

这种判断在关于日常生活的实践性社会符号学中的确比较普遍。在决

定符号活动的效果时，它也至为关键，它只在符号活动影响到信念的时候对行动做出限制。彼此充满竞争的各个党派试图强加自己关于真实和现实的定义，将其作为争取社会控制的战场上一个决定性方面。结果，诸如真实和现实这样的术语渐渐获得一种失去了光泽的、让人不无疑惑的意味。它们不是任何人都可吁求的客观的绝对之物，而是特定的参与竞争群体创造并加以利用的前提。由于吁求某种诸如真实和现实这样的东西在意义的社会建构中如此根本，因而社会符号学必须能够对此操作作出理论阐述。但是，由于那些范畴似乎与特定符号施为者有着内在的联系，真实和现实乃是这个施为者的真实和现实，所以这些观念似乎在试图对其加以解释的符号理论中难以实用。

这种手足无措使符号理论陷入泥潭，阻止了它发展出对符号活动中现实和真实的全面而连贯的描述。两种替代性做法是，要么持天真幼稚的现实主义，认为真实和现实都毫无问题，要么持老于世故的唯心主义，认为这些范畴过于困难或不可达成。为了社会符号学目的，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把真实和现实定位为符号活动基本模式中整体所必须的关系和位置。如此一来，它们绝非不可调和，绝非不在符号活动之外，总是受制于某种符号操作中的竞争性力量。在社会符号学中，模态（modality）是用来描述符号操作中施为者立场的术语，指向属于模仿层面那个分类体系的状态和地位。这些包括社会个人、不同位置和各套关系等范畴，按照这种观点，这些范畴同任何其他的一样，都是文化位置或价值观。所以，真实描述的是当符号操作中的社会参与者接受属于模仿层面这个分类体系之时的状况。真实是分类体系中那些术语以及分类体系本身，借用特雷弗·伊顿的说法，对符号操作中的参与者显得“安全”之时诸事务的状况。所以，真实描述的是符号操作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指向在这一操作过程中起作用的分类体系。现实是参与者做出的、关于被认为“安全”并在互动中起作用的那部分分类体系的描述。当参与者准备启用真实这个术语的时候，他们觉得，在分类体系和体系所描述的对象之间，有着完美的契合：一种似乎突然之间就变得透明、自然、不可避免的关系。

社会符号学把所有符号行为和操作都当做社会行为和操作来处理。社会操作中探讨的核心始终是根据稳定性或根据权力对社会参与者、关系、结构、操作等进行界定的问题。符号操作是对这些进行检测、重新肯定、改头换面的手段。因此，无论是在对稳定性的肯定中还是在对权力的坚持

中，无论是在符号体系的再生产中还是在对那一体系的挑战中，权力问题始终是探讨的核心。

所以，从符号学观点看，真实和现实是标志对于时下符号体系状况看法一致与否的范畴。作为范畴，与诸如符码、意义或参与者等其他范畴相比，它们并不算是问题重重，也并非内在地就难于达成讨论和分析。当然，符号学实践自身不可避免的是一种符号行为，无法宣称关于绝对现实的绝对真实，尽管一直是这么做的——就像我们在本句中所做的一样。与其他符号施为者相比，社会符号学家没有必要担当更大的义务。

因而在每个符号行为中，模态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对分类体系“安全”的强调，正是模态操作的一个例子，对其“不安全”的强调同样如此。因而所有言谈（用言语来类比）都是模态化了的。变化只在于模态的运用是要肯定分类体系坚持其真实或其作为现实的地位是安全的，或质疑体系的安全性，挑战其作为真实或现实的地位：譬如称之为虚构而非事实。既然话题核心是参与者与体系之间的契合或缺乏契合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谈及某模态（与体系之间）是高契合还是低契合，或者换个说法，是高模态还是低模态。

通过肯定说话人与听话人之于模仿体系地位的契合，模态表现出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契合，或者缺乏这种契合。契合因而成为稳定性关系或权力关系——倾向于表现稳定性关系或者倾向于表现权力（差异）关系——的指示标志。高契合度指示的是参与者之间的稳定性表达。低契合度指示的是权力差异有待探讨。无论是权力（差异）还是稳定性，都可以通过与模仿体系的高契合模态得以表达。

模态指向知识体系的社会建构或论争。意见一致则赋予体系或体系某些方面“知识”、“事实”的地位；意见不一致则让这样的地位陷入质疑。当然，意见一致和契合有可能由权力的差异关系引起：也就是说，权力更大者有可能在针对权力较小者推行其分类的过程中取得成功。一旦这种分类被接受，稳定性关系便会围绕分类区域而生。权力差异和缺乏稳定性有可能围绕其他区域继续，因而我们所处理的这种符号体系中的权力和知识，就会得到潜在的（也是正确的）认同。结果，模态成了政治斗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指示标记。它是论争的核心方法，不论是靠谈判还是靠强制，它都是意识形态体系得以施展的所在。它为建立霸权体系这一复杂操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而社会施为者的积极参与，以及权力较大

者针对权力较小者纯粹的意义强加，对于霸权的建立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同所有符号一样，模态体系中的符号有自己的历史，这对它们的意义和影响起到了作用。表示模态的能指本身就是携带着先前论争痕迹的符号；它们对一时间的模仿体系状况进行了编码。特定的能指与构成模态体系的所指之间构成的联合，是符号操作的产物，记录着特定时刻的社会关系状况。因此，模态符号，像其他符号一样，是由以下两种东西所双重决定的：能指的先前结构，由社会/符号活动所促成的能指/所指联合。所以，在任何对模态的分析中，问题总是这样：能指结构（及其作为符号的先前意义）是什么？由该能指与该所指的联合所记录的是什么？

为了帮助我们对这一观念和操作进行理论化和展开描述，我们将从口头语言里选几个例子，深化我们从语言学中抽出的模态这个关键术语。按照这种用法，我们正是由此入手的，模态指信息的地位、权威性和可靠性，指其本体论地位，或其作为真实和事实的价值。我们的方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语言学家韩礼德，他对模态这个术语进行了拓展，使其超出了（如“may”和“might”之类）助动词的范畴，将所有具有这种功能的元素都囊括其中——无论名词，“有一个疑点……”；或者动词，“我怀疑……”；或者形容词，“……是非常可疑的”；或其他诸如“也许”、“当然”、“有点儿”之类，如此等等。韩礼德对模态理论的另一根本性贡献，是他坚持认为，模态是他的功能性语法人际要素的组成部分，这与我们所谓符号活动层面是彼此对应的（他的其他要素包括经验/观念要素和文本要素）。论及模态的逻辑学家通常都认定它是假设的一大特性，将其置于（用韩礼德的术语）观念要素之中。韩礼德的理论承认，模态是参与者在言语互动中的关系问题，因而正是在社会领域中进行的，而且模态形式乃是活动于社会语境之中说话人的活动痕迹。

一旦采取了这一步，那么很显然，所有言谈，所有文本，考虑到其社会来源，总是会携带表示模态的符号；考虑到符号活动功能和文本中每一项内容的起源，所有项都会携带这种活动的痕迹，所以就都表现模态。所有具有适当结构的能指，都能与社会性的所指构成联合，以产生出模态符号。口头语言的许多方面，也许是所有方面，都能被看成是在执行模态功能，在建构着参与者及其针对模仿层面各个方面所具地位的看法之间的关系。譬如问题、陈述、命令（模态的传统语法范畴）；时态（过去时，现在时）；指示词（这/那，这里/那里，定冠词 the/不定冠词 a）；所谓语塞

现象（“有点儿”，“嗯”，“呃”，“有些”，“你知道的”，等等）。为了部分地说明这些要点，我们将讨论一则简短的访谈文本。参与者是一位中年男性，一位中产阶层的学者，以及一位“年长的”中产阶级妇女。这位名叫麦克斯的学者在记录针对“什么是语言”“它（语言）是什么构成的”这些问题的舆论调查。他将从修理站取走自己的车，在同修理站老板约翰和希德的访谈之后，他转向一位妇女，这位女士把车开到修理站前庭，正准备给车加油。下面是关于访谈的部分文本：

麦克斯　我们正在制作一档广播节目，有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想请您回答。第一个问题是：你说什么是语言？

妇女　语言……哦，是不同国家的人们进行的对话。

麦克斯　很不错，那——你说它是什么构成的？

妇女　（停顿 8 秒钟）构成是（困惑的语调）……

麦克斯　嗯。

妇女　嗨，我不知道你会说它是什么构成的……它是人的表达，我猜是这样的吧？

麦克斯　我没有答案，只有问题（大笑）。

妇女　（同时——微笑。）

希德　这答案毕竟不算糟糕。

妇女　嗨，它就是一种表达，它应该是人的表达，难道不应该吗？

希德　回答得很好。

麦克斯　非常感谢。

这里，我们不打算弄得非常系统，我们会把我们的评价限制在模态符号及其结构中。（对口头语言中模态详细而系统的分析，参见《意识形态中的语言》一书，以及福勒等著《语言与操控》一书的某些章节。）麦克斯的起句经过了精心结构，以便用特别的方式提出问题：他用的不是“什么是语言”，而是用“你说什么是语言”这种更加复杂的提问形式同时也是针对社会关系地位的提问（作为性别化角色的男性/女性；作为社会建构结果的“中年”对“老年”；中产阶级对中产阶级）。“（如果我要问你什么是语言，那么）你会说语言是什么？”也就是说，从两位参与者的社会地位来看，这种提问形式所表明的是一种低契合度的模态：“我甚至不会

问（因为我无法想以为然地强行行事……并且就算我要问，你也可以要么不回答，要么只做假设性回答）你会说什么。”然而，“什么是语言”这个插进去的问题是由具有高契合度的模态呈现出来的。所谓的现在时是（这个词是高契合的指示标志）“X 是 Y”这种分类/关联性质的结构，其中的 X 和 Y 都断定存在着分类，而且这种分类具有事实的地位。

这里使用的能指，有着与其构成联合的所指相互适切的结构。所以，作为能指的现在时表示时间上的空间关系，因此也就表示可证实性。所以，它的作用是充当表示一种不同的空间关系的所指的能指，也就是社会空间关系，因而具有高契合度，因而成了真实、事实、现实。时间意义上的空间关系能够代表社会意义上的空间关系，而后者又能代表本体论意义上的空间关系，也就是真实。相反，“如果……那么”以及“就会”这种虚拟形式，都是关于本体论意义上的距离、不确定性、试探性等的指示标记，所以可以用作表示社会距离的能指。

但模态结构影响不止于此。在使用提问形式“什么是……”时，访谈者实际上发出了一个指令：“告诉我什么是语言!”这个祈使句暗示出指令发出者/指令回应者这一角色结构。然而这是一种访谈者无法做出断言的社会关系。因此他使用到了表示问题的能指（以疑问句这种句法形式），伴随着信息需求者/信息提供者这一角色结构。这是围绕知识差异建构出的能指，携带着围绕社会权力差异建构出的所指。

访谈者赋予自己的问题的特点是“容易回答”，而在此前对修理站老板的访谈中，他赋予自己的问题的特点是“你可以简要回答的两个问题……”我们推测，这里的关键是相对男性知识而对女性知识所进行的模态化，是男性好动（“你很忙，你可以简要回答……”）相对女性能力不强（“你可能紧张，不太习惯与定义打交道，哪怕你都会很容易……”）这类观念。访谈者称自己为“我们”：“我们正在制作一档广播节目”，但此前访谈修理站老板约翰时，他称自己为“我”：“我正在制作一档广播节目，约翰”。的确，第一人称单数形式适合表达稳定性，而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则适合表示权力、性别或年龄的距离。

我们并不想一网打尽，但指出访谈剩余部分中一些更进一步的指示模态的标记，还是非常有用的。妇女的停顿就是首当其冲、明显的一个。一旦因为重要事务有待决断而需要仔细思考，女性一般会犹豫。这里涉及的是一整套的问题，所以她的犹豫发出的信号是“慎重应答”，这本身就是

表示社会距离、缺乏稳定性的符号。然而，她决定用复述“语言”这个属于模仿层的讨论内容来开始自己的回答，这在这个语境中也是意义重大的：她选择了关注模仿层面，在这里找到了契合，并有可能将其建立起来。然后，她使用高契合度的模态给出自己的定义：“它是人们的对话……”访谈者所说的“相当不错”，属于较低契合度的模态——即“相当程度上，我们似乎不会同意”，尽管这可能是出于访谈者避免把自己打扮成“权威”。受访者的停顿和语调是更进一步的模态符号，正如“你会怎么说……”那样，这个说法移除了由“我”来回答问题的可能性，对于“你”“我会怎么说”，而且还使用了表示虚拟的“会”（would）。反义疑问句“我猜是这样的吧”通过双重模态操作，要求访问者对契合做出明确表示。“我猜”表示假设而不是知识，而“是这样的吧”要求访谈者把她的假设确认为知识，赋予了他这样做的权力/能力。访谈者和受访者两人的笑在这里是有意味的：访谈者的意思是“这不过是一个游戏，一个玩笑”；受访者的意思是“你确信我们能够只把它当做游戏/玩笑吗？”作为此前接受访谈的两位男性之一，希德以“这答案毕竟不算糟糕”坚持了回答的契合，他所用的形式是从认定模仿层面上缺乏契合（“这回答可能是糟糕的”）过渡到对此的半取消〔“这回答不算糟糕，毕竟（这是个女人的答案）”〕。

妇女最后的回答表明，无论在符号活动层面还是模仿层面，对她来说，都不大可能有契合。她用“它是一种表达”这种带有契合模态的断言开始，但随后又补充上“它应该是……不是吗”。也就是说，她把模仿层面上具有高契合度的模态“是”，转换成了低契合度的模态“应该是”，紧跟其后的“难道不应该吗”（wouldn't it）无论在模仿层面还是在符号活动层面都比“难道不是吗”（isn't it）模态程度要低。希德所说的“回答得很好”是他试图坚持高度契合，但那已不再是她会做出的选择。这个简短的交流活动清晰地阐明了关于模态的两个互相联系的要点。首先，模态无处不在，在言谈或文本中的任何地方都会出现，迫使语言符码的所有方面都为模态服务。其次，模态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既反映又组织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与他们基于性别、阶层、年龄和背景的契合彼此呼应。

因而信息的模态不是一个单一或简单的真值。它几乎总是一堆复杂甚至矛盾的主张和反主张。我们在实践中发现，模态标记常常表示的，不仅是最终的模态值，而且是主张的先后序列。譬如在口头语言中，模态助动

词的顺序暗示着判断的顺序，充当着解开总模态值的钥匙。这些主张首先关注的是信息模仿层面与信息表面所指涉的现实之间的适切。这些主张在肯定和否定这两极之间变动。所有模态标记都表示各种各样的肯定或部分否定。这些标记都是联合肯定和否定要素这类行为的踪迹或能指。由于肯定是表示稳定性的透明能指而否定则与之相反，模态综合体所表示的，就不仅是沿模仿层面的信息系列指涉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表示符号活动行为中参与者之间的符号活动关系。这推出了这个根本性的命题：模态值是既属于符号活动层面又属于模仿层面的一种功能，只有参照二者才能得到阐释。

视觉媒介的模态

口头语言研究自身，为面向社会的符号学提供了一种模式，但对于总体的模态体系研究，该模式在一个方面可能起到误导作用。如我们所表示的，口头语言拥有高度清晰的专门化模态标记体系，以及依赖语境而定的运用规则。其他符号符码所使用的模态标记表述得不那么清晰，对语境的依赖性也不那么强。尽管听话人/读者对模态标记的重构与说话人/作者的重构相同不是关键——赋予社会符号体系特征的，是它们的异质性而不是同质性。然而，无论是针对特定语境中语言的模态标记达成一致看法这个层面，还是通过口头语言对该意义做出决断那种可能性，在口头语言的符号体系中都比在任何其他符号体系中更突出。

尽管如此，我们针对口头符码中模态体系所提出的那些主要观点，在所有符号符码中都行得通。视觉文本的读者似乎能够以一种合理的预料方式解读这类文本的模态，而且，尽管解读可能的变动幅度不如在语言符码情形中那么限制严格，但它毕竟受到了限制。视觉文本同语言文本并无二致，都会促成某些模态判断，抵制其他一些模态判断。如果我们从读者/观看者的视角来考察这个操作，就会有利于发展出模态暗示（modality cues）这一更具普遍性的范畴，它既包括专门化的模态标记，也包括语言符码以及视觉符码中模态判断的所有其他基础。

为了阐释视觉符码中的模态操作，我们来分析取自漫画书中的几个页面：开头两页，一页选自《比诺》（见图 5.1），另一页选自《X 博士》（见

图 5.2)。为了做出结论和总结，我们将考察选自特大版漫画书《西部英豪》(见图 5.3—5.5) 中的几个页面。



图 5.1　促狭鬼丹尼斯的世界

《比诺》和《X 博士》都不能判断为现实主义文本，但为这些判断提供基础的模态线索在两个文本中是不同的。先看《比诺》，其画风是一个线

索，似乎表示它是一个“游戏”文本。我们可以将这种风格标识为“非现实的”。用于传递该意味的某些元素，包括简化视角、原画的单色彩（未在此复制）、细节压缩以及一些局部的反常变形。所有这些标识出了这个给出文本和由该漫画所表示的、假想中的三维世界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是一个普泛化模态线索，在用于特定符号活动关系中之时充作标记。对“笼统意义上的读者”而言，即那些与在此所讨论的模仿层面上那套价值观之间没有关系的读者，缺乏现实主义所传递的信号是该文本乃属虚构，以及他们并不是这个符号活动操作中适当的参与者。按照常识性观点，视觉符码中的现实主义是与语言符码中的真实彼此对应的：现实性的视觉表达也可能被视为真实。在这里，视觉符码有胜过语言符码的绝大优势。在语言符码中，表现常常涉及翻译操作（极少数情形中除外），所以，现实主义的效果更难产生出来。因而，譬如电视对新闻的报道比报纸的地位更高。如此一来，笼统意义上的读者能够把缺乏现实主义用作指示他们缺乏与文本中所表现那套模仿层面的价值之间的亲密关系的标记，如此一来，他们便缺乏与持有这些价值观念的群体之间的亲密关系。

画中所有人物都以非现实方式表现，其中，“好孩子们”被画得更具有现实特点，与丹尼斯和他那帮人相比更少变形。他们眼睛、耳朵和四肢的画法都遵循现实习惯。另一方面，促狭鬼丹尼斯的鼻子似乎和嘴巴挤在一起，单单的一只配有两个瞳孔的巨大眼睛径直置于鼻子上。名叫纳舍的那只狗看上去像昆虫、人类和一卷羊毛混合成的东西。总体而言，在这种漫画风格中，角色越顽皮，被画得就越不真实，也就是说，画风的模态契合度就越低。

但是，正如我们对与语言符码相关的真实和现实所进行的讨论，这里，同样的，现实主义是在参与者的符号活动关系中建立起来的。所以，尽管笼统意义上的读者可能判断，这种绘画风格中所涉及的整套模态标记表示出的是缺乏现实主义，而该文本的特定受话人则同样可能断言，自己同该文本及其模态标记之间存在着契合。对这些漫画迷而言，模态标记充当着一种表征，表示他们与文本所体现的模仿层面价值之间的契合。在他们眼中，这个世界是作为针对现实世界的反世界存在的；视觉模态标记是这个世界的符码，它是一种反符码，与韩礼德所描述的语言与反语言之间那种关系非常相似（参见本书第 4 章）。所以，《比诺》的读者既对文本模态标记及其意义做出判断，又对（这些标记所表征的）从现实世界到该文

本建构的对立之间的距离做出判断。《比诺》这个文本允许读者从缺场的现实性文本那个虽然缺场却是强烈暗示出来了的世界中来建构对立和差异关系。

这使我们能够解释一个明显的悖论。丹尼斯和他那帮人被画得不那么真实，他们的动机和行动却似乎更为可信，或者与《比诺》的读者更能有契合，远胜过那些软蛋——他们对“ya”之类语词充满恐怖，无能到连一本书都搬不动。不那么真实的风格在这里是同更高契合度以及更大可信度彼此关联的。但是，在促狭鬼丹尼斯的反世界中，现实主义是表示被其所反对世界的能指，所以表示与被其所反对的、真实的世界价值观念之间存在契合；而离开现实主义，则表示与同其相互对立的那个反世界的价值观念存在契合。因此，把好孩子们画得更为真实，就能够表示他们的异样和他者特色，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反世界中的丹尼斯和他那帮人所反对的世界。

所以，这幅漫画既建构起自身世界模仿层面的价值观念，又建构起一个模态标记体系。这样一个凸现而出的文本，建立起了模态判断的根基，我们将称其为锚文本（anchor text）。《比诺》的读者明白如何阅读这样一个锚文本：不是用一种直接的方式，而是将其作为的符号活动关系所具有的一种功能——把信息制造者和接受者彼此以及其他符号活动连为一体。丹尼斯是一个具有真实性的角色，和那些讲英语的白种年轻男子，共同享有这个世界的许多方面。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包括画顶端的促狭鬼丹尼斯粉丝俱乐部告示），读者被邀请认同丹尼斯，这起到了把他们自己的现实与丹尼斯的现实关联起来的作用。所有这些手段都有助于赋予文本，尤其是中心角色，一种现实性。

正是在属于这种性质的基线上有了绘画风格介入，它将整个行为标记为笑话，无须当真，丹尼斯及其行为更是如此。这充当着对信息一种乏力的否定，对此很容易看透。被否定的是顽皮，顽皮是以一种温和的形式，对正统人物——中产阶级的父亲们及其中产阶级的儿子们——表示敌意。如果该漫画的行为被看做刺激《比诺》读者们的调皮行动，那么这种风格就部分地起到了作用，尽管没能完全做到。在绘画风格的部分否定之下，我们仍然能够见到模仿层面的内容。这种风格对其进行了部分地折中，但的确只是部分地起到了这种作用。

漫画《X博士》具有相反的模态结构。其表现的角色和场景有意识地



图 5.2 《X 博士》的非真实世界

让我们全然不熟悉，属于一个外于此世界的虚构之地。但是绘画风格运用了精确的细节和具有三维特征的能指，以此表示高度的真实主义，而且艺术家还将一些熟悉的物品插入这个陌生世界之中。《比诺》试图从现实世界的现实价值逃离的地方，正是漫画《X 博士》试图为其非现实世界赋予

高度模态契合的地方。但是，两者不愿将其风格所表示出的模态价值强行作为最终价值。

模态标记，在视觉符码中，如同在语言符码中一样，都被阐释为一种综合体，其意义是一连串的模态。模态判断中的关键阶段依赖的不是模态标记，而是对常规符号活动模式的指涉，这个模式包括关于符号制造者和信息的假设，以及关于可行的一套表现现实方式的假设。这些假设难以阐明，因为它们既不在文本之中，也不在现实本身之中。然而，对一种单一文化而言，譬如产生《比诺》和《X博士》的文化，某些泛泛的说明是有充分共性的，以致我们可以说，《比诺》为它的青少年读者提供了一种对现实世界的非现实观照，而《X博士》则相反。两者相比，《比诺》现实性更强。

两种策略所涉及的，不仅是它们与读者的现实之间不同的关系，而且包括符号活动层中不同的社会组织。促狭鬼丹尼斯直接向他的读者呼吁："欢迎加入我的俱乐部！"对共通现实的共通倾向，让读者没有什么门槛就融入到一个具有稳定性的群体之中，而且稳定性关系暗示着某种真实。文本的内容，伴随着相对父母和非稳定同龄人那种同龄人群体的稳定性，有可能显出颠覆性，但这种颠覆力却被这种绘画风格的模态所削弱，进而化险为夷了。这里不重要的是模仿层面价值观念之于该读者群的契合。这里重要的是在促狭鬼丹尼斯这个人物中，该读者群体的模仿层面价值观念与另一群体之间的契合。绘画风格的模态标记表征了这个问题。在《X博士》中，所表现世界和日常世界联系模糊，而有利于融入的高模态度信号所起的作用，是强化了对于异域世界的焦虑。这里不重要的是一个读者群体的模仿层面价值观念与另一读者团体之间的契合。这里重要的是模仿层面的价值观念对于任一读者群体的契合。现实主义模态标记表征了这个问题。由《比诺》的模态形式所描述的这个社会是一个联系松散的开放群体，但是《X博士》所描述的社会是一个个体化了的精英。由于具有语言模态综合体这种结构，诸如此类的文本模态表示出一连串模态操作，渐渐地，这一连串模态操作又表示出一种社会关系。

这里，我们再进一步地简要给出几个关于漫画视觉符码中模态操作的例子。特大版漫画书《西部英豪》有14个故事。其中一些英雄号称是有真实的历史身份的，譬如"野牛"希柯克、戴维·克罗凯特、杰西·詹姆斯和丹尼尔·布恩。其他人物则是虚构的，也许只是为这个漫画系列而创作

的，或只在此场景中才受到关注：科里·比尔、“边疆领袖”鲍勃·爱伦、“切耶尼小子”和女英雄“双枪李尔”。最后还有最难归类的约翰·韦恩，在两个故事中他都是主角。约翰·韦恩——戴维·克罗凯特——双枪李尔这个组合本身就十分有趣，暗示着一个由平等现实身份组成的看不出时间的世界中的各种模态的相互融合。只有丹尼尔·布恩的故事提供了精确的时间：1776 年 7 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只有一个故事中有女性主角——双枪李尔。只有丹尼尔·布恩的故事中的女性配角被给予了名字。在故事最后，两位男主角的三个女儿获救，全书以她们的婚礼作为结束。

因此，一些重要范畴就是时间/历史/因果，以及性别。现实主义表现模式与具有高契合度/现实/事实的模态之间的等同关系，在这里，如同在关于前面两个漫画的讨论中一样，发挥着作用。所以，涉及约翰·韦恩的两个故事是用了一种接近摄影的现实主义风格来刻画的，表示出漫画文本和“的确”以约翰·韦恩作为主演的“真实”电影之间的紧密契合，却不保证作为演员的约翰·韦恩具有现实性，西部背景和情节具有现实性。涉及戴维·克罗凯特的故事是用了一种很粗疏、“非现实主义”的风格来刻画他。

模态线索利用到规模不大的一系列透明能指。因此集中而细节化的形象可以代表现实主义或空间关系，而现实主义或空间关系又代表现在时间，现在时则代表着事实性。缺乏细节和集中的形象代表着非现实性或距离，而非现实性或距离又代表过去时间，过去时则代表着虚构性。我们从三个故事中分别挑出画面并复制在这里，其中戴维·克罗凯特的故事（图 5.3）源自 18 世纪中叶，“野牛”希柯克的故事（图 5.4）源于 19 世纪中叶，双枪李尔的故事（图 5.5），相比前两个故事，可以被解读为看不出时间，或者发生在“当代”，尽管这个故事可能和约翰·韦恩的故事有着时间上的临近性。就视觉模态而言，三个故事形成了一个系列，从最不集中、最不现实的戴维·克罗凯特的故事，到更为细节、更为现实的“野牛”希柯克的故事，最后再到现实主义风格的双枪李尔的故事。



图 5.3　穿过时间迷雾的戴维·克罗凯特





白人们追踪着野蛮人的酋长，想要抓住他。以便永久终结叛乱……



但戴维深知这毫无希望……他们永远没法在森林里抓住这位溪流部落的酋长……而且，既然战斗结束了，他想要做的事情有很多……



但在他离开之前，他还有个人要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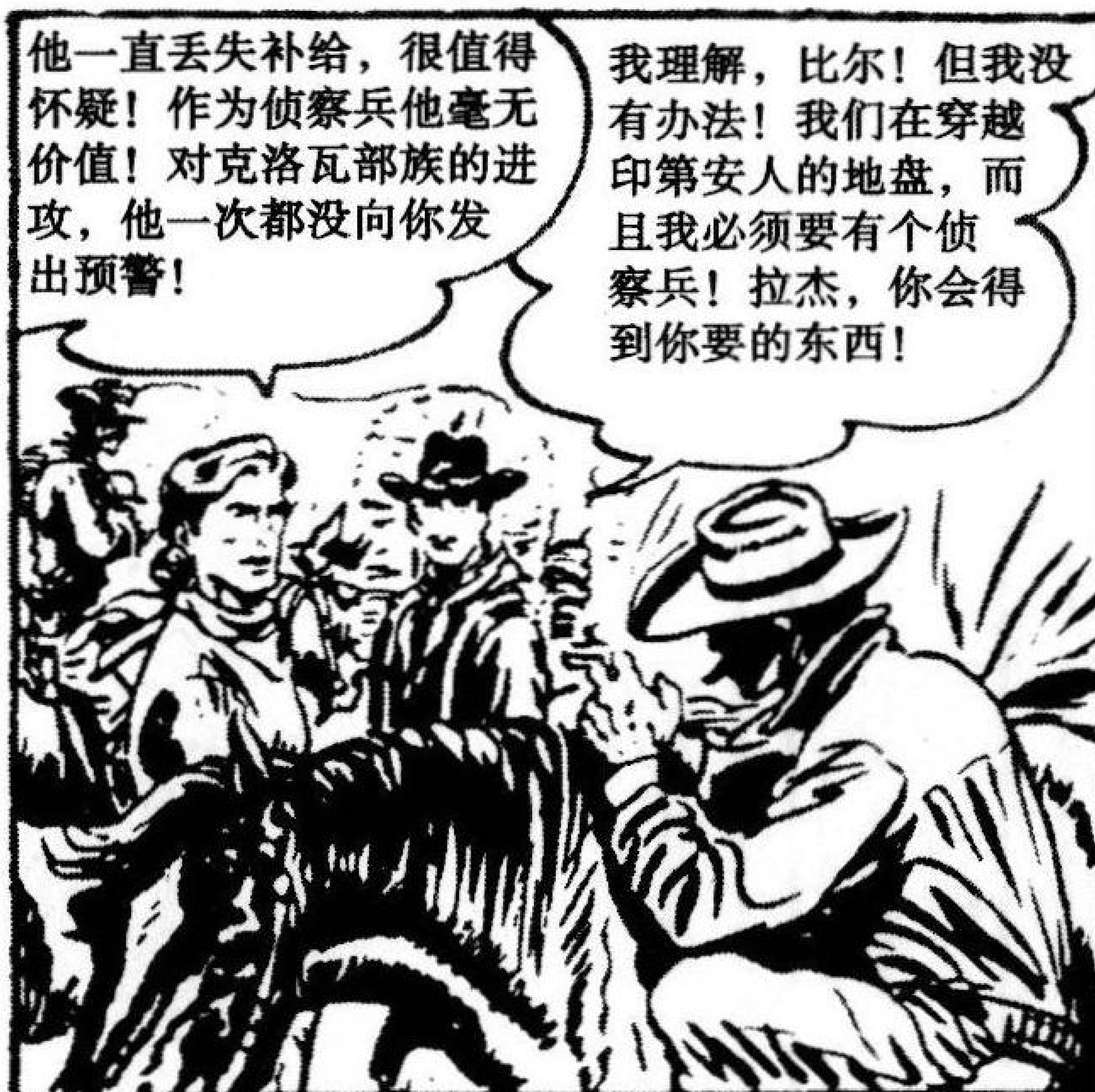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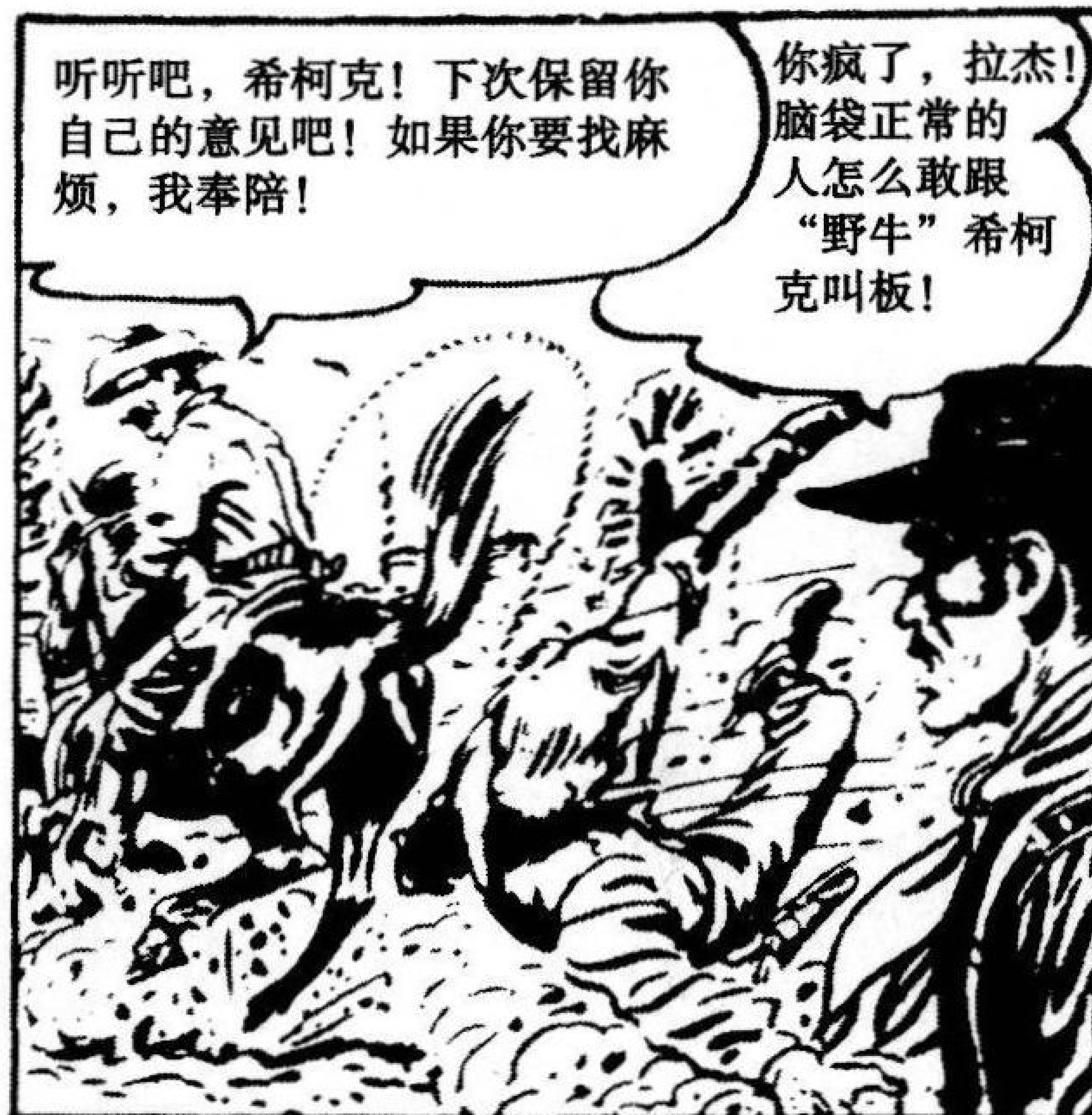
既然暴动已经结束，戴维可以回到他最挚爱的……田纳西乡村……和他的家人……做一名与印第安人搏斗的勇士固然不错，但生命中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图 5.4　踏上危险之路的“野牛”希柯克


他一直丢失补给，很值得怀疑！作为侦察兵他毫无价值！对克洛瓦部族的进攻，他一次都没向你发出预警！
我理解，比尔！但我没有办法！我们在穿越印第安人的地盘，而且我必须要有个侦察兵！拉杰，你会得到你要的东西！


听听吧，希柯克！下次保留你自己的意见吧！如果你要找麻烦，我奉陪！
你疯了，拉杰！脑袋正常的人怎么敢跟“野牛”希柯克叫板！


我不管他是谁！我要把他的傲慢踩在尘土里！
这可是你自找的，拉杰！


嘿！


呀哦！


砰（枪响）


我，我的裤子……
砰（枪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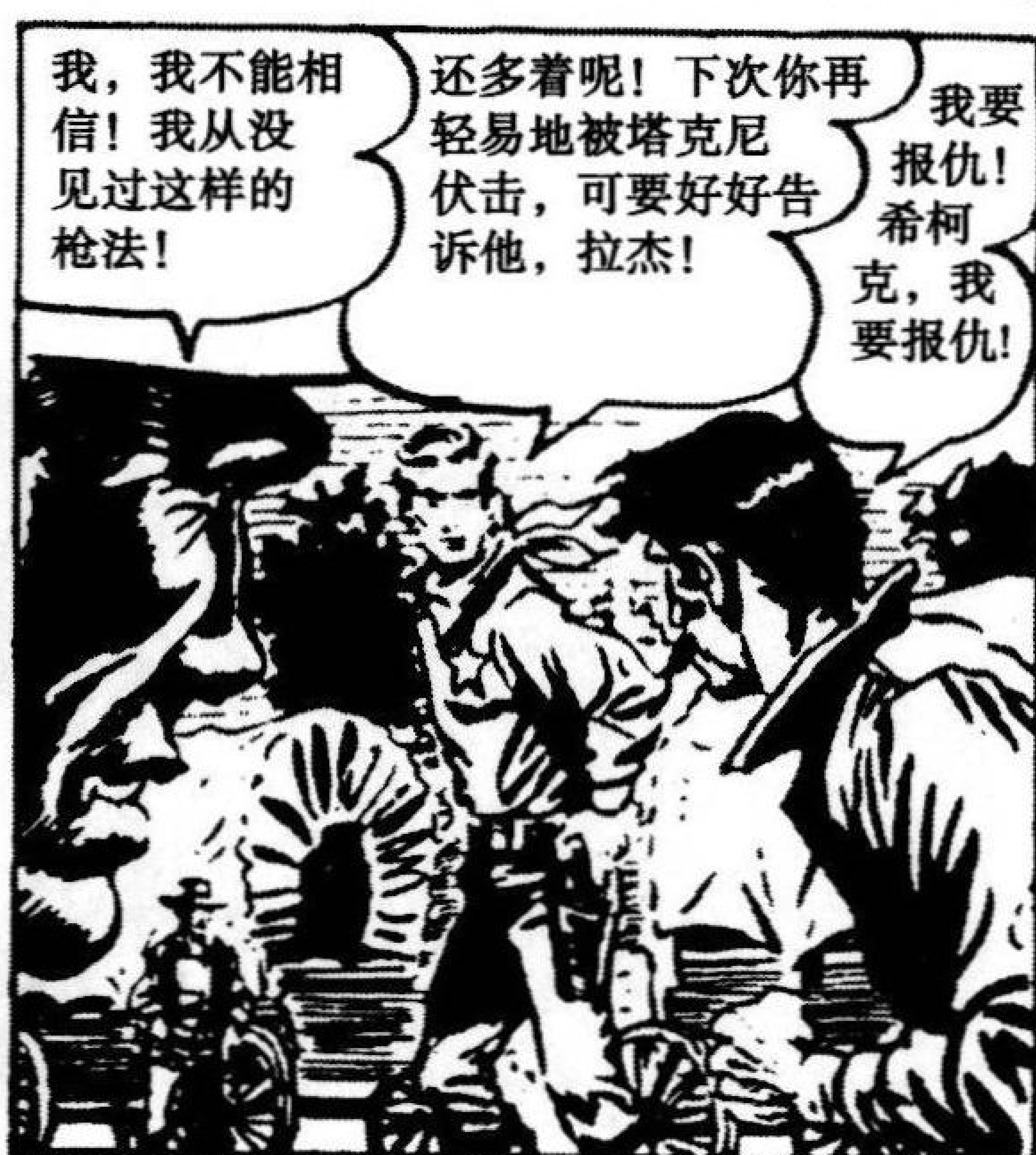

我，我不能相信！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枪法！
还多着呢！下次你再轻易地被塔克尼伏击，可要好好告诉他，拉杰！
我要报仇！希柯克，我要报仇！



图 5.5　双枪李尔提出的性别问题


穿成这样她跑不掉的！把她关到格鲁格斯妈妈的饭店里，不要告诉任何人！然后叫卫兵撤离监牢！
我希望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李尔！
李尔一人留了下来，她从提包里取出一些东西来……
莱西娅的脸和我不大一样。但如果我扑上粉，再化一下妆……再抹点儿……
这假发太有用了！天色黑下来的时候，也许这种伪装就会行得通！
夜晚……
嘘！莱西娅！
喂！
我没看到卫兵！他们在那里？
他们去庆祝了！趁他们没回来，把我弄出去！
我们用马把窗闸拉下来！加油，伙计们！
好了，现在带我去见艾特！
这匹马没人骑，跳上来，我们出发！

于是，历史距离可以由绘画风格的模态得到极其清晰的表示。戴维·克罗凯特被赋予“神话人物”的视觉模态，在时间迷雾中或隐或现。但绘画风格所表示的不仅是这一点。同样一套能指表达出模态价值和模仿层面主要范畴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将考察其中两种：自然/文化范畴，男性/女性性别范畴。

在建构其特色的模仿性宇宙观的过程中，西方体裁为自然/文化的对立赋予了专门的意义。当代城市读者的世界被迫性地文明化，为此，自然/文化的对立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贴近自然的过去的世界。但是，通过充满敌意的环境，通过“野蛮的”印第安人、天性中的贪婪未得驯化的坏人，表现出来的那个边疆世界，那个作为文化载体的人（白人，男性）与自然之间斗争的场所，同这样一些范畴相比，自然/文化的对立所占据的不过是一个边缘位置。这种符号活动层面和模仿层面的意义含混，使表示自然和文化的能指具有暧昧的模态价值。自然是一种普遍的、不受时间影响的价值，现在受到了暂时的压抑，或者说是一种虚妄。文化是人为的、虚假的，或者是“像我们一样”。这种含糊其辞可以尤其清晰地在戴维·克罗凯特这个例子中看出。印第安人是待射杀对象，是用模糊轮廓表现出来的，几乎与树木和灌木丛无法分别，而戴着浣熊皮帽（=自然）的戴维·克罗凯特，则比杰克逊将军还要真实。在这个特别的故事里，当缺乏现实性的印第安人遭到屠杀后，（用细节化的、现实主义的技法）描述他们的酋长红棒子决定逃跑，撤入森林（自然）。这支军队（文化）试图在森林找到他们，“但戴维深知这毫无希望”。他离开了自然和文化这种极性化，最后一幅画中，一位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向返回的戴维·克罗凯特挥手作别。“既然暴动已经结束，戴维可以回到他最挚爱的……田纳西乡村……和他的家人……做一名与印第安人搏斗的勇士固然不错，但生命中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这个结尾不仅重申了家庭生活意识形态，而且赋予其全然真实的模态价值，仿佛现实创造者规划了故事本身的虚构色彩。就这样，意识形态被建构到模态格局之中，而模态格局使得意识形态自然而然。

性别是这一体裁中更难以追寻的范畴，因为它常常在特色缺场的时候显得意义重大。模仿层面的平衡（14 个故事中有一个有女性主角，同时，只有两个女性配角有名字）反映出符号活动状况：它们是供男性阅读的关于男性的故事，关注的是要独立地建构男性身份。但是，其中一个故事打

破了这一体裁的通常模式，从而凸显出了性别问题：双枪李尔的故事。它的与众不同，不仅仅在于它有一个女性主角和一个女坏蛋。它具有特殊的风格元素，既表示故事主体的性别，又表示赋予该体裁中性别的模态。

我们将集中关注两套透明能指。一个是画幅的尺寸。双枪李尔的故事平均每页 7.5 幅画（相比之下，约翰·韦恩平均每页 6.5 幅，戴维·克罗凯特为 5.5 幅）。画幅尺寸较小表示亲昵、家庭价值、女性特色。就该体裁自身的模态而言，它的模态契合度高而地位低。相对而言，画幅尺寸较大表示史诗、公众、阳刚，属于模态契合度低（与读者的世界极为不同）但地位高。另一个不同之处是绘画的风格。双枪李尔中，风格是线型的，线条清晰而连贯，毫不含糊地表现出人物、物体和关系。戴维·克罗凯特故事的边界是模糊的，大量使用阴影和重叠，并以看似不合理的突兀线条或空白打破了整体构图。这一差异可以用于区分该体裁中的性别——女性意味着清晰、精确、理性和文化，男性意味模糊、力量和非理性。它还提供了一种复杂的双重模态，既适用于双枪李尔的绘画风格（相比戴维·克罗凯特的故事，它在模仿层面上更具现实性，但在符号活动层面上契合度更低），又适用于该体裁更为寻常的风格。

我们在阐述我们关于视觉媒介中模态的讨论中，只谈到了漫画这一种体裁，我们要表示的是，在此体裁中存在着还具有进一步特色的体裁，每一种都有自己的模态特征。显然，当我们对其他视觉门类进行考察，情形会更为复杂：各种各样的艺术（绘画和雕塑）、电影、电视和印刷媒体。这里，我们将总结出能用于更多领域的视觉媒体的一些普遍性原则。

1. 作为符号活动活动（文本制造者和接受者、文本和指涉对象之间的关系）的透明能指，视觉文本的许多特征都发挥着模态线索的作用，表示出作为具有或高或低契合度的文本或文本一些部分的地位。
2. 视觉文本暗示出模仿层面的内容，该内容作为锚文本，基于它同对其模态做出判断的任何人所具有的经验之间的契合，而具有模态价值。接受者与模仿层面的内容、与文本和制造者之间的关系定位方式非常多样，既然如此，那么，文本的模态价值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要取决于接受者的立场和取向。
3. 由于模态能指是从符号活动层面和模仿层面的意识形态范畴中建

构而出的，因而模态和意识形态可能相互作用，意识形态分配模态价值而模态使得意识形态价值合理化。相反，抛开文本或体裁的意识形态价值，人们会对其模态重新划分方面的大动干戈。

4. 不同的体裁，无论是按照媒介划分（譬如漫画、卡通、电影、电视、绘画），还是按照内容划分（譬如西部片、科幻片、言情片、新闻片），都会建构起各自特定的模态标记，以及充当体裁基线的总体模态价值。这一基线，可能随不同类型的观众/读者而不同，随不同文本或者文本中的某些方面而不同，但是，这些差别本身则从它们与该体裁的基本模态价值关系中获得了意义。

处于危急之中的模态

在考察模态形式和符号活动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方面，格雷戈里·贝特森就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框架。贝特森把精神分裂症看做实际上是关于模态体系的病理学，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甚至连自己的思想和交流都无法标识，更不用说谈及别人的这些方面了。于是，这使他发展出一种关于模态的普遍理论用来解释这种现象。在这项任务中，他首先观察人类和其他物种的“游戏”，譬如猴子。在这些物种中，诸如威胁之类的行为似乎很危险，然而其他动物做出的反应则是将其视为“游戏”，并非当真。制约这种反应模式的是一套信号——表达、姿势、实施行为的方式——它们用游戏模态来标识这种行为。贝特森没有使用模态这一术语来描述这些信号。他的术语是元交际（metacommunication），将此看做关于交际本身的交际。在对其模态理论的拓展中，贝特森采取的步骤是将此看做非人类交际活动的属性，它在某种意义上对交际体系是基础性的，如果起点是语言学和模态助动词的话，它是不那么明显的。

根据他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交际问题所进行的反思，贝特森提出假设，认为对元交际功能的中断是最为重要的决定性特征。他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特殊元交际样式看做实际上是针对家人相互作用的很有道理的反应，他称之为双重束缚（double bind）。他得出结论，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里，患者成长过程中暴露于父母充满爱与憎（稳定性与非稳定性）的双重信息交流之下，但是患者不仅仅将此作为矛盾情感进行体验。这种

父母交际的典型模式，是言辞说的是某东西（譬如，“我爱你”），而其他元交际信号所述说的东西则恰好相反（譬如说话腔调冷冰冰的，说话时身体后缩）。元交际不是对语言信息进行一致性标识，而是取消语言信息。但是，如果儿童试图把语言信息按其反面做出阐释，元交际信号表明这也是不对的。在这种情况中，元交际令人沮丧地被证明不可靠和充满矛盾，于是孩子就会学着将它置之不理，发展起一种不同的体系来。

精神分裂症激起了社会符号学的普遍关注，但对其起因，尚存在未被解决的争论。一个思想流派坚持认为，患精神分裂症是因为生理方面的问题。也许某一天，他们的理论会被证明是对的，并且我们会辨识出产生精神分裂症症候的特定化学物质或基因。但即使如此，对于研究处于危急之中的模态而言，精神分裂症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分析对象。酗酒是一个可做比较的现象。没人怀疑酒精是具有特定生理作用的药物，会产生对现实的扭曲。但是，酗酒在不同的社会里具有不同的形式。不同文化中的酗酒发展出依附于各种社会关系样式的特定模态结构，而这些操作和效果可以由社会符号学来进行有益的研究，无须否认酒精作为物质材料所具有的作用。贝特森的重要性不在于他发现了精神分裂症的起因或治疗方法（他并没有做到），而在于他揭示出，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和非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神经中枢都是存在的，它存在于交际形式和特定的相互作用样式之间，而模态样式正居于这套效果的中心位置。用我们使用过的术语来说，他揭示出，模态可以成为投射到模仿层面的符号活动层面所具有的效果。社会关系样式可以成为定义现实和真实的动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文本可以阐明这些常规的模态操作和关系，恰恰是因为它们将其带到极端。

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展开分析的文本，是一个精神分裂患者写作的样本，它被收入一本关于精神分裂症的书中。

我看到蛋糕吗我做的是行动的相反吗
是的我从感官上觉得被欺骗了吗
心理暗示中的思维在增强
暗示中的感觉
在在欺骗欺骗欺骗
欺骗
香草柠檬作为柠檬香草作为开始

在在暗示暗示暗示的
暗示的暗示作为
暗示中的开始
柠檬香草作为不可相信的
理由作为柠檬作为暗示中
暗示暗示暗示的
暗示
非暗示
我看到我在暗示中做的吗

阿里耶蒂医生对此的解释如下：

这是一个典型的词汇拼盘和定式。我们读到的第一印象是，它纯粹是一派胡言。我们还对词汇重复留下了深刻印象。至少，让我们来尝试把握这个夹缠的意义。

这位患者全神贯注的是他所无法理解的现象：他的感觉可靠吗？或者他经历了心理暗示吗？他所经历的世界充满喧嚣，是碎片化的、无法确定的。几乎所有他观察到的东西都引领他在两种可交替的结论或象征中徘徊，它们对于囊括其他一切这个关键点变得十分突出：欺骗感或心理暗示。换句话说，他是欺骗了他的感觉的牺牲品吗？或者他经历了来自自身或外部世界的心理暗示吗？几乎所有东西都是用这两个定式性的概念来感受的：欺骗和暗示。他经历了奇怪的现象。“我做的是行动的相反吗”即“我做了与我想做的事相反的事吗”。然而，还是有些东西像现实岛屿一般，尚未被欺骗和暗示性的汪洋吞没。“我看到蛋糕吗？”他问自己；那是某种可触摸、具体的东西。后来他看到柠檬和香草，这些有色彩的、令人愉快的物品，借助抽象的语言，从混乱的海洋中凸显。心理暗示似乎战胜了欺骗感。患者似乎承认，麻烦就是暗示，同时作为事实，对暗示这个词的重复具有一种富有暗示的品质。

这个文本是对感觉精神分裂写作的权威指南，我们此刻将用到它。正如阿里耶蒂所分析的，这种感觉读起来就像是对真实和现实成问题的地位所进行的深刻反思，尝试的是一种寄望于身体感觉的解决方式。但是，这种感觉并不立刻可见，文本让大多数读者印象最深刻的正在于明显缺乏感觉。文本表明顺序是随机性的，阿里耶蒂称之为词汇拼盘（word-salad），

这是精神分裂患者的语言和思维特征。但是，如果这些话并非随机的，如果它们都有意义，而意义正如阿里耶蒂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必须将其理解为经过强烈转换的文本。如阿里耶蒂那样，为了对“欺骗感”进行阐释，我们可以投射出“这些感觉是欺骗性的”这样一种更完整形式。这是与关于普遍真实的模态相关的一种形式。但是，这种相关形式渐次地可能从先前转换形式而来——“（我的）这些感觉欺骗了某人（我）”。我们无法猜测这种转换可能会有什么模态：“（我的）感觉可能/也许/大概/有时/将/欺骗（了）……”相似的，“受欺骗中”可被解释成“X（可能）欺骗Y”的转换。其他似乎已经发生了的转换操作包括了将“暗示”和“不消化”融合，形成了“受暗示中”，在通常的语言中，这似乎是个双关语，带着这样的蕴涵：做出暗示这一操作，如同不消化一样，可能是身体上的、令人不快的。

以这种方式改写整个文本是可能的。结果可能产生一个每一点上都有意义的文本，只要顺着阿里耶蒂的总结中所指明的路线反复冥想就成。这种感觉可能部分地成为我们自身建构的一部分，是关于该文本定然有意义——有这种意义——这种先行假设的产物。同样的，做出这不过是疯话这种先行假设的人，不会费尽心思去进行这些转换方面的颠倒，可能很不相信我们解读的可行性。所以，我们的解读并不具有绝对地位。但是，这一点是它与所有阐释行为所共有的，它所运用的语言操作，也是在常规英语中极为常见的。

如果我们的解读正确，那么，这个文本与非精神分裂患者的英语有两个主要的不同。其一，以删除为主的那些转换操作使得意义几乎不可把握。这种感觉正是我们所谓的锚文本，与促狭鬼丹尼斯所暗示的那个后院世界彼此对应。我们的阐释认为，这个精神分裂患者进行了构思，而且可能写下了关于那个文本的、透明的模仿层面的形式，清晰而直接地表示了一种现实面貌。然而，由于无数插入的转换，他几乎完全把锚文本中的一切都弄得含糊不清，使我们如此困难地对其加以猜测。但是，转换不仅影响到锚文本的清晰性。它们取消了几乎所有英语句子中必要的模态标记。头两行之后，根本没有完整的动词，到最后一行都没有。英语中的动词是模态助动词的主要位置，也是同样具有模态功能的时态标记的主要位置。最后得出的文本几乎没有表明文本该如何解读以及它对于作者有着何等意义和重要性的任何模态标记。所起到的效果，用语法术语讲，就是等同于

精神分裂患者语言中典型的无起伏的语调和没有抑扬顿挫的语音。重要的是作者开始和结尾都用到了系列问句形式，却没有使用将它们标识为问题的问号。

这系列转换具有双重效果，服务于一个充满矛盾的目的。通过模糊自己的意义，精神分裂症患者断绝了与精神病医生的联系，从而表达出一种极端的非稳定性形式。但是这仍然提供了一个文本，让精神病医生有机会破解符码（就像这里一样，他相信自己做到了这一点，至少是完成地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文本具有至为关键的模糊性，将那些无法理解的人强烈地排斥在外，将那些人数很少的、关系亲密的精英人士包容在内。结果就像把《比诺》中变形的表层和《X 博士》锚文本的模糊模态合并为一处。《X 博士》的模态策略创造出追随者义无反顾的崇拜，精神分裂症患者则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爱好者俱乐部之中。模态标记的压抑使得读者取向不明，掩盖了交际地位，使文本在符号活动层面和模仿层面都无法安身。这两种特质都支持了贝特森的主张，即精神分裂患者语言的符号活动形式被进行了理想的改造，以便表达一套复杂而模糊至极的社会关系。表面上和真实与现实相关的语言特质，只有被共同选择为针对社会关系本身做出交流的方法，才可以得到阐释。

模态和控制

社会控制靠的是控制如何对被认为是判断和行动基础的现实进行再现。这种控制可能直接运用于在符号活动操作中流动的模仿内容，或者间接地通过对模态判断的控制而得以运用。任何控制模态的人，都可以对选出哪种关于现实的说法作为符号活动中的有效说法进行控制。所有其他说法能够短期存在，但是，从长时间来看，却被剥夺了力量，除非一个群体拒绝让这种力量受到否决。对模态的认可，最终根源在于一群人的一致看法。

桑松研究了一类群体的模态操作，他们是澳大利亚达尔文的边陲地区土著居民。在居住在达尔文郊区瓦拉比·克洛斯的这群人中，按照桑松的描述，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模态类型。其一以“那个说法”（the word）（或者“直接的经历”）为特征，是得到接受的真实和官方版本的现实。这与

"有人说"相对，因为"有人说"不过是大众舆论或谣传。确立"那个说法"的操作是漫长的、受规则制约的。首先有"细节核查"，在此之中，证人不断搜集证据，形成一种加油添醋的版本。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完整的故事得以浮出水面，它比那种添油加醋型的叙述要紧凑得多，并且得到了强有力的社会认可。桑松描述了一件事：营地的女信使之一向营地首领传递"那个说法"，而首领在这之前已经冒犯了营地模态，这时，尽管他在这个营地中的地位崇高，他只能是恭顺地默默倾听，完全被隔绝，形单影只，女信使对他所用的语言也丝毫不含尊敬之意。在瓦拉比·克洛斯社会中，一旦一种说法获得了这种地位，那么，采取与之不同的说法，或者说似乎是以一个不同说法作为行动基础，就会受到禁止。曾经可以通行无阻的细节不复存在。不在事发现场的人，也不会得到独立的目击者们那些说法：只剩下不可穿透的"那个说法"，一种具有绝对模态力量的表述，它之所以有这种力量，是因为它被剥夺了转换历史，剥夺了它的形成过程，同时，不同说法经过修改和重铸也被置入"那个说法"中的适当位置。只有在目击者的记忆中，某种与之有异的经验才能得到保留。对于这些目击者和参与者而言，存在着两种可能共存的真实，但是，他们毫无疑问地都明了哪种真实能够在社会上行得通。持异议的代价是被社群本身排斥在外——这在瓦拉比·克洛斯得到了有力佐证，在这里，群体的稳定性大约就是生活所给予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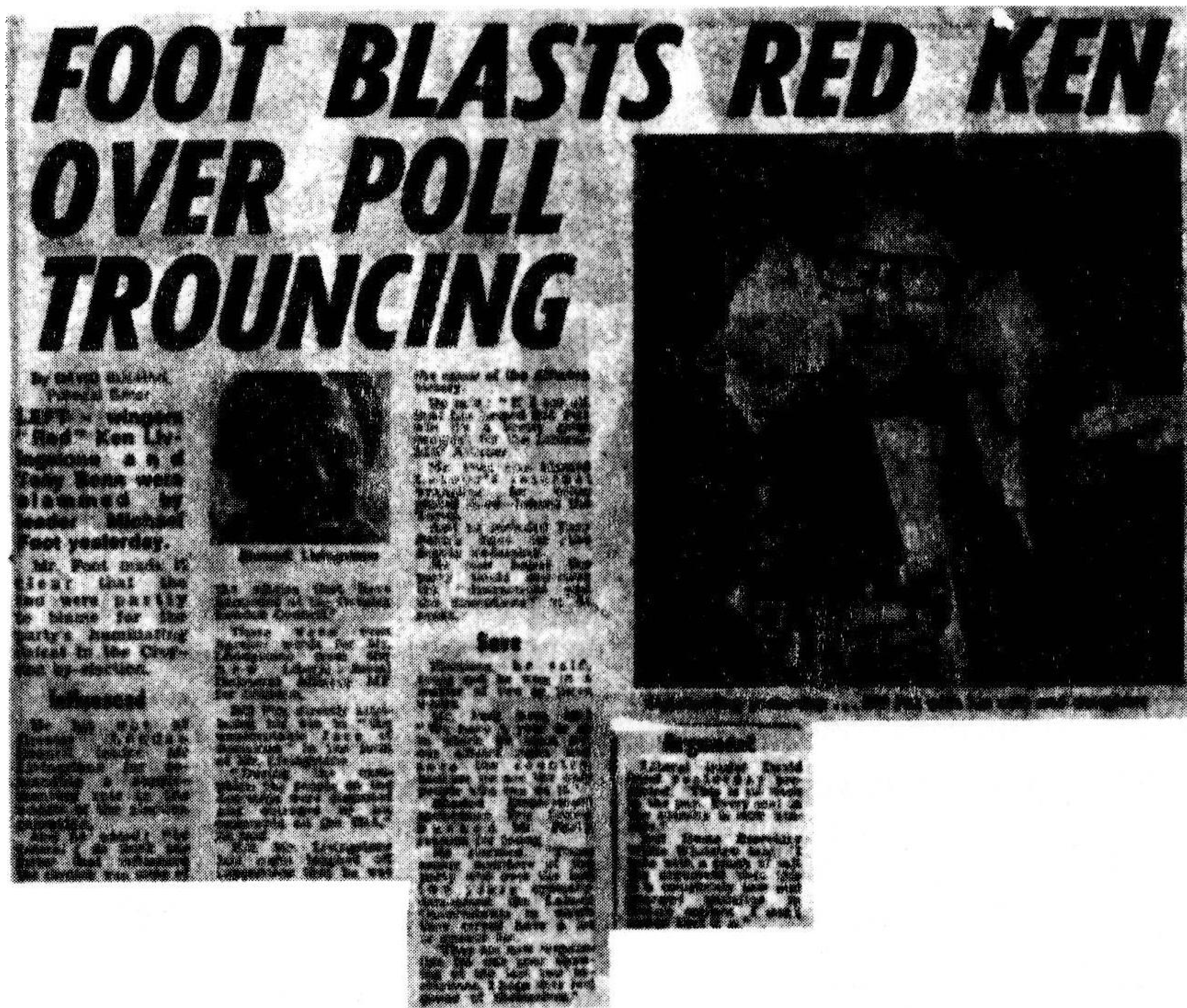
在当代大众媒体中，类似的操作也有发生，因为它们为了特定利益而发动针对社群组成部分的宣传战略。作为例子，我们来看看发生于1981年针对左翼领袖——诸如肯·利文斯顿，大伦敦议会的工党主席以及托尼·本恩——那场全面运动。运动在那时似乎极具效果。利文斯顿和本恩被刻画成寻欢作乐之徒，一手导致了工党的选举失败。以下是关于选战相对富有同情的一份报道：

工党在当地的组织者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利文斯顿先生要对选举负责。"我们无法否认，他是选举中谈论的焦点"，该党选民代表约翰·布拉金斯说。

但是，他相信，利文斯顿先生在选民中的个人魅力会缓解投票者的恐惧。"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普通人，他不是寻欢作乐之徒"，布拉金斯先生说。

当利文斯顿先生出现在一次公共集会时，他谈论的不是对 IRA 的意见，而是伦敦如何在保守政府治理下为生存而奋斗，他声称，政府正致力于地方政权的自由。(《卫报》，1981 年 10 月 28 日)

在最后一段中，文章作者给出了利文斯顿先生的观点，他对现实的说法，前面用到的词是“声称”（不是“说”或“争辩”），之前还提及他“没有给出”的“意见”（不是“观点”或“观察”）。前面的段落确立了利文斯顿先生在自己群体，自己派系中的地位。当地组织者的说法，通过一个如同瓦拉比·克洛斯社群中的“那个说法”一般不可理喻的操作接驳起来。紧随其后所引用的工党代表的话，只承认利文斯顿是“争议焦点”，而不是责任所系。布拉金斯先生报告说，利文斯顿试图通过个人魅力确立他的说法，以及他的模态；与被营地的说法隔绝并沦为无言的营地首领不同，他没有接受媒体的说法。在桑松所报道的事例中，关键证人带来的东西不利于营地首领，包括他的妻子和女儿。通过与之相似的技巧，利文斯顿似乎被他本人的盟友所弃绝。随着他朋友们对他的反对，他的话似乎就只代表自己个人，而从结果上说，这种人的话是没有地位的。不过，据说


FOOT BLASTS RED KEN OVER POLL TROUNCING

LEFT-winger "Red" Ken Livingstone and Tony Benn were slammed by leader Michael Foot yesterday.

图 5.6 经过转换的模态

是由他做出的那些针对保守政府的批评，还是会获得许多人的赞成。

同样的操作可以更为直截了当地在一张更为流行的报纸关于另一场选举的报道中看到。“福特为选举失败炮轰危险的肯”（图 5.6）。这篇文章谈及一场补选，在这次选举中，工党的得票率下降 14 个百分点，捍卫席位的保守党候选人得票率下降 19 个百分点，自由党/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一举摆脱前次选举中的垫底位置。在文章标题下有一张利文斯顿面部的小幅图片，题为“受谴责者：利文斯顿”。旁边是一张很大的图片，上面是获胜的候选者被两位女士亲吻：“庆祝昨天发生的事……比尔·皮特和他的妻子及女儿”。利文斯顿双眉紧锁，愁容满面地孤立一旁。皮特正被两位女性亲吻，即他的妻子和女儿。标题用两种方式抨击了利文斯顿。“危险的肯”将他标记为在社会上无足轻重（用的是“肯”，而不是“利文斯顿先生”），在政治上翻船（“危险的”），同时，“炮轰”表示非常猛烈的批评。被渲染的“炮轰”如下：“总体说来，我确实认为，影响选举的一个因素是发生在大伦敦议会的某些事情。”再一次地我们看到，所突出的是某个个体（利文斯顿）的可靠与否，此人地位备受挑战，因为他受到了一位工党领袖的猛烈抨击，因而抨击者代表着民众利益。实际上，福特的“指控”是非特定的，带着诸如“总体说来”、“我确实认为”、“一个因素”、“某些”这些低模态度标志，这使他的抨击力道不够。福特的言辞在开始之时富有模态，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他所做出的批评，从而重申了稳定性。报纸的报道忽视了这些模态，采取了福特刻意要与之拉开距离的反对姿态，然后又将这一内容翻译成为谈论火爆的身体行动这一表面形式。

报纸标题完成了两件事。它删除了福特的模态——福特附加在自己批评上以及他与利文斯顿的关系上的重量——并把信息地位（模态）转换成了社会关系（火爆）。这个操作与精神分裂患者的语言操作截然相反，在后者中，社会关系被转换为并不清晰模态标记。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清晰的模态标记都被去除了，信息内容被从关注中心移除，它的真正模态被弄得问题重重。“选举失败”让自己的模态被转换所去除，因此，作为名词表达，它成了一个未受质问的事实。工党在选举中获选份额的确大幅下滑，但是，保守党的份额跌得更惨。这第二个事实并未在标题或紧随其后的文章中出现。标题简约地确立起一个说法，让另一个被取缔，同时，它将自己的关注中心放在了利文斯顿先生的地位这个经过转换之后的模

态上。

奥威尔对政治和语言的著名讽刺作品《1984》就很注意这种技巧，这在他那个时代，在今天，都运用广泛。在他所虚构的在英社党所统治的国家中，媒体指使着两个角色（两者都非现实存在）：仁慈统帅老大哥，邪派头子戈尔茨坦。奥威尔描述了众人对戈尔茨坦仪式式的谴责，从而强化了他作为孤立无援、声名狼藉的发话人的处境，所以，对于他的观点，人们不假思索地就认为是错的。相反的，老大哥的言辞则具有完全积极的模态。它们完全可信。小说主角温斯顿·史密斯受雇重写历史记录，以便确保老大哥自始至终都是对的，所以，过去总是会与领袖当下的说法保持一致。

这种操作，与桑松所描述的边陲土著采取的操作类似，这些土著同样地去除任何可能挑战"那个说法"的别样历史记录。对这些边陲土著而言，确立"那个说法"的操作涉及群体，而且要当众实施并受到公认规则制约。在奥威尔的虚构国家中，在当代媒体制造中，"那个说法"是媒体公司确立的，无须考虑（被要求接受其为"那个说法"的）群体，无须（为约束交流而众所周知的）规则。但是，在这些条件下，一个现象却变得更为明显，而且这现象在土著社会中也必定是存在的。奥威尔将其标识为双重思想（doublethink）。由于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变化，老大哥的语录阶段性地显得不真实，并不得不归咎于戈尔茨坦，反之亦然。黑变白，白变黑。所以，尽管对英社党社会而言，老大哥仍然是"那个说法"的模态标记，某些语录却获得了一种矛盾的模态，因为在过去，它们有过戈尔茨坦的标记。双重思想是了解一句话语既真又非真的总条件，既真于经验和"那个说法"，又真于社会对现实的定义。

我们将这部分讨论总结为以下三点：

1. 社会控制要求对模态体系进行控制。模态因素因此成为符号活动和斗争的主要焦点。
2. 模态控制策略中的首要目标关于现实有一个单一的、不受竞争的现实版本，以及关于符号活动施为者合法或不合法这类范畴有一个单一的划分。
3. 当个人经验与为社会所肯定的真实发生冲突，结果也许不仅是思想受到胁迫，模态体系也可能猛烈崩溃，变成奥威尔式的双重思想。

差异与社群建构

我们的大部分讨论，截至目前，一直都是在社会对现实的定义中，真实并不单纯是正确的东西，并不是超越合理怀疑之上的被证明的东西。真实问题同特定群体中权力和稳定性问题不可分割地缠绕在一起。在每一个符号活动交流中，真实都被启用、被检验。差异于是成为符号活动的首要动力——关于现实的不同说法有待通过符号活动来解决，联盟有待建立，对抗有待克服或避免、激发或宣布。由于围绕差异的复杂论证，真实和现实具有双重面孔和双重功能，成为社会关系的一种效果或一个决定因素。

我们的某些讨论集中于宏观层面。前一节中，我们已考察过“那个说法”在较大范围群体中是如何建构的。但是，在社群中，以及为了社群，建构“那种说法”的操作总是必需而且依赖实际的、个体的社会施为者的行动，牵扯到无数的符号操作。这里，我们想通过某种细节，在微观层面上来展现这种操作如何运作。如果没有有关在个体的社会施为者层面上的符号活动的清晰阐释，那么我们所做出的分析将缺乏根本性的支撑。

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尔提出的一个模式，在图示通常很复杂的操作时很有帮助，通过这些操作，可以以真实的名义建构同盟，或者说，真实是同盟所制造的。海德尔的理论主要适用于个体之间构成的联盟，但是，纽科姆对其进行了改造，使其能够运用于大众传播体系。海德尔考虑的是由三人或三个实体构成的群体中每位成员之间的关系，用模式术语来说，就是正关系（+）或负关系（－）。接着他又对两种关系进行了区分，分成平衡关系（符号相加等于 0 或正数）和不平衡关系（符号相加后是负数）。海德尔等人发现了指向平衡关系这种强烈趋势，以至于人们为了达到平衡会将不平衡关系中的符号替换掉。

我们能够注意到，在某些例子中，一个简单的加号或减号可能太简单了，无法描述复杂的关系，甚至在赋值的操作中也可能存在着问题。但是，暂时接受这种简单化处理，我们就需要理解，就其所做的而论，它为什么能够起作用，在起作用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取一个典型的“平衡”三元结构，如表 5.1 所示，我们能够用总体性术语来说明所发生的事。用政治术语来说，A 与 C 结成同盟，两者反对 B。加号是表示稳定性的粗

略标记，所以 AC 这个新实体被建构起来反对 B，即由对于 B 的反对所创造。我们再来看不平衡三元结构，如表 5.2 所示，我们能够看出它的政治困难。稳定性纽带将 A 和 C 绑在一起，形成新的实体 AC，AC（通过 A）与 B 有正关系，（通过 C）也有负关系。在平衡形式中，AC 的凝聚关系由于敌对的 B 的在场而得以明确，而在不平衡形式中，凝聚关系则被分裂了。对于第二个例子中 AB 的稳定性群体，也同样如此。一个显然的解决方案，是换掉其中一个符号，这样，无论 AC 还是 AB，都会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群体，共同反对剩下的那一个，而剩下的那个也就成了三元结构动力学中的那个"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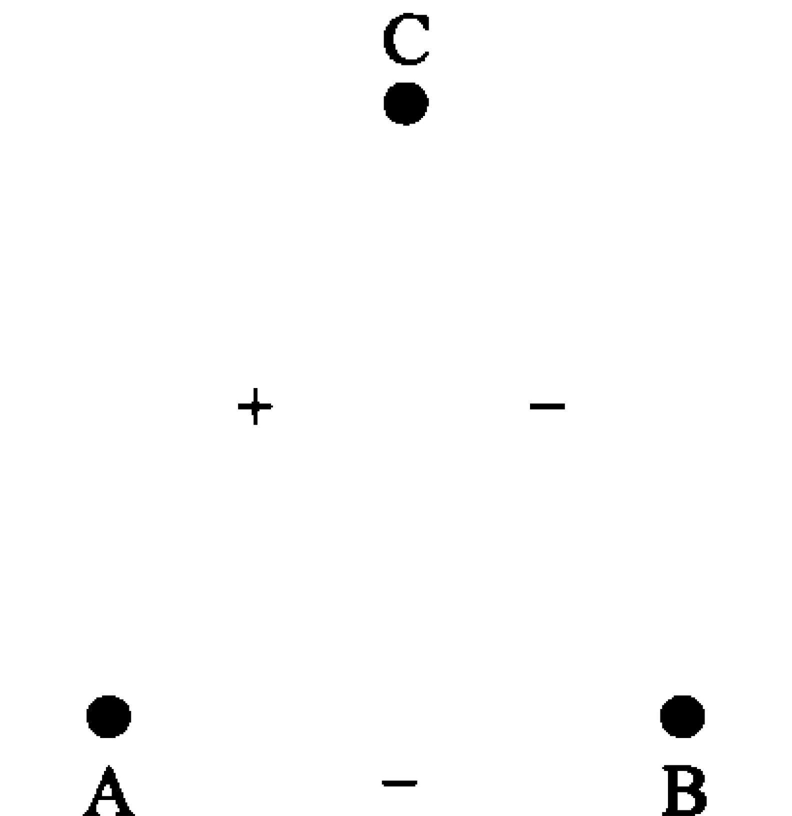


表 5.1 平衡的三元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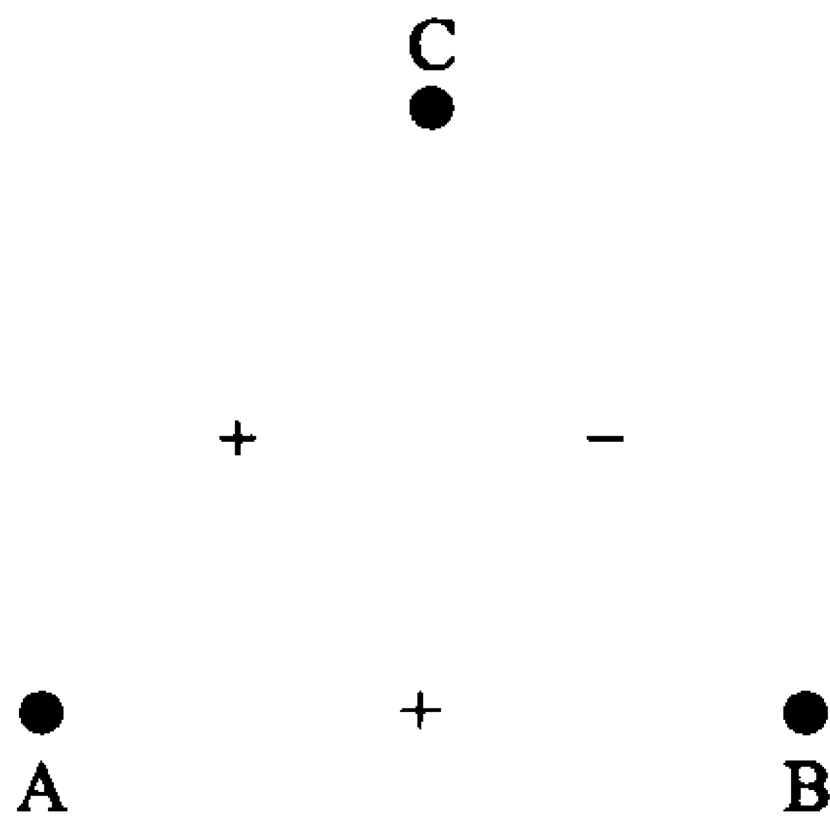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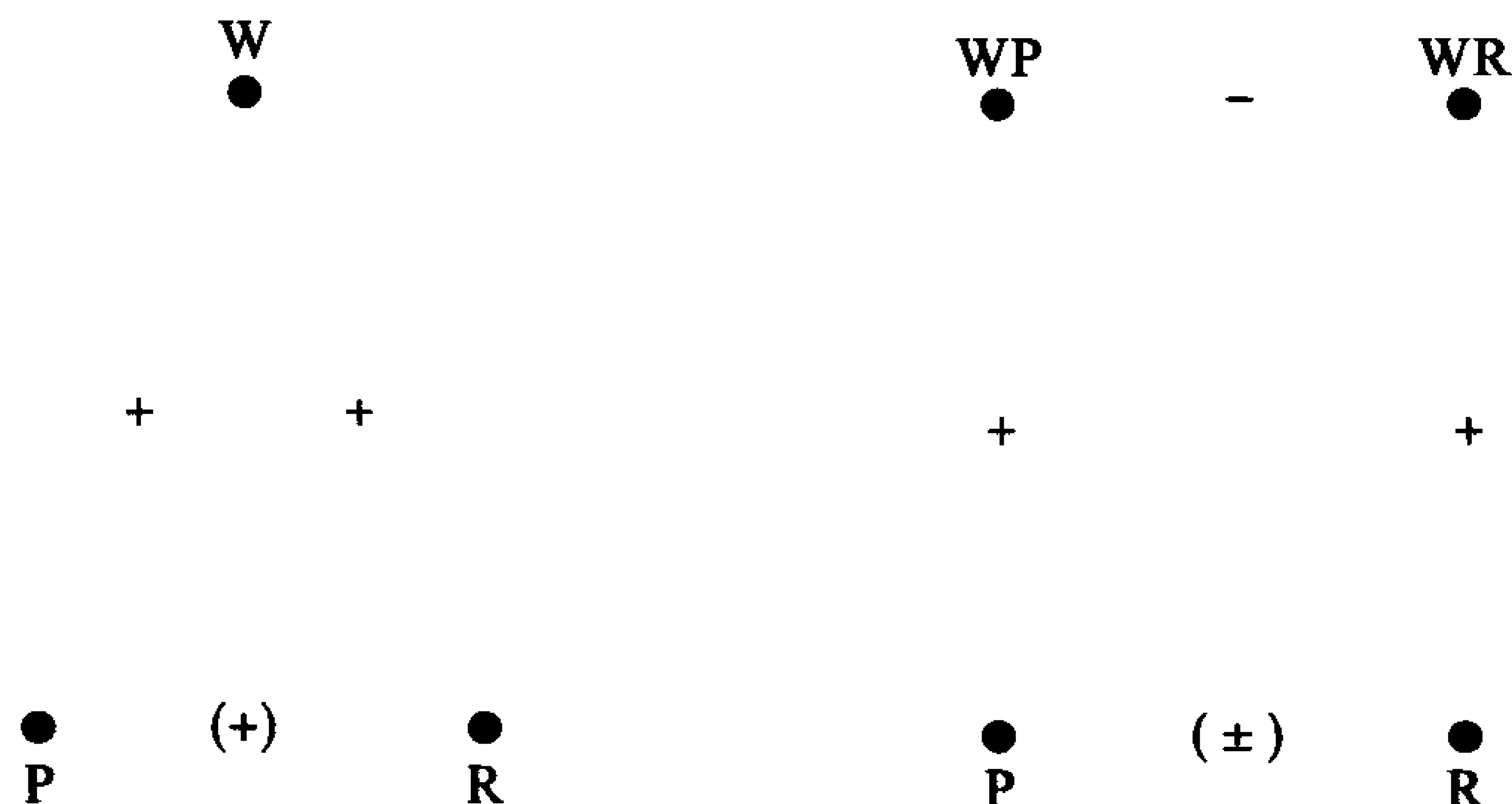


表 5.2 不平衡的三元结构

按照这里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同样的原则应用于由任何数量的实体组成的结构。只要同盟和对立导向一种一致的分组样式，它就是稳定的，同时，这个更大的聚合群体将通过稳定性纽带和共通的反对对象而凝聚在一起。在没有一致的、简单的二元样式的地方，不稳定的同盟便会成为常例。但是，在某些关系的阐述有欠分明的地方，它们有可能被转换，以便创造可能的一致性。

当关键性符号活动因素有欠明确，尤其是在某些类型的接受者对于制

造者/接受者关系或被表现世界中的模仿层面因素无法肯定的地方，在交际中便的确会发生上述情况。在大众交流中，或者只要是制造者/接受者关系过于抽象的地方，制造者都会通过建立一个彼此为正世界的方式，制造一种正符号活动关系（如表 5.3 中的括号所示）。对有待探讨的世界进行定义这一过程中存在真正差异，针对于此，我们建立了一个四个术语组成的结构（如表 5.4）。这里明显存在着不稳定性。无论是 WP 之间，还是 WR 之间，差异必须得到解决，否则就会成为对抗的基础。解决差异的努力可能来自 P 或者 R，或二者的共同努力，它们通过保留和遮蔽矛盾的方式，将两个世界之间的对立转化为联盟。



其中：

W=世界

P=媒体产品制造者

R=读者

WP=制造者组成的世界（如报纸）

WR=读者组成的世界

表 5.3　**稳定性**　　　　**表** 5.4　**非稳定性**

为了阐明大众媒体特定事例中这些操作的运用情况，我们从《太阳报》这份大众流通物中选取一期为例：1981 年 9 月 24 日，星期四。我们从第三版开始。这一版由于一位穿着暴露的“太阳鸟”而富有视觉冲击力，这是该报的一贯做法。这次的女郎是琳达·路萨迪，她拿着一只听诊器在听一个宾果球，面对读者/观众微笑着。上面的文字是“宾果女郎”，下面进一步写到“9 号……干得漂亮”。图的右边是主要新闻，打头的是《多面手安迪驾机救船员》，讲安德鲁王子如何开着直升机解救掉下甲板的水手。文章配有两张图片：尺寸较大的是安德鲁王子，尺寸较小的是那位

名为约翰的水手。

两个故事似乎互不相干，相比其他的，有明显的政治味道。然而我们认为，两个文本是一种复杂策略的某些方面，是要建构社群并使之站到一种有争议的真实形式这边。臭名昭著的“太阳鸟”，通常被认为是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手段，利用性别歧视者对女性和裸体的观念，来进行报纸销售。无疑，它确实有这个目的，但是，它也有模态功能。裸体、模特直视的目光和微笑，以及配文中的性暗示（“如果这就是医生所要求的，那就再来多一些”），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在男性化的读者和男性化的制造者（作者/摄影师/报纸）之间建立一种牢固的稳定性关系。

然而，该文本的效果不止于此。它所建构的社群依然存在，并对报纸中的其他内容作出回应。版面中的主要“新闻”故事涉及安德鲁王子。与此文本相配的有两张图片。图片中的安德鲁王子侧过头和眼睛，面带微笑——比模特的笑含蓄一些，否则会产生传达类似信息的相同符码。获救水手比安德鲁王子低一些，图片尺寸更小，也不是那么突出，所以尽管他笑得更开心，读者与他的关系却不是那么密切。标题文本蕴含了一套不同的关系，“多面手安迪”在作者、读者和安德鲁王子之间建构出一种彼此密切的关系。紧接的文本用语正式，可以从运用王子的头衔得到表征。读者、作者和王子这种三方关系不仅距离远，而且不乏恭顺。但是，在文本旁边的图片中，安德鲁王子面对读者的微笑是那么轻松而友善。成为《太阳报》的读者，得到的回报是成为琳达·路萨迪的情人和王子的朋友。

下一期中，这位模特将被另一位“宾果女郎”替代，也许永远不再出现。然而，安德鲁王子和其他王室成员会再次出现在《太阳报》上，以及其他流行日报和电视上，这种关系结构会得到强化，即便他充当救援英雄这一特定故事内容会被忘掉。报纸文本所创造社群并不抽象，不是没有连续性，也不是不指涉文本之外的社会存在。通过累积，王室家庭成员逐渐成为这个国家中每位个体的亲密朋友，所以，通过社群所复制的，不仅是一个形象，还有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读者觉得同王室赫赫有名的成员之间的距离，比他们同大街上、整个国家中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之间的距离，要更为密切，尽管事实上，这些默默无闻的人的生活方式和兴趣与他们自身的更加接近。



ANOTHER EXCLUSIVE IN YOUR RED-HOT SUN

The old banger Benn can't bear to part with...

Story: IAN HEPBURN. Picture: TONY EYLES

THIS ancient Ford Consul may look like a worthless, [illegible] heap of old junk to most people . . . but not to Tony Benn.

In fact, the champion of Labour's Left-wing — [illegible] his driving ambition to be Party leader one day — cannot bear to part with the old banger.

Perhaps he's saving the saloon for giving his rivals a rough ride?

Or he may even restore it to its former glory, should his political career suddenly backfire.

Mr Benn simply says he's keeping the Ford for "sentimental reasons."

It was one of four wrecks that until recently littered the grounds of his country retreat at Stansgate Abbey, Steeple, Essex.

Now the rotting Consul stands alone on flat tyres, its bodywork eaten away and the headlights missing.

The car's main purpose, apart from Mr Benn's interest, seems to be that of propping up a set of household ladders. And yet a terse note is taped to the windscreen, forbidding anyone to remove the banger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A neighbour said yesterday: "The car is an eyesore in a beautiful setting. We cannot understand how Mr Benn's mind works."

His supporters hope it works better than the broken-down car . . .

LABOUR REJECTS PROBE INTO HEALEY HECKLING

By PETER ROSE

TONY BENN claimed victory yesterday in the row over the barracking of Denis Healey, his rival for the Labour deputy leadership.

The party's 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dominated by Left-wing supporters of Mr Benn, rejected a call for an inquiry into the affair.

And they upheld Mr Benn's claim that Labour Party members were not involved in the shouting-down of Mr Healey at a Birmingham meeting at the weekend.

The executive thought an inquiry would become a witchhunt and lead to attempts to expel members.

Labour leader Michael Foot, who bitterly opposes Mr Benn's challenge to Mr Healey, also agreed there should be no inquiry.

Deploring

Instead, the executive issued a mild statement deploring the disruption of meetings and calling for free speech, which Mr Benn and his supporters could easily back.

Mr Healey said later he was satisfied with the statement.

But his key supporter on the executive, Right-wing MP John Golding, was not.

Mr Golding, who will try to raise the matter again, said: "This is burying your head in the sand."

He said he did not believe there were no Labour Party members among the barrackers.

Later Mr Benn said the heckling was the work of extremists hostile to Labour.

He added: "We condemned the barracking because we are all in favour of free speech."

Tony Benn . . . he blamed extremists hostile to Labour

图 5.7　抹黑工党左翼

《太阳报》对工党政治家，尤其是托尼·本恩这样的左翼领袖的处理，遵循着相同的原则，但在这里却建构出了一种强烈的、充满敌意的关系。图 5.7 是选自同一期《太阳报》的一篇配图文章。本恩的图片经过剪切，

与那位获救水手的图片尺寸相当，比安德鲁王子的图片小了很多，图片中的本恩凝视着侧面，表情冷峻。文章并未对本恩公然表示敌意，只是报道了他与另一位工党政治家丹尼斯·希里为了工党副主席职位而发生对抗。对这场争夺，读者可能选择支持任何一方，但是，这种图片建构了一种极具负面性的关系。工党的工人或成员也许无法确认工党领导层中谁是自己的朋友，但是，本恩的图片似乎无疑宣告了他是他们的敌人。这套关系投射在媒体所呈现的世界之中，并且跨越该世界的边界，形成一种通过与读者之间关系来进行定位的稳定样式。我们可以用图示表现出这两种关系，如表5.5所示。在这种三角形中，符号（+/-）总和必须为正数才能保证关系稳定，也就是说，才能让它投射出或融洽或对抗的单一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每个人都可以简单地被划分为朋友或敌人。在安德鲁王子的例子中，王子救了约翰，约翰很感激：这样就形成了模仿层面的稳定性关系。约翰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报纸上的他满面笑容，安德鲁的友善，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甚至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个群体可以伴随喜欢安德鲁王子的人无限扩大（他喜欢我们，所以我们喜欢他）。对于本恩与希里之间的冲突，我们得到一个围绕本恩与读者关系轴建立起来的矛盾结构。如果它是否定性的，那么每个讨厌本恩（或丹尼斯·希里，或《太阳报》）的人会因为他们共有的反感而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群体。如果存在三重否定，那么该结构会承受压力：如果撒切尔夫人和本恩先生这两个猛烈的对手也被同样讨厌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个对抗结构，在完全不对政治家们失去幻想的选区，就会投射出一个不可能有稳定性的社会世界，在那里，读者也没有形成联盟的可能性。这些结构确实在不同社会的不同时期出现，在“我们对抗他们”的结构中，所有读者完全（被建构为）与统治群体或者所有政治家截然疏离。《太阳报》之类的报纸一般不会提供这种形式的结构。为了必须得出正的可能，如果这种可能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太阳报》就肯定会提供。毕竟这正是报纸的主要意识形态和政治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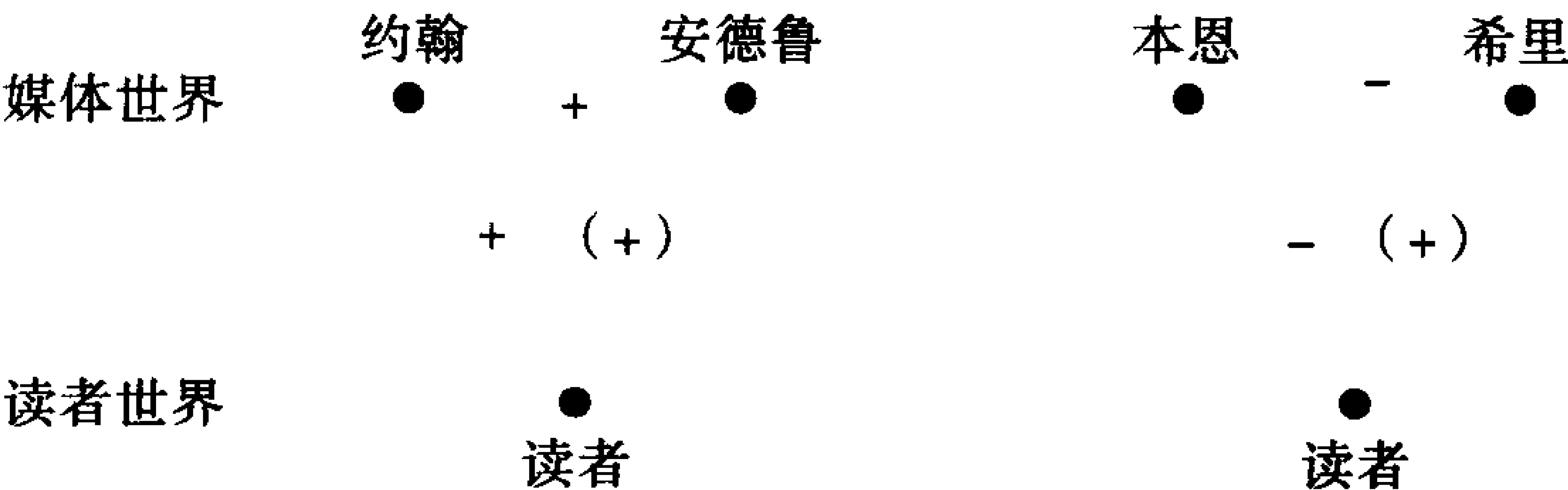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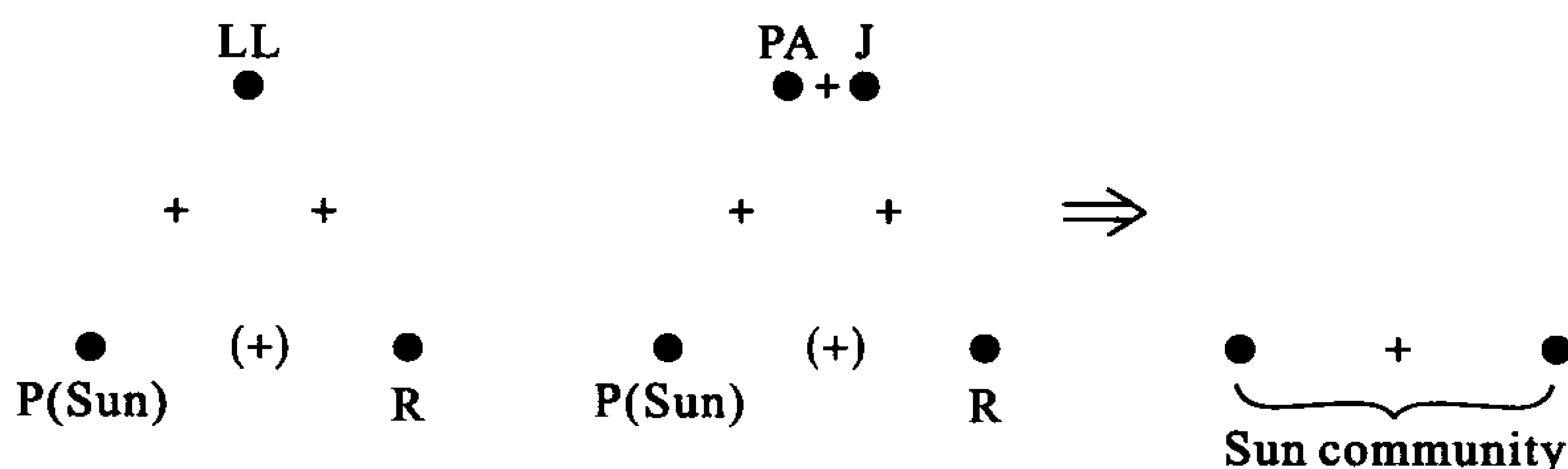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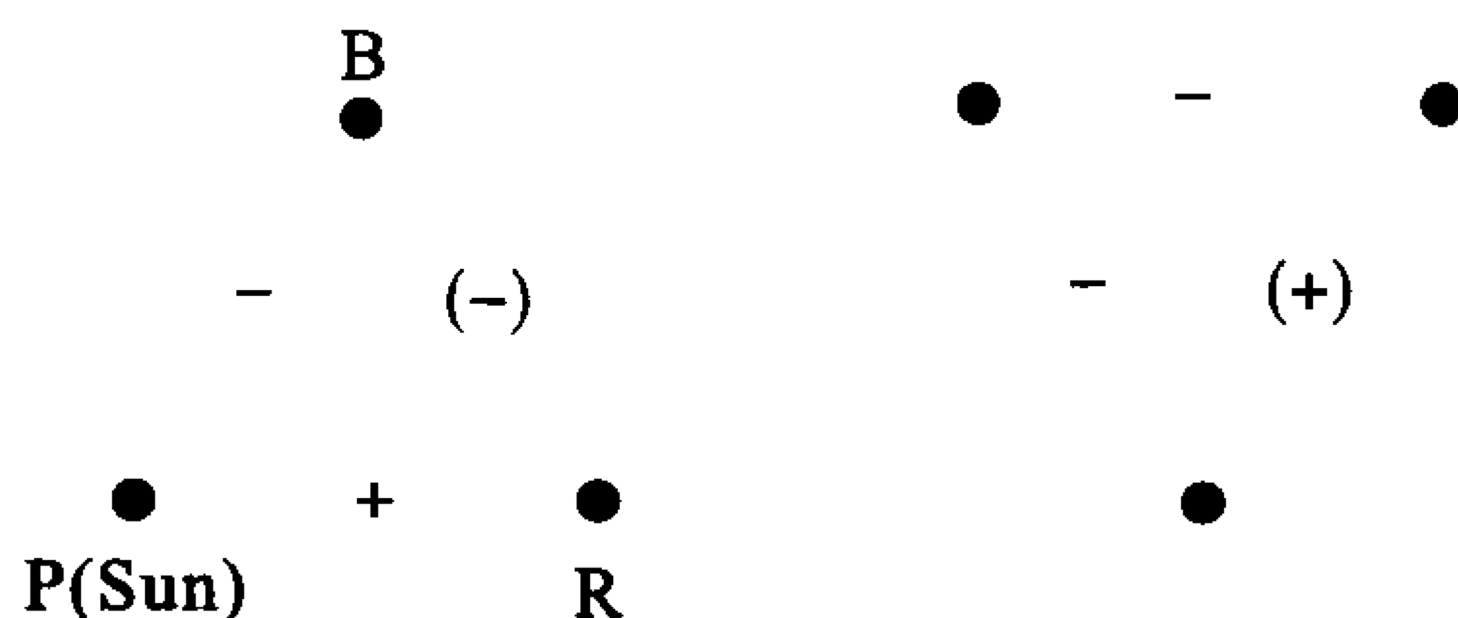
表 5.5　**两种稳定性的关系**

三个故事共同形成了一个具有双重效果的系列：创建《太阳报》读者的稳定社群，同时，以此作为基础影响人们对政治人物、问题的态度，最终赋予它们模态价值。我们对此系列在图 5.6 中。路萨迪和安德鲁王子（以及关于其他人的内容）共同构成稳定的《太阳报》社群，要维持这种统一性就需要排斥本恩，这将读者迎入它广阔的胸怀，暗暗地扩大其规模，使得本恩似乎成了孤家寡人。通过对差异的置换和夸张，差异得到了部分解决。这种手段和《1984》中英社党的采用的伎俩相似，在书中，戈尔茨坦被表现为党所组织的“两分钟仇恨”中那个千夫所指的、孤零零的仇恨对象。

1 Page 3



2 Benn story



其中：

LL＝琳达・路萨迪	H＝希里
PA＝安德鲁王子	R＝读者
J＝约翰	P＝报纸
B＝本恩	⇒被转换为
	（＋）（－）＝被认定的关系

表 5.6 社群建构的技巧（附带例外）

这里，也许把我们的观点与经常围绕媒体偏见反复发生的争端联系在一起考虑，是非常有益的。这些争论常常刻意集中在内容分析的方法基础上，而方法在本质上依赖于各种各样的量化标准。我们的观点旨在表明，这种精致的方法必须考虑针对内容的特定模态效果，正如在关于本恩的那

篇文章中一样。从某种观点来看，该文章可以被说是客观的，甚至有利于本恩和左翼，因为文章报道本恩及其支持者的言论有44行，而给予约翰·戈尔丁的反对观点却只有13行。然而，不仅模态由于诸如“宣称”、“认为”这样的字眼弱化，而且对于那些被说服把本恩及其支持者看做反权威者的人，模态还受到了颠覆。关键性的一句话是“他们拥护本恩先生关于工党党员没有卷入周末在伯明翰会议上对希里先生的起哄这一声明”。模态标记在这里被习惯性地用来控制对其声称内容的回应。居于核心的是呈现希里先生受到“起哄”这个事件时没有用到任何模态标记。这个核心取得了不容置疑的真实地位。“卷入”引出了被标识为处于争议状况的一项主张。它被专门地否定了，但是，否定的施为者——本恩先生——却是以饱受争议的方式呈现并定位的。

拥护这种声称的主体，工党的国家行政首脑，可以做出一种起决定作用的介入，只要他们有足够的知名度，与本恩没有瓜葛，并且受到《太阳报》读者信任。如果不是这样，由于本恩具有众所周知的负值，国家行政首脑就会因为与他之间的联系而声名受损。因为受控而采取反本恩姿态的读者，尤其在其没有可靠的其他信息来源的时候，会知道赋予怎样的模态，相信什么：很明显，曾发生过一个事件，工党极端分子卷入了。本恩和左翼抗议越是强烈，这就越会被相信。这是一种强有力的策略。而且还有进一步的好处：这创造出了双重思想。因为读者认为报纸是以一种客观的方式提供了他们毋庸细说就觉得是不真实的东西，所以，他们有种难以排解的感觉——他们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该相信的。但是本恩和左翼受到的攻击是模态本身上的，罪责难逃地迫使诚实的《太阳报》印出他们狡猾的谎言。本恩的言辞越是听上去可信，正如《太阳报》所报道的那样，他们产生的愤怒越猛烈。按照这样的分析，似乎本恩是不可能获胜的。

我们在这里的分析中，一部分可以用经验来检验。我们也许期望《太阳报》读者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把本恩的声明看做谎言，把本恩和左翼看做不值得相信，这个比例，与处于同样情形中的譬如澳大利亚或美国的读者相比，是比较高的。透过这场媒体战，可见大部分媒体都强烈拥护希里，而把本恩呈现为选举的灾星。一份发表于选举前夕的针对普通工党投票人的民意调查表明，60%的人支持希里。然而，在由工党成员在各个分选区经办的实际选举中，本恩以82%对18%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

两个结果截然相反。它们形象地表明了模态策略中的许多重要特征。

首先，对本恩的负建构看上去的确起到了作用，对于工党支持者绝大多数而言是如此，这些人也许考虑在选举中把票投给工党。很容易看出这是为什么。《太阳报》一家就有每天超过五千万的读者，日复一日地如此。和其他媒体结盟，能够使本恩被抛弃看上去像是民意的真实。然而，选区的成员对于本恩是相当牢靠的。因为它们作为“普通的”投票人被暴露于同样的媒体战略之下，很明显，他们会对其有着不同的反应。不仅他们拒绝它：标志符号就是他们颠覆了它所传递的信息。理解这为什么会发生是很重要的。一个相关因素是，选区各个党派都是“草根”组织，有可以选择的交流网络，这维系起一个可以选择的社群。他们所以能够否决《太阳报》的做派，用的是《太阳报》自己用到的是同样一种逻辑和战术：“像《太阳报》这种垃圾所支持的，肯定值得怀疑，它所批评的，肯定是正确的。”

这种姿态以一种方式表明，媒体战或协调好的教育战是能够被抵制的。抵制必须通过连接一个强劲社群的真正可选择的网络而起作用，这样的一个社群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针对发动选战的社会或群体那种敌意。但是，也很重要的是注意到，反本恩的媒体并非在这次战役中丧失一切。选举的最后结果让本恩的支持者们相信他们可以抵制媒体。然而，它也创造出了工党之中的模态分裂，这种模态分裂因党内冲突而生，并且使党内冲突加剧。这种分裂，作为真实和群体身份的标记，集中在本恩身上。那些不支持本恩的人不仅是反对选本恩及其支持者，他们还感觉到，理性的争论以及通过理性的争论来解决差异，已经不再可能了。当一个更大社会结构中的反对群体相信自身是按照不同模态建构在操作，争论就成了不可理喻和缺乏凝聚力的源头。

这引出了关于通常对媒体战效果的认识方面的一个更进一步的观点。对于衡量媒体对于特定选战或者在选战中的效果，有过无数研究。在此提出的假设，是文本或系列文本，与读者的意识形态站位以及他们的社会实践的转变这两者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关系。相似的探讨，在关于围绕电视中的暴力表现、色情资讯的可获得性等等争辩中，都可以用得上。简单地说，这种假设就是观看暴力镜头有可能让你在下次人际交往中遇到麻烦的时候更具有暴力性。我们在本书中的探讨所表示的，是更具有步骤性特征的转变，对思想控制制度慢慢地做出调适，并对社会主体和社会施为者进行重建。如我们所写的这件事情发生在已经过去了的1986年那样，托尼·

本恩已经同工党政治无关，更不用说更为广阔的英国政治。我们并不希望说，《太阳报》1981 年的媒体战，或此前、此后的媒体战，就具有那种“效果”。霸权操作不是以简单方式进行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坚持认为，《太阳报》针对工党左翼的这场媒体战的确有其效果，连同来自许多其他来源的许多其他文本一道而有其效果。文本是社会之物，文本生产涉及社会操作。作为社会操作的文本具有社会效果。我们就是这样来评估这一领域中大众媒体的效果的，其他领域也概莫能外。

同时，我们看到，1981 年针对“危险的肯”那场媒体战采用的是同样的策略，一时之间也获得了几乎同样的成功，但是，最终却并未被证明是成功的。到撒切尔政府最后废止大伦敦议会之时，利文斯顿已经赢得了这场信誉战。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解释怎么会这样，我们只想指出，利文斯顿能够运用各种可选择的交流模式，以便创造出更强大的可选择的、反对性的社群。须强调的关键是，在这场通过关于真实和现实彼此竞争的定义争夺社会控制的战争中，不存在什么单一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抵制是可能的，某些情形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模态策略在其他情形中可能会失败，这总是有着特定的、可分析的理由的。维系其稳定性纽带的群体可能会对针对它所谓真实那些恶意攻击无动于衷，就算它对于共同真理的信念受到腐蚀，它的稳定性就可能陷入危机。这可能看上去像循环论证。实际上，这是从存在于模态体系和功能以及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得以延续的，而其相互依赖性则源于它们都是通过符号活动才得以建构和调停的。这种相互依赖性构成了最重要的单一要点，即社会符号学需要对模态和关于真实的社会定义做出研究。

第六章　转换与时间

符号学与历史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①]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历史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的核心理论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不过，马克思的评论表明，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也很矛盾。历史是先辈们沉重的负累，是死人对活人的约束，令人惋惜，却不容忽视。如果我们不需要关注过去，那么对现在的转换会相当容易。马克思主义试图理解过去，确切地是为了摆脱它同现在的纠缠，同时，它也发现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符号学中，也存在类似的矛盾，但对其的辨识却并不那么清晰。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索绪尔实际上并没有对历时性做出致命一击，符号学

① 此处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译者注。

家们因为注意到宣布它的死亡并不成熟而激动成了一种症候。尽管有官方葬礼，历时性却并未消失。皮尔斯关于符号活动作为过程的观念，强调了运动和时间。他还从具有连续性的“思维习惯”角度提出了一种文化史，这在本质上正是福柯后来在其知识考古学中所从事的工作。在结构语言学中，历史探索失去了其猛烈势头，但是同样的，它并没有全然消失，而关于历史的那些主张也正在开始被得到重新认识。乔姆斯基的转换理论恢复了历时性操作的一个方面，使其重回语言学舞台的核心，这为语言史和儿童语言提供了新的研究兴趣，尽管乔姆斯基本人对儿童语言的兴趣更多地体现在反历史的先天性范畴。除符号学和语言学外，在历史系、文学系、艺术与哲学系，历史仍然享有学术研究中的荣耀地位，在博物馆、旅游业、大众文化和修辞学中，也是如此。远离这些之外，爱因斯坦在把时间作为第四维度融入物理学，而此刻的索绪尔，则似乎从事着把时间移出符号学之外的工作。

于是，社会符号学不能对历史和时间问题置之不理或闪烁其词，也不能通过后门将这一维度走私进来。它要做的，必定不仅仅是记录下历时性维度，更必须将其作为社会符号学不可或缺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来接受。在社会符号学中解决历史问题——它从哪里开始，它怎么建构，它又怎么影响到现在——就是要消解历时性和共时性之间的界分，以建构一个单一而统一的场域。每个符号结构都不可避免地在时间与空间中存在，每个符号操作都发生在这些维度中。花在观览图画或读出一个单词上的时间似乎可以忽略不计，花在一场简短对话中的时间同样无足挂齿。但是，忽略时间维度，就会导致扭曲，而这种扭曲具有一种累积效应。恰恰因为时间从构成历史证据的成序列文本中被移除，所以历史本身无法连通当下。历史的意义是有力的，不可同化的，使得当下的意义变得过于自然却令人费解地缺乏力量。历史与当下这种成问题的关系，在符号领域被看做总是而且只是由时间——空间框架中的各种关系构成时，就会消失，随之一道消失的还有对那些关系的转换。在这个统一场域中，历史提供了规模惊人的结构和转换，这可以通过指涉较为简单的、规模较小的符号活动结构得到有益的解释。历史还使一些组成要素性质的大规模结构和操作变得可能，这些结构与操作有助于解释无数关于意义和阐释的个体行为所具有的性质和趋势。无论在哪个层面上说，无论在何等规模上说，历史都是由意识形态建构出的时间性。符号活动中的时间一直都是历史。

探索关于转换的唯物主义理论

我们将从一个转换的场所开始，此处的转换不仅为人熟知而且显而易见，而且显然对于阐释极为重要。每个写文章的人都知道，文本的最终形式要靠此前的草稿，草稿是一步一步转换而成的，某些步骤可能得以部分留存，影响到最终文本的流畅表现。先前的草稿并非凭空而来。它们汲取了其他文本中的内容，有的是通过引用和脚注的方式记录下来的，有的并不被承认是来自别处，还有的已经被遗忘。所有这些文本都曾经（或者现在仍然）拥有物质性的存在。我们在这里谈到的转换并不神秘，本质上也并非不可知。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无法获得指向最后文本的所有文本，这也是存在的问题。我们只得靠猜测来建构使文本有意义的历史。我们对文本的判断包括我们的历史感以及作者似乎已经完成了的那种转换工作。作者的作品充满各种指称，他所转换的作品范围相当惊人，即使其结论并不高深莫测。人们认为作者对一整套复杂观念进行了同化和重新加工，或者视之为"独创性"思想家，或者视之为执迷不悟（取决于如何判断原初的那整套观念）。

因为我们不得不做如此广泛的猜测，所以我们可能受到欺骗。作者们可能略去自己读过的文本，假装读了其他自己实际没有读过的文本。他们为自己的文本建构了一部虚假的历史，可能引领我们自身对其历史进行建构，或者我们可能会用属于我们自己的反历史来对其进行怀疑和抵制。一种关于转换的唯物主义理论不需要否认这个投射或反投射操作。相反，这些操作本身就是物质事实，嵌刻在斗争和妥协、结盟和抵制的社会操作之中，而这些，正是符号活动的特点。这些操作，转换和转换投射，在所有符码中的符号、文本和信息中都能发现。每个解码行为都依靠一种转换理论以及某种扭转转换的策略。关于转换的唯物主义理论把转换看做社会/物质操作，它关联着社会/历史定位的文本，进行于具有社会和历史定位的行动者的操作之中。

这里，可能有用的是明确和我们运用转换概念有关的另一个要点。在符号学中，对于转换操作的最细节化分析是转换生成语法学家在其早期工作中所提出的那些，大致时间是 1957 年至 1970 年之间。他们的工作认为，转换是针对专门化结构的操作，产生出特定的结构变化，结构形成了新的

结构。就句法结构而言，这些可能，也的确得到相对明确的阐述，至少在最初和最后阶段是如此。在我们本章以及本书讨论的许多情形中，并不存在如此清晰的结构描述，我们也没有，也不能提供这些东西。因为，相比语言，物质性的东西更为复杂，也更少得到适当描述。所以，我们的假设是：(1) 关于这些操作的存在和地位，至少潜在地是向着符号分析的进一步工作开放的；(2) 尽管复杂，我们认为这些操作实际上一直是由社会符号施为者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实施的。

为了阐明我们的假设，我们将考察帕特里克·库克的一幅漫画（刊于《国家时报》，1986 年 6 月 13－19 日），如图 6.1 所示。这幅漫画标记的是新南威尔士的首相内维尔·乌兰退出政坛，此人任职的最后几年一直丑闻不断。这一背景对于理解漫画的笑点所在至关重要，漫画让一只吃惊的鸟儿看到自己的粪便毫无痕迹地被弹落一旁。该形象是对“粪便粘住了”这种粗俗说法的转换（乌兰的政敌们很希望看到它发生，他的朋友们则害怕它发生）。在此例中，显然笑话之所以起作用，根本上是通过一系列的转换。这些转换对描述乌兰风风火火的首相生涯的一系列开放性文本施加影响（这些事情中有哪些或怎样被人们所记得，并不重要）。它们还对一个特定说法施加影响，把它从一种媒介转换成了另一种媒介——尽管这个说法本身是把受到强烈指控的身体形象转换成了文字，所以库克在某些方面只是把先前的转换颠倒了过来。



图 6.1　作为本人的纪念碑的政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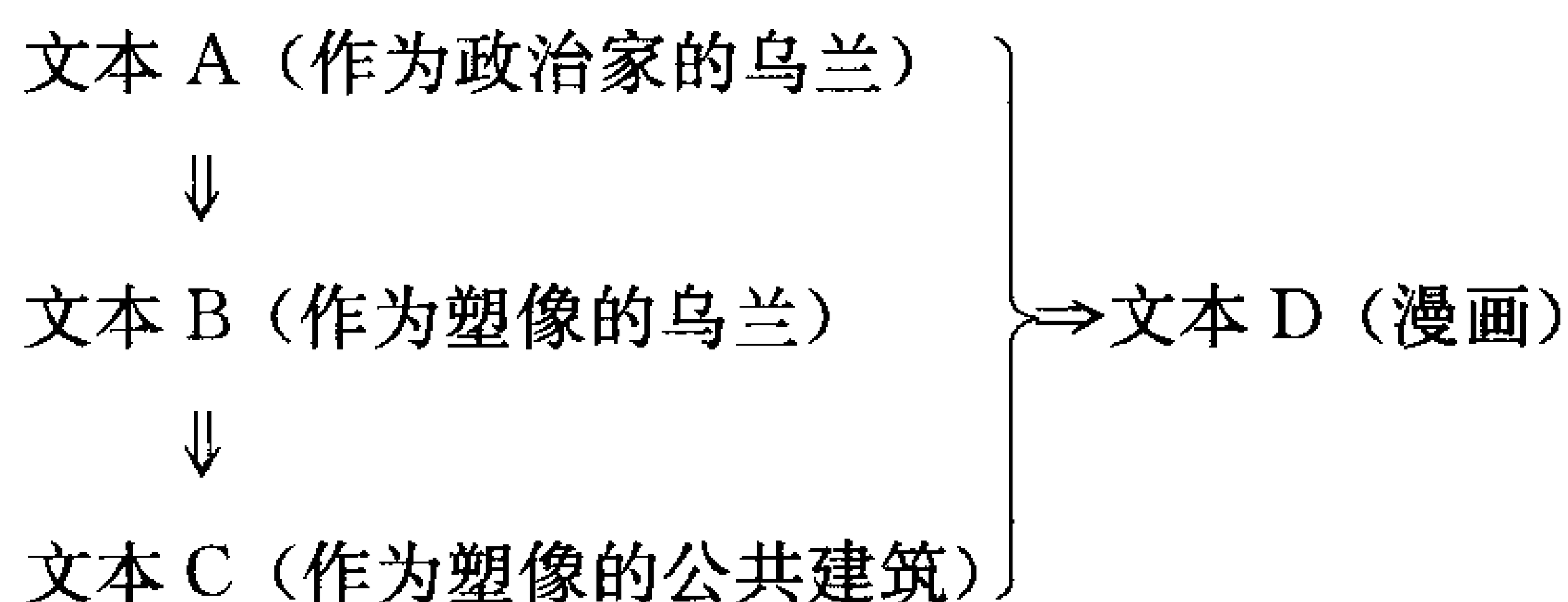
这只鸟不只是重复了来自先前政治语境中的那句话。“粪便粘住了”这句话被转换成为它的反面：“让人惊叹啊！一点都没沾上！”“让人惊叹啊”暗示的是先前“我为此而惊叹”这种形式，来自“这让我惊叹”，这渐次地暗示着更早时候的“我希望（粪便会沾上）”。“一点都没有”是一个强烈否定词，暗示的是一个长系列的表达，大致是“我希望粪便沾上”，“这块粪便没沾上”，“那块，那块，还有那块粪便也没沾上”，“一点都没有沾上”。“一点都没有”这个词暗示有许多块粪便，但没有一块沾上。可能把“一点都没有”处理成只是一个添加在原先句子之上的词，不把它视为一个重要转换。然而，我们所拥有的是至少两个文本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有着与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意义。“一点都没有”，按照这种解释，是一个单独的词，却表征着一系列转换，对一系列文本施加了影响。于是，否定在总体上，必须被看做一个转换操作，一种实际或虚拟文本之间的关系。

但是库克的极简文本因为整个一系列暗示出的转换而意义密集。譬如线描假装是对乌兰塑像的表现，一种从三维到二维形象的转换。这种三维文本在澄清漫画意义方面是关键的一步。不认识到它的必要性，就不可能明白这个笑话。但是没有人打算认为这座塑像真的存在。塑像是一个伪文本，由伪转换投射而出。我们可以假设库克必定或多或少地对其进行过构想：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被要求去假设更多的东西。笑话的一部分是想象这样一座塑像；另一部分是解构这一形象。要求我们实施的转换工作是复杂的，看上去充满矛盾的，但是，矛盾本身正是笑话意义的一个部分。

这种并非转换的转换（this transformation-that-isn't）的动机，因此还有它的意义，我们猜测（猜测在解码转换过程中是基本功）这可能来自柯林·瑞安在同一期《国家时报》中的一篇文章，文章是这样开始的：“内维尔·乌兰在新南威尔士从政的最后几年将会因为纪念碑而铭记——规划这些纪念碑，是为了让它们比他的政治生命更久长，也许会让他的统治流芳百世。”库克的漫画似乎像是对该文本某些部分的评价和转换。所以这座从来没有过的塑像成了无数其他纪念碑的替代之物，它们将会存在，但是开支巨大（根据这篇文章所说，耗资九亿澳元）：一条单轨铁路，一条悉尼港下的隧道，以及一座游乐场。库克把它们（如果这就是所谓纪念碑）转换成为乌兰的塑像，这暗示着对它们做出判断，它们不过是乌兰大写的自我作祟——同样的判断在瑞安的文章中暴露无遗。转换并非陈

述，但是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其他事例中也同样如此的东西：所采取的转换暗示着陈述以及与陈述相互联系的意义。转换不只是对意义结构的操作。在吸引读者去探索陈述（可能的）范式方面，即探索模仿层面的体系，转换投射出系列意义，并且通过一种简化，变得本身就具有意义。

库克的暗示性评价是复杂而微妙的，通过他所做的精确转换工作引出，并要求读者进行复制。譬如：对头部的表现与库克平常关于乌兰的漫画并无二致。于是，漫画文本具有双重来源：（并不存在的）塑像和（真实存在的）人。这种随意的画风，充满删略，允许二者都得到投射。模糊本身就意义重大。正因为公共建筑被表现为等同于塑像之物，所以，塑像被表现为等同于此人之物。乌兰就是他的塑像——或者说，乌兰已经是一座纪念碑，一种公共现象，并非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可以用图示方法将这些操作表现如下：



这既图示出变化的过程（通过这些过程连续性的文本得到了重要转换），又图示出这些文本中的每一个在文本 D 中的留存，文本 D 有意地表示出每个先前的文本。

漫画中乌兰塑像的基座上写有难以辨认的文字，我们猜测那是乌兰的名字。这是一种删略转换（deletion transformation）。删略转换在符号学中最为常见。这个例子表明，删略转换的意义不是由删略这一事实单独给出的。这个意义包括被投射的行动者和动机。在这个例子中，给出了我们许多暗示出的行动者和动机。如果我们把这看做对塑像的表现，那么可想而知是时间和天气条件磨蚀了名字。所以，这个意义的一部分在于这幅漫画被置于遥远的未来，那是乌兰的名字会被遗忘，但他的塑像/纪念碑仍会留存。甚至对于这种阐释，我们也拥有双重意义：或者（1）当乌兰的名字在历史中淡忘，粪便还是不会沾上，或者（2）即使他的名字消逝，乌兰的魔力仍然会阻止粪便沾上。但是，名字形式难辨有着另外一位行动者，帕特里克·库克，我们猜测，他对名字的删略表示出了敌意，如其删

略乌兰三维的人性所表示出的敌意一般。重要的是，他要强调，删略本身并不意味着敌意，尽管删略具有一种共核意义。我们从删略这一特定行为得出的意义，不仅复杂，而且专门针对这个文本。它们只是猜测，不是事实。对文本的阐释总是一种猜测，不是事实。但是某些猜测比其他一些猜测蕴涵更为丰富，并且/或者更为可信。对文本的转换式阅读常常在某种程度上是假设性质的，但是这绝非符号学家应该避免尝试猜测的理由。

时间中的符号活动

连接特定文本和先前文本的连续转换是在时间之中发生的，或者真实，或者虚假。同样重要的是，符号活动也是在时间之中发生的。符号活动流可以被理解成其自身就是一系列的转换，由思想控制系统进行组织，或者逃避思想控制系统的控制。转换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结构变化，从结构A变为结构B。符号活动转换中所讨论的结构，是连接符号活动参与者彼此以及连接符号活动参与者与其生产的系列信息和意义的结构。

为考察话语中的转换，一个不错的起点是对话。下面文段选自《梦想家》这部土著作家杰克·戴维斯创作的戏剧。剧中角色是土著人：母亲多莉和她14岁的女儿米娜以及她12岁的儿子沙恩。

沙恩　伦敦的首都在哪？米娜！伦敦的首都在哪？

米娜　哦，妈妈，他肯定在开玩笑。

多莉　为什么？

米娜　你没听见他的话吗？你怎么这么耳背？

沙恩　好吧，我刚才提了个问题。

米娜　现在听着，沙恩，伦敦是英格兰的首府。

沙恩　哦（停顿）爱丁——堡在哪？

米娜　哪里？

沙恩　爱丁——堡。

米娜　我不知道，让我看看。

沙恩　瞧吧，你也不是万事通。

米娜　爱丁堡，傻瓜——苏格兰和爱尔兰首府。这国家的名字应该拼

成 I-R-E-L-A-N-D，不是 I-S-L-A-N-D。

沙恩　（愤恨地）我不知道。（他扔掉家庭作业本，打开一本连环画，看了起来。）

多莉　米娜，把垃圾拿出去，放进垃圾箱。快点，这里苍蝇已经够多的了。

米娜　哦，妈妈，让沙恩去吧。我明天还要完成一份有 10 页纸的关于土著的作业。

如果我们把这个文本当做一连串的话语，那么，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阐释问题。为什么单个的话语会按照这种顺序发生？或者它们具有这样的顺序意味着什么呢？然而，如果我们把符号活动结构作为首要对象，我们对于第二个问题就会得到清晰的回答，对于解决第一个问题也就有了一个框架。对话开头的运动（沙恩和米娜的第一句话）可以表现为表 6.1。构成两个话语的符号活动结构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复杂的转换关系自我揭示出来，在这种关系中，结构 A 的各种要素在结构 B 中得到转换。在任何对话中，参与者作用受到转换是通行的常例。代词体系标记了文本中转换一般发生的位置所在，如“我”变成“你”或者“你”变成“我”。参与者的这种重新分类如此寻常而连续，以致我们一般对此缺乏注意，但是，这也是一个同样重要的转换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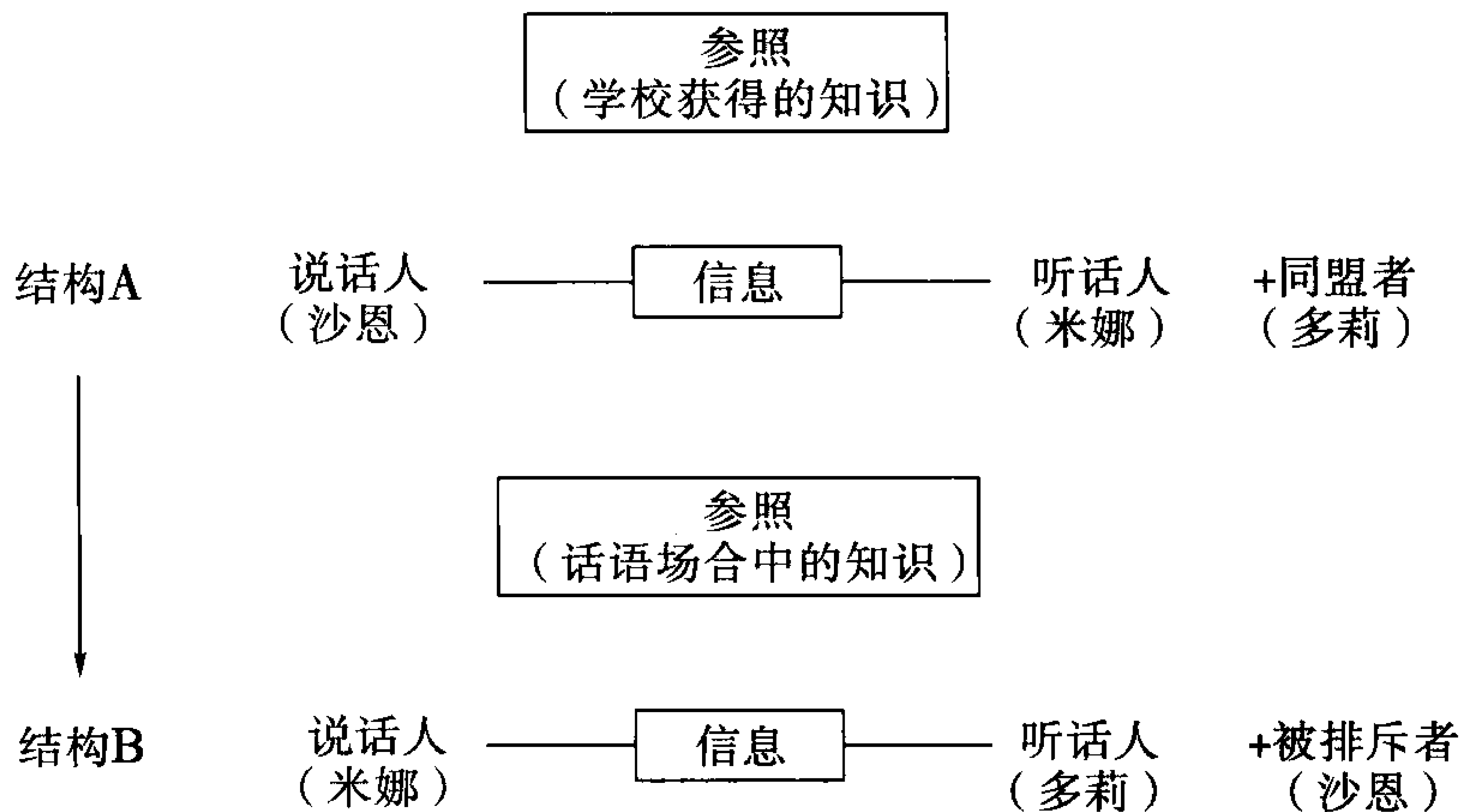


表 6.1　符号活动结构：复杂的转换关系

不过，在这个交际活动中，转换操作更为复杂和广阔。沙恩实际上把同一个问题问了两次。两个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附加的“米娜”，这个呼

喊试图对米娜在符号活动结构中的意义进行转换，所采用的方式是从问题（人群之中的米娜应该具有所需要的知识）变为命令（要米娜给出答案）。母亲多莉出现在符号活动之中，尽管表面上看，她似乎在此节点上并不可见。符号活动结构的最简描述包括指称对象及其社会建构和意义。沙恩正在做学校布置的作业，因此问题就来自这个领域。实际上是学校把自己的符号活动结构带进了这个土著家庭之中。沙恩在重复着一个学校样式的问题。通过这么做，他似乎占据了学校教师这样一个权力地位，把他的姐姐置入他本人那个无知的被问者地位。但是转换是双重的，因为米娜就像学校老师一样，她知道正确答案，或者沙恩是这样认为的。问题的主题属于这个复杂的社会操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其地位是学校（因此是非土著）关于非土著文化的知识。既然，如沙恩和米娜一样，用于澳大利亚白人社会中的土著这种身份，那么，问题的性质就进一步让他们两人转换成为荣誉白人（honorary whites），被英语文化所同化。

然而米娜的答案并不是沙恩所预料的或想要去建构的。按照所要求的，她把自己转换为说话人，但是是对她的妈妈说话，这样，就将沙恩转换为话语对象而不是参与者，她的文本中的“他”，而不是“你”。同时，她还忽略讨论主题，用关于先前话语身份的后设评论来取代学校知识。她的话语是陈述而不是问题，建构起同她妈妈之间的平等和稳定的关系，这就让她的弟弟被排斥在外。这一稳定群体中的成员关系要求特定的知识体系，即白人的学校知识体系，而这可能不是多莉所能共有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在继续进行的讨论过程中，重要的是关于主题的社会划分。这种划分的基本术语是权力和稳定性。知识所具有的那种模糊功能来自它能对二者做出界定这一事实。共有知识（以及对于共有的操作）强化了稳定性。对于知识的控制，在另一方面，共有知识表示并支撑起权力关系。

下一个由多莉施行的对话，则涉及进一步的符号转换。多莉不是用相应的陈述来配合米娜，而是简单地问：“为什么？”这就把她从一个同盟者转换为一个提问者，这样她就并未融入白人那种学校知识所建构的社群之中，她与沙恩的位置要比与米娜的更为接近。米娜想要修补她的转换，所以问道：“你没听见他说的话吗？”仿佛多莉的问题只是表明她没有听见米娜刚才说了什么，并不是她要反对米娜的学校性知识以及米娜作为荣誉白人的地位。但是多莉什么都没说，这正是对米娜所做转换的进一步否定。多莉的不为所动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她身为社会结构中的家长，这一点从

头到尾都基本保持不变。

我们刚才考察过的这系列转换，本身未必有意义。我们需要理解其他社会结构，方可理解这段谈话。首先存在的是土著家庭的结构，母亲能够控制她的子女，而子女们尽管故意拖沓和不情愿，还是会服从她。其次存在的是澳大利亚社会结构，以及土著人在其中的位置。在这个简短对话中，从头到尾，所有参与者本质上都把这些结构想当然了。分析者很想要把这些结构看做非变动、非变化的东西以及一种永久而固定的符号转换背景。但是，它们实际上并不是时间之外的东西：它们仅仅在不同的时间规模上移动。十年前，当米娜四岁而沙恩两岁的时候，家庭关系可能会是不同的。十年之后，他们又会有不同。对于子女以及家庭关系而言，对话发生在一个转换节点上。米娜和沙恩正步入青春期，这个阶段在传统的土著文化中，标志着特定转换的调和仪式。澳大利亚白人的文化所具有的调和转换的这套仪式不如前者鲜明，但又的确存在。

土著和白人之间的关系也并非静止的，尽管对于这里的转换而言，时间规模极为不同。两百年前，欧洲人并未入侵澳大利亚。一百年前土著和欧洲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土著人的知识和英语知识的社会意义，极为不同。另一个百年之后关系会如何，还不可能预测。但是，这些转换中没有一个发生在时间和历史之外。所以，相反的，应该坚持的是，所有这些实践规模上的转换——在交流、人生岁月、历史时期等等层面——都同样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是单个的历时性总体的组成部分，正如在时钟里，我们可以看到秒针不断转动而发条似乎静止不动，然而，二者都是一个单一体系的组成部分。

我们关注过的文本显示出这些其他历史的迹象。我们可以用日常语言来描述这三个层面的历时性，因为它们在此例中都有作用，而且，唯有这样的描述才能充分满足许多目的。就涉及这两个孩子而言，这个土著家庭处于一个转折点上。两个孩子都面对不远将来的新角色，这涉及权力，也潜在地涉及新的薄弱领域，毕竟在劳动力市场上土著人仍然是受到歧视的。性别角色也会破坏他们之间作为姐弟这种稳定性关系。的确存在着一种选择：利用现在澳大利亚白人社会为一小部分顺从的、欧洲化了的土著人所提供的机会。但是，通向权力的道路是代价巨大的：与其他土著断开稳定性纽带。这个对话表明，在小的规模上，这种斗争已经展开了。米娜尝试着土著白人的角色，因为沙恩对白人文化的无知而拒绝他，同时努力

要维系与自己土著母亲之间的稳定性关系，假装母亲也在经历着同样的转换。她所尝试的任务，她希望会免除她身为土著女儿的义务，恰好成为针对土著人的一项工程，但是这仅仅是强化了她与自己家庭和人民的疏离，因为学校课程把它们转换为客体，从一个白人的眼光来看待的客体。相比之下，沙恩被定义为一个失败，因为他不具备关于白人文化的知识，而且在遭遇挫折的时候（此时，是米娜让他受到挫折），他拿起的不是长矛或回旋镖，而是一本漫画书。

这个对话是虚拟的，但是它阐明了通过累积而建构起历史的无数细小事件的动力学。更正式地对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它如何用这样的历史进行言说。这个简短的交流包括三个人关系之间一系列对立性的转换。为了说明，我们在这里选取的是多莉（在下表中以字母 D 表示）和米娜（在下表中以字母 M 表示）之间的关系。出发点是多莉与她的女儿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和稳定性（+）关系。有时其中的一个或另外一个建构出年龄基础上一种平等（=）而稳定的关系，一种米娜比母亲优越但却非稳定的关系（她对白人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或者她同母亲之间一种新的平等而稳定的关系（通过将她们二人都转换为白人）。

基础关系	经过转换的系列关系	转换位置
	D+－M （M：年轻 → 年老）	年龄
D+> M→	D－< M （M：土著 → 白人）	种族
	D+＝M （M 和 D：土著→白人）	双重族性

所有这些转换都可以在这个单一的交流中找到，并与之共存。这情况和索绪尔在历时语言学中提到的是相同的，在历时语言学中，替代形式在言语层面上，以他所谓共时性状态，临时地共存。但是，尽管这些替代形式，在这个家庭生命的这个阶段，在这个文化阶段，是共存的，但是，人们却不能无视撷取文本一小片这种研究中体现出的长期变化总倾向。这种方向性来自某些转换在转换阶段的一极或双极位置上的受阻。导致受阻的诸多力量可能在单一一次交流中看上去不具模糊性：实际上，它们必须在更长期的历时性阶段中才能看得分明。譬如，20 年前，土著→ 白人这种

转换也许对于土著人来说非常困难。而现在却相对容易了许多，尽管仍然有很大的难度。结果，单一的转换（米娜：土著→白人）要比双重的转换（米娜，多莉：土著→白人）可能性更高。这样一种不同的转换可能会撕裂两代人，打破土著家庭的稳定性。

对于语言描述进行一种精确的转换分析能够表示出比特定社会转换中所实现的更为全面的一系列变化。譬如：米娜在这里表现出对于白人文化过于熟络。只是在她把爱丁堡当做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首府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而这个错误，即使是她这个年龄的白种澳大利亚人也会犯的（尽管同龄和同水平的英国女生也许不会）。① 但是，在剧本的后边部分，她被表现为因为与自己的土著男友约会而晚归，离开了学校，为了土著稳定性而抛弃了困难的白人文化。这不过是一种可能的个人历史。即使如此也不能说是确定的，因为后来，在她的生活中，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她还是可能选择白人文化，或者至少其某一个部分。而且，即便她结婚之时似乎选择了多莉一样的立场，如果她的女儿试图说动她，如同她试图对多莉所做的那样，也许她就会采取一种不同的立场。

共时性横组合段与凝结了的时间

仅仅对历时性的三个层面进行定位，当然，只是一种简单的粗略办法。历时性有数不清的层次、数不清的尺度，话语便在其中产生意义。我们引用的这段对话可能费时一分钟。在口头语言里，单一一段对话所花的时间很短，英语中每说一个单词平均只需大约半秒钟。但单词本身由单个的语音和音素组成，它们的产生速度大约是每秒 12 个，以发音清晰可辨为条件，每秒的上限可以达到 20 个。提到这些数字，是为了强调，在这些层面上，事件发生速度极快，似乎是一瞬间的、静止的，尽管简短，正如在其他层面上，事件推进速度极慢，也似乎是不动的。差异是度的差异。但这些度上的差异，对意义的生产和接受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对所有其他类型的符号而言也同样如此。

为了进行说明，我们只选择一个单词来考察，这个单词仍然来自前面

---

① 爱丁堡是苏格兰的首府，北爱尔兰的首府是贝尔法斯特；爱尔兰是独立国家，首都是都柏林。——译者注。

引用过的对话。沙恩在两次提问之间都用到“米娜”。这个单词独立成句，所以是一个横组合段，因为没有横组合段就没有意义。在口头语形式中，似乎它不具有一种时间之中的结构，或者说它的书面形式是这样暗示的。因为它的这种特质，我们称之为共时性横组合段。但尽管如此，它仍然没有脱离时间。“米娜”一词嵌刻在日常用语之中，说出它大约需要半秒。作为呼喊语，它则需要整整1秒——时间要长1倍。多出的时间为音质延展所占据，又尤其是发生在自己的时间规模中的特定音调模式。音调有许多种模式：Mèena（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降调，祈使句式）；Mèéna（降升调，包含命令和提问）；Meéná（双升调，表示提问或请求），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变化形式。单词与音调模式相互结合，同等地对时间中展开的线性横组合段施加影响：“米娜，我命令你告诉我/请告诉我/你是否能告诉我。”但这些形式都是在时间中展开的。“米娜”这个单一话语似乎在一个单一的瞬间呈现出了一个横组合段，而这个横组合段接着发生伸展，因而该横组合段可以得到解读。

实际上，书写习惯把它呈现为历时性横组合段：“米娜+!”尽管在一眼望去的时候这又变成了一个共时性横组合段。书作体系在这里引入了一种生产和接受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所以当横组合段产生时可以是共时性的，但当它接受时却是历时性的，尽管这要取决于特定读者或者解读的情形如何。共时性横组合段与历时性横组合段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它是意义产生和接受活动在物理性的时间和空间中的条件。但是，正因为它具有这种物质现实性，这种区别强有力地影响到对信息所具有地位的判断。横组合段似乎是共时的，外于时间的，这样一种解释显得更加合理，因为它们插入的关系似乎在单一的时间与地点上建构出了某种同一性。所以，“米娜”比“米娜，听我说”更令人信服地插入了权力，因为这似乎暗示着，名字的性质会被包容在祈使句式之中。

共时性横组合段能够在空间中得到运用——就像在写作、绘画与摄影中那样。它们还能够作为两种介质的结合体而存在——譬如：在电影的音轨与形象之中，对于这二者的结合，爱森斯坦称之为垂直的蒙太奇（vertical montage）。但是，共时性横组合段甚至能够在相同的时间和相同的介质中产生，譬如“米娜”就是如此，其中音调和音系两个体系都携带于声音介质之中，共存于有意义的结合之中。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绘画和电影中，其中颜色符码与表现符码是共同存在的。这种现象在人类符号活动中

甚为普遍。实际上，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说，人类的信息体系都是典型地多符号活动的，包括了多种共时性横组合段，它们具有矛盾的特质，因为它们看上去如此透明，以至于几乎不被认为是信息，然而，它们又特别难于分析或反抗。

作为转换的蒙太奇

为了把这个讨论拓展为一条普遍性的符号学原则，我们将思考视觉媒介。爱森斯坦颇具前瞻性的电影理论集中关注了作为电影主要横组合原则的蒙太奇手段：将一张张胶片粘贴在一起以创造出特定的电影意义。的确，对电影语言的完整描述必须包括框架或背景中，或者按照爱森斯坦对图像与音轨或场景与事件的并置方法命名的那样，像垂直的蒙太奇中的许多其他“并列—合并”那样。不过，爱森斯坦对镜头蒙太奇的强调，对针对电影的社会符号学而言，仍然是正确的，因为每条胶片通常都是单一镜头所拍摄，占据了一个单一的时间和空间，而这种定位性表示出构成话语的社会关系。所以，镜头蒙太奇是一种转换序列，正如口头话语中的符号活动转换一样。其精确的历史对于它的阐释至关重要，而且它以同样的方式，同在其他层面上运作的其他历时性结构和转换相互勾连。

为了进行说明，我们将从漫画《神奇女侠》中选取两个页面来分析（见图 6.2）。我们所使用的原则，同样也能用于分析来自电影或电视的系列镜头。第一个页面有五幅图，第二个页面只有一幅图。在每个图框中，视角表述都很清楚，就像是镜头一样。这似乎将读者放在与艺术家一样的位置上，双方视角融合，因而具有与动作之间的单一关系。头两幅图是一个复杂的转换，涉及不只一处的视角颠转。第一个页面就是第一个页面，必须记住这一点。并没有其他的引入，这就是引入。第二个页面提供了通常这类漫画开始时的那种信息。所以这个故事的读者是冷不丁地开始。她也许对神奇女侠有所了解（我们此刻说“也许”：实际上，对于确切的关系和这些读者的不同建构是绝对不能想当然的）。她与漫画的主要关系是顾客同产品的关系，同时伴随着与生产者/艺术家之间的居间关系。正是这样一种结构受到了第一幅图的决定性转换。

起句的“看着……”是一个祈使句，把自由的顾客置入一个从属的位

置上，要求毫无质疑或无须理解地服从。这样一种视角是略微高出一点的，充当一种透明的权力能指，而且是从即将展开的叙事内部而来，所以也充当一种透明的参与能指。但是图框很窄，容不下或许能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解释的关联场景和语境。并没有什么“奠定基础性质的镜头”。艺术家想来比读者所知更多，而且他根本不愿意分享他所掌握的知识，这样就能通过这种不对称性摆布读者。通过观察立场所表示出的，远非一种同一性，而是一种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一种刻意为之的非稳定性。



图 6.2　“神奇女侠”的共时性和历时性横组合段



第二幅图把艺术家和读者的位置定得更高了一些，看上去也更为有权力。但是现在这个视角是进一步地来自场景，行动从中心外移，而且不是朝向读者的。于是，这种转换，从一幅到另一幅，更进一步地把读者排斥在行动之外，让他们处于一种权力更大但却更无知的地位。这种地位是艺术家经过了选择的，不是作者想要如此，所以效果也就更具强制性。读者

在权力最大的一刻体会到没有权力的感觉，这正是这种视角所表示出来的东西。

第三幅图是观察者立场从极端的伪权力到眼睛平视层面的转换，观察者看到，神奇女侠面朝一边跪着，更进一步地，是从她而不是从现在被指认为王后的另外那个女人那里看到了这种转换。王后的话给出了关于下边要发生的事情以更多信息，但是却激起了一段隐蔽的历史，涉及戴安娜的"名誉"，而对此做出裁决的是爱神。在爱神眼中，戴安娜的罪过是接受了爱还是拒绝了爱呢？阿佛洛狄忒这个名字的出现使人想到希腊神话，它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受到了欧洲文化中身份尊崇的说话人的高度重视。在以英语为母语者的文化中，大多数20世纪处于青春期的女性读者都不会知道阿佛洛狄忒是希腊爱神。不过，在此处它们给出了这一信息。正如视图角度从远而高切换到近乎平等，所以，相应的，共有知识的程度得到了扩大，尽管仍然不乏距离和权力之别。在第四幅图中，视角置于神奇女侠后方，在她跪着凝听阿佛洛狄忒的双重信息的时候（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前提是你做到我要求你做到的）与她的头平行。神奇女侠被标记为一个女儿，而不是一个超级女英雄（在原图中，"女儿"一词使用的是黑体），她似乎要经过某种服从的考验。此前一直受到控制的认同可能，现在以极大的力度为女孩子读者提供出来，而那个权力极大的母亲角色，到此为止，已经接受了漫画作者们强加在她们母女之上的神秘考验。

从第五幅到第六幅之间的过渡需要翻页。图画表明神奇女侠挣脱铁链，强化了她的超能力。但是蒙太奇效果也同样惊人。这幅图不仅是前边各幅的五倍大，而且包括了前边隐而不露的信息。上边方框中的文字给出了关于她的明确信息，这种信息一般都是故事的开始。故事的标题在图下方出现——"遗产"。创作团队的身份也放在这个位置：四男一女。南希·霍拉罕的名字在方框的左下角，她所担任的是"着色"这个不算核心的工作。这幅图的视角是与居中的火花平行的，同时也是同仍然跪着的神奇女侠的头部平行。图画尺幅的增加允许我们看到更大也更细节化的神奇女侠，仿佛给了一个近镜头，而且语境也更为明确，仿佛给出了一个长镜头。收到的后果是画作让读者同时感受到了更大的权力感和更强烈的亲近感。读者看到，神奇女侠处于她本人的层面，望向被认同为阿佛洛狄忒的那团火。

就这个漫画而言，一个必须得到研究的符号交流，是作者同其目标受

众之间的关系：即以英语为母语的处于青春期的女性读者。作者，如我们所看到的，基本是男性，他们自我转换，在一个全然女性的世界中占据着一个女性的观察点，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女性幻想。我们，本书两位笔者，作为分析者，都是男性，在我们中甚至连一位女性着色师都没有，所以我们请一位 18 岁的女孩子阅读这两个页面后写出她的评论。

哦，我不喜欢这样，神奇女侠被贬低了。尽职尽责固然很好，但她不应该卑躬屈膝！看完这一页（即第一页），我就直接往下翻，把它（即开篇部分）忘掉，因为，你知道，那才是神奇女侠真正应该的样子，压倒一切等等。

根据这样的评论，我们可以勾勒出读者反映的进程。显然，在看漫画之初，她是带有对神奇女侠强烈的初始期待结构的，她期望与之达成认同——但是这样一个人应该是有力的而不是羸弱的。她记录下了漫画对这种结构尝试过的转换，至少是在内容层面的，但是却拒绝它们，感觉漫画本身将她隔离一旁。所以她在第二页达到了对这种转换的转换，有了一种解脱感：它取消了前一页中尝试过的转换，而且她计划要忘掉曾经发生过的东西。

实际上，第一个页面上表现的这种情形要比第二个页面更接近于她的个人经验。这位读者仍然住在父母家中，尽管她为公共机构工作。她属于中产阶级、有知识、相貌迷人，而且能够买得起新潮时装；她喜欢挣钱，也有一些工作上的抱负，但是并不认为自己做好了离开家庭的准备，尤其是没有准备要安定下来和结婚，既不想嫁给她目前“固定的”男友，也不想嫁给其他什么人。她比米娜大四岁，生活条件也不同，但是，她可能距婚姻同样的远，也处在相似的转折点上。由这本漫画书第一页的符号活动结构和内容带来的那些关于无助、无知和服从的体验，表现出她目前所处位置的一极，她已经在成长中超越了的那种经过了夸张的孩子式驯服。她的话是“我就直接往下翻，把它忘掉”，与她生活中所涉及的转换点是彼此适切的，同她对该文本的解读是适切的。与那段土著对话一样，这里也有着参与者的个人历史，从转换角度来看，它们是同符号活动行为的转换操作彼此勾连的。再一次，这篇短文提供了比她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的要更为广阔的系列结构和转换。

因为更为宽广的社会历史，她的个人历史本身具有其所表现出来的形式。随着劳动力大军中女性数量增多，女性们所要求的是更加自动化，并且还有因妇女运动而产生出的新的意识层面等等，这些共同构成了制约并塑造这个女孩历史的诸多状况。这种普遍性的运动在文本中留下了痕迹，其中一个部分涉及文本作者的性别身份。这些男性达成了一种性别转换，占据了女性的位置，同时从这一位置出发，他们独具特色地挪用了女性经验。神奇女侠本人就是另一个方向上的部分转换。作为神奇女侠，她是公主，但是作为女性，她是戴安娜公主。类型上说，她是对超人的转换，但是在文本本身之中，她被比作经典的男性以及女性："如阿佛洛狄忒一样美丽，如雅典娜一样智慧"，同时"比赫拉克勒斯更强健，比墨丘利更迅捷"。在女人中她无可匹敌，只是与之共有卓越的稳定性；在男人中她可以匹敌，但即使男人们特有的力量和速度方面，她仍然能够超越。

这一点提出了更为广泛的关于性别和类型形式关系的话题，这一话题在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写作这两种语境中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根本性的问题是，是否现有体裁对父权制价值观念的进行了如此有力的编码，以至于在更有力地保护它们的意义上说，用女性角色替代男性角色可以让潜在的价值观念体系继续保持完备。我们的立场是，尽管这是一件复杂的事情，然而，如果体裁的确对参与者的社会符号关系进行了编码，那么新的社会关系，包括对于性别角色的新的/不同的价值评价在内，都会要求体裁形式的发展，使其能够充分而适当地编码这些关系。同时在既定角色中切换性别立场将对任何一种体裁形式产生影响，而且，通过这种切换，影响到该体裁所投射的这套社会关系。

对经典的指涉，指向符号活动结构本身一个令人好奇的方面。它们构成了"关于经典的知识"，一种得到认可的知识领域，这在英语文化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英国，直到19世纪为止，希腊和罗马文化都是统治精英所拥有的标志阶级的标记，甚至商业中产阶级成员也被排斥在外，马修·阿诺德曾对此进行了的阐述。但是，在20世纪，课程发生了大的革命，不同的知识体系现在成了"文化"和统治精英成员的标记——正如像公主、王后这样的皇家头衔不再标识统治精英这种资格了。我们这位女性读者，尽管受过值得尊重的教育，却不能记得阿佛洛狄忒和雅典娜分别是哪路神仙，但是这并不让她苦恼。她既不希望记得，也不觉得这种知识有什么必要，尽管她充分了解，足以能够辨识（或者相信）对经典的指涉是

正确的。所以，知识结构中一种真实却遥远的转换，被文本的符号活动策略所重复，它将古典神话不是转换成为当代（高雅）文化，而是转换成为流行文化。她感到，这种知识把她同漫画作者隔绝开来，但是，这是一种不成问题的转换，对此，如果她愿意，她可以将其颠倒，这样，不仅能复原文化的过去阶段，而且能恢复与先前文化精英之间的关系。当然，她的这种转换，对比试图从土著背景进入英澳文化的米娜，要容易得多。它起到了一种把文化中的进步倾向同退步倾向结合起来的效果，再一次在话语层面上，显示出极其广阔的一系列矛盾性的转换和可以替换的历史。

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为了让操作可见，历时性可以运动得非常迅速，也可以运动得非常迟缓。我们这位女读者触及到一个与此相关的重要事例，因为对于第二个页面，她所说的是，“那才是神奇女侠真正应该的样子”。这幅图是用挣脱铁链这个个性化的动作来表现神奇女侠的。更确切地说，这幅图表现出，她双手一振，铁链断裂，附加的速度线条和声音效果表现出了所发生的事情。图画是静止的，但是横组合段的意义则是运动。由于形象是静态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共时性的横组合段，然而它却被理解为一个运动的横组合段，一个历时性的横组合段。为了对其进行解码，眼睛必须历时性地移动，从一个部分到另一个部分，惟其如此才能建立起横组合段的诸般细节。在某种意义上，整个页面都是一个共时性横组合段，作为整体一览无余，然而，因为它必须得到解读，而且因为解读是在时间中发生的，所以，它也是一个历时性的横组合段。但是，在另一意义上，神奇女侠也是一个共时性的横组合段。图画上方的方框中的文本列出了她的多种品质，但是这位女读者显然并不是靠这种罗列才能了解神奇女侠究竟何如的。神奇女侠是一个复杂的意义集合，可以被置入时间和空间中的横组合段之中，而且必须用那种形式来得到把握。但是，对于实践和重复而言，这些横组合段挤压在一起，看上去似乎是同时发生的。它们越是看上去像同时发生，它们就会越显得具有内在性，因而也就越不证自明，越不可挑战。因为这位女读者不能特别地记得她关于神奇女侠的横组合段形成于何时，所以她的印象似乎对她而言具有一种绝对性的地位，而对比之下，第一个页面的历时性的横组合段就失去了力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时间这种历时性维度绝对不是与符号活动分析无关。时间可以运动得太快或者太慢，以便能够轻易地被看到或者结合到分析之中，但是，时间总是同阐释相关的，忽略时间就总会造成扭曲。共

时性和历时性之间没有固定的分界线。只有历时性现象，按照不同速度以不同规模运动，为了某些目的，可以将其处理成静态，但这只是权益性的，出于策略缘故的。话语是一个意义在符号交际活动参与者之间起作用的场所，无论这话语是演说还是对话，是漫画还是电影，是仪式还是游戏。于是，话语分析能够揭示出构成这些交际的操作，其中时间流的社会行动在某些方面来说是极其明晰可见的，其中转换可能性在被压制成为历史或历史缺场的道具之前，可以被允许有更为自由的表演。但是，只有话语的内在社会结构成为根本性前提条件，只有散漫的诸多事件被组织到了一个复杂却统一的历史性框架之中，这才有可能发生。

解读历史

社会符号学不能没有对历史的描述，正如它不能摆脱社会理论一样。但是解读历史的策略自身又有其宏大的历史，今天又许多富有影响力的历史理论和方法供选择。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方法创造，但同时，我们无法回避在更广阔的史料编撰学中定位社会符号学这一义务。因此，在这部分中我们将做的是一件专门而有限的工作。我们将只集中讨论一个关于历史方法的主要话题，而且大致将范围限定在来自语言研究中的某些概念和方法上。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建构出一些原则，它们可以更广泛地运用于历史方向的社会符号学课题。

我们要关注的是历史中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福柯就是一位关于话语的重要历史学家，他曾经说过，这是当代史料编撰学中的一个主导性论题。在许多类型的知识史中，他看到对于非连续、分化和断裂的关注，以及与之相伴的思想体系中的危机与革命，非连续事物如此庞大，以至于断裂之前和之后的思想和意义体系连标准都发生了改变。他本人作为研究思想观念的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其中一例。所以，再提两个具有影响力的名字，那便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认识论，以及美国人T. S. 库恩的科学哲学。不过福柯还注意到了历史工作中连续性的在场，或者更应该说是不同层面、不同系列的非连续性。有关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之间的关系以及非连续性的地位是不乏争议的。宣称危机出现了，抵达一个分水岭了，革命发生了，诸如此类是让人激动的。但是，连续性似乎在

这些激进的断裂之下和之上流淌着，对其炫目的决绝意味投出怀疑的目光。对于社会符号学来说，更重要的是，包括“革命”这个观念在内的这些主张中最为激进的那些，已经彻底改变了基本的思维模式和产生意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些理论最终落脚于源自历史符号学那些未经明确说明或未经检验的前提。

要开始粗略描述历史符号学的基础，我们将回溯到19世纪。索绪尔在比较语文学的传统中接受训练，在攻击历史问题上，比较语文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一印象让人如此深刻，以至于许多人在这个为历史着迷的时代中，认为这一学科提供了一种面向所有历史探索形式的模式。索绪尔的工作标志着一种断裂，一种非连续性，在他之后，语文学的这种主张不再普遍了。但是，这一历史学科的成就还在，至少值得社会符号学再度检视。

该学科的成就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每个都以一种不同却互补的方式同非连续性和连续性这个论题相关。最让人瞩目的成就是某种样式的非连续性理论。在分析声音变化中，尤其是分析欧洲语言的声音变化中，语言学家阐述说，存在着“巨大的”声音变化。这些变化影响到的，不仅是单个的单词或声音，而且包括了语言的整个音系体系。它们显示出巨大的规律性，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发生，跨越了整个系列的语言社群。这些就是革命，却是看不见的革命。它们的发现在19世纪用一系列语言“规条”进行了梳理，这些“规条”就成了一种新的历史方法的检验工具。但是，随着这些规模巨大的规条的发现，在对它们的梳理基础上，另一项工作也在进行：追溯单个单词的起源成为历史性的词典编撰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工作为词典的编撰提供了滋养，而词典编撰，以现代的《牛津英语词典》为例，仍然是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资源。这第二项学术事业在其主张方面并不磅礴，实际上还有着一种对立倾向。在声音变化规则围绕非连续性提出巨量规律性的地方，历史性的词典编撰学聚集的是无数的连续性，时间流逝中单词和意义的缓慢变化因子。尽管词典样式在针对19世纪传统的反动中发生了改变，尽管很少有学者愿意或能够进一步推进这项事业，这项工作仍然是可能的。

我们不想暗示历史语言学中的变化发生是毫无道理的。相反，索绪尔对于历时性语言学的不快，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见，正来自于他关于语言学本身的性质和范围认识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他所开创的整个传统所共

有的。在这些问题的核心位置，是语言研究与社会力量研究之间的隔阂。没有了这种联系，考察语言变化的理由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理由首先是从社会力量中发现的。所以，只有在社会语言学理论中，这些问题才可能得到正确对待和得到解决。在此，做出本质性开创工作的是 W. 拉波夫，他的作品不只成为社会语言学中的主导性力量，而且为一种新形式的历史语言学打下基础，社会符号学可以从这种新历史语言学中汲取力量，为自己的目标服务。

如我们在先前所见，拉波夫主要研究语言变异，因为这同社会分层彼此相关。但是，他也对解释这种变异的机制进行了调查。他清晰地表述了历时性研究的根本性前提：人们必须认为，语言变化的机制，无论对于小规模当代现象还是过去大规模变化，都是相同的。从符号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对这一前提进行拓展，使其涵盖所有符号形式。拉波夫事实上并没有发明这一前提。如他本人所说，这是新语法学家（Neogrammarians）的基本前提，这是与索绪尔同时代的一个活动积极的语言学流派，索绪尔本人对其工作相当了解。正如拉波夫对其所做的重述那样，这条原则听上去足够明显，事实也是如此。经过索绪尔式的分裂之后，该原则对时间的压制本来不可能发生，因为从任何内在意义上说这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必须从别处找到理由，说明为什么它在学术话语中基本无人说起达 40 年之久。

拉波夫用到了乔姆斯基式的转换语言学，但是同索绪尔一样，他尤其关注声音的变化，并且用与索绪尔相似的方式对之进行图示，精确地用特定的系列条件和约束描绘出成序列的各种转换。索绪尔只有三个阶段——阶段 1，具有形式 A；阶段 2，其中形式 A 与形式 B 共存；阶段 3，其中只有形式 B 得以留存——拉波夫把索绪尔的阶段 2 拓展成五个步骤。第一步，自由的变异是存在的，这来自于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第二步发生在这种变异变得具有系统性的时候，这与特定群体或社会状况有关。作为这种关联的结果，按照拉波夫的说法，这种关联起初可能是无意识的。第三步，变异作为群体标记或状况指示标志而逐渐有了社会性意义。第四步，标记得到了系统性地发展和泛化，成了特殊音系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腔调”。到此阶段，标记拥有了一种众所周知的意义，不仅对群体本身是如此，对群体以之为对照而自我定义的整个社群也是如此。第五步，一系列标记沿着同一连续体而被夸大，成了一种定式，集中了来自外部社群的语言偏见。到这个地步，使用这种突出形式的群体处在索绪尔所说的

第三阶段，但是作为整体的社群却并非如此。不同的形式共同存在，对于该言语社群的所有成员而言，都可以理解而且具有意义。它们的意义和原理是表达和控制社会关系。

对于关于分裂的理论而言，这一点的最重要暗示在于，它们从未真正发生过。不过，它们无疑看上去会发生，这种看上去会是很重要的。在分裂表现之后必定是重要转换和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严重对立，这本身也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研究分裂的理论家常常都是最具启发性的历史学家。这种转换必定存在，在不同程度上、在先前的体系中存在，而且转换必定与原初形式共存，形成一种有意义的关系，如果转换对于以之作为标记的群体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只会起到为其社会功能服务的作用。所以，认同这种转换、受到这种转换的这个群体，必定理解原初形式以及改变了它的原初形式。关于先前那个群体能够轻易颠覆这种转换这一点，并非那么具有公理性，但它的一种形式的确是它们自身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两者之间的屏障的形成原因必定是社会性的而不是认知方面的。如果一个群体用一种重要的转换自我凸显，那不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别人，而是因为他们理解却摒弃了别人。关于语言，或思维，或行为，或表现的一种新风格作为一种反语言（借用韩礼德的说法）而起作用，肯定了身份和差异，宣示它的意识形态并保护它的秘密。

把艺术或文化阶段看做被不可通约和不可理解的深刻裂隙所分割的独立整体，成了一种错误，但是却意义重大。它反复重申了霸权行为，主导群体正是通过这种霸权行为对历史进行改写，它们试图借此规避对其意义不予苟同的那种对立。但是，在那种历史之中，它融入了对统治群体曾经是革命群体这一点的承认。库恩的科学史作为一种不可通约的范型的延续，陷入了接受对历史进行改写这种错误的泥潭中，对此，他的观察是，这是统治群体的惯常做法。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每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具有延续性的“统治思想”或者主导性文化形式，给予统治者的，不仅是他们赢得了胜利，而且他们的手下败将也被抹去了痕迹。

明显的分裂作为巨量的普泛化转换而存在，它们具有典型的可逆性，并且一直为此做好了准备。思想观念或符号形式的历史，按照一个接一个的时代，跨越各个分裂时刻而前行，事实上接受了关于统治群体及其形式就是社会和文化总体这种主张。它们将时间中的斗争改变成为跨越时间的

差异，通过非法地将其转换为历时性，它们使实际的历时性操作更加难于追寻。它们标识重要的社会变革，因为只有重要的社会变革才能产生出明显的分裂，但是，这种变革的性质就变得更加难于看穿了。分裂不是一种认知上的障碍。它与口头语言类似，后者被用于表示符号活动和思想因如此障碍而不具通约性，但它实际上要说的与此正相反。一个接一个的阶段可能显得极其不同，但是却绝对不会是不可分辨的。这种普通符号学中最贴近的微观层面上的现象是一系列的时装。不尚新潮的人觉得，裙子的滚边可能太高或太低，头发可能太长或太短，但是这些拒绝随时潮而动的人准确地知道，他们所弃绝的是什么意义和什么群体关联。所有这些变化都可以用连续性和非连续性进行分析，都具有滑动或转换的特点，用两个模式的任何一种来阐释的人所做出的选择，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意义。

历史语言学提供的另一种资源和模式是词源学传统。雷蒙德·威廉斯的《关键词》一书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一传统，显示出它那潜在的生产力。他的动机，同拉波夫一样，来自当下的需要和结构，而不是过去。他观察到，作为一个文化分析者和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他本人所用的词汇都从属于意义的变迁和非连续性，这些词汇的源头都能够在社会和历史中得到精确定位。这些单词在词典词条中的完整解释都包括了一系列的意义，都不是单义的。尽管作为整体的罗列可能显得不可理喻，但这种模式却具有历史方面的意义。意义的主要变迁，新术语在写作中的出现（他认定，这些词汇可能进入口语中的时间略微早些），总是源于社会历史中的事件，并且照亮这些事件。但是，尽管在这种意义中存在着质变，它们的根据在当代术语中仍清晰可见。它们是依时而变，而不是另起炉灶。同时，之前的意义常常留存，这使词条变得更复杂，却也在历史中更加多姿多彩。

为了将词源学研究建构到普通符号学中去，我们需要从符号学角度理解，如威廉斯所研究过的那样，追问单词是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威廉斯所追寻的转换中所讨论的结构是什么。索绪尔式的符号学鼓励我们把单词看做基本的符号，对应于根据语言专属规则切割成片的现实。对于威廉斯所研究的大多数单词而言，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对于许多单词，他都按照通常的惯例，以假设形式给出了定义。所以，很多相似的单词，同义词能够用于给单词意义指出方向，因此，作为这个领域中基本的符号学前提，我们就可以认为，由此所暗示的就是，单词的意义在最低程度上是

一个模仿层面的横组合段（或一系列模仿层面的横组合段）。单词携带着经过压缩的信息，是一种共时性横组合段。单词的重要性，对于历史符号学而言，在于隐晦地包含在单词中的信息被无数次地重复，所以现在它们常常潜能无限，以至于能够接管这个横组合段。在这种框架之中，对单词的研究也就是对关键文化文本的研究。同颇具锋芒的比较历史方法为伍，它能够在时间的回溯中对一个光点进行延伸，从而重建意义的复杂结构和操作，若非如此，意义就会长期地消逝。而且，它能够用于其他媒介中反复发生的固定的共时性横组合段，譬如艺术、电影、建筑或仪式中的手法、主题和惯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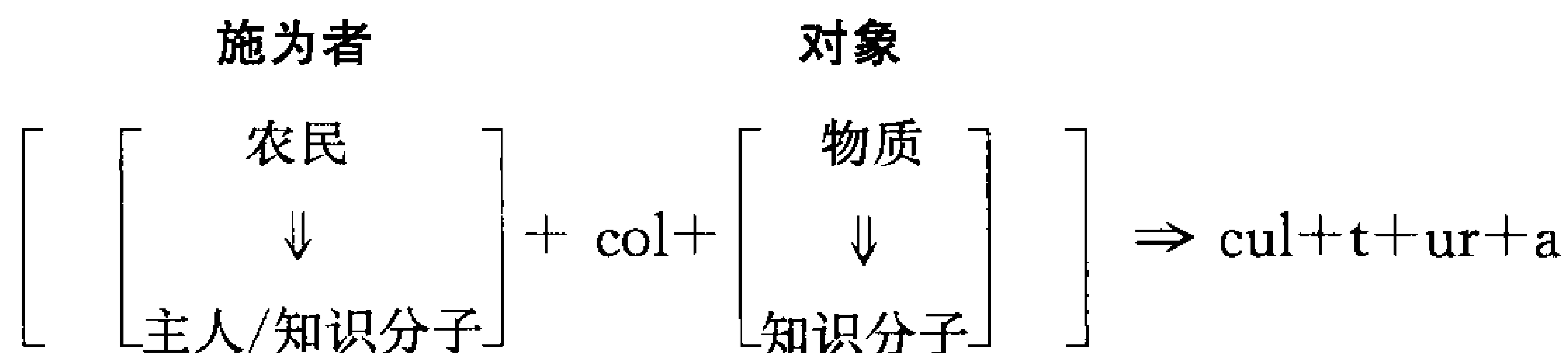
我们将通过考察文化这个单词来阐述这一方法，这个词是威廉斯分析过的。在《关键词》中，他为之使用的篇幅达六页之多。他给出了它的词根，拉丁文 colere，其字面意义是“开垦”（to cultivate），“殖民地”（colony）和“崇拜”（cult）也来源于此。他的分析追溯了这个词逐渐拥有抽象意义出现于何时，这样，在 20 世纪末的今天，根据威廉斯的看法，我们有四大系列的意义：原初的开垦这一身体行为，以及三个转义，即艺术文化，知识的普遍操作，以及一个民族的整个生活方式。他将后三者的强势出现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尽管他看到准备期是相当长的，可以一直回溯到 16 世纪。如果存在着涉及英语中这个单词的“分裂”，那么，这要定位在 19 世纪中叶。我们甚至可以更为精确些。马修·阿诺德 1869 年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启动了三个新意义中的两个，爱德华·泰勒 1871 年的《原始文化》为第三个意义提供了广泛流行的机会。分裂理论也许还会注意到 1867 年的选举改革法案，它一下子就让英国的选民人数翻了一番，这让阿诺德无比震惊，而达尔文 1859 年的《物种起源》既影响到了阿诺德，又影响到了泰勒，前者因之而无比不安，后者则因之而信心百倍。

但是，一种符号考古学可能也会指出，这种意义结构已经存在于拉丁世界之中了，对于懂得拉丁文的英国和其他欧洲知识分子（阿诺德和泰勒就属此类），是可以接触到的。威廉斯所追溯的历史大部分是像他所记录的那样发生，但是却受到我们同样必须理解的另一种历史的限制，完整的解读必须遵循这两种历史的表述。

因此，我们将用词根 colo 开始，从其发散而来的单词对其进行了固定。刘易斯与肖特所编的拉丁词典给出了它的四个主要义项：开掘或照料；居住；付诸关注；崇拜或献媚。第一个意义在拉丁文中是最常见的形

式，是整个系列意义的起点。显然，这个单词不仅指示行动本身，而且指示一种具有典型施为者和对象的操作。正是这个完整的模仿层面的横组合段，这种转换模型，赋予了它最低限度的意义。行为是农场工作：翻地、照料庄稼等。我们可以理解，这里的施为者是农场工人或农民。对象是劳动者所工作的一类实体：诸如土地、树木、水果等。另一个有关身体方面的意义是“居住”。在它所发生其中的这个完整结构里，这是一个非及物性的模式。尽管在拉丁文中它采用的是受格形式——譬如家或田地——这些被理解为地点词，行动者也不再是工人而是主人。它的转义则只涉及对非身体行为的暗含对象进行转换：崇拜（神灵），献媚（贵人），培育（德行）。

在拉丁文中，施为者常常和动词形式不可分割（譬如 colo 意思是“我耕种”）。对施为者的分类以及对象的分类都有着相似的考虑。解释大部分意义的主要转换是由两个相互关联的转换组成的一套转换，即对被认定的从农民到主人或知识分子的转换，以及从具体对象到被认为已经在知识方面“进行过加工”的抽象品质的转换。看上去启动这种转换可能的群体很可能是依赖占有土地阶级的知识阶级，但是这些记录并不足以让我们对这种猜测进行检验。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成套的转换在固定 cultura（拉丁文，“培育”）以及其他派生词的意义方面继续有着活跃表现。cultura 是通过增加系列元素产生出来的，＋t，＋ur 以及＋a。我们可以将这种转换过程表达如下：



所以，在它被法语、英语或其他欧洲语言借用之前，cultura 就有着自己的历史，清晰地嵌刻在它的一套意义之中。它并不只是对应单一的一块现实，它代表着一套可能的转换操作，并带有一套进一步的附加判断，伴随这包括转换以及附加在内的整个一系列东西，形成了一个动态的意义综合体。当它第一次出现在英语、法语和德语中，它似乎失去了它复杂的附加内容的绝大部分，但是，在威廉斯所追溯过的历史中，它所获得的是原初综合体的系统复苏。

但是，这并不会让这个词的英语史没有意义。有力的线索也许在拉丁文中就埋下了，但并不是所有选择都被用到，甚至它在英语中的重新被翻检出来都是一种社会行为。当我们注意到实际的话语，我们看到无数特定转换出现又消逝，数量远远大于能够作为公共意义进入词典中那些，尽管边界常常是具有任意性的。在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关键词无疑用在了无数语境之中，而语境采用了拉丁文中没有清晰可比项的许多方式对其进行转换。我们近乎随机地选取其中一段：

我必须说，我所谈及的文化，是一种通过阅读、观察和思考抵达理性和上帝意志的努力。不论是谁把其他什么称为文化，的确，如果他喜欢如此，他尽可以这么称呼，但是，他所谈论的同我所谈论的是一种极为不同的东西。再一次的，因为文化致力于理性和上帝意志的方式是通过求得对之了解更多的这种直接的努力，而持不同见解者的见解显然本身并不属于这种性质的努力……

在这里，文化首先是一个包括知识工作的操作，有一个能够轻易得到恢复的被省略的施为者（诸如马修·阿诺德之流），然后，文化被转换为一个人物化的实体，他和先前被省略者做着一样的事情。但是，对象稍微有所不同，这就影响到我们对这位施为者的详细描述。理性让施为者变成哲学家或知识分子；上帝的意志让他变得如神甫一般。然后，这二者一道把他转换为一个单个的人，这个人结合了这两种角色，解决了两者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由于达尔文十年前的著作而显得惊人地显著）。阿诺德所面对和解决的这种对立在罗马文化的那种形式中并不存在，所以这不是这个拉丁文单词的意义组成部分。尽管阿诺德进行了努力，它也并没有变成这个英语单词中人们所承认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出自一连串的这类转换，在话语中大量发生，因而新的意义出现并得到了固定。它们就是这么做的，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的英语史所具有的一个优势，是重构其意义嵌入其间的这种散漫构造的历史时的材料容易获取。马修·阿诺德对这个词的个性化运用无疑是具有影响的，但是那部分是因为他如此充分地说出了中产阶级这个特定社会组成部分的观点，而他也有意识地要如此。这个组成部分是中产阶级公立学校体系的产物（托马斯·阿诺德博士，拉格比学校校长，就是其中

一位杰出者)。马修·阿诺德对这个拉丁单词暗含的转换进行移用并复制的能力，并非神秘的巧合。他是一位古典学者，古典学者是他所代表的群体成员的重要标记。古典知识（包括对阿佛洛狄忒、雅典娜、赫拉克勒斯等等的知识，足以满足《神奇女侠》中的许多话题）是公立学校体系所提供的文化资本中很大的一个部分。能够自由而自信地运用术语及其转换，于是正如关于精英内容的知识（也是来自于希腊或拉丁）那样清晰地标志着成员资格，或者具有受过教育的优越感那种口吻和腔调，这正是阿诺德也拥有的东西。

在这些术语中，泰勒 1871 年对该词在不同意义中的核心使用——仅仅是两年之后——标志的不是分裂（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所有可能的意义在以前都是可能的，而且在之后也继续起作用），而是直接冲突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力量。泰勒，即后来的爱德华·泰勒爵士，在 64 岁的时候被指定为牛津大学第一位人类学教授，是一个富有的贵格会的制铜工人的儿子。作为一位贵格会成员，他是一个持异见者，马修·阿诺德对这个阶级嗤之以鼻，认为他们对于文化缺乏理解也毫无兴趣。对于这些持异见者，阿诺德在一个方面是正确的：作为贵格会成员，他被阻挡在大学门外。不过，他还是能够对那种大学门内的文化资本有大量收获，并且帮助建立了一个新的学科以及关于文化这个单词本身的新的一系列意义。所以，他的新意义并不仅仅是新意义，更是对现存霸权的一种挑战。

阿诺德和泰勒代表了和文化这个单词相互关联的可替换的两套转换，从社会中不同发言立场进行了阐述。阿诺德抓住了拉丁文 cultura 的转换潜能，它实现了把农民或材料工人变成各种知识工作者这一核心转换，他在 19 世纪英国社会中把它同教育者、知识分子和神学家联系起来，而且——这是最具特色的贡献——把诗人和其他艺术家也包括在内。但是，对阿诺德而言，转换线路从知识分子转回到材料工作是确切地受到禁止的。所以，文化和定义工人阶级的工作是截然对立的，即便阿诺德坦言自己要把文化提供给大众。

相反，泰勒的定义拓宽了最初转换的幅度，并用之建立起一连串的对等之物。对他而言，文化既是各种类型的材料工作，也是知识性工作。转换联系，不是如同在阿诺德那里一般被打破，而是得到了开掘。既然它被用于原始文化，那么，它就包括了前农业时代人们的活动，同时泰勒坚持认为它们根本性地延续到了现代人的种种生活形式之中。这种转换，作为

意义，在他自己那种风格的人类学中被专门地作为一个基本前提宣布出来："似乎没有人的思想原始到对我们自身的思想毫无痕迹的程度，也没有什么古老到打破与我们自身生活的联系的程度。"

不过，泰勒也转换了阿诺德式的言说立场。作为一个被排斥在外的持异见者，他没有权力使用文化这个单词，也没有权力宣称可以接触其实质，他是以经过转换的方式得到这个地位的——正如他最终在牛津获得了教席，获得了爵位，这是他成为英国功成名就者之列正式成员的能指（阿诺德本人并没有爵位）。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标志着他身为贵格会成员和持异见者这一身份的平等主义心愿，而是继续鼓吹这些理念，从这个立场来合法地说出它们。他的立场，伴随赋予文化一词所具有的充当着某种标志的那种包容性意义，被人类学这门新学科带进了20世纪。于是，他所达成的转换是双重的，不仅是对该词所暗示的横组合段的转换，而且是对这一言说立场本身的转换。

总体说来，对文化的转换进程具有黑格尔式辩证法的形式，这种相似非常具有启发性。这个进程可以描述如下：

文化 A	→	文化 B	→	文化 C
材料工作：		知识工作：		知识和材料工作：
初始意义		对 A 的否定		否定的否定或超越
		（阿诺德）		（泰勒）

然而，要让这个辩证性进程有意义，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文化 A，作为一种由反对群体维系的反对性意义，伴随文化 B，得以充满活力地续存。尽管似乎文化 B 在某一点上取得了统治地位——尤其是我们看到当时统治着文学生产的那个阶级的著作时——文化 A 和由其所定义的那个群体却继续存在。所以文化 C 在整个由文化 B 所统治期间一直都做好了准备，它代表着向被压抑却未被根除的东西回归，也代表着对它的一种融入或同化。但是文化 C 继续伴随着其他两种基本形式存在，它们中的每一个都继续生产着进一步的子意义族（further families of submeanings）。尽管从狭隘的结构主义看，在从文化 A 到文化 B 的转换进程中存在着绝对性的分裂，而且文化 B 和文化 C 之间存在着不那么绝对却仍然很重要的破坏，在社会本身及其潜在意义的库存中，却一直只有一种更大整体中的平衡切换，这无疑的确发生了变化，但是它也有着同等重要的延续成分。

威廉斯对词汇的工作，对他而言，只是他作为文化历史学家的副业，

但是，这项工作却为全面发展的历史符号学提供了模式和动机。同拉波夫一样，但是较之更为执著，他把解读历史看做是与解读现在不可分割的，而且他把各种社会力量看做符号变化的动力源。他把关键词处理成本身就是复杂的信息，而不仅仅是其他横组合段的构成要素，就此而言，他超越了拉波夫和索绪尔——尽管确切地说，正是在话语流中，单词获得并发展起自己的意义，即使索绪尔也明白这一点。追溯这种共时性横组合段——言语中的不同腔调，艺术、服装或礼节中的不同动机，也都基本遵循相同的发展规律——为符号考古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解码经典

历史符号学必须加以应对的一种符号对象，就是经典文本。在大多数社会中都存在着一套文化文本，它们的官方任务是为现在而表现过去。对福柯而言，这类具有特权的文本是人们设计出来以产生无穷评说的。经典这个单词来自拉丁文，意思是教室。一部经典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本，一是因为其符号密集，也因为其对于意识形态基础的适应性而从过去被选中，它是让其地位合法化的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系统必须同时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准备后继成员。这种双重功能给予经典以一种不易明确的价值。从统治阶级角度看，经典还有进一步的复杂性。对于他们创造经典的能力是有着严格制约的。经典能够无数次地再版、重新阐释、为各种评说所包围，但是，它们中的某种东西却依然未变。一时的不予关注，也许足以给予某些群体让它们的意义再次渗入现在的机会，同时，意义越是具有潜在性，它们被压抑得就越久。

在字面意思中，经典是书面文本，但是其他媒介中的文本也起到同样的功能。某些建筑物作为公共纪念碑而被小心地保存和修复。博物馆和美术展览馆展示各种艺术作品，并将其他储存备学者们所用。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机构控制着某些话语，让这一系列物品具有意义，尽管并非所有的都如此。来自学校的群体参观博物馆，但是成年人也自发前往。在有着许多保存至今的纪念碑的国家中，旅游提供了关于历史更具平民性的话语，这种话语部分属于教育话语的溢出之物，但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重点。

在此且引一例，巨石阵[1]每年吸引大量游客，但它或者人们推断出的有关它的历史，在学校课程中并非重要的内容。大众媒介也提供它们的描述，所采用的方式是通过文化节目，譬如像英国 BBC2 台那种建制化的方式，以及通过权威的重新表述，譬如肯尼斯·克拉克爵士（后来又受封为勋爵）的电视系列节目《文明》。

这套经典属于马修·阿诺德所谓文化的领域，至少足以被判定属于精英分子：一种由统治阶级制造，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化。在文学批评中，文学经典这个概念作为特定统治阶级的建构之物而受到批判。布尔迪厄注意到法国博物馆的参观模式，它主要是中产阶级构成，他启用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这个概念来对此进行解释。文化资本是一种使之有所作为的背景，由允许一个人在博物馆里欣赏艺术作品的种种阅读模式和成系列的假设组成。根据布尔迪厄的看法，这种资本是按照阶级分界线分布的。就算它只提供阶级身份的标志，这种分野也是潜力足够强大的，因为它允许表面上公共而普通的系列物品同时起到强化阶级分野的作用，因为它们宣称的是一种统一的全国性文化和全国性身份。但是卢卡奇说过，属于资产阶级文学经典的“杰作”起到的作用远胜于此：它们提供了一种对于它们的时代属于例外的社会理解。马尔库塞看到了批评的维度，伟大艺术中的一种辩证品质，这种东西，他觉得，在他所谓单维的流行艺术中是匮缺的。这两种立场并非不可兼容。“高雅”文化既可以起到阶级标签的作用，也可以充当权力性知识的神秘宝库。像这样一种双重立场，正是我们在本节中将要进行讨论的东西，尽管我们看到，即使对于统治群体而言，这种“权力性知识”也是如此地问题重重，以至于对于有过文化训练的人士，它也是难以自由而简单地触及。

为了让这里的讨论不至于空疏，我们将其置于特定语境之中，即欧洲文化史上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准确的涵盖幅度、性质和意义，在艺术和文化史学家那里多有争议，然而，它在当代思想中的通行和潜能却不容置疑。肯尼斯·克拉克爵士的《文明》无疑就将文艺复兴的描述包括在他关于高雅文化及其发展史的权威版本之中，提供给大众。在这本由多系列组成的著作中，有关此时期的一章题名为《人——万物的灵长》。它是这样开始的：

---

① 指英格兰南部索尔兹伯里的直立石柱群。——译者注。

把佛罗伦萨变成欧洲最富有城市的人，是那些银行家、羊毛商、虔诚的实干家，他们居住在冷峻而坚实房子里，足以抵抗党派之争和民众骚乱的风雨。他们丝毫没有预见到，这就是文明史上誉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杰出时期。仿佛突然之间，从黑暗而狭窄的街巷就诞生了光明而敞亮的大道，一切似乎都没有缘由……

作为高雅文化和大众之间的沟通者，肯尼斯爵士一手予之，一手取之，正如布尔迪厄可能会预料到的那样。他以这个时段为中心，给予历史意义以极为广博的解释。他对经济和社会语境有特定的了解，而且迅疾地在描述中涵盖进去。但是，历史和语境的要点在于它们同对文艺复兴的理解没有关联，并非“可以预见”，也似乎“没有缘由”。他不是用一种转换框架将文艺复兴的艺术文化同它的现在和过去联系在一起，他笔下的文艺复兴始终是缺乏定位的。它起到的唯一作用，是向我们这个冷峻而坚实的时代传递它的信息。克拉克对此信息的总结如下：“人的尊严。今天这些语汇在我们的嘴唇上死去。但是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它们的意义依旧清新而鲜活。”

于是，作为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符号的文艺复兴成了文明的能指。它在这里的功能，显然是将“我们”（现代人）纳入一个由那些被排斥在这个清新而鲜活的时代之外的人所组成的共同范畴之中，尽管肯尼斯爵士那种厌世口吻标志着，他是那些至少知道并理解什么已经消失的精英中的一员。在这个框架之中，每一杰作，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在这本由多系列组成的著作中，都简略地做了回顾，并且它们慢慢地代表着文艺复兴本身，因为它们没有拥有别样意义的时间和别的框架。

克拉克的文本包括一张人们可以料想得到的文艺复兴“巨匠”的名单：米开朗琪罗、莱昂纳多·达·芬奇、多纳泰罗等等。为了对经典文本的阐释性阅读，我们将集中关注其中之一即多纳泰罗的一个文本：多纳泰罗的雕刻《圣抹大拉的玛利亚》（图 6.3）。作为雕刻家，多纳泰罗足以被列入肯尼斯先生那张人数不多的大师名单之中去，尽管他的名气比不上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在他的作品中，这尊木雕，大概作于1450～1455年间，被认为是它那个时代印象深刻、富有开拓性的作品。但是，克拉克却没有提及。它与克拉克关于文艺复兴的意识形态看法以及他所选出的一套经典之间，关系重要但却并不直接，这种间接性让我们看到了对经典文本

进行分析的更多可能。



图 6.3　多纳泰罗的雕刻《圣抹大拉的玛利亚》：一个具有转换特色的作品

孤立地看待这尊塑像，将其作为静态符号，会使我们无法对其进行历史性的解读，甚至根本无法对其进行解读。它的意义须在这件雕刻涉及其中的那套转换中去发现，它正是在不同的历史之中，或短或长，交织而出。它不具备自动自发的意义对其解码需将它同历史关联起来。它的历史就是它的意义。或者说，因为这些历时性链条是复数性质的：它的种种历史，数量多得让人很难知道阐释任务该从哪里入手。

不过，其中有一种历史是不可忽略的：这件雕刻最初嵌入其间的那种话语。正如单词只有在话语中才获得意义一样，因此作为符号的雕刻在内在上说也是对话性的。对于分析家而言，任务是尽其所能地发现与之相关的话语。多纳泰罗的雕刻是为佛罗伦萨的浸礼堂而作，是对一座建筑的复

杂回应，这座建筑本身充满了来自各种声音的信息。它的功能性意义来自这个语境。在此语境之外，这尊雕刻能够具有其他功能和意义，但是那些只能作为对其他功能和意义的压制而存在，或者说，作为对其他功能和意义的转换而存在。所以，在20世纪，它能够具有旅游功能，吸引人们来佛罗伦萨。它甚至可能用作帽架。历史符号学不会预先宣称这些其他功能就不合法或者错误，或者把最初的功能看做具有绝对的优先权。然而，它所必须做的，是把这一系列的功能看做由特定施为者做出的一系列行为，他们要对他们所实施的功能转换负责任。

这幅图片（图6.3）给出了关于抹大拉的玛利亚最初语境的某种观念，这是一尊木雕，高约1.98米，立身一个矮座子上。雕刻在居中的镶板上，镶板置于佛罗伦萨浸礼堂靠西南面内墙的两根圆柱之间，浸礼堂呈八角形，属于罗马式风格。祭台位于西墙，一反教会将之置于东面的习惯做法。墙面和地面铺设大理石，大理石色彩斑斓，打磨得锃亮。带顶的天棚以一个庞大的系列拼贴画为主，都按照13世纪威尼斯的风格绘制。祭台上端是巨大的基督像。在基督的左边（这座木雕的正上方）一格，是一幅关于这个被拯救者自新的画。在基督右边一格，表现的是那些被诅咒者在地狱中的苦难。八角的天棚剩下五格为五幅群像。最高的一幅是巨大的天使。较低的四幅是平行性的叙事，内容分别取自“创世纪”、“约瑟”、“施洗者约翰”、“基督降临”。位于基督右边的画作都是以诞生或创造为主题开始，而靠左边（也就是这座木雕的正上方）则以成功（约瑟夫与基督）或灾难（大洪水，圣约翰的废黜）结束。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第一种对话关系涉及这幅宏伟的拼贴画。这比多纳泰罗开始他的雕刻要早150年。这是一件巨型作品，而且大片区域都以黄金为背景。无论多纳泰罗对此是怎么认为的，他很难忽略这一点。他也是浸礼堂结构的装饰者，他所作的陈述不可能回避与已经在其位的形象产生互动。既然这幅拼贴画显然是属于文艺复兴以前风格的文本，多纳泰罗与其之间的关系便成为总体上构成文艺复兴风格那些转换的一个实例。多纳泰罗的雕刻转换了这幅拼贴画的基本模式中的几乎每一个要素。这幅拼贴画是集体作者创作的，所有个体性的差异都不可恢复地被删除了，譬如契马布埃就“被认为”参与了创作。多纳泰罗是文艺复兴时期重要角色的早期代表。有署名的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被认为是具有个性特色的。这幅拼贴画的创作者集体与观看者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不同的定位。画中的

人物比真人大，在人们头顶几米处浮动，代表着权力，完全认同教会——其物理构造和其本身作为社会机构——所具有的权力。这些艺术家牺牲个性以抵达这种权力地位，而且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可质疑其完整性的空间。多纳泰罗的雕刻，与此相反，是置于地面上的，只是略高了一点，而且人们可以凑近观看，在其周围走动，为之所同化。它强调的是亲近而不是权力。同时，因为它与屋顶所强加的缺乏统一主题的结构相对，它对这幅拼贴画所创造的社会统一性做出了挑战。雕刻在教会中被说起，但进行言说的并不是教会，而且意义本身是表述给那些与之平等的个性化的人的。

雕刻的内容也代表着一种转换。这尊雕刻和这幅拼贴画主题都来自《圣经》，但是两者之间的现实度有不同。这通常被认为是文艺复兴风格的一种标志，多纳泰罗的雕刻以一种突出的形式表现出这一点。不同的模态表现出艺术家和观看者之间发生了剧烈变化的关系，由认同和平等取代了差异与权力。多纳泰罗那种现实主义的构成成分和暗示是多样而复杂的，不能在框架总体中想以为然。我们选择屋顶拼贴画中的一幅，《三博士朝拜》（图 6.4），来进行更具体的对比。多纳泰罗的雕刻，准确地说，是三



图 6.4　13 世纪的拼贴画：《圣抹大拉的玛利亚》的语境

维的。《三博士朝拜》是二维的（除了屋顶的弧线），并且它的编码同深度或时间并不一致。所描绘的人和物与可以轻易复原的现实（身体的或社会的）并不对应。背景在哪里？内还是外？这是白天还是夜晚？一颗星星在晦暗的金色天幕/地表闪烁，表现出这是夜晚，但是，这个金属世界中没有投下什么阴影。位于三博士后面的塔给出的空间线索是矛盾的，拱门与塔顶既像是从图中所表现的空间中淡出，又像是淡入。这里并不存在着什么视觉营造或技巧，只有这种幻觉是不可能感受。人也是二维的，心理上和空间上都是如此。面部是平淡的，有可能传递社会和情感信息的整个系列符号符码都被消除了：体态、表情、衣着、语调，或者总体来说，有关腔调的符号学内容，一切都没有。我们的重点不是要指明人物没有被表现成个性化的人，而在于多重符码被这些拼贴画传统弄得无言了——这些传统逐渐编码了社会传统。本来，集体或个体透过这些符码有可能传达出异见和差别的。符码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对社会和物理现实进行猛烈而且不可逆的转换达成控制。同典型的反语言一样，它创造出一个反世界，其中排斥和控制的社会意义占据压倒性的主体地位而导致意义潜能的极度衰减。

对比之下，多纳泰罗的雕刻是表情性的（expressive），它使用的是一整套被拼贴画艺术所排斥的符码。人物躯体瘦削，面容枯槁，如同厌食症所引起的消瘦所传递的信息。身体的形体结构冗余地传递着同样的信息，譬如跟腱外凸，胸骨显现，褴褛衣衫下干瘪的乳房。头发垂落在粗毛外套上，浓密而纠结，同动物毛发无异。多纳泰罗再现了表示这位苦行圣人自我惩戒、自我憎恨的那些能指。

丰富的透明能指，解释了多纳泰罗的雕刻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特色和情感力量。它使他自己那套转换可行，这套转换与拼贴画一样地激进。他那位抹大拉的玛利亚站在一块岩石断片上。人与物所构成的世界剩余部分，并不像拼贴画中那样板平而扭曲，但是是被节略了。这尊雕刻伫立在砖石结构的柱子之间，背景是格子状的大理石，产生的效果似乎与拼贴画的黄金背景有得一比。但是二者却有着显著的不同。多纳泰罗对背景的节略是具有某种信号性质的，而且是可逆的。单独的一块嶙峋岩石投射出一种荒芜的景象。她双手抬起进行孤寂的祈祷，眼眶下陷而一无所见，她是纯然孤独的。这一想象语境是可复原的，如果复原，它标志着与她实际所处环境之间的深刻矛盾，因为环境不仅装点得富丽堂皇，而且属于公共所在。她所携来的这个不可见却又能强烈感受到的世界，不仅与她周围的富贵形

成对比，而且成为对其做出的谴责，如果我们还记得施洗者约翰——这个当时犹太政权（希罗王）和教会（法利赛人）的猛烈批判者——在他那个时代代表着什么。这座浸礼堂是礼拜施洗者约翰的，这位圣人也是佛罗伦萨的庇护者。

多纳泰罗进行了许多其他转换。他那位抹大拉的玛利亚不是纯然写实的。和写满摧残的面庞与干瘪的乳房相比，举起来祈祷的双手纤细、优雅，并非骨节嶙峋，衣衫褴褛，但衣衫裹挟下的双腿也是苗条而匀称，没有静脉曲张或肌腱扭结，对于这些，多纳泰罗在呈现起来是得心应手的。于是，这位抹大拉的玛利亚既年青又年老，既美丽动人又让人生厌，同时是厌与欲的主体和客体。这套对立也适用于多纳泰罗对圣经典故的运用。在《圣经》叙事中，抹大拉的玛利亚并没有被表现得苍老。她站在圣母玛利亚的旁边，同在十字架下，在《约翰福音》中，她一人见到了基督的再生。她想要触摸他，但他警告她别这么做。按照教会传统，她是一个从良的妓女，成了爱基督者。多纳泰罗利用了这个人物的模糊性，将其推至极限，把她表现为一个苍老、苦行、饱受摧残却依然美丽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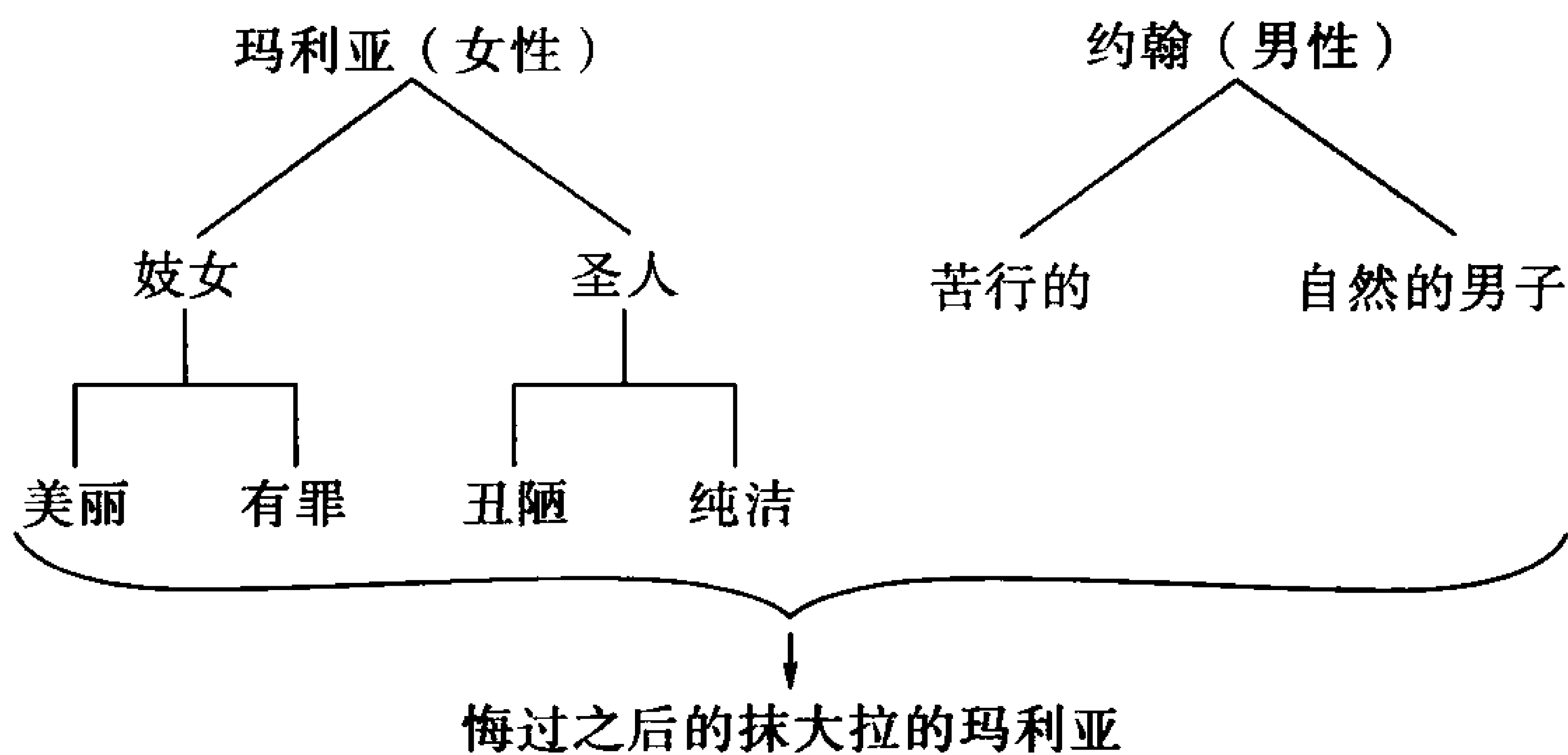


表 6.2 圣玛丽与圣约翰：对《圣抹大拉的玛利亚》的转换

多纳泰罗还引入了另一个转换。他那位抹大拉的玛利亚伫立在礼拜施洗者约翰的浸礼堂之中。公元 1450－1455 年间，他遭遇了个人危机，这个时期他总共只有两件雕刻作品，而这另外一尊就是施洗者约翰。他那位抹大拉的玛利亚身披毛皮，这一般是和施洗者约翰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表示他对腐朽文化的彻底弃绝。她的上方画着施洗者约翰生平，她就在关于他生命尽头的绘画之下，正视着居于建筑中心的洗礼盆。她不仅是《圣经》中比他晚 40 年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她也是经过了转换的施洗者约翰。这个相关的转换结构可以表述如表 6.2。她不仅苍老，而且具有雌雄双性（多

纳泰罗 30 年前的著名作品《大卫》也是如此）。施洗者约翰所展示的那种苦行，也是女性可以尊奉的事业——因为这是在多纳泰罗的意大利。锡耶纳的圣凯瑟琳是最知名的榜样：1380 年她去世之时只有 33 岁，被严格节食和自我惩罚弄得憔悴不已，但在政治上却潜能无限，所以她刚一咽气，各个群体争相窃取她的头颅和躯体，以便挪用她所具有的神力。和他的时代接近，但更少刀光剑影的，是博罗尼亚的圣凯瑟琳，克莱尔贫士团的女修道士（1413－1463）。锡耶纳的贝尔纳蒂诺是奉行同一传统的男性，死于 1444 年，在 1450 年受到教会册封。多纳泰罗完成这幅雕塑之后的 40 年，萨沃拉诺拉还在坚守这一传统，并因此于 1498 年被烧死。在宗教改革之前的 300 年里，教会捧出了一系列被神化的苦修者，他们要么如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一样被册封，要么像萨沃拉诺拉一样被烧死，但是，这些人一道建构起一个具有持续性的传统，预示清教主义运动的刀光剑影。

多纳泰罗本人的政治立场很难评价，因为他并未留下著作，在其他方面也明显地谨小慎微。他的父亲是一位羊毛梳刷工人，因为参与反对梅迪奇家族的叛乱而被逐出佛罗伦萨。这个孩子不仅幸存下来，而且得到了柯西莫·梅迪奇的强烈支持，甚至《圣抹大拉的玛利亚》可能就是在后者要求之下创作的。但是，瓦萨里调查说，多纳泰罗并不受柯西莫或其他人的资助，而是保持了特立独行，而且，40 年后，即 1494 年，在萨沃拉诺拉的领导下，佛罗伦萨曾短暂地驱逐了梅迪奇家族。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市民们在主广场竖立起多纳泰罗的青铜雕塑《朱迪丝谋杀荷洛芬斯》。这尊雕塑表现的是《圣经》中女英雄诛杀暴君的事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正是柯西莫委托多纳泰罗而作，几乎是与《圣抹大拉的玛利亚》同一时期的作品。多纳泰罗潜在的激进精神也许得到了同代人的认可，虽然他是在梅迪奇庇护体系之中工作，并且无疑受到了这些环境的影响。

多纳泰罗的雕刻与此前形式所具有的意义有着一种彻底的断裂，可是却仍与它们置于同一建筑物内。这种关系比乍看起来更为密切。沿着屋顶从右（诞生）至左（死亡、胜利）的顺序展开叙述。《圣抹大拉的玛利亚》被置于最左边，位于表现正义得到重生的画像下方。环绕屋顶的四个叙述严格平行，所以既可以垂直观看（把《创世记》中的事件与约瑟夫、施洗者约翰和耶稣相关的事件联系起来），也可以水平观看，由此创造出一种复杂的类型转换。所以耶稣被表现为从死亡中升起，直接位于躺在坟墓中的约翰头顶。虽然约翰死了，但注定要通过基督而复生。因此，约翰既像

基督，又不像基督；既是活着的，又是亡故的。表现在胜利状态下的约瑟夫，好比基督之取得胜利一般，在他的上方，诺亚正栖身方舟之中，与施洗约翰相似，即将获得重生。多纳泰罗把施洗者约翰转换为抹大拉的玛利亚，属于与此相同的操作。抹大拉的玛利亚身体朝向右侧，按照屋顶壁画的叙事线索迈向死亡、光荣和最后的审判。然而，她的脸却从祭坛和基督形象偏向一边，这偏离了传统叙述中蕴涵的那种慰藉。这种侧身转体，后来成为一种矫揉造作的标志，但在这里，它所表现的是对待宗教传统的暧昧态度，一种信仰危机。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它运用的是传统形式，以个性化方式转换过的那种传统形式。

我们对此雕刻的解读可以是无穷无尽的，在此之中，我们对一系列转换进行了定位，它们共同呈现赋予该雕刻文艺复兴的特质。这些转换与之前的传统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达成了一种刻意的断裂。这种断裂并不神秘，也不绝对。其组成要素都是可以解释的，也都有其理据，并且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先前的体系中。我们考察的是一种新的腔调，而不是一种新的语言，而且，作为这种变化的行动者，多纳泰罗对先前形式的运用仍然娴熟自如。同样的一套基本转换支撑着文艺复兴艺术、新教和激进政治，这三个文化、社会的不同领域，在 1300 年至 1600 年间，见证了无数发生在欧洲的重大变迁。多纳泰罗的转换工作对三个领域都有涉及，与之既有潜在的契合，又凸显了政治或社会意义。艺术与宗教中的转换表达了一种基本的政治态度，正如社会中诸多力量提供了语言变化的动力。多纳泰罗的作品值得研究，值得成为经典，因为它直接致力于对建构出新腔调、新传统的旧形式展开批判。

我们所做的与艺术史家的工作并非判然相别，而且，不同学科的学者提供的材料，累积起来，对于建构经典文本的散漫语境，是极具价值的。除了语言领域，历史符号学家不再冗余地向艺术和文化领域中投入一丝不苟的学术研究。现有各种学科的学术研究似乎建构起一种必要的联系，然而，对此却存在着一种令人奇怪的盲目。譬如《圣抹大拉的玛利亚》如今正在“意大利教堂作品博物馆”展览，与之一道的，还有多纳泰罗以及其他艺术家 300 年间为佛罗伦萨大教堂和浸礼堂而创作的其他雕刻作品。这个新语境建构起新的横组合段和新的意义，但同时它也积极压制了使之成为经典文本的原初符号活动语境。学者们知道这尊雕塑原来伫立何处，却似乎不知道它为什么重要，它可能意味着什么。

这是由传统博物馆达成的那种典型转换。每件物品都在孤立于其对话语境的状况下进行展示，附带的标签可以充当线索，以为对其有充分了解、能为之提供某种框架性东西的人服务，通过这种方式达成布尔迪厄批评过的那种效果。博物馆中的作品只对那些了解其话语本旨的人而言才是开放的，而这种话语，是一度环绕作品周围的那种话语，或者是能为此目的的服务的可相互替换的历史和话语。缺乏这种文化资本，即使是著名作品或经典文本，也同样是不透明的。这使它们特别容易受到侵害，并被纳入关于建构性对话的和关于历史的不同版本之中去。现代博物馆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效果之一，就是为诸如肯尼斯·克拉克爵士的《文明》那样的文本创造市场。

某些人可能觉得，像克拉克那种通俗史，其意识形态性质可谓露骨，他们坚持认为，历史本身必须被看成在内在意义上属于一种建构之物，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反复书写，且缺乏评判每种不同版本的衡量标尺。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过于悲观。历史是一个斗争场所，且没有哪个历史学家是纯粹超然的。但是，作为思想家，历史学家的思想并不全然无所拘束，他们所使用的资源也不是可以随意摆弄的。按照这种辩证思考，经典文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众说纷纭的评论让其对话特性始终生机勃勃，各类博物馆（包括大中小学在内）保存着它们的物质形式，对各种对其力量进行折中的企图形成挑战。正如精英文化所声称的那样，解码经典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事业。然而，要正确地做到这一点，要求对多种非经典文本进行系统的研究，不过同样的一种精英文化却将之排斥在自己对文化的定义之外。

第七章　爱与权力的转换：叙事的社会意义

本章讨论的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主题：家庭是社会意义和符号操作的中心；叙事是社会意义的主要载体。这两个话题常被置于不同范畴，被看做属于不同分析传统的研究领域。家庭社会学是“硬”社会学的论题，涉及经验资料和统计分析。而叙事理论，则为符号学的文学形式所支配。即便是在叙事分析已经通过神话分析侵入人类学的那些地方，它仍然倾向于寻求形式模式，以超越特定社会语境及其特殊社会组织形式为目的。但是，实际上，家庭组织模式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叙事来维系和沟通，因此，没有有力的叙事分析形式，就不可能理解我们所探讨的社会操作和社会意义。相反，许多叙事体裁的意义和功能都同家庭这种建制紧密关联，家庭成了我们研究叙事本身所具有社会意义的主要场合。这套关系在各种转换操作中首当其冲的历时性操作中取得意义。爱与权力的转换构成了各种家庭分组，并将它们与社会构成中的其他结构彼此连接起来。不论家庭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可能采取什么样的特定形式，承载并调和这些操作的叙事，本身就是通过转换而同彼此联系起来的，也是同围绕家庭的社会意义组带联系起来的。这种叙事理论是波斯特所谓的家庭批判理论（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family）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于家庭文本的符号学

在当代家庭社会学中，家庭这种建制在变革过程中被赋予了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通常它所起到的都是保守作用。家庭被视为主要社会化的施为者。它是个人与其生于其间的社会之间产生决定性冲突的最初场所。通过家庭，社会不仅复制出物质性的身体，而且复制出社会化的个体。社会学对家庭这种建制中的差异进行了辨识，或者是不同社会阶级与种族之间的差异，或者是跨越时间的差异，譬如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现代”或“核心”家庭形成的缓慢过程中的那些差异。但是，人们对家庭的总体印象是，它是一种稳定的、起着稳定作用的力量，即使有变化也很缓慢，对家庭以外变化所产生的压力起着抵抗作用。

然而，这种稳定印象需要在承认在其表面之下有着内在转换操作这一背景下来关注。在既定社会群体中，任何时候，家庭结构都可以通过指导个人和所构成家庭的得体行为的一系列作用和规则加以描述。这一模式的通行，也许是超越时间和社会构成的，以至于看起来仿佛是一个永恒的事实，一个由上述因素而来的不变模式。这种模式总是呈现为共时性横组合段，一套处于时间和进程流逝之外的关系。但是，这种印象是运用了共时性横组合段而产生的一种常规性意识形态效果。家庭的永恒真实性必须同普遍存在的变化相互配合，随着新的个体出生并融入特定位置，然后，随着身体上变得更弱或更强，在性能力上变得活跃或沉寂，或者死亡，之后，他们又再度被分配到不同位置。假如这种变化永无止境，那么无变化这种幻想就只能通过内部平衡的转换来实现，即对现有变化操作进行反转换。因此，表面上的无变化就远非一种假设，它本身就是转换操作的产物之一，如果还要再度启用这一手段，就必须对这种转换操作进行精确控制和约束。流行的看法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家庭处于危机之中。可能同样真实的是，我们不妨说，危机是家庭这种建制从未摆脱过的东西。

为了对研究这一操作做出贡献，社会符号学需要弄清楚符号活动解释的范围与界限。一方面，单个的具体家庭是由实实在在的人组成的，包括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但是这个整体因为赋予它以及它的各种构成成分的社会意义而只起社会单位的作用。这些意义是通过大量文本来

传达的，如我们前边说过的那样。然而，坚持认为家庭作为一套意义，本身就是一种文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将称之为家庭文本（familial texts）的一系列文本重叠在了一起。孩子们在自己的社会环境中明了他人，便是在构建一个家庭文本，无论他们对之会说什么，这个文本都会与之不同。他们本身就在家庭文本中被赋予了一个预先存在的意义，这些家庭文本迫使他们面对不可穿透的封闭，这些文本的意义由于对他们生存不可或缺的其他人的行动和行为而得到大力强化。这些家庭文本得到无数的几乎难以理解的其他符号活动媒介中的其他文本的暗示。它们带着其巨大的符号挑战呈现在孩子们面前，而孩子们此时甚至还没有开始破解音系符码，也还没有进入语言世界。

孩子们对最初构建的家庭文本谙熟于心，这也为理解每种其他重要社会关系的一系列的转换提供了起点。众多社会中的思想家们时常利用这一连锁转换，明确将国家中的权力结构与家庭中的结构联系起来，激发父亲的权威（譬如作为国民之父的君主），加强保护母亲的意识（领土）。我们并不是要表示，国家的权力来自或者反映出自主家庭结构中的权力。相反，孩子在家庭经验中所面对的家庭文本是一个绝对文本，不在其理解或控制能力之内。这些文本是一系列转换的产物，而这些转换实质上将成为家庭的社会决定史，而不是反过来被决定。孩子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继续应对这些特定的结构，在沟通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他们后来利用家庭文本转换来弄清以后的权力和稳定性关系，那么他们会得到关于社会现实的一个复杂而矛盾的阐释。在家庭中没有单一且预先设定的一套意义来对待权力与性别，从家庭到国家或者到任一更为广阔的社会组合也没有一个不可避免的推断。因此，家庭中的父权模式，绝不应被视作自足的社会事实，而更应该被看成对现有一连串家庭文本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转换，一种以一类作者的名义进行的大规模介入。如果它看起来是一个封闭的、不容异见的文本，那么，这正是这些意识形态施为者所做努力的结果。这种建构之物与政治或工作的父权制建构，都同样是转换，这些转换必须由出于自身缘故的特定施为者来达成和维系：它们并非家庭之中父权制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结果。

有两位理论家的工作对于理解我们所谓家庭文本十分重要：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列维-斯特劳斯对亲缘结构的描述。弗洛伊德备受争议的贡献是他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在他的理论梳理中，有时他使这些理

论听起来像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精神方面的事实。实际上，他的论述是将其作为一系列重要意义来处理的，父母这种二元结构是特定阶段的特定立场所诞生的建构。俄狄浦斯情结主要是儿子的文本，涉及父母以及父母与自身之间的关系。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这种情结也许和一个真实事件相关，该事件为儿子传递了这种情结的意义。即用我们通常的话来说，历时性文本在本质上是与共时性文本相互关联的，这种关系本身如此紧密，以至于两种文本中的任何一个都起着转换对方的作用，尽管共时性文本，即我们称之为家庭文本的，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优先地位，它等待着合适的时机来被触发，或者它为自己创造合适的时机。

然而，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俄狄浦斯情结一般并不突出地存在于精神生活表层。儿子是否认它的，且将它的价值转换成一种新的形式，在此形式中，他将父亲融入自我。但是，俄狄浦斯结构与对它的逆转共同存在于儿子头脑中，构建出一个双重的自我，弗洛伊德将其标识为超我（super ego）和本我（id）。按照弗洛伊德的描述，俄狄浦斯结构还受到许多其他转换的影响，它们按照俄狄浦斯结构把许多其他人构建成母亲、父亲和儿子的替代者。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操作贯穿人的一生，产生出其他的关系文本（譬如在政治领域和工作场所），以及其他主要的叙事形式（譬如在宗教、艺术和文学之中）。

弗洛伊德关于转换操作构建了家庭并将家庭与其他建制联系在一起这种理论，迄今为止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不过，如果要将他的描述汲取到社会符号学理论之中，那么它还有亟待处理的两个主要缺陷。他没有给出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历史或社会语境。俄狄浦斯文本是属于儿子的文本。弗洛伊德曾多次试图改写该文本以适应女儿，但都没有获得成功。它是为对应拥有权力的其他人的文本而产生的，最直接的就是父亲和母亲，他们的关系受到多重外部社会力量的限制，而弗洛伊德则通常并未对之进行考察。即使在同一社会中，这些外部社会力量和生存条件也会随着不同社群和不同地位而发生变化。远在儿子的俄狄浦斯情结能够起到让其明确自己的社会关系之前，这些社会关系便已经形成该情结了。俄狄浦斯情结不应该被视作不可化约的、绝对的文本，它必定最终潜在于任何时期的所有家庭结构形式之下。如果把弗洛伊德理论视作关于对特定家庭文本进行转换的理论，而不是对一个普遍性家庭文本的发现，那么它会更为精细，更为强大。

相对符号学，相对他的其他作品，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亲缘关系的工作则不太明确。他关于神话的研究即使不乏争议，还是被视为对叙事分析的一大贡献。然而，他的亲缘关系理论不大为人们所接受。符号学家常常忽略它，视其为社会人类学而不是符号学。社会人类学家认可它，却将它判定为一种暧昧的社会理论，认为它过于别出心裁和普泛，与语言现象之间的类比极其牵强，因此是毫无裨益的。我们并不是要最小化列维－斯特劳斯给予其理论的那种形式中包含的难度，不过我们会认为，它包含着某些对社会符号学而言具有原创性的强大贡献，对其深入研究定能带来回报。

列维－斯特劳斯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做了有用的修正，因为作为人类学家，他关心的是文字教化之前的社会，而不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他理论的目的，是建立一种被称为舅权（the avunculate）的亲缘体系，即其中男孩的舅舅被赋予重要作用的体系。列维－斯特劳斯称，在该体系中有两个普遍运用的规则。首先，父与子，舅与侄，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常常是颠倒的。于是，如果父与子之间关系好，那么舅与侄之间的关系就差，反之亦然。其次，兄与妹，夫与妻，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常常是相对的。列维－斯特劳斯以亲缘图表的形式阐述了这些关系，这些已经成为当代人类学的惯常做法。我们复制了这样的一个图表（见表 7.1），在该图中，儿子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是正向的，如同弗洛伊德描述中俄狄浦斯情结之后的阶段中的情形一般。这似乎是以在舅舅身上投射负面意义为代价而达成的，舅舅在此代表着俄狄浦斯情结中的父亲。但是，列维－斯特劳斯天平的另一部分却不那么容易解释。在关于家庭生活的当代意识形态中，很难想象婚姻纽带会是脆弱的（尽管离婚统计与之相反）。但是这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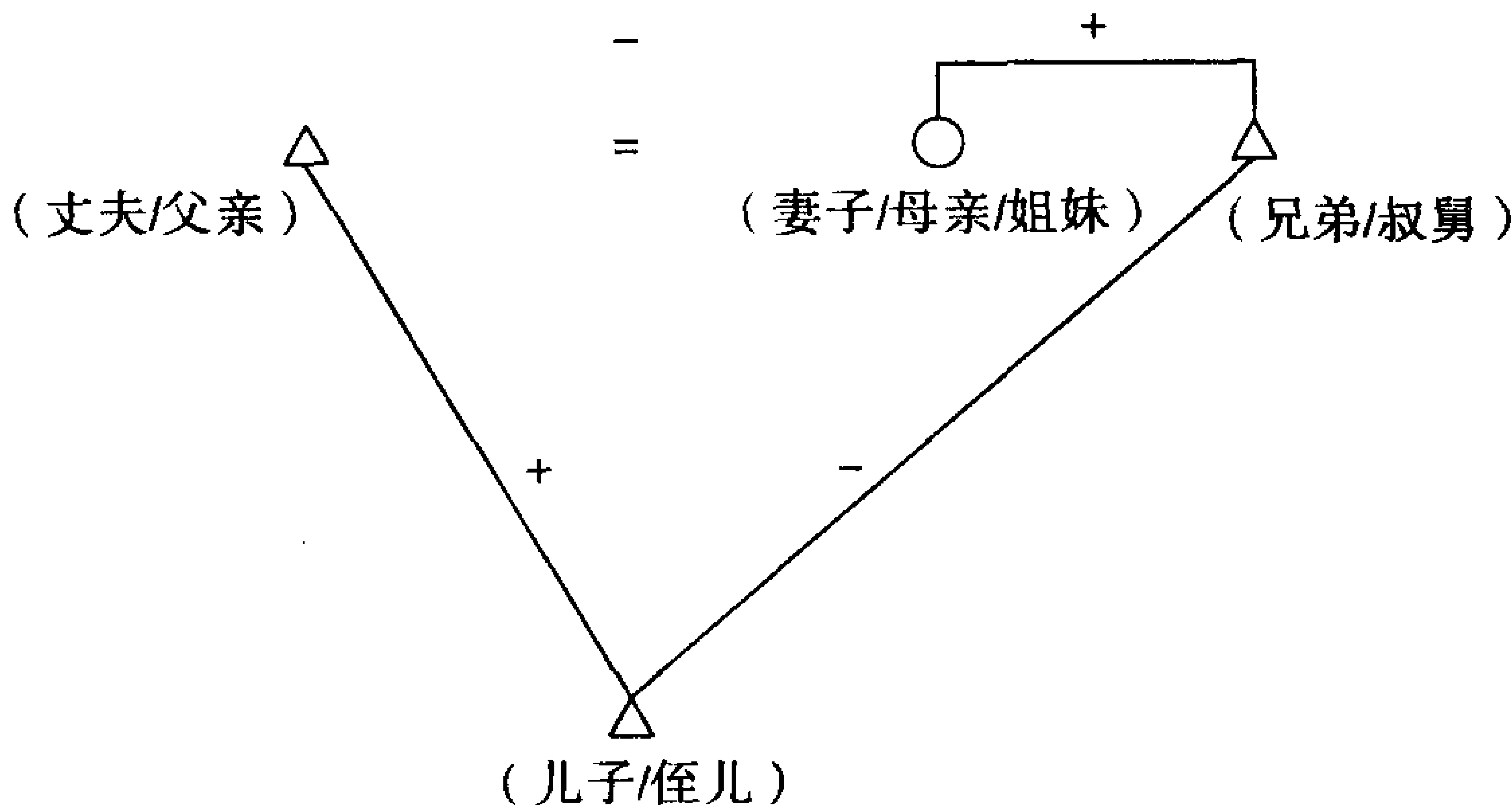


表 7.1 作为家庭文本的亲缘图

很多时候都是许多社会中婚姻关系的一个系统性特征。任何对家庭结构的充分描述都必须能够对其条件和结果进行理论化。

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了关于这种可能性的数学运算，但这并不是关于它的一个可行的转换理论。如果我们求助于弗洛伊德，或像米德和贝特森这样的家庭人类学家，我们就可以看出列维－斯特劳斯框架中的巨大裂隙。他省略了母子关系，这种关系在弗洛伊德理论中可能被转换为兄妹和夫妻关系。于是，为什么会有一条如此普遍的社会规则规定，正向形式的母子关系不能被转换成这两种替代关系？或者说，为什么要有某类女人不得喜欢而另外一类女人则必须爱这种义务呢？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会非常有趣。

但是，列维－斯特劳斯确实对这种模式的社会基础进行了解释（而且他把性别偏见也建构进去了）。他宣称，在所有社会中，是男人给了女人婚姻，他将这看做是涉及三个要素的一场交易：接受者（丈夫），给予者（舅舅/妻子的兄弟，或其他等同于此的人），商品（妻子）。这些过度简化了的术语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到底谁才是他描述的这些结构的创造者。列维－斯特劳斯的确坚持认为，他所描述的是一种象征性的结构，并非未经调和的社会事实，从社会符号学角度讲，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进步。但是他没能认识到，“象征性的结构”，同弗洛伊德的情结一样，是由特定的社会施为者在社会中生产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称其为文本而非结构，为什么我们要试图追溯它们的社会起源。列维－斯特劳斯所使用的材料大多来自男性人类学家研究男性资源和信息提供者所取得的成果，他们都是从这个优势立场来描写家庭/亲缘文本的。他本人的结构图，采用了圆形、三角形、等号、括号、加号和减号等形式，表现出经典结构主义那些典型特征，而正是这些特质为结构主义带来了坏名声。这些图应该被看做对一系列之前文本的转换，包括人类学家对信息提供者的总结或转换所进行的总结和转换，并且还要回溯到他们意欲描述的那些男性家庭文本那去。在这一操作中，男性被转化成了三角形，女性成了圆形，整个复杂的符号活动操作毫无痕迹地被删除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应该低估列维－斯特劳斯使我们能够做到的东西所具有的价值。他所描述的结构也许是极度抽象，形式化和简单的，但是，在任何人能够将其作为一种文本进行解读之前，这种简化可以说是必要的。

我们将一些有关家庭文本的假设总结如下：

1. 个人以家庭文本的形式发展起与他人关系的框架模式。家庭文本属于共时性结构，能够为特定群体中的关系赋予价值。家庭相当于社会中一种重要建制的文本，我们可以将这套文本称为家庭文本。
2. 家庭文本代表着转换操作的一个阶段，我们的分析必须对这些文本进行回溯，这样才能理解后期中的矛盾和可能。
3. 家庭文本必须被理解为既是来自一个特定社会位置的建构之物，又是融合了其他重要文本的复合文本。规范的文本给出了统治阶级的家庭意识形态（就性别、年龄和地位而言），但是它仍然包含着对立性文本的痕迹，正如可替换的文本包含着各种样式的统治阶级文本一般。
4. 家庭文本要受到家庭生活物质条件的限制，不考虑这些物质限制就不能理解它们的不同形式。
5. 通过转换，家庭文本与明确了的其他类型关系的其他共时性关系文本产生关联，与无数叙事——即将这些结构表现为事件或过程的历时性横组合段——发生关联。这些叙事都以家庭文本为主要意义，尽管该意义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被颠倒或置换。

《俄狄浦斯王》的社会意义

如果我们只选择一个叙事文本作为样本分析，从中探索叙事文本与家庭理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文本将是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俄狄浦斯王》。叙事，自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赋予其尊荣地位以来（《诗学》本身即是西方叙事理论史上的奠基文本），《俄狄浦斯王》一直是西方的文学经典。它的情节为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提供了灵感，列维－斯特劳斯用这个神话来阐述他对神话的结构分析法。德·劳雷提斯在这些解读以及《俄狄浦斯王》之上，又进行了重要的女性主义解读。它不仅是著名的文学文本，并且还是珍贵的人种志资料，一个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家庭叙事，来自家庭发展史上的前资本主义阶段。

古希腊家庭的性质，本身在家庭史上就很有吸引力。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家庭，由一个自主的丈夫，加上妻子和2.25个孩子组成，这绝非家庭

的普遍形式。它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从早期的大家庭和亲缘关系网中出现，颇为人们所争议，但是，古代雅典的家庭形式展现出家庭早期也是极原始的形式。它代表着家庭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后世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一套文献——包括索福克勒斯的文本以及其他希腊悲剧大师的文本。由于这个缘故，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希腊家庭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这本著作为关于家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对古希腊家庭给予了有力的批评，这些批评现已成为社会史中的常识。他把这些缺点与出现在父权制希腊的一夫一妻家庭这种新的形式联系起来。这种新的家庭形式有两个主要特征：女性从属于男性权力以及男性控制继承权（男性继承）和制度化的卖淫，对于后者，恩格斯使用的术语是蓄妾（hetairism），这个词来源于希腊单词 *hetaira*，字面意义是同伴，引申意义即高等娼妓。

毫无疑问，妻子在古希腊的地位非常低，实际上与奴隶相差不远。女性本性的分裂，从父权制的角度看，德摩斯梯尼表述得最为透彻，他有一句著名的引言："我们有 *hetairea*（高级娼妓）来满足肉体的欲望，有 *pallakai*（妾）来照顾我们日常的身体享乐；有 *gynaikai*（妻子）来生育合法的孩子，还有一个值得信赖的管家来料理家务。"这里，德摩斯梯尼证实了恩格斯罗列的内容，还增加了 *pallakai*，这个词一般指女奴，有时翻译为妾。此外，男女严格分离，同性恋是古希腊社会普遍的特点。

关于古希腊家庭，恩格斯有一个更具争议的说法。受美国人摩尔根和德国人巴霍芬的影响，他假设有一个被他称为母权（Mutterrecht）统治的家庭结构的早期阶段——即按照母亲序列的继承序列，存在于由家族而非家庭组织的体系中。在这一阶段之后是父系社会，按照恩格斯的观点，父系社会必然性地导向父权制度，之后是代表男性的一夫一妻制。伴随着奴隶制和贫富的两极分化，他看到，城邦开始出现，城邦这种权力体系与家庭组织以及家族功能相对，但同时又渐渐对家庭的形式起决定作用。

母权的早期倡导者夸大了这些社会中母权制的可能程度，但是，认为母系社会中的妇女地位比古希腊好得多则是有道理的。同样清楚的是，列维-斯特劳斯研究的那种舅权体系显示出母系社会的痕迹，因为在母系社会中，最亲密的男性亲属不是女性的父亲而是她的兄弟。丈夫与妻子的兄弟之间针对儿子（尤其是作为继承人的儿子）以及妻子/姐妹的角力，是家庭中两种竞争性权力原则之间斗争的产物，这种东西在现代核心家庭中

已经消失了。在这场斗争中，女性的作用至关重要，并非如同列维－斯特劳斯所暗示的那样是边缘性的。

现在我们转向索福克勒斯，看看对他的文本分析能为理解这些问题提供什么帮助。关于俄狄浦斯及其家庭，他写过三个独立的剧本：公元前440年他55岁时写的《安提戈涅》，公元前406年他逝世后由他孙子写成的《克洛诺斯的俄狄浦斯》，以及写于上述两个时间点之间的《俄狄浦斯王》。索福克勒斯是雅典公民，虽然不是贵族出身，但他参与了公共民主生活。这些戏剧写于狄俄尼索斯节，目的是获取奖金，颁发奖金的是由几位男性裁判组成的评委会。于是，这些文本可能有人类学家通常使用的文本中所包含的典型偏见：由统治群体中的成年男性所作，为统治群体中的成年男性而作。当然，这些文本是虚构性作品，所以我们不能认定它们就忠实地反映了索福克勒斯时代的社会现实（并不比任何类型的文本更甚）。但这并非我们的目的所在。相反，不论它是谁的文本，不论它与那个社会中统治性的家庭文本有何等程度的对应，我们所感兴趣的，是作为这一系列剧本核心意义的家庭文本。

如弗洛伊德所观察到的，俄狄浦斯故事中最骇人听闻的事件就是儿子杀父（拉伊俄斯）娶母（伊俄卡斯达），尽管他做的这一切都不是有意的。不过他的父亲并非无辜。拉伊俄斯本人就曾试图杀了他，命令将这个襁褓中的婴儿双脚捆绑（他的名字正是由此而来，俄狄浦斯的意思就是“肿脚”）弃之山坡。然而他的企图并未得逞，因为伊俄卡斯达对整个事情早有安排，她将婴儿托付给一位牧羊人，这位牧羊人心生懊悔而放过了这个婴儿。俄狄浦斯由科林斯贵族夫妇珀里布斯和梅洛普抚养长大，他以为他们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然而一位神使警告他说他将来会杀父娶母，于是他离开了科林斯，结果在一个十字路口偶遇并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拉伊俄斯。杀了父亲之后，俄狄浦斯来到底比斯，此时底比斯为女怪物斯芬克斯的淫威笼罩，她有一个谜语，能解开谜语的人可以驱赶她，迎娶皇后，统治底比斯。俄狄浦斯解出了这个谜，娶了皇后也就是他的母亲，成为了底比斯的国王。他有四个孩子，两个儿子，波里内克斯和埃特奥克勒斯，两个女儿，安提戈涅和伊斯梅涅。但是底比斯再度陷入瘟疫，解除这场瘟疫也要回答一个问题：谁杀了拉伊俄斯？俄狄浦斯的秘密被揭穿之后，他母亲的哥哥克里翁将他逐出底比斯，取代他成为底比斯国王。伊俄卡斯达自杀，俄狄浦斯带着他的两个女儿流亡，但是他诅咒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以及

他们的舅舅克里翁。两个儿子死于争夺底比斯所有权的战争中。克里翁下令不准埋葬大儿子波里内克斯。安提戈涅对此命令宁死不从，而且拂逆克里翁的意愿，拒绝嫁给他的儿子海门。之后，海门也自杀了。

这里所描述的每个事件都是家庭关系的明显叙事对等，行为则被标识为敌意（杀戮、放逐）或关爱（嫁娶或提供全面支持）。我们也注意到，克里翁，舅舅/母亲的哥哥，作用非常重要。那么，这就是列维－斯特劳斯所描述的那种舅权制，对此，恩格斯视之为母权的延续形式。俄狄浦斯取得底比斯王位是基于他所娶的人，而非基于他是谁的儿子。底比斯王位是与这个女人以及她的家庭相伴随的，为作为年长男性代表的克里翁所拥有。

如果我们运用人类学传统来梳理这些关系，那么，这一模式在某些方面与列维－斯特劳斯的舅权制模式是彼此顺应的。在安提戈涅这件事上，兄妹关系比婚姻关系强出许多（尽管对她心目中的新郎来说，这并非那么明显）。在俄狄浦斯这件事上，伊俄卡斯达称他为君（anax），表现出的是尊敬而不是爱，但是，在这部戏中她并没有这样称呼她的哥哥，俄狄浦斯也没有表现出对她的眷恋。她的婚姻是一种政治联盟，除了是底比斯国王这一点，对方是谁并不重要，而且没有人会认为有什么爱的问题要讨论，尽管在她与拉伊俄斯的前次婚姻中，她愿意为了丈夫而牺牲自己的儿子。

这种涉及舅舅和父亲的模式，初看上去不太符合列维－斯特劳斯的模式。父子纽带具有强烈的负面性。不仅拉伊俄斯和俄狄浦斯之间如此，并且克里翁和海门、俄狄浦斯和他的两个儿子之间也是如此。但是，这并没有因正面的舅舅关系获得平衡，即便俄狄浦斯的确求助于克里翁，似乎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帮助。不过，并非所有父亲都会被儿子弃绝和谋杀，或者成为弑父行为的牺牲品。波里布斯是俄狄浦斯的“好”父亲，俄狄浦斯很尊敬他，以至于他宁愿逃离科林斯也不愿冒险杀害他。而且，俄狄浦斯有两个重要的男性他者，两个都是奴隶：拒绝杀他的牧羊人，将他带到科林斯的朋友。俄狄浦斯靠奴隶们的筹划而得以从父母置之死地而安的怒火中得救。于是，他能保持对父亲（波里布斯）的正面态度，从而顺应被（俄狄浦斯以及其他人）标举为“正确的”态度。从这些节选中，我们可以为俄狄浦斯重构一个家庭文本（索福克利斯代表俄狄浦斯构建了这个文本），如图 7.2 所示。

+
波里布斯 拉伊俄斯 = 伊俄卡斯达 克里翁
+ − 海门 −
+
= − 俄狄浦斯 + 伊俄卡斯达 克里翁 = −
+ =
波里内克斯 埃特奥克勒斯 伊斯梅涅 安提戈涅 海门

图 7.2 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家庭文本

我们所描述的叙事很难称得上是优秀的社会史。作为一种组织家庭关系的方式，它完全是灾难性的。经过一次杀婴、一次杀父、两次杀兄、三次自杀（不包括俄狄浦斯的自残），底比斯王室几乎没剩下什么人了。这不可能是希腊人组织家庭事务的方式，否则他们无法活到长得能写出悲剧来。即使存在着一种习俗，其中敌对的感情要用谋杀来表示，正面的要用婚姻来表示，这种家庭文本似乎也是同父权制希腊的标准文本相互矛盾的，因为父权制希腊明显重视父子关系，对兄弟姐妹则很少提及。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通过历数那些违背父权制主要规章者的灾难，索福克勒斯的戏剧正是要为这种标准文本正名：爱你的父亲，你将继承他，冷落妻子和母亲，你可以对她们行使权力。但是，这部戏剧是以俄狄浦斯这位儿子的文本为中心的。为他提供了过于众多的父亲或者父亲替代者：一个正面的父亲（波里布斯）和一个负面的父亲（拉伊俄斯）；一个正面的奴隶父亲（牧羊人）和一个负面的舅舅克里翁。弗洛伊德对这个情节的解读内化了其中两个人物，将一个（拉伊俄斯）视为仇恨的对象，另一个（波里布斯）视为超我的理想化了的父亲。但是，索福克勒斯为俄狄浦斯构建的父亲是四个而不是两个，其中三个至少在希腊社会中是有公共建制的地位的。其中之一碰巧是生父。舅舅代表母亲的亲缘关系。但是那位奴隶也是这个处于希腊上层阶级社会的“家庭”中成员之一。正是父子关系对父系结构至关重要，所以这种关系中产生的负面性必须进行置换和控制，同时正面性则必须进行强化。一位男性（父亲）对于另一位男性

的权力，必须由一个或更多个父亲一样的人物来平衡，他们要么有更多关爱的自由（奴隶，或年长的同性恋情人），要么更苛刻严厉（舅舅）。但是这些建制（同性恋、奴隶父亲和舅权）一个复合文本的具体表现，产生于父权制父亲与儿子之间既有关爱又有权力这种关系的需要，同时，也有儿子的反需要，儿子需要对奴隶和姐妹拥有自己的关爱和权力。这一结果并不是一套无意识的情感，如同弗洛伊德的解读中那样，而是一系列彼此相关的关系，它们都是有意识的，都存在于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在一系列建制中被不完美地神化了的家庭文本中。

现在我们要扩展文本范围来研究，仍然处于希腊文化同一时期的，同样受人喜爱的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提亚》系列。[①] 这个系列不仅描述了一个不同的王室，而且，由于其中心事件是杀母而不是弑父（虽然初看上去也许和俄狄浦斯模式相互矛盾）。阿哥斯国王阿伽门农因弟弟墨涅拉俄斯的妻子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拐，他便以弟弟的名义发动了特洛伊战争。在去特洛伊的路上，阿伽门农在军队的坚持下，很不情愿地处死了自己的女儿伊菲捷涅亚。当他和情人卡珊德拉返回家乡后，他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和他的侄子埃捷斯托斯勾搭成奸，谋杀了他。他的儿子俄瑞斯忒斯，一直在外被抚养长大，现在同他的男性好友皮拉底斯一道回来了，在伊莱克特拉和阿哥斯女人们的帮助下，他杀死了他的母亲及其情夫。这一事件让他感到羞耻，把他逼疯了，表现出了典型的精神分裂症状（语言支离破碎、重听、幻觉），他逃离了阿哥斯，终身未娶。阿伽门农王室就这样结束了：总共四个谋杀者，一个疯子，没有留下继承人，和底比斯王室一样看不到希望，但是形式却完全不同。

在这个结构中（表 7.3），出现了许多模式。在顶层，阿伽门农、克吕泰涅斯特拉和海伦分别都有两个配偶，一个是合法的，每次都是负面的（一），另一个是非法的，是正面的（+）。在底层，俄瑞斯忒斯有两个“父亲”，一个非法，一个合法。事实上，他也有两个“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是他的生母，但是，关于他死亡的虚假消息传到阿哥斯时，最为悲伤的是他的保姆克里莎：

① 《俄瑞斯提亚》是埃斯库罗斯最成熟的悲剧之一，也是古希腊悲剧中仅存的一组三部曲，它包括《阿伽门农》、《奠酒人》和《福灵》。——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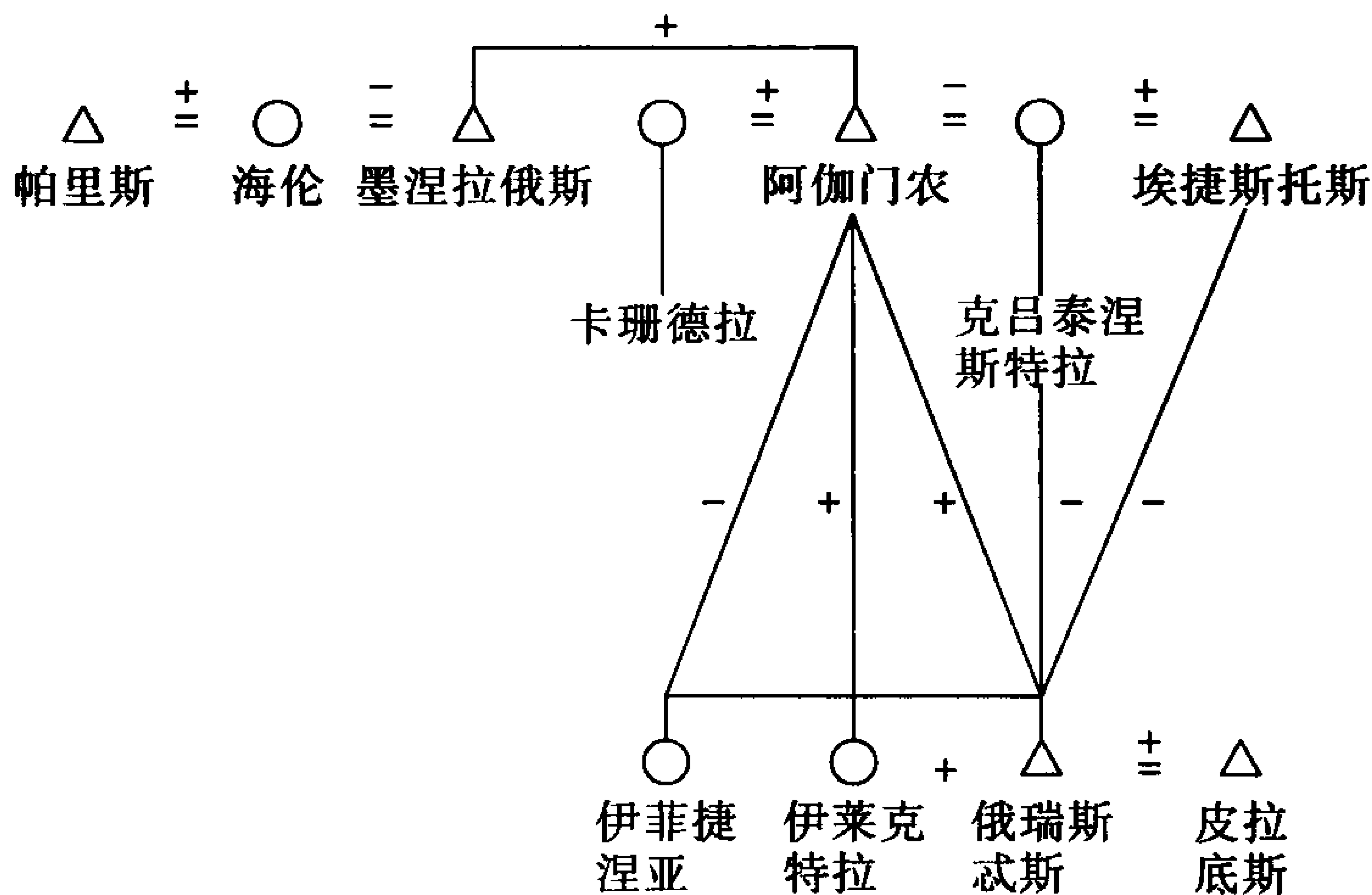


表 7.3　埃斯库罗斯所著《俄瑞斯提亚》的家庭文本

> 我从来没有承受过如此的伤痛。
> 其他困难我都勇敢地面对了：
> 但此刻，亲爱的俄瑞斯忒斯！我耗尽一生
> 只为他！我把他从他母亲身边带走，抚养他长大。
>
> 埃斯库罗斯，《奠酒人》

就此框架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俄瑞斯提亚》实际上重复了俄狄浦斯模式。作为母亲的爱人，埃捷斯托斯是父亲的一面；他被俄瑞斯忒斯毫不留情地杀了。但是母亲也分离成了两个，保姆是有爱心的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是有权势的母亲。俄瑞斯忒斯所杀的，是母亲的第二面，他内心极不情愿。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发现妻子的真实身份时，及时地停下来，没有做出杀母行为，他的自杀部分是对他的愤怒做出的反应。俄瑞斯忒斯可以杀掉他所憎恨的那个转换而来的那个父亲而热爱他的生父（或者至少他在父亲死后充满怀念）。俄狄浦斯杀了生父而热爱转换而来的那个父亲。《俄狄浦斯》表现了被压抑之物的灾难性回归，见证了所需转换是多么困难：《俄瑞斯提亚》所做的大致与之相同，只是用简单的置换将其掩盖起来了。

埃斯库罗斯所做的工作，是探索了他剧中社会里婚姻问题的其他维度。阿伽门农有两个伴侣（卡珊德拉和克吕泰涅斯特拉），两个女儿（伊菲捷涅亚和伊莱克特拉）。他杀了其中一个女儿，而另一个女儿却很爱他，

以至于弗洛伊德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伊莱克特拉情结。他的一个伴侣（卡珊德拉）警告他另一个伴侣会杀害他。卡珊德拉是战利品的一部分，并不是他那无爱的婚姻中唯一的补偿（不时的有其他战利品），但此刻她占据着那个转换位置。女儿们的事发人深省。在他处死伊菲捷涅亚——应军队的要求——之前，他起初表现出的是对女儿的过分溺爱。带着女儿去远征并不常见。军队要求以她作为献祭，而不是送她回家，表明社会为了保存现有的家庭结构施加于父女纽带之上的严厉惩戒。

索福克勒斯没有为我们提供足够的细节，使我们难以开始构建控制女性性别那种转换（德·劳雷提斯尖刻地问道："遇到俄狄浦斯之后的斯芬克斯会怎样呢?"）。埃斯库罗斯的戏剧在研究克吕泰涅斯特拉时探讨了这个问题，海伦则是另一个例证。克吕泰涅斯特拉无爱的婚姻通过也许可以从称为鸾凤和鸣那种东西那得到补偿（她称埃捷斯托斯为"我最最亲爱的男人"），她还宣称对于女儿伊菲捷涅亚是舐犊情深。她与埃捷斯托斯的正面关系成为对她周遭负面关系的唯一补偿。在该剧中，埃捷斯托斯似乎自负、孱弱、野心勃勃且自私自利，但这对于克吕泰涅斯特拉对他的建构无关。不论他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克吕泰涅斯特拉都给予了他极其正面的感情价值，这就是他对于她的意义。她所使用的特殊转换当然完全是非法的（在这个社会中，阿伽门农可以有二十个妾，而克吕泰涅斯特拉却不允许有一个情人），如果没有这种转换，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提供给女人的是如何贫瘠。克吕泰涅斯特拉的丈夫离家十年，他处死了她的女儿，还带着一个妾回来，但是这些只不过是对于古希腊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那套家庭关系所做的戏剧性夸张而已。

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一样，都身为男性且年长，只是出身更高贵一些：然而他的文本拥护民主，比索福克勒斯的文本更充分地表现了关于女性的家庭文本。他清晰地表述了自己的忠诚。《俄瑞斯提亚》以审判俄瑞斯忒斯被指控杀母这场戏作为结尾。原告是女神欧墨尼得斯，她吁请明确形式的母权，因为母子之间的纽带远比夫妻或父子之间的坚实。在这部戏的高潮部分，投给母权和投给父权的票数相等。只能由一位编造出来的角色朝着有利于俄瑞斯忒斯的方向来解决这个问题——投出这一票的是雅典娜这位女性。埃斯库罗斯的作品是展示母权理论盛行于古希腊的经典文本。他在自己的戏剧中所表现的社会样式显露出女性家庭文本的众多痕迹，以及包容这些痕迹的建制——尤其是公然挑战居于核心地位的父权制

家庭的各种形式的通奸。但是，正如索福克勒斯探索与父亲之间关系的问题需要投射出希腊社会提供的多个父亲一样，所以，埃斯库罗斯探索性别关系的问题需要表现出关于女性的家庭文本的某种东西。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试图勾勒出一套六个叙事的主要社会意义，两个剧作家每人三个剧本。现在到了清晰表述我们的阅读策略及其目的的时候了。从所表现的事件到共时性结构这种转换，可能显得为特定目的而为之或刻意为之。事实上，这种联系既紧密又多余，以至于我们可能从很多可以替换的例子来得出同样的结果。尽管我们将这些叙事看做是一套的，我们却并不认为它们彼此一致或表现了一个共通的意义。相反，每个作者所呈现的家庭文本都既有重叠又有差异。它们都是复合文本，表明存在着彼此有所竞争的家庭文本，其中一些受到了遮蔽（在索福克勒斯的叙事中尤其突出）。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参差并不承诺有什么单一的、最终的、统一的文本，也并不存在关于古希腊社会的普遍性家庭文本。相反，在不同程度上，这些叙事提供并阐述了关于被噤声者、从属者的家庭文本，它们扰乱了却又塑造了统治者的文本。从属者所做的关于他们自己家庭文本的那些叙事不复存在了，但是它们作为统治者文本意义的必要完善而得以留存，宛如须避让的岩石，须紧抓不放的树。

我们选择来分析这些文本，是因为我们提出了关于古希腊社会中家庭的一系列的假设和疑问，所以现在最好回到这些假设和问题上来。弗洛伊德和列维-斯特劳斯所关注的是自我维系体系，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所代表的则相反：家庭中的危机，危机如此深重，以至于他们所表现的家庭不能发挥作用，无法自我繁衍。从诸如恩格斯的宏观史和社会历史学家所建构的材料那里，我们可以概述出制约并被融入这些家庭文本中的物质状况。物质状况就是这些家庭文本所揭示的东西，但是它们所揭示的这种东西构成了那些状况对于那个社会成员的社会意义。物质状况与家庭文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所想要理解的恰恰就是这种辩证关系，那么，单独分析其中任何一个都是极不充分的。

对两位剧作家而言，危机发生的场所都是钟鸣鼎食之家（oikos），即贵族和富人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并非古希腊唯一的家庭形式。到这个时期为止，希腊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复杂的结构，其中城邦是统治性的组织原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阶级分化渗透到了希腊社会之中，打破了社会以前按照部族和亲缘关系组织的那些纽带。钟鸣鼎食之家不再是亲缘

关系网中的一个大家庭。但是，在一个蓄奴社会中，奴隶在主要家庭文本中取代了亲缘。处于钟鸣鼎食之家的核心地位的，现在成了核心家庭（丈夫、妻子和孩子），但是家中蓄养的奴隶也是家庭的内在组成部分。埃斯库罗斯以及索福克勒斯展示了这些他者在可能的情感结构以及经济生产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他们成了核心群体那些问题的转换性解决。没有奴隶，希腊人的家庭实在难以想象。

如恩格斯所说，这些问题源于已婚夫妻的经济政治关系，以日常生活中男女明确分工和两性的身体分别作为特征。为了男性权力以及男性继承，妻子的位置严重弱化。家庭生活的父权制意识形态被清晰地记录在当时的道德文本以及其他的文献中。诉说得不那么清楚的东西，外于我们所分析文本的，是对这种针对所有相关者的分配感到不适，与统治性父权模式共存的其他建构的多样性，以及被允许甚至鼓励的置换和包容数量太多。

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都以不同的方式关注到作为父权制精神牺牲品的儿子。他们追溯了这种转换，这种转换为钟鸣鼎食之家的儿子们提供了其他父亲，通过这种追溯，他们想要包括并置换可能摧毁父权制的那种敌意，同时强化正面的态度以便把儿子紧紧绑缚在他那父权制角色上。舅权制这种旧式建制提供了一个可疑的父亲角色，这来自母系的亲缘概念，尽管表面上舅权制已经从希腊社会生活中消逝了。奴隶制提供了另一类父亲，以对权力不平等的颠倒作为特色。同性恋提供了一个进一步的父亲角色，且其地位相同，不过是在家庭之外，尽管在我们所考察过的文本中，两位剧作家中只有埃斯库罗斯写到了这种希腊建制，而且写得非常隐晦。

和这种三重性父亲角色的建构彼此呼应，这些文本展现了一个三重性母亲——伴侣角色的建构，这也是与前者相同的基本范畴建构起来的，包括：*gyne*（作为财产的管理人的母亲或妻子），奴隶身份的 *pallaka*（情人或保姆，负责照顾饮食起居），以及平等的性对象（来自钟鸣鼎食之家的姐妹或来自其外的 *hetaira*）。根据这些范畴，女性至少被分成了三个不同角色，每种角色都被剥夺了这个社会为其所界定的潜能。尽管 *gyne* 的角色是合法妻子和母亲，处于这种官方性别意识形态的中心，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其他两种角色并非偶然，而是系统的。因为爱与权力之间的暧昧关系，有权者的儿子索要一个他们会爱的女人，因为他们自身所具有的更大权力（奴隶），甚至更强烈地索要某个他们会爱的女人，因为他们的

权力是中心化了的，或者不成问题（高级娼妓，或者一个同性恋同伴）。

我们所考察的家庭文本有一些独特特征，它们专属于希腊社会的一个阶层，处于家庭和国家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就这种专属性而言，我们需要修正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论述。毫无疑问，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对父亲有极为矛盾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社会要求必须克服的。但是，这一矛盾的起因并非他须对母亲有所欲望，而是他对父母所具敌意的反应，这种敌意是受他们自身关系的社会建构所制约。他的情结不是埋伏在他潜意识中的内在心理事实，而是来自社会框架中系列重要他者的系列特定意义。俄狄浦斯的问题不在于他的俄狄浦斯情结，而在于两种家庭文本的瓦解。大型亲缘群体萎缩成了父权制的钟鸣鼎食之家，在这样的家庭中，在极端的父权状况下，建构出主仆、男女之间的一道屏障。诸如恩格斯所提供的框架，让我们得以看到现代家庭发展中这一刻的特别。但是，像弗洛伊德一样，恩格斯还看到古希腊父权制家庭与19世纪资产阶级核心家庭之间的众多相似。像弗洛伊德（也像列维-斯特劳斯）一样，他看到了变成了建制本身内在之物的各种补偿结构。同时在我们研究甚至很少量的叙事时，我们也发现了大量关于家庭文本的矛盾转换，它们能够运用弗洛伊德的转换理论来进行很好的探索，尽管它需要一个比弗洛伊德的更好的社会操作描述来对其进行解释。

家庭照片与家庭文本

家庭文本以一整个系列的共时性叙事为代表，从史前雕刻（如大女神）到各种各样的家庭表现形式（谱系、家庭肖像、艺术或雕刻中理想化的神圣家庭），再到现代家庭照片和影集。这些文本并不直接典型地表现家庭文本。它们通常被解码为转换，解码为历时性顺序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由特定施为者生产，其目的是为了插入进一步话语链之中。它们的共时性是它们意义的组成部分，传递出关于家庭形式永恒而无尽的这种信息。它同时也使完全了解家庭形式意义受到阻碍，因为这种意义在本质上是历时性的，是关于爱与权力的转换的信息，交织在单一文本的静态瞬间。

为了描述这种文本功能，我们以一张照片为例（照片 7.1）。这张照片大约拍摄于半个世纪之前，照片里是一个美国犹太家庭，现在这张照片属于最右边的那个男孩（我们称他为 A，他的阐释是我们将要分析的复合文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拍摄的是男孩母亲家一家三代的照片。外祖父母老拉里和朱迪斯分别坐在前排的最左边和最右边。他们中间是他们的三个女儿：左边是二女儿蕾切儿，中间是小女儿贝基，右边是大女儿萨拉。蕾切儿后面是她的丈夫约翰。萨拉后面是她的丈夫小拉里。萨拉有三个孩子，最右边的 A，外祖父前面的大女儿莉迪亚和坐在萨拉膝盖上的罗茜。蕾切儿的独子贝瑞坐在她的膝盖上。此时的贝基还没有结婚，在她后面的是弟弟萨米，家中最小的一个。



照片 7.1　作为家庭文本的家庭照片

A 有两个评论，有助于我们将该文本定位于更为基础的家庭文本。他介绍说，照片描绘的是“母亲一家”。这首先是他自己的母系亲属，整个照片是母系制决定的，即便他把外祖父描述成“男家长”。母权制基础可以从女婿们直接站在他们妻子身后显示出来，孩子们则分散在人群中，和他们的父亲没有参照关系。A 还注意到了小女儿贝基的明显中心地位，她置身照片中心：

A. 嗯，我在想照片中的贝基是…莲花中的珍珠。她是处女，位于照片的正中，围绕她周围是希望……

G. 希望人丁兴旺?

A. 人丁兴旺，是的。还有……有……弟弟……姐夫……在身边……围绕这个……需要被保护的群体。我相信我的朋友蒂姆娜就有这种洞察力。她说所有的男性都穿黑色衣服，我说我的外祖母就是这样，她说我的外祖母是个名誉男性，她已经不是女人了。

根据这个解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符码的某些主要要素。表示±亲密（=±团结）和±高级（=±权力）的透明能指给出了含混的意义，因为男家长和女家长都坐着，像他们的女儿一样，而第二代男性都站着，比他们的妻子或姐妹高。小儿子萨米比贝基和他的姐夫们都高。因为他当时只有14岁，人们也许会怀疑他脚下垫了个箱子来增加高度，其实情况并非如此。因此他的高度似乎表示着权力或重要性，但是他不是男性家长，甚至连父亲都不是。A 所强调的符码与中心和边缘有关，靠近中心是表示宠爱对象的能指，边缘则表示权力，为保护宠爱对象而存在的权力。

事实上，有很多的圆形结构传递出这个意义。如 A 所指出的，贝基处于双重圆环的中心，身边有两个姐姐，还有四个老年男性长辈（外祖母是名誉男性）。但是，“儿子”萨米身边也有他的姐夫们在两侧保护。四个孩子以镜头视角为中心组成了一个内圆。由三个女儿加上外祖父母（外祖父作为名誉女性）组成的圆为他们提供保护，在他们之后是由三个男士组成的群体——尽管外祖父母也可以被看做这个圆外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该框架中起主导作用的男性作用模糊，让人觉得颇为有趣。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父权制家庭（A：“无论是在他本人眼中，还是在家人眼中，外祖父都是个重要人物”）。但是权力标记是边缘性，因为权力是为爱而存在的，而不是倒过来，或者说，符码正是这样坚持的。权力的缺乏是中心的标记，因为缺乏权力——青春、女性、童贞——是爱的对象中本质性的东西。因此（对于 A 而言）这张照片似乎在礼赞小女儿贝基，而女家长则由于采取权力态势而经历了性别转换。

通过描述相关诸人的年龄和关系，我们认为这张照片只有在与另外一张照片相互关联并作为其转换前提下才有意义，这通过亲缘分析家们所使

用的族谱或家谱树的形式可以得到合理而明晰的阐释。A 为我们解释这张照片的话语一直提到这种性质的一幅图谱。我们可以按照表 7.4 的线索，把构成这张照片的交流表现为一种转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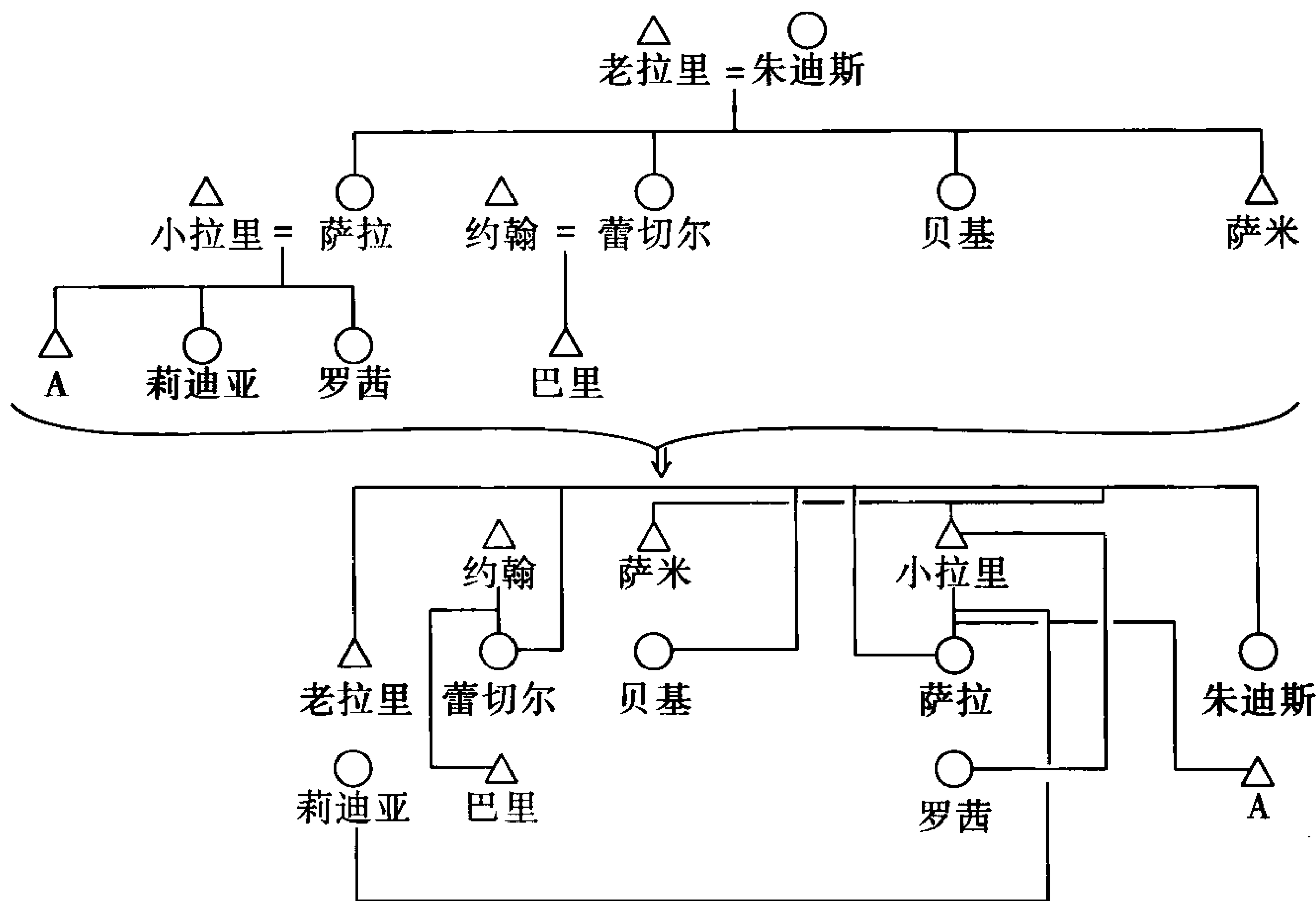


表 7.4 对表 7.1 的转换

这个转换操作可以分解成几个转换部分。在族谱中，+近距等于+亲近，或者通过婚姻（=）或者通过血缘，或者在同代之中（—）或者在隔代之间（|）。在这张照片中，每种婚姻关系都增加了距离，男家长和女家长之间的距离最大。这里存在着爱与权力之间的颠倒关系，因为夫妇权力越大，他们之间（表示非爱）的身体距离越远。年轻的已婚男性都站在他们妻子后面，没有与之产生接触：事实上，根本没有看她们，就像“儿子”萨米没有看那位没有结婚的女儿贝基一样。萨拉和小拉里的孩子们分布在家中重要的其他人周围。大女儿，作为爱的替代对象，被交给男家长。儿子 A 被交给不苟言笑的女家长。小女儿罗茜（同蕾切儿的独子巴里一样）被允许紧靠母亲而不是父亲。在这些位置重置中，我们得到另一条转换规则：当非近距转换为近距，表示爱大于权力。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条原则：

+近 →−近 表示 权力>爱

− 近 →+近 表示　爱>权力

（也就是说，当一种众所周知的近距关系被表现为一种远距关系，这表示，主导方面是权力而不是爱；当一种众所周知的远距关系被表现为近距，那么情况正相反）。

根据这条原则，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作为男家长的老拉里，存在着一套复杂的婚姻关系转换。他和他的三个女儿，包括外孙女莉迪亚，之间的距离比他和妻子之间的距离更接近。他的妻子朱迪斯被分给了 A，尽管这明显是一个更为矛盾的礼物，而她本人的儿子在后面，女婿们将她和儿子隔开。于是，这种婚姻关系有分成两种形式的表层转换：

$$老拉里 = 莉迪亚 \Rightarrow \begin{cases} 老拉里 = 莉迪亚 \\ A \quad = \quad 朱迪斯 \end{cases}$$

但是，在女儿们的作用给定前提下，我们可以把分配给男家长的三个女性重构为三部分：

女家长（朱迪斯）
新娘（贝基/雷切尔/萨拉）
少女（莉迪亚）

这三种作用与父权制希腊中女性的三种作用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即 *gyne*（法律上的妻子），*hetaira*（妓女/伴侣）和 *pallaka*（妾）。这种相似性不是偶然的，它有助于解释犹太人弗洛伊德怎么能够那么出色地理解希腊人俄狄浦斯。

很明显，这家庭不仅为三个女儿建构了不同的角色，并且同样的操作也发生在下一代那儿，譬如萨拉与小拉里所组成的家庭。在照片中，A，“儿子”，被分配给了源头家庭，分给了女家长而没有分给他的父母。大女儿莉迪亚作为爱的对象被分给了男家长，也就是说，被建构成了男性所爱的对象。罗茜仍然为母亲所有，和母亲结成联盟而为家中男性所不可触及。当然，我们不要认为这表现的是一成不变的角色。譬如：根据 A 的说法，甚至一年之后便不会让巴里如此贴近母亲了，他的位置将随着一年之后另一个儿子的出生而发生变化。这张照片只代表家庭建构中的一个阶段。但是，从转换方面来解释，有助于明确之后的各个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譬如 A 说他和莉迪亚之间的关系比他和罗茜之间随和，因为罗茜总是试图“改变他”，试图支配他的生活。罗茜自命为家庭律法的拥护者：莉迪亚是一个随和，不强势的人，因此大家不怕她，也很

喜欢她。按照她与男家长之间的关系，照片显示她被建构成了那样的角色，而且似乎按照她与弟弟之间的关系，她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猜测，作为男家长的外祖父不在时，她也会代她父亲完成这一作用，尽管在一个大家庭中这种转换的可能性会变得难以预料的大。我们也许会问，莉迪亚是否“天生”比罗茜更可爱、更和蔼、不那么拘谨，或者是她被塑造成了那种角色，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相关的问题，因为有些人被证明在为其所指定的角色中难以胜任。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依旧能够看到父权制家庭文本对于一系列彼此不同的女性选择有着如何苛刻的要求。它绝非在所有的男孩女孩身上盖上一个单一性别模子的印记，而是要求他们要有特定的差异，并且尽可能地放大或创造这些差异。

最好是不要把这个问题理解为人类的某种“本质属性”。譬如特定生殖器官的有无能够影响到性别建构操作，但却不是全部的决定因素，跨性别建构是可能的，并非不同寻常。它更多是这样一件事：个人能够行使的抵抗幅度有多大，他们产生对立性家庭文本的程度就有多深。在本例中，最明显对立所在就是这个男孩A。A清晰地反思了他那种姿势的含义：

A. 我看到……也看到这个男孩的姿势，我觉得，我觉得这同我和……呃……和我与家人群体的特别关系有关，也许和任何群体都有关。那就是，我部分地，进入了群体内部。我在向它的内部张望……

G. 你那样子转过去了……不，实际上你没有……你的头稍微转过去了一点……

A. 是的，我既在其中又在其外。我既想进又不想进。我很矛盾。

A用了直接的空间关系术语对这一姿势的意义进行了充分讨论。他同意，他通过让自己如此疏远而打断了这个群体的和谐格局，他本应该置身朱迪斯前面。然而，他认为自己不会站在贝基前面，置身照片空缺的中心，因为这“不可想象”。他把自己姿势的复杂纠结解读为既想加入这个群体又想离开它的自我取消冲动。他强烈感到，这种矛盾是他作为社会存在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这张照片中，他显然积极投身于这个角色的建构之中，他是如此突出地疏离这个家庭文本的唯一一个人。所以，他似乎成了这个包括在总文

本之中却没有为之所同化的异文本的作者。不过，他没有融入的部分原因在于没人试图接纳他。他的外祖母最清晰地拒绝他的这一角色。当问及他为什么没站在外祖母前面，A 回答说：

A. 部分原因是由于她的病腿……她那著名的可怜病腿（笑）以至于她……

G. 但是你本来可以？

A. 我本来可以站在她的面前，我却没有。

在这个解释中，A 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实际上还有曲折，牵扯出另一个理由。他于是承认其起因不同，发笑，将它中和成一个理由，阐明它的合理化地位。"著名的"表明朱迪斯滥用"可怜病腿"来作为借口，以便不做她不想做的事。就本例而言，似乎她不想做的事是让 A 作为一个被允许的替代男性站在她前面。于是，A 的解释暗示出，他一会儿支持并重复外祖母（抛弃他）的理由，一会儿又质疑她的可靠性，尽管他没有对这个暗示探究下去。但是，似乎他在照片中充满矛盾、被边缘化的位置是共同造成的，属于他外祖母以及他本人那个不同家庭文本的一个组成部分。边缘化，我们甚至从男家长的位置看到，是这种母系结构中身为男性的一部分。外祖父不仅处于这个群体的最边缘，而且他还在自己与女儿们和女婿们之间留下了谨慎的空隙。只有大外孙女和从他妻子那边散发出的重量，使作为家庭的一分子的他看上去很平衡。A 身上冲突的压力，无疑也被他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些压力是通过他本人身体所建构的信息表达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却又是预先给定的。如果作为正式文本的这张照片认可他有权将自己的不同意义嵌入其中，那么，他那种异见将协调并表现其他人未予承认的意义。

像这样的一张照片不仅记录了一个家庭文本，而且似乎使其意义永恒化了。A 向我们畅谈了照片的隐含意义，还描述了关于它的某些零星历史。他 50 岁生日时，莉迪亚来看他，送给了他这张照片。他提到，他和朋友、女儿，当然还有其他人，都讨论过它。他甚至讲起自己关于照片的一个梦。

A. 我做了一个梦。我姐姐莉迪亚在我 50 岁生日时送给我了这张照

片。我好多年没看到它了。不久后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澳大利亚的一个山坡……笼罩着……笼罩着明媚的阳光，有点像秋天的阳光……你知道汤姆·罗伯茨的《栅栏》中的山坡吗？你知道那幅画吗？《栅栏》？美术馆里的？

G. 描述下好吗？

A. 嗯……一辆马车被偷了……

G. 是的，我知道了。

A. ……它后面是灌木丛。灌木丛美极了，它简直就是描绘澳大利亚景色的杰作。太阳透过树丛……点亮了这片黄褐色的草地。在这样的一个山坡……每个人……我的家人……这一家子……波娜一家子……玛丽一家子……我们的孩子们，波娜的，我的，还有玛丽的，或许还有其他人，我不确定，一起照相。它是只在我梦中出现的那些不可能的照片之一。

每个人都在山坡上。每个人都舒适快乐。每个人都做着符合自己个性的……快乐的事，他们都在动。每个人……同时每个人之间都距离很宽，他们都没有僵成一团……呃……他们彼此之间快乐融融。就是这个样子，那张照片和这张有着很相当的结构。你也许能看出其中形状……一看就能看到。是的，……不是那么紧的样子。我想这就是我的梦……关于家庭的梦，关于亲缘关系的梦。

对梦的分析把我们带进了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地带。A 明确认识到了山=家庭这一象征，这座能容纳无数家庭的大山与弗洛伊德的解读是一致的。但是，同样有趣的是把这个梦看做是对照片意义的转换，对照片中 A 本人身体文本的转换。这里没有静止（“他们没有僵成一团”），只有动。梦瓦解了原作那丧失了动感的共时性，正如轶事或其他话语一般。活动是个性化了的，没有步步亦趋地沦为其他人的意义，好比照片文本中那样。但是，他坚持认为，这个场景和照片有同样多的样子和秩序，或多或少地融入了“家庭”之中。包括他的两个妻子以及她们各自的孩子，对于这个家庭而言实际上是一个严重问题。所以这个梦表现了家庭的优点和犹太特色，也表现出对于个性和分离的意愿，这与他四岁时曾经尝试去调和的矛盾正好一样。照片和梦仍然起着将 A 和他的家庭和他的犹太特色绑缚在一

起的作用，无论它们同时也表现出了多么深刻的矛盾。

我们试图重构的家庭文本将支撑起它用以明了关系之后的文本，尽管它不会始终保持不变。我们没有研究A之后的生活感情关系。然而我们的确问过他，家庭结构在他的工作关系中有多大关联性。他的回答是，他将男性分成三类：父亲型（与他有激烈冲突的强负面权威人物），舅舅型（与他有非常正面联系的权威人物），以及兄弟型（大多数是男性同事，与他有着弱正面性关联）。他将女性分成两类：一类像罗茜，“想要重新塑造我，因此我取笑她们的话以及她们想要让我成为的那种人”；另一类像莉迪亚，对之“我不怎么喜欢也处不好，但是她不想让我变成别人”。A似乎在舅舅型关系中，或者是他用那些术语所建构的体系中，才能发挥最佳。然而，他对于女同事所使用的模式中没有一种是完全正面的，没有一种能让他建构起一个正面的女性权威人物。

在这个解读中，我们所关注的不是这张照片作为一个自足文本，而是作为来自家庭文本并在其间起着沟通作用的一连串话语中一个战略要地。在发掘这些家庭文本的过程中，诸如编码在族谱中的那些关于家庭的物质事实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家庭文本是为回应生物和社会所命定的群体建构起来的，但又不等同于这些群体。它们是有多个作者的文本，受到家庭中所处不同位置的影响，绝对不是独立的。渐渐的，当运用这些家庭文本来明确一个新的群体或一个新的领域时，它们从其先前历史中带来了它们的限制。这些不同领域将被对立和类同模式连接，通过融入了旧模式中某些东西的一套新的关系文本表现出来。新领域中的总体关系最终将由运行于该领域中的力量来决定。如果个人要利用家庭文本来明确，譬如位于工作场所中的各种关系，那么，这些关系本身不会是家庭关系和家庭文本的产物。但是工作和家庭的范围，在终极意义上说，是一个单一政治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彼此不同却彼此依赖，并且必然通过规律性的、可商洽的转换路线而相互联系。

幸福家庭和叙事顺序：从历史中抽取时间

围绕着每个人从童年到成年的无数叙事中，有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性的大类：故事。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要求讲故事，并且不断地构建和讲述自

己的故事。成年人知道，看着电视上最乏味和老套的故事开头有什么危险。真要花一番努力才能从电视机前站起来撇开这个故事，或者关掉电视。那么，故事的吸引力何在，它们又起到了什么样的社会作用呢？

在此处的讨论中，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对叙事（narrative）和故事（story）做出了区分。在我们的用法中，叙事指对文本所建构的世界进行组织。故事指是叙事的一种，它按照特定形式、文本方式秩序，取决于故事所发生或为之而发生的此情此景中参与者的社会组织。于是，叙事是朝向模仿层的。故事按照其特别的模仿结构融合了更多属于符号活动层的方面。不过，在分析任何叙事或故事样本的时候，符号活动曾和模仿层之间的相互关联是绝对不能忽略的。符号和文本始终是社会生产的。能指的结构本身是先前有关沟通和论争的社会操作产生的结果，所以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并非任意的，而是表示了特定时间点上的社会关系状况。为了揭示这一意义，我们需要理解故事和叙事生产中涉及的参与者所具有的社会关系。

叙事是关于组织和呈现话语的文化的既定方式。叙事的特色结构本身携带着重要意义。叙事把事件连接成有顺序和因果的链条，并给予它们开头和结尾。这些特征是表示连贯、顺序和封闭性的透明能指。使用这些具有说服力的透明能指，效果之一就是将叙事本身的内容自然化。通过在一个叙事框架中呈现各种难以定性的文化范畴，这些范畴本身显得颇具自然特色，并似乎如同自然本身一样不可避免。

另外一个颇为流行的叙事特性，是用于表示现状的稳定性。亚里士多德关于叙事的著名定义就是，它具有开始、中端和结尾，这似乎看上去太老生常谈或不值得挑战，但是，随着他的注解，这掩盖了一个意识形态加载过程，从最初的平衡状态，经过复杂化或扰乱，抵达危机和解决，导致一种新的平衡。这为关于现状的经典叙事给出了一条原则。从意识形态上说，这种结构承认，事态可能受到扰乱，可能得不到解决，但是它承诺，它们会回到一种平衡状态，这是先前就有的，是自然的，所以也是不可避免的。叙事，所以，是一种积极而灵活的策略，特定的社会能用之复制出它们的价值体系。叙事需要连续的变化、不停的活动、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且把它们变成稳定、连贯、可解决的。它为断裂的进程和事件划出边界，并常常打破它们，将其进一步分成独立的步骤或阶段，还对其不安分的力量做出限制。

当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叙事类型就是历史学家们所生产的历史。历史学家们不懈的活动可以被看成一直尝试着以让现在更为安全的方式来重写过去，他们为每个断裂时刻发现具有闭合特色的方方面面，把历史划分成庞大的个体叙事群，以专著或论文的方式存在于无数单个的历史体裁中。按照这种方式，历史让过去和现在彼此融洽，成了关于平衡最终取得胜利的那些叙事取之不竭的源泉。就这样，历史学提供了从历史中抽取时间和操作的一种叙事形式。

叙事的另一种主要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故事，这将是我们讨论的重点。这一术语指的是一种体裁，其特定形式随时间和场景不同而变化极大。故事这一范畴在各种叙事类型中如此重要，以至于它的特征似乎成了叙事的无标记（unmarked）形式，这种类型未予评说也无可评说，如此寻常以至于它似乎成了所有类型中最“自然”的一个。除了模仿特点之外，故事还暗示着对参与者的特别组织，以相对高层次的非正式性和稳定性作为标志。故事的类型或分类繁多，或者与社会场合有关（如轶闻趣事、儿童故事、小说），或者与典型的模仿内容有关（如科幻、西部故事、童话）。

因为故事作为一个范畴直接绑定在特定符号活动语境之中，所以它比叙事形式更可能发生变化，这使它对符号活动操作的回应速度要慢得多。所以，这种为思想控制所决定的叙事范畴和模仿范畴以一种特定体裁形式形成的结合，呈现出具有巨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结构。但同时也更为准确、更为细腻地对直接的社会力量做出了反应。因此，故事而非叙事为分析特定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超越时间的连续表现提供了绝佳的场所。

我们用以阐述的例子是儿童故事《仅只一声》，由詹姆斯·希里奥特所作，彼得·巴雷特为孩子进行了“改编”并配上了插图。因此叙事以双文本形式存在，既是文字文本又是图像文本。二者的关系本就复杂，图像文本有时从属于文字文本，充当“阐发”或“修饰”，有时又相对独立，像赋格曲一样与文本之间具有一种对位关系。我们将从文字叙事开始来分析故事。相比宏观的平衡到断裂再到平衡，我们有必要以更细腻的层次展开，将这个故事分成一系列的单元，为便于参考，我们给它们加上序号。

单元1　兽医/叙事者詹姆斯·希里奥特设置特殊场景，为我们介绍了那个世界：乡村，更确切地说，一个农场。还给我们介绍了

几个人物：农场主威尔金先生（也是故事中唯一取有名字的人物）和两只牧羊犬幼崽。兽医/叙事者问农场主“这两只幼崽真的彼此友爱，对吧?”威尔金先生答道：“是的，它们是好朋友。它们从不分开。”

单元 2　现在焦点转到了威尔金先生，他是一位忙碌的农场主，但仍有时间兼顾自己养牧羊犬的爱好，这方面，他多年来一直都很成功，赢过不少比赛。从上窝幼崽中，他选出了两只，分别取名斯威普和吉普。

单元 3　现在焦点转移到了这两只幼崽。在农场主眼中，作为牧羊犬，这两只幼崽表现“自然”。

单元 4　现在介绍两只幼崽。斯威普很寻常，吉普则有些不一样：他身上有棕色条纹，一只耳朵耷拉着，另一只总是竖起来，并且它从不叫。

单元 5　乔治·克洛斯利，“威尔金先生的一个老朋友”，他的狗死掉了，想再买一只。威尔金先生把斯威普卖给了他。

单元 6　吉普很伤心失去它的“兄弟和最好的朋友，而且无疑它思念着斯威普”，但是因为有其他狗的陪伴，吉普从不“真正孤单”，吉普不太聪明，在比赛中难以胜出。

单元 7　一年过去了。吉普和农场主在田间。它仍是“双眼发光，性情可人。但却从来不叫”。

单元 8　又一年过去了。要召开一场牧羊犬比赛。穿着各种服装的人成群结队地站在河边的大赛场中。

单元 9　狗都被拴在篱笆上，排队等着上场。没有咆哮，没有争斗。“看着一长列摇着的尾巴和友好的表情，真是妙极了。”

单元 10　威尔金先生靠在车上。吉普被拴在保险杠上，威尔金夫人坐在威尔金先生身旁的帐篷凳上。威尔金先生不是在“遛狗”，而是特地来观看比赛。

单元 11　“乔治·克洛斯利和斯威普”挤到出发点。吉普身子都僵硬了。比赛开始时，吉普慢慢站了起来。

单元 12　斯威普明白克洛斯利先生发出的所有指令，各种姿势，长短口哨。显然它是冠军。

单元 13　克洛斯利先生向斯威普快乐地喊到“帅小伙”，斯威普摇摇

尾巴做出回应，吉普抬起头，发出嘹亮的一声，“在整个赛场回响”。

单元 14 威尔金夫人惊得吸了口气。她的丈夫失声大呼：“哇，难以置信！”望着他的狗，嘴都合不拢。

单元 15 吉普的绳子松开了。兄弟俩玩耍起来，“像儿时那样相互嬉笑”。

单元 16 兽医/叙事者和威尔金夫妇都希望现吉普“像其他狗一样叫，但它却不再叫了”。

单元 17 六年后。兽医/叙事者在农场中。威尔金夫人和厨房门外晒太阳的吉普说话。吉普自从比赛那次之后就没有叫过。威尔金夫人等了很久，但她觉得吉普永远都不会再叫。兽医说：“噢，没关系。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比赛那天的下午。”

单元 18 威尔金夫人再一次看着吉普。“可怜的老伙计。八岁了，叫的却仅只一声！”

这些就是文字文本的诸个阶段。当然，这里的描述省略了重要的材料。如果能指具有一个重要的结构，那么完整的记录需要注意到叙事结构的每个方面。譬如：该叙事专门提到，参与比赛的人们靠在长长的弯拐上，“拐头有羊角雕成的把手”。毫无疑问这是有意义的。从这种分析角度来看，许多方面都没有得到揭示。

图像文本以自己的步调发展。如我们所说，有时它起到的作用仅仅是阐发。这也很重要，因为它在几个点上调校文字和图像文本，以便鼓励读者把两种文本结合起来解读：以图像文本为阐发，以文字文本为言说/细述。（通过阐发所进行的）调校还起到在一定层面上使图像文本的效果变得中和与自然的作用。如果仅有阐发，那么，表面上看，并不需要进行过多的详细解读/分析。但是，所有的自然化都是神秘化，这里也并不例外。

文字和图像文本的 1～4 单元的文本陈述了最初的平衡；5～7 单元的陈述了平衡打破；8～15 单元被给予解决；16～18 单元陈述了新的平衡。不难看出，即使（在叙述以及我们的描述之中）强加固定阶段，也不会模糊所描绘操作“现实”的根本流动。即使第 1 单元中就包含打破平衡的证据：兽医把两只幼崽拟人化，说：“它们真的彼此友爱”，威尔金先生对此的回答是：“它们是好朋友”，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一个具有明显效果的对比

分类体系。他进一步说："它们从不分开"，叙事者/作者给予了这句话以独立句子的句法地位。威尔金先生的分类体系关注的是自然属性——在他看来，两只幼崽的行为完全出乎天性。在第3单元中他说："这两个小东西生下来就爱围着鸡、鸭、羊——它们所看到的东西——打转。"所以，（叙述中和分析中）更大结构的技巧就在于此。稍作分析就能揭示出各个阶段是被建构而成的。

然而，这些单元对这种现实施加了一种相当严格而且看上去势不可挡的顺序性。这种顺序以其"自然"之势引领或者推动读者前行。每个单元都引入了特定文化范畴，同时以特定动力方式让它们在叙事中展开行动。单元1把读者引入这个相关世界，介绍了它的一些类型化术语："乡村"，以已开化形式出现的自然；已受到驯化的动物；动物既是商品，又是宠物，与人类具有特别的、亲密的关系；作为这个世界主宰者的人——不仅他的分类具有效力，而且他还能对分类进行修正；在人和动物中都存在青春（幼崽）与老迈的对立。对于支持和支撑这些更大范畴至关重要的相关范畴，也进行了介绍：爱（人类）与友谊（人类、动物）、"游戏"（适用于幼崽或小孩）的概念。在单元2中，譬如，"游戏"被转换成了"爱好"、"运动"和"竞技"：所有这类的成年人活动，都可以显示出与它们"工作"具有临近性，而工作，正是对作为操作的许多其他范畴的表面合法化。单元3把"游戏"和"工作"作为自然、天然、生物性的范畴联系起来：两只小狗崽从快活地扭斗，不让人注意地就过渡到围着鸭子打转的工作上，而这种活动它们"生下来就想这么干"。"工作"于是被自然化了，而且具有其所有的结果：譬如3单元中的物品销售，同单元5中把斯威普作为劳动/劳动者卖出是相互关联的。单元4介绍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化构建，暗示出整个的分类体系，那就是寻常/正常以及非同寻常/非正常。从外表和行为上看，斯威普是寻常的，吉普则不是。这个叙事作品正是围绕这个问题的解决建构起来的，这是评估和重估所有其他范畴的关键所在。

提供发展动力的范畴和矛盾是：老与少，父母与孩子，人类与动物，在这个世界是如何关联的？幸福、悲伤、友谊和爱这些是有待分配的属性，而任一特定分配体系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在一天之末，什么算是寻常/正常，什么又算是非同寻常/非正常？

有一种范畴在这套基本范畴中是缺场的——所以看上去没有进行讨论——即男/女。威尔金夫人在单元10才出现，这正是打破平衡这个结构阶

段的中心位置。这指向了叙事中一个有趣的结构分野。开头部分的特点是女性范畴的缺场，似乎在这个世界中性别不是一个话题。叙事最后部分的特点是女性范畴的在场，似乎没有这个范畴就不可能有什么解决/恢复平衡。有趣的是，这种在场在图像文本中比在文字文本中能得到更多的彰显。在后半部分，图像文本是以威尔金夫人作为主体的，描绘了她的身影与姿态。似乎图像文本就是用来表述文字文本中没能写出或说出的那些意义的。

因此叙事中的这种打破平衡可以被看做由初期阶段引入的那些范畴中的内在矛盾，以及未曾说出口的对女性进行的压抑所引起的矛盾。最后的恢复平衡解决了一些问题，尽管不是全部问题。那只寻常的狗斯威普，作为成年狗，通过取得冠军而变得不同寻常，而那只不同寻常的狗吉普，之所以变得寻常，不是因为它没有取得冠军，而是因为它在发出的叫声中展示了狗的特色。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叙事作品对这些价值观进行了相对化处理，诸如：发声、正常耳朵、成为冠军，对斯威普而言这些是寻常/普通，对吉普而言这些是非同寻常/出众。不发声、垂耳、棕色条纹，对吉普而言这些是寻常/普通，对斯威普而言这些是非同寻常/出众。尽管如此，还是必须为把吉普带入通常的正常领域而做出某种努力。

高潮节点上的矛盾或困难是更难对付的论题：譬如关于动物/人类，爱/友谊，青春/老迈，男性/女性等等的范畴划分。而且它们没有在文字文本中得到解决。然而，在图像文本中，似乎暗示出了对这些问题的某种解决。我们初次见到威尔金夫人是在单元 10，她坐在丈夫前面。丈夫站在她身后，背靠汽车。吉普突前，稍微靠右。这并非传统的“家庭照”，尽管包含了其中一些成分。如果这幅图是从正面作呈现，可能显示出她在丈夫前面，比丈夫矮。这可能暗示出一种代际差异：（祖）父与（已婚）女儿，而不是丈夫与妻子。吉普，作为宠物，本该在威尔金夫人前面。在这幅图中，既揭示又掩饰了这种矛盾：掩饰是因为这并未作为“家庭照”来建构，是以理由而不是摆出一副家庭姿势作为动机。揭示是因为这种不对称过于明显。威尔金先生看上去已经五十好几或六十出头，威尔金夫人则刚过四十。

单元 11 从后面以 45 度角显示了相同的一幕。这算是更为充分地暴露出了这些问题——威尔金先生和威尔金夫人之间的距离得到了凸显：他们看上去毫不相干，犹如吉普一样。这三者被表现为三个独立的个体，没有

任何联系。单元 14 的情况则并非如此，当时，威尔金先生和威尔金夫人并肩而立，一同吃惊地望着吉普。然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威尔金先生了。下一次我们遇到的是一个男性，他就是那位兽医，现在闯进故事中来了（威尔金先生的唯一标记是拖拉机上的一个空位）。威尔金夫人看上去很年轻，那位兽医也一样。在单元 16 和 17 的图像文本中，威尔金夫人和兽医在密切交谈：她身子靠向他，他的手势和身势表现出对她的亲切鼓励。他显得焦虑；她略微显得自信而有所期待。在单元 18 中，这种紧张得以缓解。他们并肩站着，神态悠闲，面带微笑望着坐在他俩身前的吉普。除了房门，附近的石墙、大门以及远处的山冈，这个世界中的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

根据我们的解读，故事确立了一种“正常”的家庭结构，从“幸福”家庭的消解（对卖掉自己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进行置换，因为他所使用的范畴不允许他解决这种紧张），到最后一个家庭单位的重新奠定（这个家庭的成员坚持着使得这种解决可能的一种分类体系——超越了动物/人类，青春/年迈，同时，重视/承认性别范畴和女性作用的必要）。

当然，问题是这一意义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是作者，或者，也许更重要的，儿童读者的意义？也许有两件事情需要声明。故事明显是一种“改写”，是为儿童所写的。因此故事的形式和内容，都用到了文化分类，它们在语言和图画中的表达，都是心怀儿童进行建构的。作者的观念，关于童年，关于童年的焦虑和关注，关于童年有效而相关的分类，混合着作者和绘图者自身或多或少有所掩盖的种种考虑，共同构成了作者/绘图者的文本最终所表达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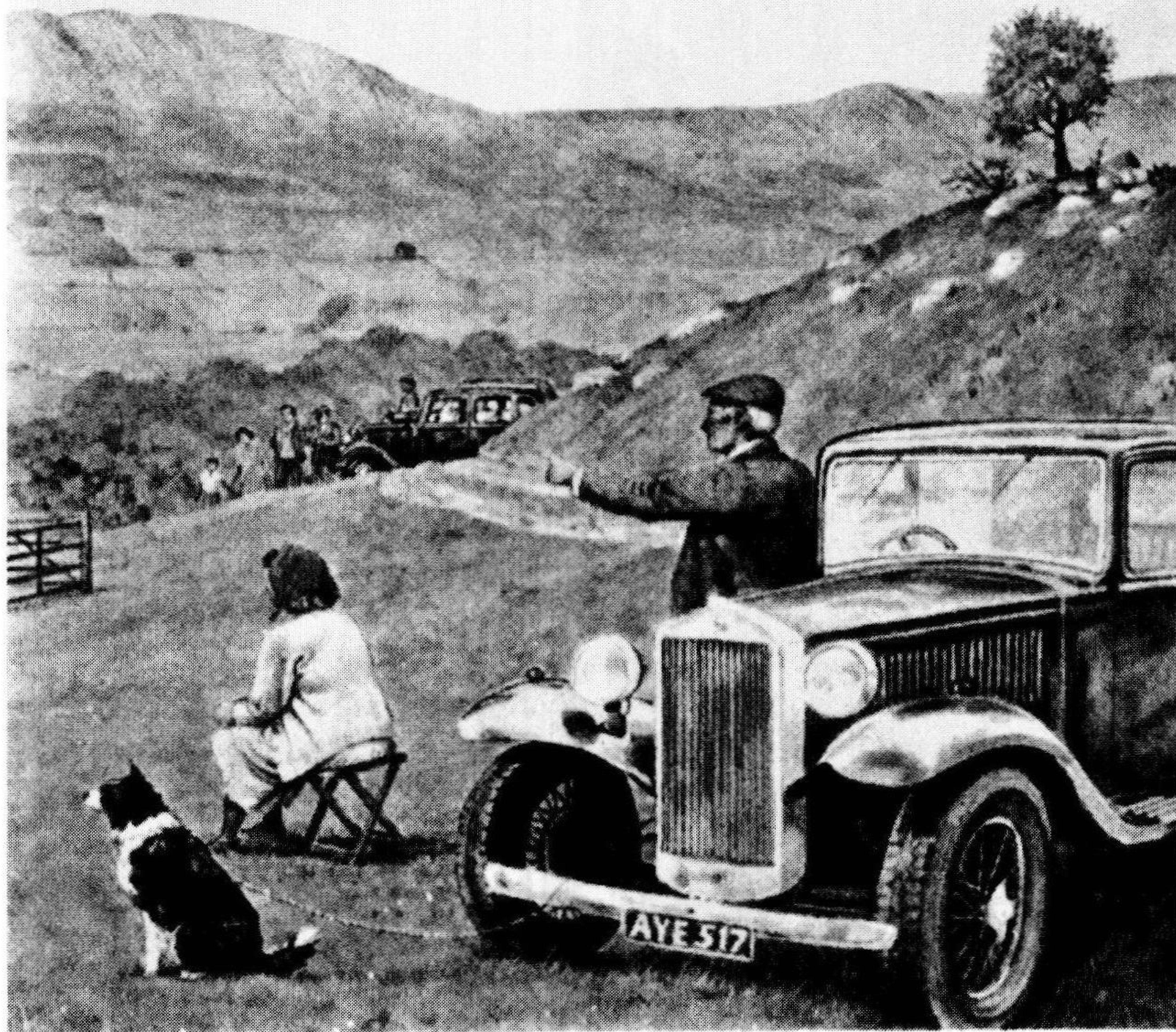

他一年多没有见过自己的兄弟了，
我想，他不大可能记得起他了。
但是，他明显异常感兴趣，当裁
判挥动白色手绢，发出比赛开始
信号，同时，从赛场远端放出三
只绵羊，吉普慢慢地立起身来。
AYE 517

图 7.2 分崩离析的家庭



图 7.3　重新确立的家庭单位

换言之，改写这个概念是极为复杂的。结构要素须分阶段进行介绍，而且它们的顺序赋予它们一种势能和一种特定张力。图像文本和文字文本以特定方式彼此交叠。这些结构有待解读，但是它们却不能决定儿童读者的解读。"难以言喻"的意义承载于图像文本之中这一事实，进一步对此进行了强化。儿童读者会以特定方式对其作出反应，其反应并非不可预测，但是会受到关于他们身为这些范畴的社会成员以及关于他们所做的阅读努力在这些先在经验上的影响。儿童读者在文化或社会方面可说是"白板一块"(*tabula rasa*)，他们不是天真地来到文本面前的。儿童读者（即便是作为别人读他们听那种读者）是身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之中的，而且已经拥有一种社会文化的阅历。

《仅只一声》不仅是儿童读物，供儿童阅读的故事。而且，它也是出版物，是一本待售的书。如此一来，它就是一件被制造、买卖、消费的商品。它存在于市场，与之相伴的还有广告、营销。这一操作建构出促成叙事的属于它自身的一系列文本。譬如在书的封底有这样的一个文本：

《仅只一声》是一个迷人的故事，最初刊载于《马背兽医》，是詹姆斯·希里奥特继其处女作《猫咪摩西》大获成功之后所作。彼得·巴雷特为本书创作了精美插图，本书定会成为各地儿童难以割舍的最爱。

同时推荐：《猫咪摩西》

"你绝对会喜欢这本绝对惬意的书。"

——《泰晤士教育副刊》

"彼得·巴雷特的插图是一流的！"

——《每日电讯报》

出版商夸大其辞的介绍所针对的读者不是（或者绝不可能是）儿童读者，他们针对的其实是成年读者，即成年读者会根据什么利于儿童读者、儿童读者喜欢读什么而为儿童读者买书。在这一点上，购买者会受到专家意见这种建制化意见的引导。因此有了上面这些评论摘要，它们显赫的出处，能给予评论者以权威地位（在这个市场上，不同于其他，对评论家们都没有指名道姓）。

在这一层次，我们可以看到叙事的文化决定是如何运行于体裁的符号活动层面的。一个本已复杂的产业，为那些有待教化的人创造/再创造出文化上可以接受的社会样式；出版业得到评论业的支持，而评论业本身为教育、文学批评和心理学的诸多学术/职业/产业所维系。此外，这种体裁还靠那些关于乐趣和娱乐的观念而得以成形，因为，正如斯威普和吉普在游戏时表现得最快乐，儿童也在游戏时最快乐——这能够不为人所注意地导入关于工作的观念。

詹姆斯·希里奥特的故事受众颇广这一事实，进一步使这个文本复杂化了。它们被建构成了适合成人的电视连续剧（适合孩子）和小说。在他的一些出版物中，譬如若干册咖啡桌图画书，詹姆斯·希里奥特就像一位向导，领着读者走向自然，去往他的故乡约克郡，因而这个文本本身被这些叙事的各种版本、被这位乡村兽医在各个地方的个性表现复杂化了。所

有这些故事都表达了一种总体性的意识形态，关于个人在事物框架中的位置，关于乡村价值观念，这是关于价值观念的一张保守的网，得到了叙事形式和它出现于其中的体裁形式之网的双重支撑。儿童能够快活地从阅读《仅只一声》成长到阅读关于英国的咖啡桌图画书而无须改变意识形态。

第八章　进入符号活动：为文化而培训主体

从孩子诞生的那一刻起，也许比这还早，他们就受到符号活动和文化的影响。新生儿立刻进入与周围人们之间的符号关系之中，而且，在这一至死方休的过程中，他们会建构出一个意义的世界，并被一个已经符号化的世界建构。这一过程始终是相互作用的、动态的；孩子并不仅仅是任由文化在上面刻写的白板一块。他们是自身文化形成中的主动参与者，既不是仅仅任由文化刻写，又非仅仅被形式、价值观念和操作同化。同化这个观念在关于教育的探讨中无所不在，但是，这一事实仅仅指向其意识形态潜力，被描述为同化到一种文化之中的这一操作，无论是用于孩子还是成人之进入社会，都涵盖了反应、拒绝、颠覆、默许和接受等等复杂操作。许多教师将这个过程描述为对知识进行同化——“在对这种东西进行同化时他们似乎毫无困难……”——同样地模糊了作为个体的符号施为者和更大的符号体系诸方面之间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作用的种种操作。“对知识进行同化”不同于将新运来的柴火码放在后院中已有的那堆柴火旁边。

“瞧，那是操作指南”：开始步入性别和权力

在本章中，我们希望探索这一复杂操作的某些方面。在当代西方社会，教育体系是监管这一操作的主要国家机构，但教育操作的范围却超出

了教室。教育体系的进入，是在为社会生产社会成员的这种转换操作的后期。为此，我们的分析将会从这个来自家庭场景、发生在家庭领域中的文本开始。这个文本是一堂“烹饪课”。参与者包括三岁的蒂莫西、他的妈妈、他妈妈的朋友多丽丝。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

多丽丝　你觉得妈妈刚才那样做了吗?

妈妈　不，亲爱的，你不要往勺子上吐口水。

现在我可以继续了吗……

哦，亲爱的，要是我有……

蒂莫西　我可以看看操作指南吗?

妈妈　等一下，宝贝（听不到声音)。

蒂莫西　……黄油，宝贝……这步我们做好了……现在我们做什么?

……我们在做了。

妈妈　这点儿我们做过了……瞧，那是操作指南……上面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蒂莫西　打鸡蛋?

妈妈　对（赞许的)。

多丽丝　我们打了鸡蛋，然后呢?

蒂莫西　搅拌它。

多丽丝　彻底搅匀……对……这步我们做好了……好的……就是这样。

蒂莫西　第三步。

多丽丝　你觉得该做什么呢……

第四步

蒂莫西　（听不到声音)

多丽丝　妈妈刚才是那样做的，对吗?

这似乎是一场毫不起眼的交际活动，发生在轻松的家庭氛围中。明显发生的是某种公开的学习行为：蒂莫西学会了一点儿烹饪知识，在阅读和计数方面得到了知识强化。但是，我们将看到，这并不是他所学到的或得到强化的全部内容。我们将从场景开始。这是一间厨房，位于家中。因此这是一个特殊领域，具有所赋予的性别特征，属于女性空间，与学校和工

作那种公共空间相反。不过，在这个空间中，妈妈和多丽丝是在工作（烹饪）。妈妈同时还在指导孩子，扮演着教师的角色。同时，她心情放松，从事着与自己的朋友多丽丝的社交活动。多丽丝扮演着一系列角色，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她对蒂莫西进行指导，尽管她是身在妈妈家的厨房里，同时宣示出她身为朋友这种稳定性。在这一场景中，蒂莫西所面对的，是对基本思想控制体系的一系列流动性转换——转换如此流畅，以至于他似乎把握不住体系本身。

这一任务的性别属性同样如此。表面上，蒂莫西似乎（应他自己的要求）在接受如何做饭的指导，这在传统上是女性的任务，但今天，许多“进步的”夫妇都努力以非性别歧视的方式对其进行重新定义。蒂莫西似乎正在社会化地进入这种经过转换的性别体系，而不是传统那种。不过，问题关键不在于蒂莫西实际上在进行着烹饪。他所做的（在食物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是重复他妈妈所遵守的操作指南。对他而言，他妈妈的指导包含着双重信息，这双重信息对双重性别角色做出了明确规定：“学会做饭”（转换你的男性角色）；或者“学会给予女性/厨师指导”（即学会扮演你的男性角色）。

这场交际活动中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一种相似的复杂和模糊特点。学习烹饪这一操作，使这一场景有机会运用表达与协调知识与权力密切联系的种种语言形式。三种主要语言互动模式在这里都有运用：疑问句：“妈妈刚才那样做了吗”；陈述句：“你不要往勺子上吐口水”；祈使句：“瞧（那是操作指南）”。蒂莫西只用了其中两种：五个疑问句，其余都是陈述句。多丽丝也用到疑问句和陈述句。但是，尽管蒂莫西（在六个或七个分句中）用了五个疑问句，多丽丝使用疑问句的频率却与之等同（总共十二个分句——其中，“是的”算作一个表示重述的分句）。蒂莫西妈妈使用的陈述句（五个）比疑问句（两个）多，而且用到了那个祈使句。

因此，就这些形式所暗示出的社会/语言作用而言，其分布存在着一个重要偏离。不过，当我们对句法形式与语用运用的配合进行考察，这一点更是明显。以多丽丝的第一个疑问句“你觉得妈妈刚才那样做了吗”为例。从语用角度来看，这显然不是一个问题。多丽丝是在告诉蒂莫西，他的妈妈刚才已经做过，因此他正在做的什么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他应该停下所做之事。换句话说，这个疑问句的作用不是提问，而是命令。以妈妈的第一个陈述句为例。“不，宝贝，你不要往勺子上吐口水”。其说出的语

境是蒂莫西刚刚往勺子上吐了口水，这句话或者是反事实的，或者实际上是另一个命令，“不许（再）往勺子上吐口水”。她的下句疑问句“现在我可以继续了吗”也不起问题作用（它并不指望得到“是的，如果你想这么做的话”之类回答），而是作为“现在我要继续”的陈述，因此甚至可能成为命令：“让开，让我来……”

这些切换也影响到了模态。譬如疑问形式所表示的模态要低于陈述形式。但是妈妈和多丽丝所问的问题是事后才提出的。当多丽丝问“你觉得妈妈刚才做了那件事吗”，蒂莫西的眼睛告诉自己，妈妈已经做过了。因此，不确定性必定涉及符号活动层面，而不是模仿层面，表示出缺乏权力而不是缺乏知识。但是，这是大量使用在课堂之中的问答式问题，其中教师知道答案，但会用提问形式来考察学童的能力。所以，缺乏权力是以蒂莫西的问题而不是以多丽丝的问题来表示的，尽管多丽丝的权力由于稳定性的缘故是带着貌似缺乏的面具出现的。蒂莫西被给予获得权力的机会，肯定该体系本身合理性这种权力。

所以，蒂莫西正在学习的，是意义和权力在符号活动层面上的相互作用。除了关于句法形式与语用运用之间的偏离的特定知识（以疑问表陈述，或者命令，以陈述——涉及孩子行为方面——表命令），这些是蒂莫西所属社会群体具有的那些符号活动规则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正在学习关于这些作用的一个意义：“不要直接强调你所拥有的权力。”对蒂莫西行为的直接否定或禁止不曾有过。我们已经提到“不要那样做”是如何被表述为“你觉得妈妈刚才那样做了吗”。这甚至发展到对蒂莫西所说的一切都拒绝或不愿意进行否定。当他问“我可以看看操作指南吗”，妈妈的回答是“等一下，宝贝”。当蒂莫西说“搅拌它”时，多丽丝并未对他说“不，不是搅拌，是搅匀”，而是回答“彻底搅匀……对”。蒂莫西因此学到了迂回手段，了解到那些拥有权力者在特定条件下如何对权力进行掩饰或遮蔽。

这里所使用的策略是一种“涉入”（或者也许是“纳入”）策略。在这些规则中起作用的迂回手法似乎没能真正产生作用。如果权力最后真的被解读成功消解，那我们又何必千方百计地去掩饰它？一个答案似乎是，对形式的这种运用要求听者/读者在重建意义时付出更大努力。想想对种种形式进行解读过程中所涉及的各个步骤吧。“你觉得妈妈刚才那样做了吗？”“妈妈刚才那样做了，你没看到吗？”“别做了，我刚才已经做过了！”

最后一句最直接地表示了“被表示”的内容，对听者在重构中要求也最低。听者停止动作，因为命令他们如此。（注意，在很多社交语言中，“叫我做”意思就是“命令我做”）。对于第二种形式，听者被置于“信息接受者”的位置。然而他们被要求进行某些推断：“如果某动作已经完成，那肯定没必要由我来再做一次。证据就明摆在我眼前。”第一句话对重构的要求最高。这时，听者是作为“信息提供者”来听别人言说的。（在本例中）要求他为自己提供信息，因为没有别的可能的听话人（蒂莫西年龄再小点，可能会用“是的”来回答这个问题）。通过为自己提供答案，然后由此进行下一步推断，蒂莫西得到了极为不同的定位。导致他行为事实过程的操作是在他本人的脑海中进行的，他给自己的答案是他本人思考/行为的结果。认同外部权力，在这里，是通过个体自身对其本人行为和意愿基础具有认同而得以重构的。

这一小段引文中代词的使用对这种机制起着支撑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你不要往勺子上吐口水”中的“你”。既然蒂莫西已经把口水吐到了勺子上，他似乎就不是这个“你”的合适指称对象。现实与他妈妈对该现实的重构之间的冲突，迫使他尝试做出有意义的那种解释。这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步骤，其中，他会得出结论，他的行为偏离了他妈妈对他的看法。因此，那个“你”不是具体的，而是一个与妈妈所作陈述一致的、理想的“你”。那个理想的“你”也是一个高度泛指的“你”，现在包括了“所有好小孩”，以后当然会包括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中所有成员——“你不要/不能再穿那种东西了……”他妈妈和多丽丝口中的“我们”所起作用与之相似，尽管方向相反，是从总体到个体：“上面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我们打了鸡蛋”。这里，复数代词似乎指整个群体，实际上却用来指一个个体。蒂莫西从中也许会得出，这里的意思是，在他所属的社会群体中，每个人所处位置都相似，有着相似的知识、价值观念和历史，因此完全有可能通过称呼集体来指称个体，这并不存在什么重大区别。

最令人惊讶的是，围绕这一意识形态性小事件的所有这一切，对于年幼的蒂莫西是何其复杂和暧昧。在某些方面，他学会了一个规范体系，这个体系具体规定了行为准则中适当和得到允许的形式和限制。蒂莫西是个“乖”孩子，令人满意地配合了烹饪课教学，明显学得很好。但在他所学到内容的核心位置，必定是来自权力和控制话语中的矛盾和神秘这种双重信息带来的特别压力，以及一个消除其意义歧义并凸显具有真正约束力量

那些规则的潜在体系。妈妈和多丽丝帮助他转换操作指南的言辞，在意识形态上却没有丝毫让步，不过，蒂莫西对付意识形态上的复杂性却比对付烹饪更加有效。他已经做好准备去面对学校那无处不在的复杂性，甚至强过让他面对厨房那些要求。而且他只有三岁大。

牙齿还是粉刺：归化还是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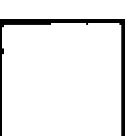
蒂莫西熟练而积极地穿越了话语符号活动的雷区。但同样明显的是，他的表现中用到了有所区别的、非成人的规则。仿佛童年本身构成了一个宽广的领域，其中错误能够得到容忍，各种形式的抵抗能够得到展露。尽管领域被建制化，成了控制策略，它们也是对从属者的权力或利益做出真正让步的地方。在本节中，我们将对一个产生于这种附属领域的文本进行考察，这就是澳大利亚的儿童保育中心。

即使在澳大利亚一国之内，儿童保育中心也没有固定模式，在诸如英国和美国等与之文化关联密切的其他国家，形式更是有所差异。对于位于家庭和学校这两大领域交界处的这种附属领域而言，这种不一致是可以预见的，其所面对的对象分类在该文化中是未定的（可教育的或不可教育的）。保育员（通常为女性）因此面临着一项暧昧性的任务。一方面，“好”的儿童保育中心紧紧联系的是相当正式的教育操作。但是，放松其规定这种反向需求则促生“滥”的儿童保育中心，在那里，孩子们受到放任，变得“无法无天”或者“百无聊赖”。文化要求行为受到控制或得到指导，然而孩子们的爱动爱玩是他们作为社会生活中积极施为者的内在特性，不能简单地进行打压。孩子们需要（在并非总是限定得死死的范围之内）得到机会，探索规则体系的边缘地带，或者甚至故意对其进行顶撞，这最终可能达成同样的结果。于是，保育员必须具有文化方案，对不限于但常常是界线之内的活动进行匡正和约束。我们用来探讨这一问题的范本来自一个学龄前儿童日托中心。萨拉和亚伦大约三岁半。

老师　看这个（用手指向一幅犀牛妈妈和犀牛宝宝的图片）。

萨拉　它妈妈有很多牙齿。

老师　多少颗牙齿？它们有多少？



萨拉　1、2、3、4。
老师　上牙加起来是多少？
萨拉　1、2、3、4、5。
老师　上牙5颗，下牙4颗。
亚伦　不，那些不是牙，是粉刺。
老师　你觉得它们是粉刺吗？
亚伦　对。
老师　但它们在应该长牙的地方……你觉得它们只是颜色不同？
亚伦　唔……那个……那些是粉刺，因为它们是粉色的。
老师　嗯……也有可能……那你把这里的东西叫什么呢？
萨拉　胡须。
老师　你也这样，那是什么，萨拉？
萨拉　一只耳朵。
老师　这只耳朵看起来很有趣，是吗？
亚伦　是的……一只小耳朵。
萨拉　那有一只……1、2……两只耳朵。
老师　你们觉得它们友好吗？这些犀牛？
亚伦　……
萨拉　不。
老师　为什么不？
亚伦　因为它们会吃人。
老师　你怎么知道？什么让它们看起来不友好？
亚伦　它们的牙……它们会吃人。
老师　它们那么大……这只呢？
萨拉　它没有牙。
老师　没有吗？
萨拉　没有。
老师　你觉得它很友好吗？
萨拉　是的。
老师　……
亚伦　看看它有什么。
萨拉　它有几只小爪子。

老师　　爪子。

萨拉　　看到了……但是……但是它还是对我们很友好……

老师　　即使有爪子，它还是很友好?

萨拉　　看……它们并不很可怕。

亚伦　　不，它们很可怕。

老师　　亚伦，你觉得狮子友好吗?

亚伦　　是的……因为……如果它们……如果人们伤害它们，它们才反过来伤害人。

老师　　如果你不伤害它们，就会很安全，对吗?

亚伦　　是的。

老师　　我不知道。

这位保育员/教师以建立关于她本人与孩子之间的“不同”方案作为开始。她挂出一张表现非洲动物的挂图。权力与知识完全融合在这个行动之中了：挂挂图的权力和能力，决定对哪个文化领域进行探索的权力和能力，两相结合。教师对两者都拥有控制权。就思想控制体系而言，这种（或许只是暂时的）模仿层和符号活动层的同一性是至关重要的。教师控制着由谁来挂挂图、挂在哪里，而且控制着哪些算是与之相关的知识。表面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学习模仿层面的知识：关于犀牛和狮子以及它们的习性。但很快，问题变得明朗了，关键不在于教师的知识，而在于教师的权力。教师给学生的指令“看这个”被萨拉重构为“告诉我与这个有关的东西”。她乖巧地作出评论，“它妈妈有很多牙”。这给教师提供了她所需要的、可以进一步展开的内容。萨拉的合作方式，试图表现出和教师之间的稳定性，却被亚伦“不，它们是粉刺”这一挑战所粉碎。亚伦通过反对萨拉和教师所进行的分类，拒斥与教师之间的稳定性。也就是说，他运用模仿层面，来表达对教师在符号活动层面所拥有权力的挑战。但亚伦的挑战更为深入。他不仅挑战分类，还挑战教师对整个场景的控制。通过重申/修正萨拉的最后发言，这位女教师表示这个特别对话序列已告完结。那个重申所起到的作用，是标识结论和文本事件的终止，以及她开启新对话这种意图。所以，亚伦的挑战时机很到位。如果他选择在萨拉第一次回答后就插话，教师便不会受到任何挑战；如果他在教师问“它们有几颗牙”之后插话，他的挑战就会仅仅针对模仿层面，因为教师尚未试图终止这一

话题。

针对这一举动，教师的策略是：假装这是个“真诚的”说法，并不超过她本人所操作的思想控制体系。她将挑战重新标记为仅仅是针对模仿层面的，并且表示她相信亚伦是真诚的。“你觉得它们是粉刺吗”这个提问。于是，这变成重新聚焦到分类的差异上，其中亚伦的“觉得”与教师的“知道”两相对立。教师假装“误听”了亚伦的挑战，并通过这一简单的策略，维护了自己的权力。当然，她可能用不同方式来进行：“亚伦，你是个调皮的孩子，总是打断别人。”但如果那样做，只会是承认亚伦的成功，阻止她无法在这次平定造反中获胜。

教师的结束语“嗯……也有可能……那你把这里的东西叫什么呢”没有受到挑战。她对亚伦的反分类也并未做出任何让步。到此为止，孩子们应该已经学会了分辨哪些评价是表示肯定和支持（“好的，对”或者“是的，好姑娘”），哪些表示不支持。在此语境中，缺乏支持性评价意味着教师缺乏同意，即教师是反对的。在整个这个短小的文本中，这位女教师所采用的策略，与烹饪课文本中蒂莫西的妈妈和她的朋友多丽丝所采用的策略，是非常相似的：她避免直接表达不同意见，更乐于让孩子做出推断——让他们为自己建构——她的不同意/不赞成。与此有关的其他例子包括：“你怎么知道”，“它们那么大”（即这可能是一条相关标准，但不适用于此），“看看他有什么”（相当于，“注意相关特征”），“我不知道”（即如果它在教师的知识范围之外，它不可能是正确的）。

在这一文本中，亚伦和萨拉对环境的反应存在着系统性差别。三个表示差别的例子上——是牙齿还是粉刺；是吃人还是友善；是危险还是友好的动物——亚伦都反对了教师的分类。萨拉有两次是以与教师不同开始的。第一次，她只是把问题留给亚伦，由他来表示反对；她觉察到教师的不同意（“为什么不呢”）便不再开口。第二次，她再次以站在教师的对立面开始。然而，在来自教师的三次挑战之后——“看看它有什么”，“爪子”，“即使它有爪子，它也很友好吗”——她屈从了这一压力。反观亚伦，在这两次提示后，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而且每次都以自己的标准支持自己的挑战。仅有一次，亚伦与这位（女）教师的观点一致，但即使在这一点上，他的看法也从教师的“这只耳朵看起来很有趣”变化为自己的“是的……一只小耳朵”。亚伦的表面方式是拒绝稳定性可能，对此，考虑到这是与有权者之间的稳定性，那么在本质上，这种稳定性意味

着驯服和顺从的可能。萨拉表面上是在争取稳定性可能，顺从的可能。当然，从如此简短的文本例子中做这样的猜测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萨拉的犹豫，尤其是她的“看到了……但是……但是它还是很友好”一句，表明她除了还有些许的不赞成，而且有着某种反对的可能。

尽管如此，这一清晰差别可能表明，即使在这个相对较小的年纪，也存在着和性别相互一致的行为区别。最终，萨拉和亚伦会完全进入属于他们文化的符号体系。然而，这的确表现出，他们到达同一终点的路径似乎截然不同：萨拉是通过寻求稳定性，亚伦则是通过不断的反对。这种途径的不同可能的确会使他们最终处于不同位置。尽管两人都是符号体系的合格使用者，但是可能，对于萨拉，抵抗的可能会慢慢消退，对于亚伦，抵抗的可能会得到保留。亚伦的反对/颠覆会为他争取到教师（有权者）关注这一额外优势。只要他选择在游戏规则内活动，可能这会一直为他带来回报；反之，对于萨拉，顺从也许只会让人期待她做出更多顺从，让她更轻而易举地表现出顺从。

我们对此的观点，最简洁地表达出来，就是进入符号活动似乎具有专属性别的诸多方面。可能通往模仿层面和符号活动层面的路径会按照男孩女孩进行不同建构。当然，教师对男女学生的区别对待常常会受到议论，并得到凸显。相似的，为不同性别的孩子所制定的不同教学方案也得到了清晰记录。我们的观点是，这是一个很早就得以确立的操作，总是在模仿和符号活动、知识和权力两轴上同时展开。此外，男女进入语言和符号活动的不同方式有着真实的历史，关于特定社会建制中特定经验的历史——譬如学龄前儿童日托中心，或者学校——而且，这种历史对于来自不同社会出身的不同个体有着重大差别。无论如何，这不是定位在反社会、反历史的心理分析记录中的虚构历史。进入符号活动具有那种建制方面的特殊性，涉及阶级、性别和种族。孩子对意义的建构、对文本的重构、对符号体系的建构，总是在这种语境中发生的，并非发生在关于童年的去语境化或非语境的臆想中。

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

在我们考察过的两个文本中，方向都是朝着接受体制的，尽管这些必

然通过符号生产实现。两个文本都触及到学校的话语，它们都是为之做出的准备。但是，学校作为一个主体的符号操作场所，因其对生产体制的关注，因其对“正确”文化生产和再生产形式的精密控制，而得以凸显。生产和再生产以及支撑该操作的体制之间的诸种关系，随着学校教育的不同阶段，随着孩子和教学课程的不同划分而变化。

我们将从学校研究报告（school project）这一在小学教学课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体裁开始我们的分析。作为一个体裁，研究报告要求孩子关注由教师这一拥有权力的他者所建构的各套相关材料（尽管教师充当的是更大“学科”分类的中介者）。研究报告按照相关顺序对相关材料进行文本整合。常常，教师分发需要作答的话题和问题表。所以，对于担任文本制作者的孩子而言，研究报告就是一次深入符号方面不确定的或未知的领域中的一次探险。它以突出的形式呈现出平日文本制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尤其是围绕符号控制方面的问题。

图 8.1 复制的是一份（共 18 页）研究报告的第 2 与第 3 页，这是由一位 8 岁澳大利亚女学生所做的关于超市的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对孩子们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标明超市“有”什么，它们如何起作用；显示它们与“生产链”之间的关联等等。这里，这个孩子用图示显示出关于超市所售商品种类的某种东西。同时，通过她犯下的一个有趣错误，她表现出对符号活动操作本身越来越强的意识。她称这些标签为标签图画（pictures of labels），尽管实际上它们本身就是标签。可能对她来说，它们通过在研究报告中的展示操作从“标签”变成了“标签图画”。从“物”到“对物的再现”这种变化，对她而言，似乎涉及对标签的剪贴，即以一种类乎引用的方式，作为报告中的例子，将物从其通常语境中拿出来，并且进行去语境化（decontexualized）使用。“引用”这个隐喻，也许有助于大体说明这个孩子与符号活动体系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这个孩子所处的位置，总是从符号体系中选取现有符号并在自己的符号应用中“引用”它们；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当她将其用于“她的”文本之中，她也就处在对符号进行“再生产”位置。这个孩子在这两页上建构的文本是“她的”文本。事实上，这是这种模式的一个恰当象征，在这种模式中，孩子们被置于相关现有符号体系的文本生产者位置：可资利用的是来自他们不完全理解的符号体系的那一揽子的符号（他们是其再生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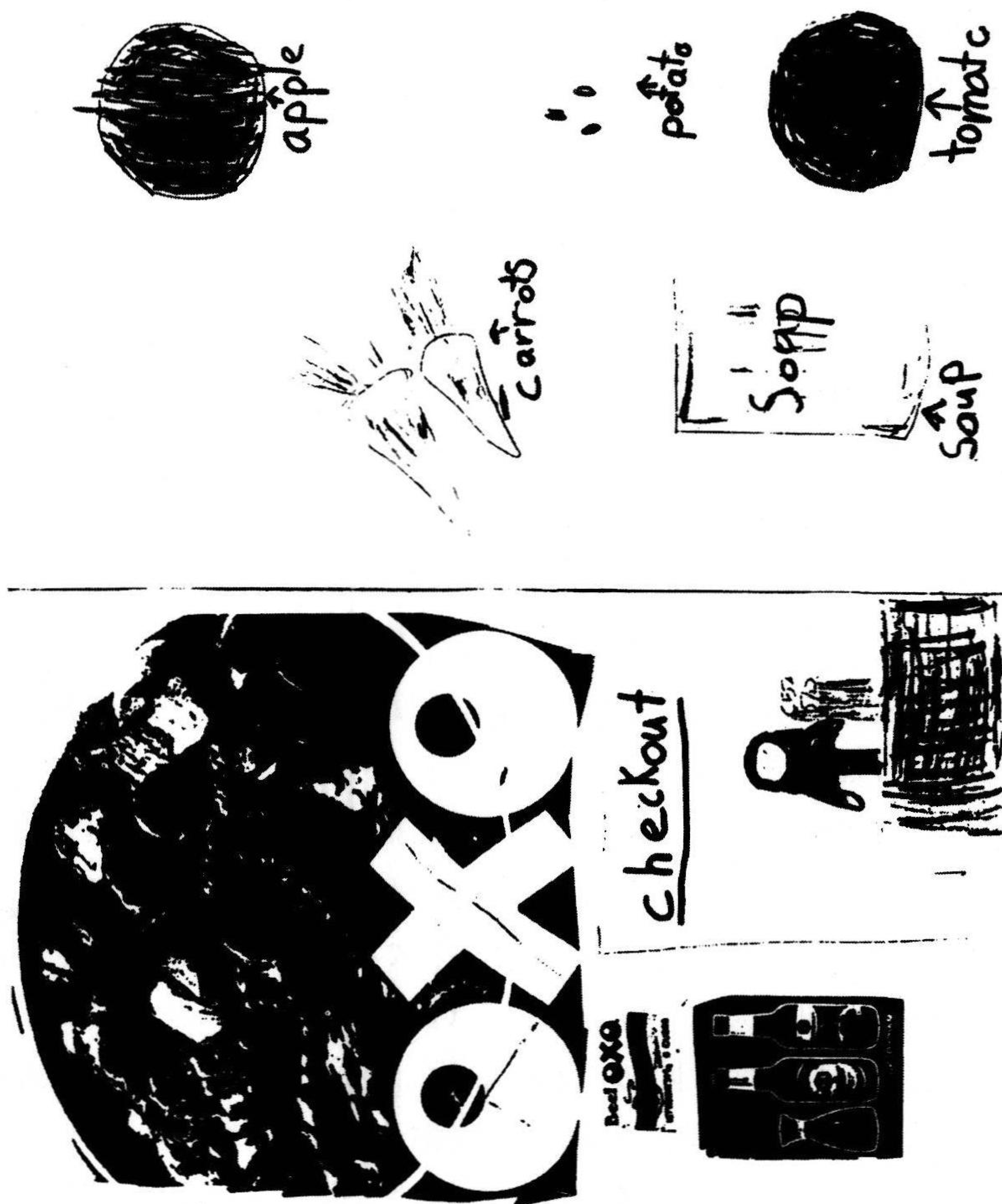


图 8.1　一份报告文本：“超市里边有什么”

这个问题对这个孩子而言尤其复杂，因为这些符号离她自己的符号经验距离太远。这些标签/符号的生产模式在每个方面都离她很遥远。它是一个那些有权者所了解的操作。所以同时，对这些现成符号的使用承诺将权力赋予她的文本。将具有如此复杂性的符号引入她的文本承诺，对她的文本既有所控制又给予权力。这当然很像期望通过表明他们身为特定群体成员而获取权力的那些人在言谈或写作中使用某些有力的指示词一样。在许多方面，这一文本同所有文本一样：它互文性地利用了相关且适合该领域的现有文本，从这些片断组合中按照特定体裁的要求建构出一个新的文本。这为小作者的解释性文本提供了赋予该文本连贯性的那条原则。

教师/读者对这一文本的评价是简单地画个钩。在许多方面都可称道的第 2 页得到了两个钩的评价。在这之后的那一页，这个孩子亲笔画下了

超市中所销售的商品。画画用的是彩色铅笔：复制在本书中的黑白图。似乎使教师对其作出更高评价的原因在于，这些是孩子“自己”的符号：它们是她创造的，不只是复制。对这位教师来说，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她的判断都是典型的，她的这种评价表明她更加重视创造而不是复制。在教学课程的后期，“创造”与诸如控制、“掌握”、自发性、原创性、真实性等概念是相等的。所有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得到高度尊崇的价值观念。

但是，这些术语之中的评价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总体上而言，撰写研究报告文本主要还是为了让孩子对一系列通过各种各样的符码进行运作的规约进行再生产。研究报告格式所具有的明显开放性，由于在学校课程中被建构为一个体裁，小学生们是不了解的，甚至不知道其存在的体裁被体制所控制。研究报告这个体裁，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严格受到教师的一套指令和“（社会）科学”的大量规则限制。因此在这一层次上，复制各种属类概要这种能力是值得表扬的。

教师对这份 18 页的研究报告的最终评语是：“真遗憾，伊丽莎白，你没有完成你的研究报告。你只完成了作业单上的一半内容。为什么?”很明显，一个更大思想控制规则体系的、一个被表述得极为清晰的方面在此运作，而且教师（/规则）对学生的期望与该体系是一致的。在另一个层次上，这个孩子画的蔬菜和那听汤罐头的图片是高度规范化/样式化的，因此似乎不具备关键的“原创性”。或者以这之后的那页为例（图 8.3），这是一份关于汽车的研究报告（由一名比之晚一年的小学男生所做）。当然，这里所展示的不是“创新性”或“原创性”，而是对一个特定物体的既有结构所进行的仔细观察。可能文化或符号活动中的成长指的就是对这种东西的要求远远胜过对原创性东西的要求。实际上，汽车研究报告可能被认为完全具有在官方所推行的各种进入符号活动操作中所关注的那种东西的特点。也就是说，真正被需要和受到表扬的，是从既有材料中准确抓取特定的复杂符号，正如以胜任的方式对这些符号进行再生产这种能力所表现的那样。在伊丽莎白的研究报告这个例子中，教师的高评价是与孩子创造出一个经过扩展的书面文本那几页相互关联的（图 8.2）。评语分别是两个钩和“好女孩”，以及两个钩和“真棒”。这两页的特点是我们会充分认识到句子是标准单位。受到表扬的不是她的思考复杂或具有原创性，甚至也不是熟练的语言形式。她所知道并因之而受到表扬的，是她非常深入

而且明显自发地产生了用完整句子进行写作的需要。再一次的，教师的好评似乎是在孩子的再创造上而不是创造/原创操作上的。

因此，从为“仅仅属于再创造”打上一个钩，到为孩子的图文并用的创造打两个钩，再到为经过扩展的文本打两个钩并附加点评，教师的评价变化颇大。这一幅度可能会显示出评价的真正原则：语言符码高于视觉符码。此外，在一个更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层面上，这似乎是一种以内化高于仅仅是引用或拼贴这种再生产为基础的再生产评价。但是，无论内化可能意味着什么，它实际上都代表着更加严格的控制观念，在这种观念中，孩子/主体已经成为再生产手段的一个组成部分。

于是，这正是悖论所在。教师评价最低的那几页，显示出这位身为文本制造者的小孩最积极、最自由和最具有创造力；教师评价最高的那几页，显示出这位身为文本制造者的小孩最受拘束，囿于复制而无法自拔。我们的观点，并不是说这些限制应该因为孩子无拘束的创造性这种浪漫主义信念的名义而被抛在一旁。应该说，教育的符号策略主要是通过创新和限制这双重信息来起作用的，在这之中，限制的程度和表述常常被神秘化了。于是，我们能够开始理解，为什么蒂莫西在做饭和对谈中学到的东西能成为他后来学业成功的有用准备，为什么亚伦如果继续认为他真的有权拥有自己的想法就会碰上一些问题。

符码与主体：就写作而论

教育中的符号状况与其他前教育语境中那些相比，在一个方面有决定性的不同：书面符码占据主体。从口头到文字文化体系的过渡是教育操作的重大成就。读写能力的提倡者是将其作为一种必须掌握的、不可或缺的工具来谈论的，但是，进入文学符号活动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一系列技能而已。书写符码允许与口头符码极其不同的生产和接受体制的发展。它们所控制的这些体制和实践投射出符号施为者的新类型、语言和意义的新类型、主观性的新形式。于是，书写实践是当今社会中所有个体意识形态形成的关键阶段。当然，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效果都是一致的，对每个人都一成不变的。读写能力有程度和类型上的不同，这具有利于标记主导群体成员身份的进一步功能。

我们所考察的那份关于超市的研究报告，来自于这个孩子进入书面语符号符码的相当早的一个阶段。到大约八岁的时候，尽管还没有成为口头语言符号符码的完全合格使用者，孩子们的表现已经很娴熟了。从一种符码到另一种符码的过渡，正是由于学校体系所建构的那种操作，涉及孩子对自身缓慢的重新界定。这种重新界定关系到以一系列复杂的方式、相对于他者进行更为刻意的、有意地建构对自身的定位。谈到自我的作用，将自我定位为说话人或听话人，并不是这一阶段的关键。口头文本是互动地建构起来的，对孩子们来说，另一方的参与者往往是成年人，成年人在文本的形成中起着发起和指导的作用。因此，由于权力较小，孩子们被“免除”了发起和维系文本形成的责任。在与同龄孩子的交往中，自我意识也不是关键。

在写作中，对作者的定位立刻成了问题。他们要负责对文本的建构；他们必须为特定受众建构文本，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也为作者建构出一个特定的位置。这些是学习写作过程中的主要问题，与对语言的两种符码——口头方式和书面方式——的不同组织轩轾分明。那些组织形式本身同我们刚才谈到的问题彼此关联，同作者与写作主题的问题也有关系。我们以图 8.2 上方的复制内容为例，这是这份研究报告中包含的两个拓展性写作之一。

读者被直呼为“你”，正如“他”或“她”在口语中可能被如此称呼一样。这个“你”有一种普泛化了的、通用的“你”的言外之意，与蒂莫西的妈妈“你不要往勺子上吐口水”这句话中的“你”一样。也就是说，尽管这个孩子在想象着一位读者，这位读者却可能是任何人。这一点，通过“停车场”、“收银台”、“女士”、“钱”这些表达中的定冠词使用，得到了强化。注意用不定冠词取代定冠词之后所产生的区别：“你去一家超市……”

这个孩子的任务是描述“这家超市如何运作”。如果她是对她的父母或者兄弟进行描述，那么听话人直接就在眼前，这些描述不会引起任何注意。但是，在这里，在书面文本中，它们却会引起注意，这个孩子不仅换用了语法形式，而且转换了从口头到书面形式的其他语言使用者的关联方式。在这一阶段，她的自我观念仍然在口头语言中从可能的分类和概念中建构起来的。所以她描述的不是“超市如何运作”，而是描述了你这个特定的人会在超市里做什么。她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来处理抽象和概括的要求。

WHERE THE SUPERMARKET GETS IT'S THINGS FROM.

超市从仓库中获得其物品。一辆大货车把物品从仓库运出。一些身强力壮的人把物品堆上车。然后车开到超市。仓库从工厂获得其物品。工厂获得原材料为超市制造物品。超市获取物品时，它买的价钱比我们在超市里买的价钱便宜。它就是这样赚钱的。

（教师评价）真棒√√

图 8.2　为超市研究报告所做的拓展性写作

HOW THE SUPERMARKET WORKS



当你去超市，你把车停在停车场。你拿出购物单，从边上取到一辆购物车，进入超市。你围绕货架而行，取到你要的东西。然后你去收银台，那里的女士会告诉你东西的价格，然后你把钱付给她。

教师评价）好女孩√√

注意，在这么做的过程中，她也一直是置身其间的参与者："我来告诉你。我可以为此担保。"在另一个长文本"超市物品从哪里来"中，她的定位是不同的。在那个文本中，她是一位超然的旁观者。她为之所采取的策略是赋予无生命实体以活动："一辆大货车把物品……车开到超市。仓库从工厂获得其物品。工厂……制造物品。"因此，通过相当执著地运用"略去"人的活动，这幅图画的确展现出一些一般性的特征。随着人的活动消失产生出专门性的欠缺，描述于是变得普泛化。在这一操作中，这位儿童作者采取的是一种超然观察者/记录者的视角。

采用这种视角的可能性，对于作为主体的作者具有重要影响，她不必置身其中，能够并事实上变得"客观"并拉开距离。话题的要求，从事的探讨，变得更为重要。这种客观性是科学和科学模式所要求的东西。尽管作者表现距离和客观性的形式并非那种圆满的科技写作（尽管为无生命/非活动的物体赋予活动/生命被证明是科学写作的典型表现），但是那些策略是非常明显地被运用到了的。或许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孩子已经懂得了这些策略和意义，而且她试图用她本人对这种符号符码的知识所允许的术语对其进行再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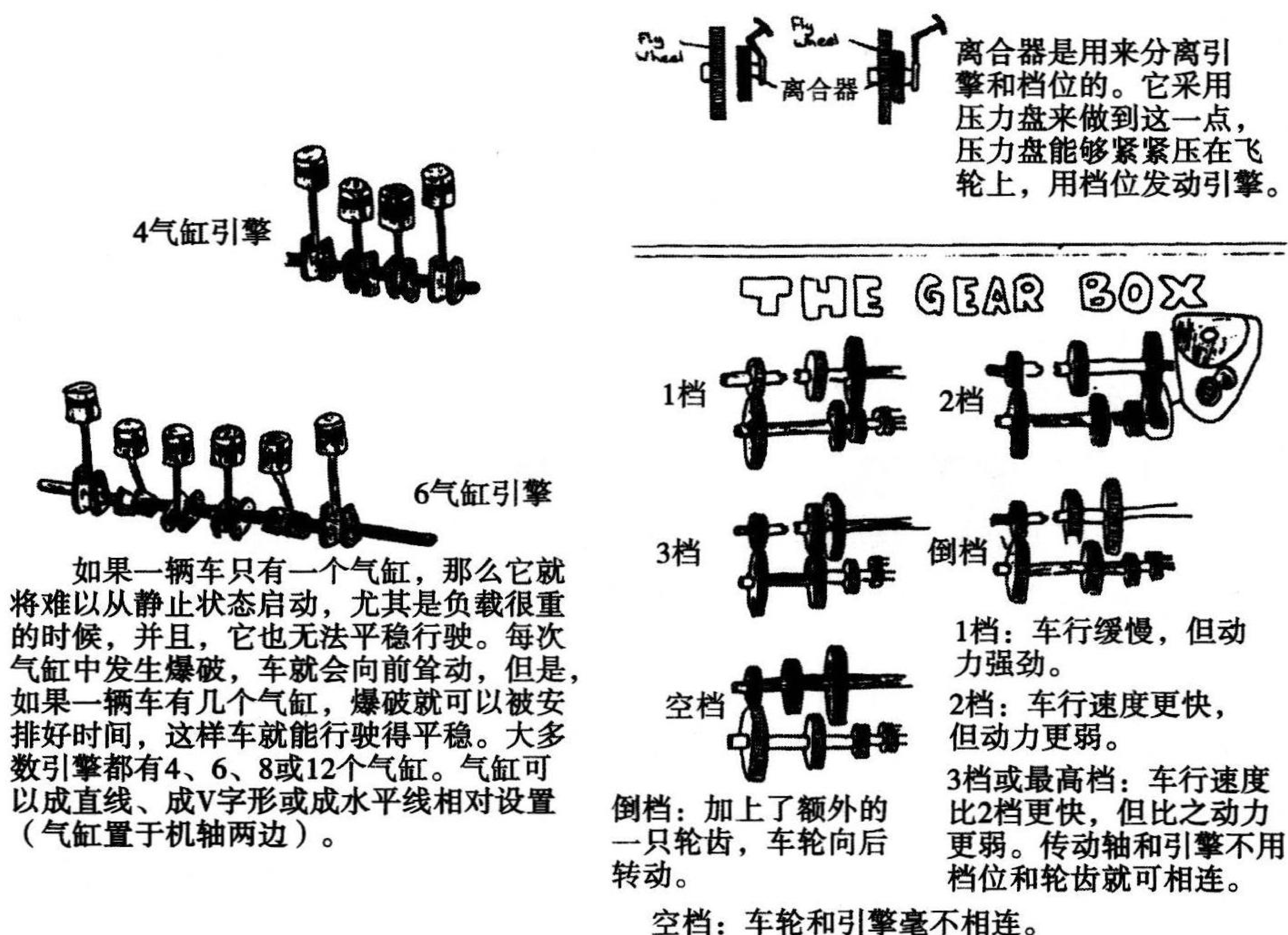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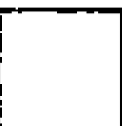
图 8.3　汽车研究报告：在客观性方面的一次练习

图 8.3 是一个 11 岁的男孩所写的汽车研究报告，这显示出这种写作符码的更大发展。尽管这份报告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它却非常清楚地指向教学课程的技术/自然科学领域。在图 8.3 中，这个孩子试图通过大量全然科技写作中的典型的语言/文本技巧来取得距离和客观的效果。“如果……那么将……”这种虚拟模态标志着从“事实”出发进行假设。大量的无施为者的被动式（“当负载很重的时候”，“可以被安排好时间”和“成水平线相对设置”），以及无施为者的动词形式（如“难以启动”），用于将人类活动从文本表面移除，集中关注操作而不是原因，从而再次传递出客观印象——在这里是通过使人类主体缺失而建构起来的，所以，实际上达到了聚焦所关注对象的作用。这个文本的另一标志是对该领域中技术术语的运用。

作者的位置被极其小心地建构为一种不存在的位置。也就是说，这个文本是以一种任何人都可能是作者的方式来写作的，因此既不需要也不涉及特定的作者。结果同那个超市研究报告中一样，读者也相应地被定位为不在场。

像这样的操作，明显对使用这种符码的人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对这种符码的使用成为习惯就更是如此。作者在这类文本中的主体地位是复杂的。他们学会将自身从文本中擦除。文本/对象成了最重要的东西。可能许多作者实际上都开始把这当做自己所处位置以及文本的现实状况。心不在焉的官僚就是这样。即便身为心不在焉的官僚，作者也掌握着这类文本中所固有的权力。其他作者会意识到他们所建构的不在场具有虚假性，意识到这种手段给予他们更大的权力。长袖善舞的政客就是这样。但是，进入符号活动还要包括的东西，不仅是生产，而且，更多时候，是对符号商品进行消费。在此，至关重要的是理解消费者/读者作为其进入符号活动的结果是被如何定位的：从能够为自己的目的建构/重构文本的、具有完全意识的读者，到相对而言听任文本对其读者进行定位的读者，情形不一。

进入文本的符号活动这一操作，笼罩着神话和神秘化。种种意识形态理论倾向于把意识形态处理成一个一劳永逸的范畴，以其不变的形式面对着前意识形态的个体，只向他们分发他们所能拥有的唯一社会角色和意义，不允许有可能发生分歧或抵抗的时间和空间。精神分析，特别是法国理论家雅克·拉康所阐述的精神分析，提出了一种历史，一种通过“现实



界”（the real）、“想象界”（the imaginary）和“象征界”（the symbolic）三重话语前进的三个有序阶段。但是这种历史具有神话特点，因为这三个阶段完成它们的工作的语境仿佛是在一个襁褓世界的迷雾之中，无法检验而且没有变化，却又为对现在的解释提供了一个高效的方案。针对这些观点，它们或者将历史连根拔起，或者将其变成神话，我们认为，进入符号活动这一操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真实而复杂的历史事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系列的历史。这些历史为构成成年人意识形态储备的整套东西贡献了不同的意识形态线索，有着为有效行动打开或关闭种种不同可能的不同路线。对这些相关历史的决定，在实践中往往是困难的，我们自身的解释当然也是程式化的，颇多遗漏。然而，我们的主要观点仍然成立：符号活动和关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形成的操作，必须在时间中发生，只有具有强烈的历时性元素的理论，才有希望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阐释框架。

附录：社会符号学理论中的关键概念

1 学科范畴

1.1 符号学（semiotics）是对符号活动（semiosis）的总体研究，符号活动即为各种交流施为者所使用的、所有形式中的意义生产与再生产、接受与流通的操作和效果。（符号学一词的形容词形式，即 semiotic，是指这种研究的对象范围，而符号活动则专指操作本身。）

1.2 社会符号学作为一种固有社会现象，在来源、功能、语境和效果方面，主要是同人类的符号活动相关。它也同社会意义相关，社会意义是通过整个系列的符号形式、通过符号文本和符号实践，在人类历史所有阶段的所有社会中建构起来的。

1.3 社会符号学研究所有人类的符号体系，因为这些在条件和内容方面具有本质的社会属性。社会符号学之外的符号学会将全然在非生命实体之间展开的交流活动包括在内（如对基因符码的研究，或者物理体系中的能量交换）。不过，机器之间的交际活动（譬如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的交流）则属于社会符号学范畴，因为机器是人类意图性的产物，为社会功能服务。

2 组成要素

2.1 符号现象总是具有社会和指涉这两个维度，因此必须用模仿层（mimetic plane）和符号活动层（semiosic plane）进行描述。模仿层表示作为可能指涉对象的某种/某些现实样式；符号活动层表示把生产者和接受者以及能指和所指连接成为一种重要关系的某种/某些符号事件。

2.2 符号活动层是模仿层不可或缺的语境，模仿层是符号活动层不可或缺的组成成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意义的社会生产发生的必要条件。虽然它们由同性质的结构和操作构成，但它们也能够生产出彼此冲突或矛盾的意义来。

2.3 能够拥有独立物质存在的意义最小单位是信息（message）。信息必须拥有一种物质性存在，其中至少有两个意义单位，即符号，它们被组织成一个横组合结构或横组合段。横组合段是时空中有意义的符号联合。

2.4 符号是横组合层面的一个部分，被处理成一个整体。它由横组合结构和纵聚合结构（或者分类体系）的相互作用而得以确定。纵聚合结构由系列选择来组织，符号的纵聚合意义来源于被那个结构语境中的选择行为所肯定或否定的系列符号。

2.5 符号在信息中的物质实现即它的能指，它所建构的指涉对象即它的所指。信息体系的结构同指涉对象的结构通过符码得以联系，符码通过兼容性的纵聚合结构对能指和所指进行组织。

2.6 如果符号的所有使用者都能觉察到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清晰联系，符号体系在意义生产中就能最经济地发挥作用。然而，符号活动层面的消极和敌对关系激发出相反的倾向，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无法达成，导致对这些联系的系统性扭曲。所以，根据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对于一个阶级的符号参与者觉察到的程度而定，符号可能在在透明和不透明之间发生变动。

2.7 信息通常根据所谓元符号那类符号的符号活动条件进行组织。元符号表示符号活动层面的不同方面，这样就能对参与者的符号行为做出限制。元符号在信息建构中常常是无处不在的，通常由作为标记的透明符号构成。

3 符号结构的原则

3.1 符号结构是由合并与分离这两个基本行为构造的，生产出统一和差异的表现。这些行为在符号活动中起作用的时候是互补的、彼此依存的。因此分离行为表示一种先在的统一，而合并行为在先在的更大不统一阶段起作用。

3.2 一些重要符号运作起源于包括各种扩张和各种收缩在内的这两种基本行为，收缩中最主要的行为包括否定行为和选择（choice）行为。否定只有从其反对的肯定面来看才具有意义，因此否定形式（包括全面否定、部分否定和颠倒）表示了正面的可能。选择是一种否定行为（在由差异构成的体系中肯定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在建构横组合段和文本的操作中，它是纵聚合体系中的主要的一类运作。就选择是一种否定而言，选择行为只有在考虑由所选择和所反对的东西组成的更充分结构的情形下才具有意义。

3.3 符号结构可以用连贯（融合/分离，相同/不同）和秩序（水平和垂直，涉及不同程度的复杂性和从属性）关系进行描述。两种重要的秩序分别是从属（涉及从属和层级）和并列（涉及平行和顺序）。

3.4 结构在不同层次上存在，考虑到符号切入点，可以标记为宏观结构（时间或空间中如此宏大以至于难于直接觉察的结构）、中级结构（具有使之能够直接接受考察规模的结构）和微观结构（太小以至于无法轻易觉察到的结构）。这些方面都和特定问题和特定符号定位有关。这种相对性和特定性从符号分析角度看倒并非不便。相反，要看到它本身正是对有效分析的一大贡献。不同层次的结构可以用构成模式方面的相似性（即同类性）、邻近性或因果性（即决定性）来关联。层次之间的符号运动可以命名为伸展（向上运动）或下潜（向下运动）。

3.5 在横组合段层面，分析的一个重要位置是文本。文本是被赋予符号活动整体性的一连串的信息。文本常常包涵由不止一个生产者所发出的信息，也不止实用一种符码。这些信息包括了模仿内容和系列

元符号，它们共同投射出文本的一种现实和一种符号活动状况。

3.6 在符号活动层面，分析的一个重要位置是话语。话语指符号活动操作而不是其产品（即文本）。它总是通过文本得以实现，并且与之不可分割。由于话语是任何文本的主要所指，文本的符号活动分析必须遵从话语分析。

3.7 纵聚合结构包括项目（它们所组织的材料）和分类符号（用于区分特征、明确标识的分类原则）。纵聚合结构只有在它们能够在文本中得到物质实现的时候才存在，实现的方式或者是通过关系横组合段（意义是纵聚合关系的横组合段），或者是通过标记（表示分类符号和分类的能指）。纵聚合结构内在地并不比横组合结构更具有抽象性或非物质性：在两种情形中，符号活动行为都能投射出精致的结构，它们并没有其他的物质存在，但只要人们认为它们存在，它们就都具有符号活动的力量。

3.8 信息符号活动效果的关键决定因素是它的模态，即其模仿内容与指涉对象构成的世界的那种被认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从肯定（高度亲密，高度模态）和到否定（弱或零度亲密/模态）之间的连续统一体中得到定位。模态判断通过模态标记传达，却通过模态暗示得到阐释，通过模态判断，接受者以参照模态标记和任一/所有符号活动层面构成成分和关系这种方式，对信息的重要性进行评估。符号层面中模态表现活动大量存在的地方，可谓模态密集，与之相对的是模态淡化。由于模态判断是基于被认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符号活动语境，模态判断表现了符号活动层面中其他主要关系，并被其所表现，因此，关于真相和现实的模态标记和定义被用于表现和建构特定的社会关系。

4 符号活动与时间

4.1 作为物质性事件的符号活动总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的，因此，所有横组合段都具有历时性的维度。不过，在为了阐释目的而认为信息生产或接受的时间经过可以忽略或无关的地方，横组合段可以被处理成共时性的。

4.2　历时性结构或者由连续性（跨越时间的相似/对立，或者连续，或者非连续）构成，或者由变化或转换构成。

4.3　变化涉及相对连续和相对非连续的两个方面。在非连续方面得到强调的地方，这种操作被建构为（并被理解为）转换，即从一个结构到另一个结构的非连续进程。在连续性得到强调的地方，这种操作被建构为滑动。但是，每个滑动都可以在结构方面通过独立出开头、中间和结尾阶段的方式当做转换来分析，而每个转换都可以作为由滑动所构成、作为连续的快速变化模式来分析。阐释者选择哪种方式，无论是滑动还是转换，本身都是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的。

4.4　转换分析的最小涉及面，包括初始结构和最终结构、操作、生产变化的力量和施为者。转换可以被归入模仿层面（模仿层面的转换），或者是符号活动层面。

4.5　模仿层面的转换作用于模仿层面的横组合和纵聚合结构，生产出横组合转换和纵聚合转换。对模仿层面的转换进行解释，必须总是参照符号活动层面，以阐明生产这种变化及其社会意义的各种力量。

4.6　符号活动层面的转换对各种媒介中的话语流进行组织。对符号活动层面的转换进行解释，必须总是参照参与者的社会关系，以阐释其社会意义以及生产它的各种力量。

4.7　转换分析的意义是它所投射的物质结构序列和物质性施为者，即便在许多情形下这些结构和施为者不能为分析者所完全了解，或者并不是以那种形式存在。文本生产者可能给出虚构的历史，不过，这些虚构历史正是他们文本意义的组成部分。接受者通过指涉文本本身和他们可能调用的其他文本，建构出他们自己的历史样式，成为阐释操作的组成部分。反过来说，文本生产者可能故意模糊文本的物质性历史，做出不可逆转的转换。或者一类接受者可能发现一系列转换是不可逆转甚至不可见的。转换分析的地位，于是，从来就不是绝对的，而是始终指向特定符号活动事件或状况。

5　符号活动和社会操作

5.1　符号活动行为和社会构成中的社会关系，是由权力（秩序和从属性）

和稳定性（凝聚和对抗）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同时这些维度具有典型的互补性和对立性。由此一来，每个社会群体都具有冲突和斗争操作的特点，具有针对基于群体构成中阶级、种族、性别、年龄以及其他方面等的不同社会范畴之间进行采纳和调停机制的特点。

5.2 社会中对立群体通过启动的社会现实样式，即所谓意识形态纲要，表达他们的社会关系和协调他们的利益。由于特定群体可能试图通过符号活动行为做出表达和控制冲突，捍卫权力和创造稳定性，文本的意识形态内容具有矛盾和不一致的特点，分析的功能单位就不是意识形态纲要，而是意识形态综合体，即服务于单一群体并表达其利益的一系列不同和矛盾的意识形态纲要。

5.3 意识形态综合体通过模仿层面进行表达。它们也作为思想控制体系嵌刻在符号活动情形中。思想控制体系通过规定符号活动生产对社会行为进行约束：谁能/不能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符码生产或接受什么意义。为了发挥交流手段和实施的作用，它们必须依赖已知的范畴、规则和主动的施为者。

5.4 思想控制体系能够通过指涉任一符号活动层面的主要成分这种方式得到明晰和传达，尽管在实践中，每种传达模式都是一个彼此连贯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们集中在：（1）生产者，通过生产体制这些指向生产者的规则，它们规定生产者能生产什么意义，如何生产，为谁生产；（2）接受者，通过接受体制这些指向制约接受者符号活动潜在可能的规则；（3）文本，通过体裁体制，它们运用对文本的各种划分对意义的可能以及生产和接受关系实施制约；（4）指涉对象，通过知识体制或者对符号活动可能话题的划分，根据特定的现实样式和关于谁能够格地宣称了解或理解它们的那些社会限制。

5.5 思想控制体系通过联系起特定类型的施为者、行为、对象和环境那些横组合形式实现，又通过划分规则所覆盖的民众、对象、行为和环境那些纵聚合形式实现。思想控制体系的中心是其内核，给出了各类主要施为者和对象的主要选择。思想控制帝国主义理论通过横组合层面起作用，扩大了横组合纽带的力量和范围，又通过纵聚合层面起作用，对施为者、对象、行为和环境进行划分和重新划分。

5.6 思想控制体系也可能受到抵抗和颠覆。在其横组合和纵聚合结构和规则方面，内核都可能受到直接攻击。或者在主导形式的结构和规

则受到弱化或颠转的地方，例外领域能够得到建构，生成反社会、反语言和反世界。

6 分析原则

6.1 符号活动决定

符号活动层面的条件、思想控制体系和反对场所，需要在对模仿层面进行分析之前得到明确，因为符号活动结构决定了模仿结构。

6.2 模仿锚定

指涉对象构成的世界需要对独立于文本的模仿内容进行明确。

6.3 意识形态内容

文本和话语所暗示的种种相互竞争的社会现实样式需要为每个文本做出解析。

6.4 分析锚定

分析家需要把自身定位在一个结合文本的符号活动结构中，这个结构有其各种各样的操作，目的是做出关于他们自己分析水平、关于结构的取向和意蕴等等决定。

6.5 同型

应该对各种可能的同型进行调查：模仿结构和符号活动结构之间；横组合结构和纵聚合结构之间；共时性结构和历时性结构之间；微观结构、宏观结构和中级结构之间；语言结构和非语言结构之间。

6.6 冗余和缺场

应该对各种样式的冗余进行调查，包括不同程度、不同符码和媒介中的重复信息，还应该对各种各样的特定缺场进行调查，包括模仿层面上所启动的压抑。

6.7 矛盾

对于每个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信息，在模仿层面和符号活动层面，在不同符码、媒介和水平上，都需要对与之对立的信息和意义的在场进行调查。

参考书目

Aers, D. and Kress, G. R. 1981. 'The language of social order: Individual, society and historical process in *King Lear*'. In Aers, D., Hodge, R. and Kress, G. R., *Literature,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England*, 1580 – 1680, Dublin: Gill Macmillan.

Aeschylus 1936. *The Orestes Plays* (trans. P. Roche). New York: Mentor Books.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Althusser, L. and Balibar, E. 1977. *Reading Capital*. London: New Left Books.

Arieti, S. 1981. *Understanding and Helping the Schizophrenic*. Harmondsworth: Penguin.

Arnold, M. 1869. *Culture and Anarchy*. London: Smith, Elder.

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2nd ed., 1975).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khtin, M. 1968.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 H. Iswolsk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Bandler, R. and Grinder, J. 1979. *Frogs into Princes*. Moab, Utah: Real People's Press.

Barthes, R. 1973. *Mythologies* (trans. A. Lavers). London: Paladin.

Barthes, R. 1977. *Image-Music-Text* (trans. S. Heath). London: Fontana.

Bateson, G. 1973.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London: Granada.

Belsey, C. 1980. *Critical Practice*. London: Methuen.

Benjamin, W. 1973. *Illuminations* (trans. H. Zohn). London: Fontana.

Benveniste, E. 1971.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M. Meek). Coral Gables: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Berger, J. 1972. *Ways of Seeing*. Harmondsworth: Penguin.

Berger, P. and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k: Doubleday.

Berne, E. 1967. *Games People Pla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ernstein, B. 1971.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vol. 1.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Bourdieu, P. 1971. 'The Berber house of the world reversed'. In *Échanges et Commu-*

nications: mélanges offerts àClaude Lévi-Strauss àl'occasion de son 60ᵉ *anniversaire*, The Hague: Mouton.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Fudgement of Taste* (trans. R. Nic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Bourdieu, P. 1988.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ed. J. B. Thomps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ourdieu, P. and Passeron, J. -C.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trans. R. Nice). London: Sage.

Brown, R. and Gilman, A. 1960. 'Pronouns of power and solidarity'. In Sebeok, T. (ed.), *Styl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Brown, P. and Ford, M. 1961. 'Address in American English'. *f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62.

Chilton, P. (ed.) 1985. *Language and the Nuclear Arms Debate*. London: Frances Pinter.

Chomsky, N.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The Hague: Mouton.

Chomsky, N.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Chomsky, A. 1976.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op Books.

Cicourel, A. 1973. *Cognitive Sociology*. Harmondsworth: Penguin.

Clark, K. 1969. *Civilization*. London: BBC Publications.

Coward, R. 1984. *Female Desire: Women's Sexuality Today*. London: Granada.

Coward, R. and Ellis, J. 1977. *Language and Mat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Cranny-Francis, A. 1987 (a). 'Gender and genre: feminist rewritings of detective fiction'. I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Cranny—Francis, A. 1987 (b). 'Sexual politics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Bram Stoker '*Dracula*' In C. S. Bloom (ed.), *Masters of Nineteenth-century Suspense*. London: Macmillan.

Culler, J. 1976. *Saussure*. London: Fontana. Davis, J. 1982. *Kullark/The Dreamers*. Sydney: Currency Press.

de Lauretis, T.

1984. *Alice Doesn't*.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Deleuze, G. and Guattari, F. 1977.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R. Hurley, M. Seem and H. Lane). New York: Viking.

Demosthenes 1889. *The Orations* (trans. C. Kennedy). London: Bell.

Derrida, J. 1976. *Of Grammatology* (trans. G. Spiva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errida, J. 1978.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 A. Bas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Dorfman, A. and Mattelart, A. 1975. *How to Read Donald Duck* (trans. D. Kunzl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Douglas, M. 1970. *Purity and Dang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Douglas, M. (ed.) 1973. *Rules and Mean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Downes, W. 1984. *Languag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Durkheim, E. 1970. *Suicide* (trans. J. Spaulding and G. Simps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Eaton, T. 1972. *Theoretical Semics*. The Hague: Mouton.

Eaton, T. 1978. 'Literary semantics: modality and style'. *F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 vii. 1.

Eco, U. 1976. *A Theory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Eco, U. 1978. *The Role of the Reader: 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Eisenstein, S. 1968. *The Film Sense* (trans. J. Layda). London: Faber and Faber.

Engels, F. 1884.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In K. Marx and F. Engels (1968), *Selected Wor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Everett, M., Waddell, J. and Heath, D. (eds) 1976. *Cross-cultur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lcohol*. The Hague: Mouton.

Fans, J. 1968. 'Validation in ethnographical description: the lexicon of "occasions" in Cat Harbour'. *Man*, n. s., 3, 1.

Fergusson, C. 1959. 'Diglossia'. *Word*, 15, 325—40.

Fiske, J. and Hartley, J. 1978. *Reading Television*. London: Methuen.

Fiske, J., Hodge, R. and Turner, G. 1987. *Myths of Oz: Readings in Australian Popular Culture*. Sydney: Allen and Unwin.

Foucault, M. 1967.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trans. R. Howard). London: Tavistock.

Foucault, M. 1971. 'Orders of discourse'.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0 (2), 7—30.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M. Sheridan Smith). London: Tavistock.

Fowler, R., Hodge, R., Kress, G. R. and Trew, A. 1979. *Language and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Freud, S. 1965.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trans. J. Strachey). New York: Avon Books.

Freud, S. 1971.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trans. J. Strachey). Harmondsworth: Penguin.

Game, A. and Pringle, R. 1983. *Gender at Work*. Sydney: Alien and Unwin.

Geertz, C. 1973.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Gerbner, G. 1977. 'Comparative cultural indicators' in G. Gerbner (ed.), *Mass Media Policies in Changing Cultures*, New York: John Wiley.

Giddens, A. 1976.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London: Hutchinson.

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 1976/80. *Bad News* (2 vol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Goffman, E. 1961. *Asylums*. New York: Doubleday.

Gramsci, A. 1971. *Prison Notebooks* (ed. and trans. Q. Hoare and G. Nowell-Smith).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Grosz, E. 1986. *Irigaray and the Divine*. Sydney: Local Consumption Publications.

Gumperz, J. (ed.) 1982. *Language and Social Ident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Habermas, J. 1974.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 J. Viertel). London: Heinemann.

Habermas, J. 1976. *Legitimation Crisis* (trans. T. McCarthy). London: Heinemann.

Hall, E. 1966. *The Hidden Dimension*. New York: Doubleday.

Hall, S, et al. (eds) 1980.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Halliday, M. A. K. 1971. *Learning How to Mean: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London: Edward Arnold.

Halliday, M. A. K. 1976. *System and Function in Language* (ed. G. R. Kres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London: Edward Arnold.

Halliday, M. A. 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Halliday, M. A. K. and Hasan, R.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 Longmans.

Hawkes, T. 1977.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 London: Methuen.

Heath, S. 1981. *Questions of Cinema*.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eider, F. 1958.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ew York: Wiley.

Herriot, J. 1985. *Only One Woof*. London: Piccolo Books.

Hjelmslev, L. 1953.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odge, R. 1984. 'Historical semantics and the meaning of "discourse"'. *Australian F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 2.

Hodge, R. 1985. 'Song'. In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 (ed. T. van Dijk).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Hodge, R. and Kress, G. R. 1982. 'Semiotics of love and power: *King Lear* and a new stylistics'. *Southern Review*, 15, 2.

Hodge, R. and Kress, G. R. 1986. 'Rereading as exorcism: semiotics and the ghost of Saussure'. *Southern Review*, 19, 1.

Hodge, R, and Tripp, D. 1986. *Children and Televis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oggart, R. 1958. *The Uses of Lite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Humphreys, S. 1983. *The Family, Women and Death*.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Hymes, D. 1972. 'Models of the interaction of language and social life'. In J. Gumperz and D. Hymes (eds),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Hymes, D. 1974.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Irigaray, L. 1986. *Divine Women*. Sydney: Local Consumption Press.

Jakobson, R. 1968. *Child Language, Aphasia and Phonological Universals*. The Hague: Mouton.

Jakobson, R. 1980. 'Sign and system of language: a reassessment of Saussure's doctrine'. *Poetics Today*, 2 : 1a, 33—8.

Jakobson, R. and Waugh, L. 1979. *The Sound Shape of Language*.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Jameson, F. 1981.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London: Methuen.

Kress, G. R. 1982. *Learning to Writ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Kress, G. R. 1985. *Linguistic Processes in Socio-cultural Practice*. Geelong: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Kress, G. R. (ed.) 1987.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Sydney: N. S. W. Uni-

vesity Press.

Kress, G. R. 1987. 'Textual matters: the social effectiveness of style'. In D. Birch and M. O'Toole (eds), *Functions of Style*, London: Francis Pinter.

Krcss, G. R. 1988. *Writing as Social Process*. London: Routledge.

Kress, G. R. and Hodge, R. 1979. *Language as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Kristeva, J. 1980. *Desire in Language* (trans. T. Gora, A. Jardine, L.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ChicagoUniversity Press.

Labov, W. 1978.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Oxford: Blackwell.

Lacan, J. 1977.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 Sheridan). New York: Norton.

Laing, R. D. 1969. *The Divided Self*.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Laing, R. D. 1971. *The Politics of the Famil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Laing, R. D. 1972. *Knots*. Harmondsworth: Penguin.

Leach, E. (ed.) 1969. *Genesis as Myth*. London: Jonathan Cape.

Leach, E. 1970. *Claude Lévi-Strauss*. London: Fontana.

Lévi-Strauss, C. 1963.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trans. C. Jakobson and B. Schoepf). New York: Basic Books.

Lévi-Strauss, C. 1969 (a). *The Raw and the Cooked* (trans. J, and D. Weightman). London: Jonathan Cape.

Lévi-Strauss, C. 1969 (b).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trans, J. Belle and J. von Sturmer). London: Jonathan Cape.

Lévi-Strauss, C. 1976.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II* (trans. M. Layt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Lukacs, G. 1963. *The Meaning of Contemporary Realism*. London: Merlin.

Lyotard, J.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trans. G. Bennington and B.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linowski, B. 1923.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In C. K. Ogden and G. A.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Malinowski, B. 1965.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Marcuse, H. 1964. *One Dimensional Ma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Marx, K. 1971. *Early Texts* (trans. D. McLellan). Oxford: Blackwell.

Marx, K. and Engels, F. 1970. *The German Ideology* (trans. C. Arthur).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McGraw Hill.

Mead, G.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ed, C. Morri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Mead, M. 1962. *Male and Female*. Harmondsworth: Penguin.

Merquior, J. G. 1986. *Foucault*. London: Fontana.

Mitchell, J. 1975.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Mitchell, J. and Rose, J. (eds) 1982. *Lacan: Feminine Sexuality* (trans J. Rose). New York: Norton.

Morris, C. 1971. *Writings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Signs*. The Hague: Mouton.

Muecke, S. 1982. 'Language as a series of statements'. *Southern Review*, 17, 4.

Muecke, S. 1984. *Reading the Country*. Perth: Fremantle Arts Centre Press.

Namba, M. and Kaiya, H. 1982. *Psychobiology of Schizophrenia*. Oxford: Pergamon.

Newcomb, H. 1974. *TV: the Most Popular Art*. New York: Doubleday.

Norris, C. 1982.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Methuen.

Ong, W.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London: Methuen.

Orwell, G. 1954. 1984. Harmondsworth: Penguin.

Palazzoli, M. Selvini, Boscolo, G., Cecchin, G. and Prata, G. 1978. *Paradox and Counterparadox* (trans. E. Burt). New York: Jason Aronson.

Pêcheux, M. 1982. *Language, Semantics, Ideology*. London: Macmillan.

Peirce, C. S. 1940/65.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Poster, M. 1978. *Critical Theory of the Family*. London: Pluto Press.

Poster, M. 1984. *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oynton, C. 1985. *Language and Gender: Making the Difference*. Geelong: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Price, R. and Paisley, W. (eds) 1981. *Public Communication Campaigns*. Beverley Hills: Sage.

Quant, M. 1984. *Colour by Quant*. London: Octopus Books.

Rochester, S. and Martin, J. 1979. *Crazy Talk*. London: Plenum.

Sansom, B. 1980. *Camp at Wallaby Cross*.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boriginal Studies.

Sapir, E. 1949. *Selected Writings* (ed. D. Mandelbau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aussure, F. de 1974.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ed. J. Culler, trans. W. Baskin). London: Fontana.

Schütz, A. 1970—3. *Collected Paper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

Silverman, D. and Torode, B. 1980. *The Material Wor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Sophocles, 1947. *The Theban Plays* (trans. E. F. Watling). Harmondsworth: Penguin.

Spender, D. 1980. *Man Made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Thompson, J. B. 1984.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de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Thomson, G. 1972. *Aeschylus and Athens*. New York: Haskell House.

Thorne, B., Kramerae, C. H. and Henley, N. 1983. *Language, Gender and Society*.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Turner, V. 1967. *The Forest of Symbol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ylor, E. 1971. *Primitive Culture*. London.

Van Gennep, A. 1960. *Rites of Passa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van Leeuwen, T. 1987. 'Music and ideology: notes towards a sociosemiotics of mass-media music'. *SASSC* (Sydney Association for Studies in Society and Culture),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Voloshinov, V. N. 1973.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New York: Seminar Press.

Vygotsky, L. 1962.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Watzlawick, P., Beavin, J. and Jackson, D. 1967, *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Norton.

Whorf, B. 1956.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ed. J. Carroll).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Williams, R. 1958.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Williams, R. 1974.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Fontana.

Williams, R. 1976. *Keywords*. London: Fontana.

Williams, R.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thnell, E. 1984. 'Spatial determinations of the criminal's existential world'. *Australian F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 2.

Wittgenstein, L. 1967.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

Wittgenstein, L. 1971. *Tractatus Logico-Philosphicus*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社会符号学
页数=274
SS号=13089141